章太炎政論選集

中華書局

章太炎政论选集

上　册

汤志钧　编

中　华　书　局

1977年·北京

前　言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中国面临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和严重的民族危机。曾经积极投身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而后来“渐入颓唐”的章太炎一生中写有不少专著和诗文，《章太炎政论选集》选录了章太炎的短篇论著和函电、诗歌，为研究章太炎思想和中国近代历史提供一点参考资料。

一

章太炎（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年），名炳麟，字枚叔，因仰慕顾炎武（初名绛，入清后改炎武）的为人，更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

章太炎早年走的是封建学者的道路，跟随俞樾在杭州诂经精舍埋头“稽古之学”。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朝被日本侵略者打败，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刺激下，章太炎毅然走出书斋，参加强学会，编撰《时务报》，基本上赞成维新变法。他曾上书李鸿章，企求他能“转旋逆流”①，也曾跑到武昌，帮张之洞办《正学报》，幻想借助他的实力推动变法。不久，“百日维新”夭折，章太炎避地台

① 章太炎：《上李鸿章书》，见本书卷一。

湾，东渡日本，和"尊清者游"，对改良主义者仍表同情。

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掀起，八国联军入侵，进一步暴露了清朝政府"量中华之实力，结与国之欢心"的眞面目，慈禧一伙的卖国主义原形也暴露无遗，章太炎受到极大震动，从维新梦中醒了起来。七月，在上海召开的"张园国会"上，章太炎激烈反对改良派提出的"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模糊口号，"宣言脱社，割辮与绝"。接着，树起反清的旗帜，开始向改良派展开斗争。

一九〇二年初，章太炎在日本和孙中山定交，共同商讨"开国的典章制度"和中国的土地赋税问题。返国后，重订《訄书》，在《订孔》、《学变》等篇中，批判了孔丘的"虚誉夺实"和尊孔派的"苟务修古"，在思想界起了强烈反响[1]。一九〇三年，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直截了当地把康有为、梁启超之流奉为神圣的光绪皇帝斥为"载湉小丑"，打击了改良主义，提高了革命思想。

一九〇三年六月，章太炎因宣传革命，被监禁于上海"西牢"，他除在敌人的法庭上和监狱中愤怒斥责中外反动派的卑劣勾当，宣言"不认野蛮政府"[2]外，又继续撰文，力言革命之必要，说："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3] 对革

---

① 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余杭章氏《訄书》，至以孔子下比刘歆，而孔子遂大失其价值，一时群言，多攻孔子矣。"见《国粹学报》乙巳年第六号"社说"。

② 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二十一日知府金鼎致兼湖广总督端方电，见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一册第四二五页。

③ 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见本书卷一。

命胜利充满了信心。

一九〇六年六月，章太炎出狱，在日本主编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深刻揭露改良派"污邪诈伪"、志在干禄的丑态，积极阐扬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旨意，愤怒斥责革命投机分子"自慕虚荣"、"私心暧昧"的劣迹，和立宪党人斗，和向敌人"献策"的吴稚晖等人斗。他在《民报》上发表的文章，大都针锋相对，文字锐利，"眞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①。

一九〇八年十月，日本政府下令封禁《民报》，章太炎亲至警廷，慷慨陈词，不怕坐牢，高呼"革命无罪"。

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对敌斗争的英勇，论战文章的犀利 至今犹威生气勃勃。这些，正是他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但这场革命以妥协而告终，沒有也不可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章太炎和同盟会早有裂痕，当黄兴在汉阳就扩大同盟会问题征求意见时，他竟"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告之"②。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又与立宪党人张謇等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旋又改为统一党，拥护袁世凯，攻击孙中山。不久，袁世凯"攘窃国柄，以遂私图"，章太炎斥责袁世凯"包藏祸心"，致被幽禁。释放后，一度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

此后，章太炎"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③。对过去批判过

①③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见《且介亭杂文末编》(下同)。

② 章太炎：《民国光复》，见本书卷三。

的儒术"服膺"起来了，对过去抨击过的孔丘尊奉起来了，以致"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1]。但当帝国主义蹂躏祖国，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候，他出来谴责国民党"怯于御敌而勇于内争"，临死前主张抗日，保持了爱国主义晚节。

鲁迅先生评述章太炎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又说："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2]在《趋时和复古》一文中还说："清末，治朴学的不止太炎先生一个人，而他的声名，远在孙诒让之上者，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趋时，而且还'造反'。后来'时'也'趋'了过来，他们就成为活的纯正的先贤。但是，晦气也夹屁股跟到，……孙传芳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原来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这就是鲁迅先生对章太炎非常中肯的评价。

章太炎从进步转向倒退，是由其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决定的。毛主席指出："**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从这一方面说来，**

---

①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②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在中国革命史上，他们也曾经表现过一定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积极性。”“但是又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沒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这种情形，特别是在民众革命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证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领导，不能不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只有“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接受无产阶级的帮助和领导，才能在民主革命中有所作为，而不致被历史所淘汰。

二

章太炎在甲午战争前后到一九三六年逝世前，四十多年的历程中，写了很多论著。由于他的思想有演变，«章氏丛书»的结集又在辛亥革命以后，这样，他早期的很多革命文章，就每多刊落，或经过磨勘。因此，系统搜集章太炎各该时期的论著，才能比较全面地反映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和思想面貌。

章太炎的论著，很多散见于各种报刊。辛亥革命前，他曾先后在«时务报»、«经世报»、«实学报»、«译书公会报»、«昌言报»、«清议报»、«亚东时报»、«五洲时事汇报»、«国民报»、«苏报»、«国民日日报»、«浙江潮»、«复报»、«民

报》、《汉帜》、《国粹学报》、《学林》、《教育今语杂志》等报刊撰文。辛亥革命后，他的文章又散见于《民国报》、《大共和日报》、《民立报》、《申报》、《民国日报》和他自己主编的《雅言》、《华国》、《制言》中，发表时的署名，有章炳麟、章绛、太炎、菿汉阁主、台湾旅客、西狩、戴角、独角、末底等。

章太炎论文最早的结集是《訄书》，一八九九年冬付梓，一九〇〇年七月前出书，苏州木刻本，录《尊荀》等五十篇，另"补佚"二篇。一九〇二年，他从日本返国，将《訄书》"删革行于世"，于一九〇四年出版重印本，把《客帝》、《分镇》改为"匡谬"，作为"前录"；又将篇目调整为六十三篇，以《原学》、《订孔》始，以《解辫发》终。一九〇八年，《民报》封禁前后，章太炎着手编辑《太炎集》，所录以学术论文为多①。不久，他又手改《訄书》，准备增加《原儒》、《原经》等谈儒论经之文，对重印本的批孔反清之作，每加刊削。关于结集的选文标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是这样讲的："仆之文辞，为雅俗所知者，盖论事数首而已，斯皆浅露，其辞取足便俗，无当于文苑。向作《訄书》，文实闳雅，箧中所藏，视此者亦数十首，盖博而有约，文不奄质，以是为文章职墨，流俗或未之好也。"② "论事数首"，指的是《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以及发表在《民报》、《复报》等报刊上的战斗作品，章氏以为"无当于文苑"。这些"雅俗所知"，起了重大政治影响的"论事数首"，章氏反以为"浅露"；而诘屈聱牙，索解为难的，却以为可入"文苑"。以往

① 《太炎集》，抄本，北京图书馆藏，系年编次。

② 章太炎：《与邓实书》，见本书卷二。

章太炎在中外反动派的严密监视下，用比较隐讳深奥的文字阐述反清批孔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但章太炎在辛亥革命胜利前夕，追求“流俗或未之好”的所谓“传世”之文，写作不再是为了当前的战斗，而想留入今后的“文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倒退。

一九一四年，章太炎在被袁世凯幽禁期间，手定《章氏丛书》，包括《春秋左传读叙录》一卷，《刘子政左氏说》一卷，《文始》九卷，《新方言》十一卷、附《岭外三州语》一卷，《小学答问》一卷，《说文部首韵语》一卷，《庄子解故》一卷，《管子余义》一卷，《齐物论释》一卷，《齐物论释》重定本一卷，《国故论衡》三卷，《检论》九卷，《太炎文录》文录二卷、别录三卷、补编一卷，《菿汉微言》一卷。有上海右文社铅字排印本、浙江图书馆刊本、上海古书流通处印本和上海世界书局石印本。右文社本刊行最早，多误字；浙江图书馆本刊印最精，收录较多①。所收大都是学术专著，《太炎文录》也只收录了一些诗文，而先前登在期刊上的斗争文章竟多被刊落，如发表在《浙江潮》的《狱中赠邹容》等诗，发表在《苏报》的《狱中答新闻报》、发表在《民报》的《复吴敬恒书》以及好多“时评”，《文录》多未收载。《检论》是他就《訄书》增删而成的，但《客帝匡谬》、《分镇匡谬》和《解辫发》等篇也都删除了。一九三三年，章太炎弟子吴承仕、钱玄同校刊《章氏丛书续编》，收《广论语骈

---

① 上海右文社本，印于一九一五年，章太炎曾有手校本；浙江图书馆本刊于一九一九年，其中《齐物论释》重定本、《太炎文录补编》、《菿汉微言》三种，为右文社本所无。

枝》一卷，《体撰录》一卷，《太史公古文尚书说》一卷，《古文尚书拾遗》二卷，《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五卷，《新出三体石经考》一卷，《菿汉昌言》六卷，共七种，所收不多，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战斗之作。章太炎逝世后，章氏国学讲习会编印《章氏丛书》三编，一九三八年在武汉排印《太炎文录续编》，对《太炎文录》初编、续编不收之作，“不敢续录”，《华国》、《制言》所载书札也未阑入。因此，《章氏丛书》初、续、三等三编，并未曾把章太炎文章搜集完备，特别是有关政论性的诗文、演说辞、时评、函电等，刊落很多。

至于时人编辑或坊间流行的，则有《章太炎文钞》五卷，静荠编辑，一九一四年三月上海中华图书馆石印本；《太炎最近文录》一册，钱须弥编辑，一九一五年四月上海国学书室铅字排印本；《章太炎的白话文》一册，吴齐仁编，一九二一年六月上海泰东图书局铅字排印本；另有《章太炎先生尺牍》、《章太炎尺牍》、《章太炎文选》等。其中《章太炎文钞》出版在《章氏丛书》初编之前，掇拾《訄书》和《民报》、《国粹学报》诸文，间有《章氏丛书》未收之作。《太炎最近文录》一书，据编者说：“与右文社近刊之《章氏丛书》无一重复”，其实只是章太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三年间在报刊上发表的宣言、函电等的汇辑；“附录”虽也曾录有载于《民报》的文章，但数亦寥寥。《章太炎的白话文》都是章太炎发表在《教育今语杂志》上的讲演纪录。至于《章太炎先生尺牍》等，则校印多讹，很少可取。

对于章太炎的文章，《章氏丛书》既收录不全，内容又时有刊削，因此，爬梳佚文，雠校异同，重行辑集，很有必

要。特别是他在辛亥革命前的战斗文章，诚如鲁迅先生所说："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①

本书编于一九六一年。当时虽曾注意搜集章太炎革命时期的战斗作品，对较能反映他思想发展的内容变动也稽核校注，但选目、说明等方面都存有一些问题。现在，中华书局编辑部决定在原有基础上增删印行。由于个人水平限制，选辑编排的不恰当，校勘说明的欠精审，以及标点分段的不够完善都在所难免，恳切地希望同志们提出批评。

在编选本书过程中，得到各方面的热情支持，对此谨致谢忱！

汤 志 钧

一九七六年十月

①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编辑说明

一、本书编选资料，以章太炎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至一九三六年逝世前的政治论文为主，带有政治主张的演说辞、宣言、通电、启事、书札、诗文以及与中国近代史事有关的人物传记等也酌予选录；至于学术性较强的文章则未收入。

二、本书编选资料，以单篇论文为主，主要结合章太炎思想活动按照不同历史阶段，分三卷编选：一八九五年——一九〇五年为第一卷；一九〇六年——一九一一年十月为第二卷；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一九三六年为第三卷。

三、本书编选资料，基本按照撰作或发表先后叙次编排，一律注明来源、发表刊期，手稿、抄件亦附志藏所。

四、本书编选资料，凡有撰著时日可稽，或经推敲大体可以确定的，一律以撰著时间为序；如果撰时不详，而系当时发表在报刊上的，则按照报刊出版年月编次。如有不见于报刊而又暂时无法查究写作时间，或虽载报刊而发表较晚，难于肯定写作时间的，则注明约撰何时或暂按报刊出版年月编次。

五、本书编选资料，一般都据最初刊载时的版本录

入，并将以后结集复勘，校注说明。

六、本书编选资料，一般采用最初发表时的标题，遇有原无标题的，如演说辞、宣言、通电、函札等，则由编者根据内容酌加。

七、本书编选资料，均予标点分段，凡肯定是误植的，下加〔 〕号，凡肯定是脱字的，下加〈 〉号；并将正字、脱字注于〔 〕、〈 〉之中。凡缺字，用□号标出。至于重印时改易的，则移入校注。

八、本书编选资料，凡属古体字、异体字等较难辨认的，除有特殊涵义者外，改为通行字体，以便读者。

九、本书为便于读者瞭解章氏政论发表时的情况，属于论战性的文章，一般将对方具有代表性的文字酌予附载，以供参考。

十、本书所选"演说辞"和"问答"，有的不是出于章太炎手笔，但曾发表在他主编的报刊或经他过目，故仍编入。

目　　录

卷　一

（一八九五年——一九〇五年）

卷　二

（一九〇六年——一九一一年十月）

卷　一

（一八九五年——一九〇五年）

编者按：这里选录章太炎在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五年写的政治论文、函札、诗文等，凡六十二篇。

章太炎从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开始参加政治活动，主张“以革政挽革命”。戊戌政变发生，还一度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影响。到了义和团运动展开，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疯狂侵略，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他逐渐由改良转入革命。一九〇二年，在日本和孙中山相晤，受到启发；返国后，将所撰《訄书》“删革”。一九〇三年，为邹容写的《革命军》撰序，并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康有为等改良派的思想和主张作了严厉的批判，激切地提出了革命的要求。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中外反动派的仇视，发生了震动全国的“苏报案”。

这一时期章太炎的重要政治论文、函札等，在他自己编的《章氏丛书》中，绝大部分都未收录，有的虽经收入，

文字已有磨勘。今从当时报刊和现存手迹中辑出，基本上按照撰写或发表年月的先后，加以编排；并将他所驳难的文章和可资参证的记述，辑附于后，并供参考。

致汪康年书

（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穰卿仁兄姻大人阁下：泰春解逅，目击道存，吴越既隔，相见日浅。撢览大著，词旨瑰丽，复中义法。与某氏公报，体分雅郑，虽无夔旷，听音立辨。方今风教浇讹，群喙异响，小雅不废，赖有兹编。怀欲著论，遥和钧韶，搦管笔毫，复无佳处。然辞义所趣，故以孰哉。远裔种族匪殊，亲仁善邻，宜捐小忿，刺隙视文，或殊擿埴，移书粗眎，傥昭所尤。顷戎夏交捽，鼙鼓未息，吾侪坐谈九州，虑非亟务，要自不为田巴呴吐王伯，趣以洮汰疑滞，解释槃结，亦掌故之一官已。

大著宗旨，不欲臧否人物，踶非教令，斯诚定、哀微辞，言者无罪。抑商榷法制，无过十端，数册以往，语欲屈竭，则绣其鞶帨矣。刍荛之见，谓宜驰骋百家，掎摭子史，旁及西史，近在百年，引古鉴今，推见至隐。昔太冲«待访录»原君论学，议若诞谩，金版之验，乃在今日。斯固玮琦幼眇，作世模式者乎？如鄙见可采，倘有数首，即当写奉。

证今则不为巵言，陈古则不触时忌，昔人以三百五篇谏者，其是谓欤？手肃，即颂纂祉不宣。姻愚弟制章炳麟顿首。十一月二十五日。

【说明】 此书录自《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上海图书馆藏。

一八九五年，中国被日本侵略者打败，深重的民族危机把章太炎逼上政治舞台。这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发展成为政治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上海成立强学会，章太炎"闻康设会，寄会费银十六元入会"。（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见《制言》第二十五期。）一八九六年秋，《时务报》在上海创刊，经理汪康年延请章太炎担任撰述。章太炎在这封信中提出了他当时的办报主张。

此书末署"十一月二十五日"，当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不久，章氏即由杭来沪。

论亚洲宜自为唇齿

（一八九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天地以五大洲别生分类，一区之中，人民禽兽不相越，必有人焉，整之齐之君之师之魁之桀之，圣王因其教，制共宜，不易其俗。故自唐尧以来，以里海乌拉岭为戎索，以绝亚、欧，以区黄人、白人。然而天地之运，无四千年无亢龙绝气，故放于东海，放于西海，其不能不相通者，期会然也。夫通则何病也，地体华离，犬牙相错，其本氐于欧洲，其标末于亚洲，于是乎震旦病。

亚洲之国，西有印度，南有巫来由族，制于他人，威灵所不及；其在边裔，突厥之受侮，与中国等，亦不能为我利害也。处于温带者，中国为大，东迤千余里，海岛之国，日本为大。由二国之北，溯甘查甲以上，尾大而掉，俄罗斯为大。然以赤县之地，近在肘掖，可以相倚依者，阖亚洲维日本。往者中、东有违言，将率失律，师丧而地分。诸簪笔持牍者，莫不瞋目语难，冀得当一雪耻，虽以穷发之国，饕餮于朔方，忘其欲噬，密与为盟誓。背同类而乡异族，

岂不左哉？昔兴亚之会，创自日本，此非虚言也。中依东，东亦依中，冀支那之强，引为唇齿，则远可以敌泰西，近可以拒俄罗斯，而太平洋澹矣。不幸中国刓弊，有兵实不练，有地藏不启，有学校不教，受侮邻国，惟北方尤甚！彼观其意，且欲盗黄海以为己属。日本壤地相属，而惧俄罗斯之逼处也，曰："宁我薄人，无令人薄我。"铤而走险，虽有瀛海之阻则凌之，虽有金城之塞则陷之，故先发难于朝鲜、辽东，以掩俄罗斯所未举，非其黩武，冀自救也。使中国生其霸心，发愤图自强，综核名实，使卒越劲，使民悫愿，使吏精廉强力，日本将亲睦之不暇，而又何寇焉？使中国不生其霸心，不发愤图自强，不新制度，随俗雅化，惟旧章之守，虽无日本，犹蚕食于俄罗斯，何耻之可雪？

且国家不早自振厉，以稍陵夷，至于谯诟之中，乃欲自张大，斯不亦远乎？夫句践之臣吴也，犹有报志也；蜀相之结吴也，无报志也，彼惎曹魏，则吴不得怨，故覆于南郡，烬于白帝，再挫之忿，而不敢复焉。宋与女真，宗祢之痛也，引蒙古以灭之，终自戕败，庙算失也。故地处其逼，势处其隍，九世之仇，而不敢复焉。何者？两熊之斗，败者引猨以自助，则身先禽也。今中国无深长虑，欲一快心日本，密约俄罗斯，以为系援，至于胶州屯军，吉林筑路，齐鲁与东三省将为异域，悲夫！

乃者法、俄合从，南北为罗，且夹沟而移我。我在亚洲，犹鱼之濡沫于九罭，虽日本亦有戒心焉。为今之计，既修内政，莫若外昵日本，以御俄罗斯。两国斥候，迻遣于东海，势若檠榜，无相负弃，庶黄人有援，而亚洲可以

无顽。

难者曰：方今观微之士，以为中国羸病，犁十年而仆，虽与日本结，其何瘳乎？曰：夫发愤为天下雄，则百年而不仆；怠惰苟安，则不及十年而亦仆。吾所议者，为发愤者言也，非为怠惰苟安者言也。夫苟怠惰苟安，虽有形势，若旅顺之厄，马尾之险，可以失之；发愤而为雄，而后以邻国犄角为可恃也。不然，则一饭之顷，已溃败决裂矣，安能十祀？

【说明】 本文录自《时务报》第十八册，一八九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出版。

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

（一八九七年三月三日）

血轮大小，独巨于禽兽，头颅角度，独高于生番野人，此文明之国种族所同也。继神明之后，以九皇六十四民为祖，若檀柘有乡，萑苇有藂，此葱岭以东种族所独也。春秋至太平之世，周陆无表，不殊内外，黄池之会，夫差称吴子。是故整齐风俗，范围不过，若是曰大一统；益损政令，九变复贯，若是曰通三统。通三统者，虽殊方异俗，苟有长技则取之。虽然，凡所以取其长技，以为我爪牙干城之用者，将以卫吾一统之教也。教术之变，其始由于种类。均是人也，而修短有异，黄白有别，则德性风俗亦殊。故古者婆罗门种，因族以称其教，可为左证。惟吾神皋沃壤，五德畡备，则教莫正焉，种莫贵焉。虽有掍成之志，匪自尊大，而犹不能不自殊别。譬之草体蛤螺，甲节脊骨，百族蜎蠕，犹有繁简，而况于人乎？景教入中国，事至微浅，然一遇凌侮，则挺剑挟弓而议，其教会盛也。中国儒冠之士，踽行孑处，无所倚毗，皋门有政，庶人所不议，疆埸有

事，乡校所不闻，虽有贤杰，不在官位，则娖娖无所长短，儒术之衰，将不能保其种族。悲夫！于此有人焉，合耦同志，以建学会，于息壤之将陷，天保之未定，沈忧噍杀，朝夕讲贯，虽磨顶放踵所不敢辞。其与夫汝、颍、洛、蜀、东林之士，仅与憸壬为仇敌者，所事孰缓孰急矣。若当轴不察，治以党锢，株连钩考，将投浊流。危言竦论，则恐蹈狐晅、范滂之戮。默而息乎，则不胜漆室杞人之虑。举鼎绝膑，亦不敢以怨他人。独虑变起瞚息，戎夏交捽，以不诛夷为诛夷，以无焚坑为焚坑，比于红人、黑人，尙不得齿。于斯时也，而犹欲挺剑挟弓而议之，不知吾类吾教之能自主者，尙有什一之存否也？

设教之始，以大刑甲兵为辅，自古惟穆罕默德乎？中国神圣，则有其制矣。吕不韦有言：禹攻曹魏屈骜有扈以行其教（《召类篇》）。然则水火相挤，其极不斗不止也。古之齐俗者，役龙蛇而斗之，役虎豹雕鹗而斗之，三战然后得其志。近观突厥革岛之事，两教不辑，僵尸千里，盖行教若斯之难哉！我齐州之土，自水精制法，七十子后学，赢粮奔走，任师道于四方，浸寻二千年，虽词章帖括，绝流为害，然其彰较礌落者，犹无偭错，蜂镝不行，而民知所向，大哉其入人心也。然而卷勇股肱之力，经画取与之智，不及俄罗斯；居奇操赢，使天下歙袂，不及英吉利；弭兵善邻，折冲于樽俎，不及美利坚。其诸六艺之学，四术之教，无益于生民欤？曰：惟不能合群以张吾学故。

独居而听竽瑟，不如市朝；处幽谷而观羽旄，不如通都大邑。人之乐群，其天性然也。髫龀之童，迮而诵竹

笞，有与共学，则凫藻搏跃，声亦随之；无与共学，而流涕长嘶矣。学者之乐群，亦天性然也。尝试观邑序，临横室，则弦诵之声寂如矣；趋辟雍，升瞽宗，则装潢之卷俄空矣。古香四库之藏，文汇、文澜之府，翰詹所讲肄，骏雄所习业，则入其门无门焉者，入其闺无闺焉者矣。人之好恶，固若是变易乎？何以束发就傅，则萃处切厉之为乐，稍长知学，则惟是离群索居也。曰：自宋与明作则之主，将以其权力势藉，锢塞诸生，而惧其腹诽唇反，不仰视天而俯画地，则为之饩廪利禄以羁縻之，而仍使不足以事其父母，畜其妻子。彼去之则可惜，不去则无俚，牵曳跋疐，前却进退，营一生之不给，何暇为众生？救一室之不赡，何暇虑五洲？故使天下之士，肥瘠不相顾，痛瘼不相知，非直不能卫周、孔，且求一墨翟、禽滑厘而不可得。小雅尽废，四夷交侵，殆以此也。

西国学部之盛，中华企望而有怖心，尚已。然俄罗斯之在北方，与准噶尔、土尔扈特等部，一丘之貉耳！其俗朴僿，未尝留意师儒也。自芬兰一省，完全富足，以趋俄罗斯，其民好学，逮园夫红女皆识字。俄人效之，以立学校，至于今，介胄工匠，亦人人知书矣。中国四百兆人，识字者五分而一，赖地大物博，户口殷赈，以分率计之，犹得八十兆，未甚少也。其知文义者，上逮举贡，下至学官弟子，无虑六十万人，诵习史传，通达古今者，百人而一；审谛时务，深识形便者，千人而一；以此提倡后进，郡不过数人，则甚少矣。然使举措不违，此六百人者，云合雾集，智略辐凑，以振起缀学之士，犹可为也。而朝廷所以宣教化

于下民者，惟郡县之学官，虽优崇其礼，不使屈膝。至于官秩事权，则统隶于郡守，考成于县令，纵有材行，无所措施。是以大儒骨鲠白首耆艾魁垒之士，有为斋长，无为教职。曰：是箸于三尺法，固毚愚朽钝者之任也。呜呼！昔之愚民者，钳语烧书，坑杀学士，欲学法令，以吏为师，虽愚其黔首，犹欲智其博士；今且尽博士而愚之，使九能之士，怀宝而不获用，几何其不为秦人笑也？

欲善学校，必取《明夷待访录》，而朱氏一新斥之曰："彼但知清议之出于学校，不知横议之亦出于学校也；但知陈东、欧阳澈之为太学生，不知为贾似道颂功德者，亦太学生也。"呜呼！必如其说，则废君道即无桀、纣，废将相即无羿、莽，是必焚符破玺，剖斗折衡，而后天下夷然无故尔。夫两利相较，取其重者，两害相较，取其轻者，学校非无害也，而润泽于天下为多，故君子取之。自天府既废，凡政法律令，下集于学校，上集于柱下史。史氏之职，以死奋笔，足以定是非，受赇抵诬，亦足以乱是非。然而圣王不以舞词弄札之害废史氏者，其利多也。彼学校则犹史氏也，躁竞之士，率群下以造谤者，吾见其纷呶噂沓，甚嚣尘上矣。购千百泛驾之马，而幸获一要褭飞兎，不犹愈于购驽马乎？

今行省皆设中西学堂，以救学官之穷，亦以是倾西人之设义塾于中国者。彼义塾之设，招吾屠牧子，教之语言，教之布算，教之格致，而大旨不出乎摩西基督之书。本实既拨，于彼有用，于我无益。虽然，屠牧子可教，则吾士族之子，其可教可知。设学堂以笼之，诚古策已。乃夫聪

敏特达之士，閎览博物，不诣学而成，如魏默深、李壬叔其人者，今安所处之乎？处农就田野，处商就市井，处工就官府，处士就间燕，古之明训。政府不能任，而士民任之，于是奔走展转，搜徒索偶，以立学会。推其用意，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所谓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者，此诚豪俊成学之任，而非童齔彪蒙所与能也。宜有以纠之合之礼之养之宣之布之，使比于宾萌，上说下教，以昌吾学，以强吾类；是而不行，人终以科举为清望，而以他途为卑污庳下，则仍驱高材捷足以从学究矣。彼学究则将捊去其新知，而锢之以故见，所以为教者，不三数传，即无以异于教皇之助飞蝶南也。昔意王飞蝶南，头会箕敛，诛求无艺，民不堪命，教皇佐之，导其民以不识不知，无敢私议，而意卒破裂，教皇亦先后见驱。呜呼，殆乎！

景教之尊，莫教皇若，欧洲诸君长践阼，必得其命；释教之尊，莫达赖剌麻若，蒙古诸酋豪称汗，必得其命。彼非席萝图操齐斧也，而异域尊之顾如是，以是知纲纪不可去。绥丹败而教皇弱，喀尔喀宾而达赖微，天地之气，无紫色蛙声，则统绪必归于正。中国之儒，孰敢继素王，三老五更，则无世而无其人。馈酱酳爵，北面拜事，吾知其可也。墨家者流，出于清庙之守，尝见斯礼，则而效之，于是乎有传巨子。九服之大，巨子惟一人，其崇与教皇等矣。今纵不欲效西人，宜效墨子；纵不欲效墨子，宜效三代。老更既立，贤哲蔚荟，条肄布散，罔衍神恉。不及十年，而六曹大政，必于是受成，则黄种之维紘固矣，此所谓纪也。

吾闻《齐诗》五际之说曰：午亥之际为革命，卯酉之际为革政，神在天门，出入候听。是其为言也，岂特如翼奉、郎顗所推，系一国一姓之兴亡而已。大地动搖，全球播覆，內奰中国，覃及鬼方，于是乎应之。方今百年之际，其殆与之符合也哉！故不逞之党，假称革命以图乘衅者，蔓延于泰西矣。中国甿庶驯扰，戴其君长，如临父母，无敢高言孟行以犯名分者。自与欧、美通商，闻见渐异，以至于今五十年。古巴之背叛，称以义军，尼希利党之谋逆，待以不死，民智愈开，转相放效，自兹以往，中国四百兆人，将不可端拱而治矣。风气之推迁，若有摄力，虽夸父、龙伯不能争。居今之世，将欲壅遏民气，使不得伸，无论其无成绩也。幸而胜之，虽不土崩，犹将瓦解，是自遏抑吾黄种，而反使白种为之尸也。虽然，土崩又非百姓之利也。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摇动者万物作，故內乱不已，外寇間之。昔者八王相哄，而刘、石逞其志；张、李横行，我朝以成龙兴之业。苟有揭竿斩木者，是自战斗吾黄种，而反使白种为之尸也。然则如之何而可？曰：以教卫民，以民卫国，使自为守而已。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材，谓之革政。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挽革命。

【说明】 本文录自《时务报》第十九册，一八九七年三月三日（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一日）出版。

致谭献书

（一八九七年四月二十日）

夫子大人函丈：沪滨拜别，神气惘然。抵鄂后，未奉手札，想履道贞吉，吐言为经，定符私颂。麟自与梁、麦诸子相遇，论及学派，輙如冰炭。仲华亦假馆沪上，每有论议，常与康学抵牾，惜其才气太弱，学识未富，失据败绩，时亦有之。卓如门人梁作霖者，至斥以陋儒，诋以狗曲，面斥之云狗狗。麟虽未遭谈询，亦不远于辕固之遇黄生。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欬。而好之者乃如蛣蜣转丸，则不得不大声疾呼，直攻其妄。

尝谓邓析、少正卯、卢杞、吕惠卿辈，咄此康瓠，皆未能为之奴隶。若钟伯敬、李卓吾，狂悖恣肆，造言不经，乃真似之。私议及此，属垣漏言，康党衔次骨矣。会谭复笙来自江南，以卓如文比贾生，以麟文比相如，未称麦君，麦忮忌甚。三月十三日，康党麕至，攘臂大哄，梁作霖复欲

往殴仲华，昌言于众曰：昔在粤中，有某孝廉诋諆康氏，于广坐殴之，今复殴彼二人者，足以自信其学矣。噫嘻！长素有是数子，其果如仲尼得由，恶言不入于耳邪？遂与仲华先后归杭州，避蛊毒也。

《新学伪经考》，前已有驳议数十条，近杜门谢客，将次第续成之。《墨子閒诂》，新义纷纶，仍能平实，实近世奇作，麟顷已购一通，前携至鄂中者，望将书价径寄报馆每部二圆二角可也。浙中风气未开，学堂虽设，人以儿戏视之。老儒嚄唶，少年佻达，溺于雕虫，不可振起，前邪后许，实尠其人。鄂中地大物博，求友稍易，有可寄寓，俯求引导为幸。握管烦懑，中心成痗。肃此，恭请道安！即祈玄鉴。受业制章炳麟敬上。三月十九。

【说明】 此书撰于一八九七年四月二十日（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录自《复堂日记续录》钱基博《跋记》。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二十三年，三十岁"记："春时在上海，梁卓如等倡言孔教，余甚非之。或言康有为字长素，自谓长于素王。其弟子或称超回、轶赐，狂悖滋甚。余拟以向栩，其徒大愠。"与书中所言情事相合。又查谭献于是年三月二十五日（二月二十三日）抵鄂，《复堂日记续录》"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四月二十八日）"记："闻章生枚叔与同事哄而去，此我所预料，尝尼其行。"与书中情事月日亦符。"三月二十九日（四月三十日）"记："得章生枚叔书，乱离瘼矣，士人不肉树立，无端为门户之争，竭心力而成战国世界，冷眼一笑，热心尤当一笑。"所谓"得章生枚叔书"，当指此书。故系于一八九七年。

又章氏在四月二十三日（三月二十二日）《致汪康年书》谓：

“报馆一席，断难姑留。投我木桃，在他人或未忍此，况彼自谓久要乎？久要而犹不免于此，则复合之后何如也。凡事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常以笔墨相交，则纪念自生，恐又自此开衅，不如早离为要。”（《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上海图书馆藏。）终于愤离《时务报》，另在杭州编辑《经世报》，并不断为《实学报》、《译书公会报》撰文。

变 法 箴 言

（一八九七年八月二日）

孙灏与章炳麟见于分江之滨，炳麟方读《管子》及《佐治刍言》，魂精泄横，慭然似非人。孙灏曰："自马关之盟，士气振动，至于今三年，与民变革，宜得一二成就。今吾观子之色，一似重有戚者，何也？"章炳麟喟然而长息曰：呜呼！大波将激，大火将燃，而无忧怖者，其人情乎哉！彼老子有言曰，抗兵相加，哀者胜矣。非独兵也，庶事莫不然。雪霜既降，枝叶既凋，而根荄不枯于下，惟哀是赖。粤、捻之乱，曾、胡哀者也；热河之狩，恭亲王哀者也。往者士大夫不思经世之业，而沾沾于簿书期会，以为大故，震荡回薄，以有今日，此上天所以哀下民，使无佚乐。故议变法者，吾党之责也，方唈僾而道之。今吾观于瑰意琦行之士，则有二病焉：华妙云乎，猝暴云乎，其病虽异徵，皆中于不弘毅，成于不哀。己之不变，其奚能变人？吾是以有大戚也。曰：其病何如？遽数之，不能终其物；悉数之，请更仆以尽终始：

创巨而痛深者，宜专精厉意，审所以改弦更张，至人无余思则止。吾悲夫华妙之子，耻功利为不足卻，而骛心于教之流别，必假贷于浮屠以为宠灵。浮屠氏之书，吾无訾謷焉。龙池须弥，吾据之足以考地望；夜叉阿修罗，吾据之足以辨种族。其近实者，九能之士，固将有事焉尔；其深微渊眇，知帝之悬解，而不剀切于民事，张弛之义，宜有所〈先〉后。且今之世，末法世也。浮屠之运，神歇灵绎，贤劫未尽，弥勒未出世，虽有贤哲，固无以昌明其教。而徒费日损功以自游衍，日睹闻百姓之啼号宛转而欲以空言济之也，魏、晋人之清言，其复见矣。大儒之处世，言无取瓌，事无取閎大，苟有可用，虽跖之粘牡，越人之不龟手，方伛偻以承之；若其无用，蜚蓬之问，不在所宾，其说虽涵元气入无閒，无所过而问。方今疆圉日棘，黔首罹瘼，愚贱者无计虑，而酖毒之晏安，仕宦之子，则择利便、据形势，置齐州不恤。务得趣死不顾之人以振之，患犹可弭。志果忧天下，宜醮顉竭思，斟酌西法，则而行之，展布四体，以冀豪毛之益。今不攻坚石而攻玉屑，不宝周鼎而宝五石之瓠，悲夫！昔明之季，尝以谈禅为荣矣。志节虽盛，而其气呰窳，无能济变。其贤者则以王之厨馔嫔御腥蝼膻恶而不可近，而视天下事若尘垢；不贤者则藉巧说琦辞以为名高，至于敌情之狡诈，兵力之盛衰，地形之险易，蓄藏之充虚，一切不省。渡江而东，不能居一岁，再亡于闽，三亡于缅甸，夫孰任之咎也。今志节远不逮明人，而循其谈禅之轨，则士气愈委靡，民志愈涣散，求再亡三亡而不可得，而暇变法乎哉？

乳犬之攫虎，伏鸡之搏貍，精诚至矣，而人以为大愚；气球之初举，过十里则毙，南孙求北极，几葬坚冰，亦琐材而任重者也。虽然，以墨子视之，则鹜杰矣。变法者，非口说也，必躬自行之；躬自行之而不可济，必赴汤火冒白刃以行之。古者改制度、定文章，必乘龛刘之后。方日本之议尊攘，忤大将军意，逮系数百，断项绝脰，而气不少衰。至于书生剑客，慷慨国事，竞为诡激，横刀曰攘夷，擐绔曰脱藩，一言及尊攘，切齿扼捥，斥当轴为神奸，而笑悼老成宿儒之畏懦，悲歌舞剑，继以泣涕，展转相效，为一世风尚，惧有株连，复自称浮浪以免其藩主，其气之雄毅与心之苦如此。卒使幕府归政，四邻不犯，变更法度，举错而定。当其赴汤火、冒白刃，固不意此。如斯人者，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烈士也夫！今吾中国之变法，无刀锯之迫、汤镬之危，其易于日本也，不知其几千伯倍蓰。所求于士大夫者，惟劳其心力耳。彼力者，功所以成，疢疾所以去。昔陶文毅以转漕之弊，欲有变革，众议侜张，以全力抵拒之，而后立海运之基。曾文正欲裁绿营，当是时，乘其疲极，去之如摧枯拉朽也，持之不定，营制不变，贻害至今。夫以二公之勋德，犹视此为成败，何有于末吏处士。当今之世，任变法者，吾未见其有面目黧黑、窍气不通者也；争变法者，吾未见其有面折廷诤、千人皆靡者也。嗟乎！人所以事事，赖此锐气与股肱之勤耳。今气苶矣，上焉豪杰之不任，而举宗稷之重，付之脂韦突梯之徒；下焉有志之士，又稍稍娱乐于禅学以日销其骨鲠，殆夫殆夫！守故之不给，其焉能变，斯颜习斋、李刚主

之徒所为流涕而道者也。

如向所言，吾以规夫有志之士而遁匿于佛者。若夫骏特倜傥，有雄毅之气，果于独断，坚于力行，则其病又不在是，曩者言猝暴是已。彼见西法之效，以为驰骋上下，无曲折可以径行也；又取夫后王之政而暴施之于百年以前也。夫是故见弹而求鸮炙，见卵而求时夜，遽不可待，其卒也鸮鸣鸡不可得，并与其弹与卵而失之，而遂以求之为非计，则盍慎其所发矣。昔者中国乾、嘉之际，欧洲列国，严刑厚敛，民不聊生，拿破仑出而更之，播及邻国，皆厥角稽首，若弟子之受命于先师，非甚难也。然而英之更制也，公举议员，则世族阻之；免他国商税，则富贾阻之，船户阻之；放行进口粮食，则业田者阻之；宽待佣作，则廠主阻之；禁买黑奴，则豪右阻之；哗讼三十年，然后大定。中国自通商以来，更岁五十而赢矣，召彼故老而询之开矿筑路，犹愀然以为伤地脉；其他曲制时举，有造于廿二行省，独不利于数千百人者，不可偻指数也。是其难行也，又非直伤地脉之比也。故措置一失，而怨讟从之，若学堂是矣。夫讲业之地，一废而一起，均之以教学士，使廪假于县官，士何独怨，则失之者先入，而得之者后入尔。怨讟之既作，其荐绅鸣玉而为朝官者，复听其窾言以阻之，则吾事不成。吾意虑事之始，宁更调数万缗，以为兴造之本，无捊其故有者而成其故无者，则人不吾阻，其规摹亦可以閎廓，更一二年，向之怨讟者，闻其风气而知其臭味，且艳之慕之，惟恐吾之不兼并之矣，则下令如流水，而规摹益閎廓深远尔。是故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权术然

也；彼变法而无权，不知决塞，不晓计数，则不足以定大功。叔敖高门闾而民皆改其庳车，吾将奉之以为变法之师。若夫后王之政，未遭百六阳九，而于今日望之，一则睎民主，一则张议院，此无异于行未三十里而责其百里也。今夫民主，至公也，《尚书》始《尧典》，序以禅让；《春秋》崇五始，而隐元不书即位，圣人之情见乎辞矣。然而据乱行之，则以适治；据治行之，则以适乱。剥桡之既极，君子险衰，鸟兽虫蛾无得遂其生，于是有民主焉，以苏民困，以卫华夏，吾跷足须之矣。当今日而议之，其议果行，则域内抢攘，流血漂卤，幸为拿破仑，夫固糜烂其国土，荼毒其吏民，百年然后复也。不幸而为东学党，则束缚狝杀我者，且非吾之同类。驰说者耀华盛顿而忘法与朝鲜之祸，将并忘夫华盛顿之在美洲欤？于不毛之土，剪除榛薄，始奠天地，其功若女娲、燧人，杀黑龙而积芦灰也。当是时，民非斯人，固无所戴矣。斯人者出令而创民主，民固无所竞矣。然三十年以来，林肯遭弑，嘉飞遭弑，贼杀之狱两见，其置君若奕旗，其屠君若割牺；幸独处一洲，民无溃志，邻国无窥伺，不至于废易坠亡；今行之于中国，行之于无妄之未见，则内以便蚩尤刑天，而外以便殊族，民之无辜，并其臣仆矣，欲大同得乎？其次议院，《周礼》掌之司寇，而齐有稷下。逮及末世，牻惊之言多，欲恶始终远近博浅莫不为蔽。有杂家者流出，兼陈万物而县之衡，则九流莫不为用。《艺文志》："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县衡者不定，法之左党、右党，美之合众、共和，更相克伐，五德代胜矣。往者南北美利加之战，徒以禁买黑奴，启衅于违言

也。今泰西会党，票忽劲疾，横行无所忌，惟德人稍愿悫，然威良第四尝下诏予民权，军垒反筑于王宫之外，俾斯麦知其难驯也，稍稍抑议员，使无噂沓。俄罗斯之悍，噤民不言，故入则心非，出则巷议，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其议不如其默也。我朝康熙、雍正閒，数有廷议，推行其法，使翰林科道皆得坐论，斯可矣。若骤付其议于处士，不搏击不餍。昔许慈、胡潜之争，蜀先主戏之以刀杖相屈，而李天生乃拔剑以斫西河；彼其所议，仪注与音韵耳，犹寻其仇忿如是，况于国政？且其为言也，守故而迂，求新而妄诞，其持之未有故，其言之未能成理，使听者眩于名实，愦眊不渫，则发政益濡缓无期会，而祸本以成，吾未知其愈于今日也。然则学堂未建，不可以设议院；议院未设，不可以立民主。事势之决塞，必有先后，皆出于几。自有地球三十九期以来，石刀铜刀铁刀之变，非由政令发征，而民靡然从之，其几迫也。圣人者，因其几而导之入，故举无不起，废无不坠。今也，骏特俶党之士，丁时未至，盱衡厉色，悍然而为之，志固不遂，且危其身矣。病华妙者，吾惧其不以身殉也；病猝暴者，吾又惧其妄以身殉也。何者？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或轻，视其所趣。故摩顶放踵以拯生民之陆沈，前者踣，后者继，百挫而无反顾，终以集事，斯其死重于泰山者，日本之议尊攘是也。四百兆人所未达，天时所未蒇，怀抱孤愤，出身以任之，万死无所悔，或方命圮族而大为民物害，其身既死，其名亦因以败裂，使世人反以其事为惩创，后虽有哲人，不敢继踵，是其为之也，乃适如以狸致鼠，以茹鱼去蝇也。愈举愈坠，愈废愈

起，死无益于事，而适以损之，则鸿毛之轻已。嗟乎！祸福之说，成败之效，豪杰所不言，既环天下而号之曰国士，则必为天下惜死。谢安以訏谟定命、远犹辰告重雅人，无他，审于变法之先后也。

民不知变，而欲其速化，必合中西之言以喻之。喻人之术，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纵说之则以《金版》《六弢》；其一曰宙极之史，其一曰六合之成事。人莫信其觋髴阔略之声而信其目睹，是故陈古而阂，不如道今；有独喜其觋髴阔略之声者，与道今而不信，则又与之委蛇以道古。故合中西之言以喻民，斯犹慈石之引铁，与树之相近而靡也。往者梅定九、戴东原、阮文达之徒，常以算学通中外，故二百年以来，虽极党同妒真之士，无以西算为诟厉者。自瀛海论作，而又知声光电化之学，其原亦具于周、秦诸书也，其过者以为欧人之艺，皆祖祢亚洲，比于伯宗之攘善，斯稍稍夸诞矣。人之智慧，无东西朔南一也，鼓宫宫动，鼓角角应，闭门而造车，出则轨合，以为相应相合则可矣，以为人之长技皆出于我，则适以助学者之虚憍自满也。虽然，赖是以羑之，使人善入，譬中西之学为异质，而是为其粘摄力。今夫以苍璧小玑与人而人不喜，其邻父老曰，是若祖父某年陈于某室者也，则虽知其言之觋髴阔略，而固以得之为喜，何者？喜复故物也。今著书之邻父老也存，虽忿怼于新法者，亦讴歌而乐之，竭蹶而趋之矣。精其术，平其词，是化民之至神者也。嗟夫！骏特倜党之士，果于独断、坚于力行者，有悟于此，可以得变法之权矣。

章炳麟又曰：吾读《管子》至《侈靡》，尝默识其词，至

中国之草木，将有移于不通之野者，妇人为政，而铁之重反旅金，则竦然而流汗曰，是何古之睿圣哲人，不视图谶而能知百世以后也。自今而往，苟有中寿者，当见其变之究矣。虽然，既乱易治也，既治易守也。若夫疆蒌未亏，人民未变，鬼神未亡，水土未絪，糟者犹糟，实者犹实，玉者犹玉，血者犹血，酒者犹酒，而文武恬熙，举事无实，梟狐窃柄，天与之昏，是为大乱之将作，而不得比于大乱之既成。于斯时也，是天地闭、贤人隐之世也。虽然，目睹其肢体骨肉之裂而不忍，去之而不可，则惟强力忍诟以图之。余，浙之贱氓也，生又羸弱，无驥骜之气、鸿鹄之志，其然，亦尝有所向矣。虽微踔逸，犹憯凄切怛，悲世之不淑，耻不逮黄帝而哀不已若者。窃闵夫有志之士之玩愒于佛也；其力行者，又举事而棼其绪也；以为如是则终已不得变而之治。故与子道其二病，且以自箴，且以箴天下。揽其要略，惟哀足以成事，虽有智者果者，不哀则败。三十年以往，有何桂清，十年以往，有张佩纶，言谈最贤，亦时有中要领者，而祸败若是，是可鉴矣。鉴于是二子，变者千端而或有什一之成；不鉴于是二子，冒没轻儳，其势无疑止，虽有中寿，犹不获睹天下之治也。虽然，吾固知其莫能鉴也。于斯时也，是天地闭、贤人隐之世也。吾不能为狂接舆之行吟，吾不能为戴安道之破琴，吾流污于后世必矣。

【说明】 本文录自《经世报》第一册，一八九七年八月二日（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五日）出版，列为“本馆论说”一。

平　等　论

（一八九七年八月十二日）

天地之道，无平不陂，故曰水平而不流，无源则遬竭，云平而雨不甚，无委云雨则遬已，政平而无威则不行，然则平非拨乱之要也。昔者平等之说，起于佛氏。佛之言平等也，盖亏盈流谦，以救时弊，非从而纵之，若奔马之委辔矣。何者？身毒之俗，区人类为四等：以婆罗门为贵种，世读书主祭；其次曰刹帝利，则为君相将士；其次曰吠奢，则为商贾；其次曰戍陀罗，则苦身劳形以事畎亩，监门畜之，而臧获任之。是四类者，庆吊不通，婚媾不遂，载在册府，世世无有移易。夫圆颅方趾一也，而高下之殊至是。此释迦所以不平，而为平等之说以矫正之也。揉曲木者，不得不过其直。恣言至其极，则以为胎卵毛鳞，皆有佛性，其知识亦与人等。此特其左证之义，觊以齐一四类，而闳侈不经以至于滥，有牛鼎之意焉。愚者滞其说，因是欲去君臣、绝父子、齐男女，是其于佛说也，可谓仪豪而失墙矣。

且平等之说，行之南北朝，则足以救敝；行之唐、宋以后，则不切事情。是何也？当门第之说盛时，公卿不足贵，舆台皂隶不足贱，而一于种姓乎辨之。至唐高俭定氏族志，犹退新门、进旧望，右膏粱、左寒畯，盖其俗尚之敝，与身毒同风。观夫王源与富阳满氏为婚，家人细故，无损于礼教豪发；而沈约弹之，以为六卿之胄，纳女于管库之人，宋子河鲂，同穴于舆台之鬼，点世尘家，于事为甚。若以兹事为必不容已者。嘻，其陋也！于斯时也，而创平等之说于其间，则米盐之争、锥刀之竞息矣，其有助于政教，必不裨矣。今也罪人不奴，民无僮仆，昔之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稿者，今亦及身而息。自冕黼旄钺以逮蓝缕敝衣者，苟同处里閈，一切无所高下。然则以种族言，吾九皇六十四民之裔，其平等也已久矣，复从而平之，则惟去君臣、绝父子、齐男女耳。

昔者《白虎通德论》之言，谓人皆上天所生，故父杀其子当诛，晋献公罪弃市，以杀其太子申生故。斯言也，盖范蠡、商君之属，欲氓庶孳乳而立是法，今文家遂攘取之以为口实。然自两汉以来二千余年，卒未有以是为律令者，枭之啸欤，破镜之鸣欤，诚夫人而知其谬也。若夫男女之辨，非苟为抑扬而已。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猛兽食颛民，雕鹗攫老弱，则不得不繁人类以遮鄂之。夫欲其繁也，与一女伉数男，则不若一男而伉数女，于是斟元立极以定嫁娶，而妾媵昉焉。观于职方之书，登中于天府者，女子犹多于男。惧其怨旷，则又不得不制妾媵以通之。夫以一人而嫔数女，此犹三十辐共一毂，则其势固不可

以平等。今欲贼黄种而顾为男女平等之说，呜呼，何其刺也！

古者谓君曰林烝，其义为群，此以知人君与烝民等，其义诚大彰明较著也。及其悍然独立于民上，而欲引而下之，则不能已。夫一哄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书，必立之师。纵其崇卑之度，无大殊绝，而权力固已倍蓰。故曰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彼法家之言曰："虽有忮心者，不怨飘瓦。"然则以总统莅民，以佥谋定赏罚，是特当轴处中者之所以避怨讟，而贤桀何取焉。夫父子夫妇之间，不可引绳而整齐之，既若是矣；君臣虽可平，而于事抑又无取。故曰平等之说，非拨乱之要也。

虽然，吾尝有取矣，取夫君臣之权非平等，而其褒贬则可以平等也。昔者埃及之王称法老，死，大行至窆所，或颂其德，或指其邮，以得失相庚偿，过多则不得入墓；其王亦深自饬厉，惧罹罪辟，莫敢纵欲。是即中国称天以诔天王之义，是即《春秋》有罪不书葬之义。

【说明】 本文录自《经世报》第二册，一八九七年八月十二日（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出版，列为"本馆论说"一。收入《訄书》，题名《平等难》，有修改。

实学报叙

（一八九七年八月十二日）

世言地球以上之野马，谓之空气，然而轻养淡绿各负其质，无往而非实也，必并与其空气而涤除之，则爑火不然，喘蠕不生，而大块或几乎息矣。由是观之，空不足持世，惟实乃可以持世。微生之物，细若蚤触，游息尘埃，自相战斗，是惟有实质，故相遇而触，学者挟其所有，是丹非素，或诡戾至不可听，要亦有其一至之见，梡充腷臆，故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犹愈于漂薄无所邸者，而况职志六籍实事求是之学乎？

繄古九流，皆出于周官之掌故，遭秦灰烬，高文荡如。汉世抱残缺，遗术犹略可睹。陵夷至于魏、晋，浮屠稍炽，以嘘枯吹生为能事。恨大圜之束缚，而欲摧破去之，共球一撮，则愈不暇留意，终于典章不讲，艺术不考，嫱点九能，如含瓦砾，而实学亡矣。唐、宋以降，政法程度，举不能逮先民，惟畴人操算，稍上合乎周髀，斯则硕果不食，于五际为革政之世。今日之能以欧罗巴学上窥九流者，其

芽蘖在是也。惜夫溟渤以外，听远音者闻其疾而不闻其舒。至于小雅尽废，四夷交侵，创痍既深，乃流嘶哽咽以道之，则已日莫途远。救时之彦，于是为置学堂。然一行省数千里，就学者廑以百数，俗儒鄙夫，蔽所希闻，大共非訾者，犹十而三四。高材之士，则又跬梧鼠、非螣蛇，涉猎五技，不忍攻苦。又不欲居浅陋、闻格致矣，以希腊、巴比仑之古教炫之；闻古教矣，以佛说炫之。乃曰黄赤青黑，惟吾目是视；角征穆羽，惟吾耳是听。综其所论以施之西学，则正负乱；以施之中学，则名实乱。然则彼且以此涂智者之耳目，而况中人乎？

吴王子有忧之，曰：吾不暇计夫陵谷之变迁与仓海之为大陆也，又不敢诋娸古人，以为其学不埃及若也，又不忍以阿含楞严驭西学也。吾行求其拙，吾学求其实而已。虽然，彼龜愚朴陋与高言孟行者，吾无若彼何矣。吾党之士，或学矣而未达，或怏郁愤悱而未遂，则吾将与之共蹈于实学之域。史官既绝，天府既息，讲学于宦奥，戶外莫应，将效夫西人之建藏书楼欤。吾不能，将设学会以羑致来者，墫于江南则已隘，大淮以北，大汉以西，千里重趼而至者，则未有南荣趎其人也。曩者纂《格致古微》，以廓《畴人传》、《瀛海论》之义，既拭之木觚以询贤哲矣。今欲一言而播赤县，是惟报章。大坂之报，一日而籀读者十五万人；《泰晤日报》，一日而籀读者三十万人。以中国拟之，则不可倍屣计已。抑以报章比于书藏学会，则犹有轩輖焉。是故以译书为鹄的，以译事为乏，相为鞞辅，以成是报。章子曰：伟哉造物者，其以子为此巨史也。

夫报章者，诚史官之支与余裔，故运人之职，击铎哗釦，风听胪言，以陈之王史氏，其歌谣为国风，其成事为百二十国之宝书，此行之自上者也。遭世混浊，淄缟罔辨，金匮石室之气浊，而山林之气清。于此有人焉，则上为素保氏，下为素撢人象胥，取六艺之学、中外之闻，辨程其长短，为一书，或旬而纪，或月而纪，此行之自下者也。

夫报章者，诚史官之支与余裔也。刘子骏有言："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其在周初曰史佚，其后曰史角，然则墨翟学于史氏。故其声、光、热、重之学，奭然为诸子最。今为《实学报》，其必念夫墨子而后二千余年，旁魄熔凝以有是篇，必奭然为纪事之书最。且子以其目言，圜则九重则曰天，黄垆息壤则曰地，五种孳乳则曰人，牵牛纪始则曰物，其称谓不辩。而自大圈以内，重黎之所绝，苍牙之所别，化益之所录，尽此矣。是其名也，亦可以言实矣。

夫烈缺辟历，蛰伏地中，莫见其形，而所在有电，故忽然而焚大槐，曰惟气实故。火球丽天，以黑斑为原质，八行星虽巨，皆掣曳惟命，曰惟力实故。今子言实学，将不惟嘤喋苛事之是求，其厚积广流以为言学者依倚也，则吾有望于子。

王子曰：然哉然哉！如君所祈割，吾有志也，而犹未届焉。虽然，吾尝闻于墨子矣。鹤夜半而鸣，天下震动，异于蛙黾之聒聒者，吾虽无似，彼坚瓠之口，玉卮之辨，鼓其浮虚，初发难于名物训诂，而终施及于格致者，则烛之审矣。彼上悖于六经，下不契于诸子，惟浮屠之欲闻，吾

为此惧，不能忍而与之终古，以有此报也，庶有瘳乎，其诸饰巧说玩琦辞者，亦与之更始乎。

光绪二十三年岁在丁酉七月之望，余杭章炳麟枚叔甫叙。

【说明】 本文撰于一八九七年八月十二日(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录自《实学报》第一册。

《实学报》，旬刊，王斯源、王仁俊等编辑，一八九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一日)创刊。首载奏章及英、日报文，后附刻中西文书籍甚多，均未全。谓："本报之设，以讲求学问、考核名实为主义，博采通论，广译各报，内以上承三圣之绪，外以周知四国之为，故名《实学报》。"(见《时务报》第三十六册)章氏后来辑入《訄书》的《儒道》、《儒兵》、《儒法》、《儒墨》、《儒侠》等篇，就是最初在《实学报》发表的。但《实学报》中有很多反对新政文字，如王仁俊的《实学平议》(《民主驳议》、《改制辟谬》)等。章氏撰文，也仅至第五册而止。

读管子书后

（一八九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世之言管子者① 以《内业》、《白心》为本柢，以《大匡》、《乘马》为法制，此皆肤末之言也②。而道西法者，又谓其出于墨氏。夫节用非乐，其道大觳，其风俗与泰西若冰炭，于教术合矣，于政法则背而相驰尔。呜呼！管子之言，兴时化者，莫善于《侈靡》，斯可谓知天地之际会，而为《轻重》诸篇之本，亦泰西商务所自出矣。向使地球凝结以来，迁延旁薄以至沛育新期，一循其榛榛狉狉之俗，而无愈久愈侈、愈久愈靡者，则黄金弃于矿，珠玉弃于渊，虎豹之皮、鼲貂之裘弃于山林，是真所谓佸尧之时，昆吾之美在下，虽闭关绝市，裹商人之足焉可也，又安得夫操奇计赢，以成轻重之势者哉！惟夫天地之运，愈久而愈文明，则亦不得不愈久而愈侈靡。而所谓侈靡者，其称固未有

---

(1) 《訄书》原刊本作"若夫世之言管子者"。

(2) 《訄书》原刊本作"此皆奢阔之言也"。

定也[1]。成周之世，食大牢而奏韶濩，自茹毛饮血之世视之，而侈靡又已甚矣。今西人之宴，有一飧而糜数万佛狠者，英商享合肥相国，至用六千镑可证。自成周之世视之，而侈靡又已甚矣[2]。必举成周之俗以訾今人，则亦将举茹毛饮血以訾成周，而递訾之至于无穷，则有偶袋兽而伍龙鳄者[3]，而茹毛饮血，复有訾其侈靡者矣。然则天下无所谓侈靡也，适其时之所尚，而无匮其地力人力之所生，则是已[4]。古者于山之见荣茂草乔松之为煤者，未尝求于良工精材，虽求之而未尝致，非夫效汉阴丈人之假修浑沌氏之术也[5]。其用未侈靡，则呰窳偷生而已足。然而人非一哦豚恩矣，一蛾豚恩者，开辟时第一生物。智慧愈开，侈靡愈甚，则原质之弃于地，与养气、淡气、绿气之弃于球外者，不得不审御机数以求之[6]。是故侈靡者，工艺之所自出也。

---

① “而道西法者”至此，《訄书》原刊本作“知九地之际会，而帅《轻重》诸篇者，其言曰，兴时化者，莫善于侈靡。呜呼！藉令丸土凝结靡迤，沛育新期，以至于今，甡甡然率循其獉俗，更久而无虫镂之饰邪？则金欤，珠玉欤，虎豹之皮、鼫貂之裘欤。其必弃于矿与渊与山林，诚佶尧之时，昆吾之美在下，虽杜关绝市，靳商人之胫可也，又安得夫操奇计赢，以成轻重之齐者乎？顾势也浸久而浸文明，则亦不得不浸久而浸侈靡。而所谓侈靡者，其称固未有定也”。

② “今西人之宴”至此，《訄书》原刊本作“今自大秦以西，一醧而金百溢，自成周之世视之，而侈靡又已甚矣”。

③ 《訄书》原刊本作“则有耦䳄鼬而伍羝羊者”。

④ 《訄书》原刊本作“则尟已”。

⑤ 《訄书》原刊本作“非夫假修纯白之谓也”。

⑥ “然而人非一哦豚恩矣”至此，《訄书》原刊本作“然而人非草形之虫矣。慧亦益启，侈亦益甚，则定质之弃于地，与诸气诸味之弃于地外者，必将审御机数以求之”。

夫既有工艺矣，则一方或有余，而一方或不足，而求之者则固相等，于是商贾操之以征贵贱，则其势不得不生轻重。轻重者，亦势之无可遁者也。譬之行星与日之有离心、眦心也[1]。西班牙人尝欲析富家之财以均贫者，而卒至于扰乱。用《佐治刍言》说[2]。人之有轻重，且不能平，况于国乎！故始也以贸易为一商之轻重，而终也至以为一国之轻重[3]。管子尝言合小以攻大者，敌国之形；以负海攻负海者，中国之形。呜呼！至于重势既成，则以贸易攻人而有余，亦无待于兵刃矣。惟夫菁茅石璧，非天下所贵，而藉天子之威灵以重之，使其值至于腾踊，此则君权之世所有，而非民权之世所有尔！虽然，物无不以缓急为轻重，则其道亦与侈靡等。故曰：侈靡者，轻重之本，而泰西商务之所自出也。自非旷览乎大圜之始终，与三十九期之变迁者，不足以知此。故其篇首则论古时与今时同，而其人不同；篇末则言中国之草木有移于不通之野者，以见运之合满。运即三十九期之期。呜呼！是其智有过于大禹化益者也。夫一处生物，古今不同，时时有新生之物，亦时时有绝灭之物，故松栗橡树，以其中所得古刀，验其萌芽早晚，而意大利扯拉草子之形，圆于英吉利所生者。

---

① "是故侈靡者"至此，《訄书》原刊本作"是故侈靡者，百工之所自出也。一方之工有余，而一方或不足，求者相等，由是商贾操之以征贵贱，则其势不得不生轻重。轻重者，亦势之无可遁者也。权轩辕黄龙体也"。

② 《訄书》原刊本作"西班牙人尝欲捋富室之财以均贫者，而卒至于扰乱"。且无此脚注。

③ 《訄书》原刊本作"故始也以贸易为一廛之轻重，而终也乃以为一国之轻重"。

以上约举《地学浅识》语[1]。此以知今之与古，中国之与不通之野，其草木固有异也。草木既枯为皮脱，又久则为僵石，而天地期运，于是一终。管子谓之运，佛家谓之劫，西人谓之期[2]。是故以草木言，则《易》言天造，必云草昧；言天地变化，必云草木蕃；以所化僵石言，则《易》言艮为石，而云万物所以成终而成始。由是以验其刀，而知其愈久愈文明，亦愈久愈侈靡也[3]。

鸣呼！中西之事，管子见之矣。其篇末又曰[4]：妇人为政，铁之重反旅金。重者，谓其值重也。旅犹进旅退旅之旅，谓相等也[5]，谓铁之值与金等重，甚言之也。尹《注》失之。鸣呼！维多利亚之霸欧洲，而权力及于中国[6]，与一切械器轨道之必藉于炼钢精铁者，管子见之矣。

---

① "亦无待于兵刃矣"至此，《訄书》原刊本作"亦厌兵刃矣。生人之道，甚贫足以亡，甚富足以亡，是故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则奚有于兔胄。彼人人之皆食鲜被毳，而怠于用兵者，必覆其宗祏，汙其寝庙。拯之何道，亦曰侈靡已。侈靡则日损，损则日竞，竞则日果，是兵刃之所以复而自拯之道也。故曰：侈靡者，所以帅轻重；抑非直帅轻重矣，非览九地之际会，而睹三十九期之变革者，庸足以知此乎？故其篇端，则论古时与今时同，而其人不同；其篇之季，则言中国之草木，有移于不通之野者，以见运之合满。鸣呼！是其智有过于大禹化益者也。夫物产之消长，均一壤也，而古今不同，亡时而亡新生，亦亡时而亡绝灭，故松橡行栗，以其下所得古刀，监其萌芽早晚，而意大利捽拉草子之形，圆于英吉利所生者"。

② 《訄书》原刊本作"管子命之运，浮屠命之劫，欧罗巴人命之期"。

③ 《訄书》原刊本作"由是以察其刀，而知其浸久浸文明，且浸久浸侈靡也"。

④ 《訄书》原刊本作"其篇之季又曰"。

⑤ 《訄书》原刊本作"旅即《乐记》进旅退旅之旅，彼《注》云：旅犹俱也"。下同。

⑥ 《訄书》原刊本作"而大风播乎中国"。

【说明】 本文录自《经世报》第三册，一八九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版。

《经世报》创刊于一八九七年八月二日（七月初五日)，旬刊，馆设杭州。章太炎、宋恕、陈虬等任撰述。论说外，多载英、法、日文报章，以记述国内外大事与介绍新学术、新知识为主。章氏此文，在《经世报》发表后，曾收入《訄书》原刊本，改题为《喻侈靡》，除文字有损益外，末后并加"附识"云：

> "释氏《大集月藏经》云：譬如眞金为无价宝，若无眞金，银为无价；若无银者，鍮石为无价；若无鍮石，伪宝为无价；若无伪宝，赤白铜铁白镴铅锡为无价宝。是即侈靡无定，适其时尚之义也。己亥冬日又识。"

后圣

（一八九七年九月七日）

自仲尼而后，孰为后圣？曰：水精既绝，制作不绍，浸寻二百年，以踵相接者，惟荀卿足以称是。非侈其传经也，其微言通鬼神，彰明于人事，键牵六经，谟及后世，千年而不能闿明者，曰《正名》、《礼论》。《礼论》未作，人以为祝史之事；作矣，人以为辟公之事。孟氏未习，不能窥其意。其他揖让之礼虽从，而戾于行事者，遇之则若焦熬矣。黄帝正名，仲尼以治卫，夏乱于施，西域乱于塞种，正之以后王之成名。纤及米盐、至于纬宙合，自一话一言，皆正其程度，解其玄纽，则析言破辞者无敢枭乱。惟举枢要，故闳于尔雅；惟参伍□际，故足以陷塞氏。佛氏目眚见病之说，推之色声香味触法，皆自我作，一人之私言也。荀子言："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香臭芬郁腥臊洒酸奇臭以鼻异，疾养沧热滑铍轻重以形体异，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天下之公言也。且由古者侗长佼□之民，以暨周秦，其年则巧历不能纪，

自是无圻矣。其风之迁，其志也亦迁。必守故号，则不给于用，故曰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互市以来，新理日出，近人多欲造作新字者。呜呼！斯其制作也，则迴乎三统，竟乎文祖地祇之𡎺。是故《礼论》以键六经，《正名》以键《春秋》之隐义。其他《王制》之法，《富》、《强》之论，《议兵》之略，得其枝叶，犹足以比成、康。𠳲乎！非后圣孰能不见素王而受其鬲翼铜瑁者乎！

而治孟学者惎之，以论性恶为敌逑。呜呼！性恶者，非同人性于禽豸也，而异人性于圣王之制礼，有善不□，斯谓之恶已。是故咳童因心，曰顺德之始。啼笑于食饮之有亡，曰贪戾之始。贪戾情乎？荀子固云："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亦见《正名篇》。情之恶，其柢则在性矣。或曰：征讨之义，首恶之诛，自大庭以来弗能废。荀子辨等礼，其视君臣也严，未尝闻于良贵之义，故其持世□者不及孟。呜呼！世俗之说者，以桀、纣有天下，汤、武篡而夺之。荀子以为伛巫跛匡之智，载在《正论》，驳辨几千言，孰谓其术之异于孟氏也。

夫治孟学以惎荀氏者，始宋程、苏。苏与程相敌逑，其惎荀氏则合从，彼苏氏尤昌狂妄言。近人或谓苏诋荀卿，乃借以诋荆公，大缪。忿疾荀卿，自是宋世习俗。即如子云文人，偶有撰述，特与徐干等耳，于学术何足轻重。自唐韩氏以扬拟荀，宋人遂以才高多过、才短少过并讥，要祗为揭橥孟学，并忘荀、扬之绝非伦比。若谓苏以诋荀卿者诋荆公，然则诋扬雄者，亦可云借以诋温公邪？推其用意，且曰死而操金椎以葬，下见荀卿，将敲其头矣。利𧂐小生，不可与道古。其

文学以程、苏为宝祏，从而和之，使后圣之学，终于闭錮伏匿；仲尼之志，自是不得见。悲夫！并世之儒者，诵说六艺，不能相统一。章炳麟订之曰："同乎荀卿者与孔子同，异乎荀卿者与孔子异。"

【说明】 本文录自《实学报》第二册，为"实学通论"之一，一八九七年九月七日（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一日）出版。

儒　法

（一八九七年九月十七日）

自管子以形名整齐国，著书八十六篇，而《七略》题之曰道家。然则商鞅贵宪令，不害主权术，见《韩非·定法篇》。自此始也。道其本已，法其末已。今之儒者，闻管仲、申、商之术，则震栗色变曰：而言杂伯，恶足与语治。试告以国侨、诸葛亮，则诵祝冀为其后世，而不知侨、亮之所以司牧万民者①，其术亦无以异于管仲、申、商也。然则儒者之道，其不能摈法家，亦明已。今夫法家亦得一于《周官》，而董仲舒之决事比，引儒附法，则吾不知也。

夫法家不厌酷于刑，而厌密于律②。汉文帝时，三族法犹在，刑亦酷矣。然断狱四百，几于兴刑措之治者，其律疏也。律之密者③，不欲妄杀人，一窃分数级，一伤人分数级，钩铄分析，虽离朱犹眩目，自以为矜慎用刑，民不妄受戮矣。不知上密于律，则下遁于情，而州县疲于簿书

① 重印本作“尝试告以国侨、诸葛亮，而诵祝冀为其后世。噫！未知侨、亮之所以司牧万民者”。

② 重印本作“夫法家不厌酷于刑，而厌歧于律”。

③ 重印本作“其律壹也。律之歧者”。

之事，日避吏议，娖娖不暇给，其极上下相蒙，以究于废弛，故德意虽深，不足以化民成俗，今日是也①。仲舒之决事比，援附格令②，有事则有例，比于鄗侯《九章》，其文已冗，而其例已繁③，已用之斯焚之可也，著之简牍，拭之木觚，以教张汤，使后之廷尉比而析之，设法如牛毛，其卒又以为故事。然后舍生人之能，而行偶人之道。悲夫！儒之戾也，法之弊也④。吾观古为法者，商鞅无科条，管仲无五曹令，其上如流水，其次不从则大刑随之，贵其明信，不曰较轻重⑤。子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呜呼！此可谓儒法之君矣。

【说明】 本文录自《实学报》第三册，为"实学通论"之一，一八九七年九月十七日（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出版，《訄书》原刊本、重印本都曾收入，但有修改。一九一〇年，章氏手改《訄书》，将本文改题《原法》，文字大异；一九一四年，他把《訄书》改为《检论》，就是在手改本的基础上再加改定的。今将北京图书馆藏章氏《訄书》手改本《原法》辑附于后。

① 原刊本作"一窃分数级，一伤人分数级，大辟之狱失实则令诛。自以为矜慎用刑，民不妄受戮矣。不知上密于律，则下遁于情，而州县疲于簿书之事，日避吏议，娖娖不暇给，故每蔽一囚，不千金不足以成狱，则宁过而贳之。其极上下相蒙，以究于废弛。是故德意虽深，奸宄愈因以暴恣，今日是也。"重印本作"一窃著数令，一伤人著数令，大辟之狱差以米则令诛"，以下除"不知上密于律"作"不知上歧于律"外，其余与原刊本同。

② 重印本作"仲舒之决事比，援附经谶"。

③ 重印本作"而其例已枝"。

④ 重印本作"以教张汤，使一事而进退于二律，后之廷尉，利其生死异比，得以因缘为市，然后弃表埻之明，而从縿游之荡。悲夫！儒之戾也，法之弊也"。

⑤ 原刊本作"其次不从则大刑随之，贵其明信，不曰権轻重"。重印本作"其上如流水，其次不从则大刑随之，律不亟见，奚有于歧者"。

附：原法

（一九一〇年）

自管子以形名整齐国，著书八十六篇，而《七略》题之曰道家。然则商鞅贵宪令，不害主权术，见《韩非·定法篇》。自此始也。管子曰：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七臣七主篇》。又曰：论功计劳，未尝失法律。《七法篇》。此则法以明刑，今之律矣；律以定分，今之格矣。孟子曰：入则无法家拂士者，国恒亡。今之律因于酇侯《九章》，《九章》因于李悝《法经》。悝，儒者，受业子夏、曾申，李悝即李克，《艺文志》，《李克》七篇在儒家。克受《诗》于曾申，曾申受之子夏，又别有《李子》三十二篇在法家，亡，名悝，此犹伊尹、鬻子、师旷之书，出入诸家也。岂效世儒犹然材剧而志大哉。尚考《吕刑》之录，无科条文牒诒于后嗣，顾第勿深考，五刑之属三千，非空言也。陈群有言，篇少则文荒，文荒则事寡，事寡则罪漏，是以后人稍增，更与本体相离。见《晋书·刑法志》。明科条不厌其繁。著于传记者，律有甲乙丙，始李悝；令有甲乙丙，始周威公。《吕氏春秋·先识览》，周威公去苛令三十九物。高诱曰：物，事也，此即今言三十九条矣，明令条甚广。董仲舒为《春秋折狱》，引经附法，异道家、儒家所为，则佞之徒也。

何者？法律繁苛，未足以娆民，娆民者，在亿察无征

之事。汉文帝时，有鄌侯之律，盖以叔孙通傍章十八，法亦碎矣。然断狱四百，几于兴刑措之治者，其律质也。法之棼者，熹舍事状而占察人之心术，反唇有诛，腹诽有刑，教天下谄，为人主一己之便，固蚩尤苗民所以为化。藉令为民德计者，乃在长老父师，导之以德，齐之以礼，非法令所能就也。立法之意，止于禁奸，使民有伪行而已，欲以法令化民，是闻檃括足以揉曲木，而责其生梗柟聆风，民未及化，则夭枉者已多矣。仲舒之《折狱》二百三十二事，援经附谶，比于鄌侯《九章》，其文已枝。彼张汤、赵禹所增者，朝律、越宫律、监临部主、见知故纵诸条，皆不如《春秋折狱》甚。以是教汤，使一事而进退于二律，后之廷尉，利其生死异比，得以因缘为市，然后弃表埻之明，而从縿游之荡。汉世儒者，往往熹舍法律明文，而援经诛心以为断，如薛况使客杨明，斫伤申咸，廷尉直引律曰，斗以刃伤人，完为城旦，其贼加罪一等，与谋者同罪，其议当矣。而御史中丞众等以为《春秋》之义，意恶功遂，不免于诛，况首为恶，明手伤，功意俱恶，明及况皆弃市。孔光、师丹为儒家宗，乃反是中丞议。盖自仲舒以后，儒者皆成蚩尤，为法之蠹。悲夫！经之螟也，法之贼也。吾观古为法者，商君之厉，鄌侯之平，释之之岂弟，为治不同，要之以法令明符为质，名在刀笔，而持正过于儒者。老子曰：有德司契。契者，谓科条之在刻画者也。

译书公会叙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

九域之民不同，其食味、别声、被色，均也。声浪之清浊，由其水土；语言文字之乖牾，由其习俗。象鞮不通，气不得齐和，中外相视，于是乎若光音；天人通之以地籁，地籁既通，其赫蹏犹未能戶知，中外相视，于是乎若桃梗。悲夫！古者东方介氏之国，犹能与牛马言。今其头颅肱胫，吾与之同出于一笵。闻其言，若伯劳鼓造；睹其文字，若虎所攫画之辘。若是者何也？亡所造作，则自东方大瀛以至四海，均律不变，骊騂之鸣，九万里一也；有所造作，则邻屋比畛之间，其发于嗌亢者殊，其表识亦殊。学士所诵，大匠不与知；大匠所诵，驵侩不与知。然则审人之音之难于审牛马之音也，知人之文之难于知牛马之蹄迒也，脑气撼之矣。令吾中国无《尔雅》、《爰历》，则三古以上，吾且不能审诗商、协书名，况异域乎？

章炳麟曰：互市以来，所传译泰西书，仅逮四百种，兹无错愕也。是四百种者，既剞劂刻镂，不遍流布，拘学伐

夫，至不能举其目，兹亦无错愕也。虽然，瞽者羡瞀者，瞀者羡明者，五大洲之冊籍，吾不能博发而扬诩之，吾则瞀矣。且新理日出，岁无留故，一息炭养更，其事立变。若乔木之移阴，若蛇蚹蜩翼之移壤，而吾犹守旧译，以成世之暗智，其焉能与之终古？吳越之间，有《大明》《采芑》之诗人焉，闻之曰：夫善稻与伊缓也，大卤与大原也。昔三王之季，犹能得其主名，于今世则何有。以吾圈属群徒，逑众力以任是也则可。夫古者百二十国之宝书，于今为蓝皮书，藏之金縢，比崇于方明，吾无得而译焉。其他舌人所述，有轶事，无完史，有葱岭以西，无大漠以北。故列国之要最，肘腋之隐患，一切不省，吾连而补之，公法律令、学政官制、格物商务，箸于笘籥者，故有其书或陈迹矣。或少半未卒译，吾校之以秘逸，正之以新理。横革之书，在巴黎者百五十万卷，其他称是，未度于內海，撢人、外史，口耳所不及，吾求之雒通、译之渊泉而不涸竭。虽然，创夫竹帛之成，而不得流布于震旦，以饜蟫鱼之腹，如蠹者四百种之效也，乃取夫东西朔方之报章，译以华文，冠之简端，使学者由唐陈而识宦奥。盖自輶车使者之职以溯秘书，其陈义略备矣。

嗟乎！五十年以往，士大夫不治国闻，而沾沾于声病分隶，戎士视简阅仅若木熙，无一卷之书以教战者，怀安饰誉，其祸遂立见于今日。故定武之书，郊居之赋，天地以弱文化之国；绿耳之骑，大黄之矢，天地以弱用武之国。一旦变易，官无其法，法无其人，人无其书，终于首施两端，前却失据，悲夫！以草莱数人，仅若稊米，而欲紬五洲

书藏之秘，以左政法，以开民智，斯又夸父、精卫之续也。独尝借观于邻国，日本得王仁以《论语》、《千字文》传，其后经术艺文，遂什伯百济。泰西政艺，各往往取诸希腊、罗马，而文明远过其本。然则是译书会者，安知不如微虫之为珊瑚，与蠃蛤之积而为巨石也。呜呼！斯又夸父、精卫之志也。

【说明】 本文录自《译书公会报》第二册，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七日）出版。

按译书公会系一八九七年在上海成立，恽积勋、恽毓麟、陶湘、董康等主持。同年十月，该会创《译书公会报》周刊。在它的《启事》中说："本公会志在开民智、广见闻，故以广译东西切用书籍、报章为主，辅以同人论说。今首先译出之书，为《五洲通志》、《交涉纪事本末》、《拿破仑失国记》、《维多利亚载记》、《威林吞大事记》、《英国史略》。……所译各报，如英《泰晤士报》、《律例报》、《东方报》；法《非轧罗报》、《勒当报》、《国政报》；德《东方报》；美《自立报》、《纽约报》、《铁路报》；日本《政策报》及东报之最著名者若干种。……七日为期，全年四十六册。"由章氏和杨模（范甫）任主笔；章氏任职不久，即赴武昌。

读日本国志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呜呼！盛衰兴替之故，虽曰人谋，傥亦有天幸欤？当日本变革之际，朝野上下，忿如敌仇，内治外交，诏令错出，惑乱无所统，其幸而不亡者亦几矣。及明治践祚，天造草昧，开之以云雷，终能奠王室、恬海波，以小弱为强大，轻若举鸿毛，是何也？明治以后，则人谋之淑；庆应以前，则遭时之淑。今夫君相内讧，诸侯力政，处士间之，重以夺攘矫虔，斯萧墙之患，既足以召外侮；又乃况于外侮方起，而翕应于萧墙者乎？自三古以来，有是则无不焚天智、栈社禝矣。

日本幕府擅政，越六七百祀，关白之权，东移于江戶，诸藩厥角，自处臣虏，共主守府，曾不委裘若。虽更易数姓，迭相芟薙，要之制其命者，皆豪族悍将。使以六师临之，则野井之辱，且在旦夕。及德川氏衰，文恬武嬉，弩不穿缟，而大政犹出其门。俄、英、法、美要盟城下，以开港请。当是时，神州之气大通，郁銕一隅，势不得夭遏，家定

之许，亦未为过也。特其久持政枋，尾大不掉，卿辅士族，莫不痛心腐骨于幕府。又其与诸国约互市也，不待朝命，以便宜从事，忠愤者因是以攻瑕蹈隙，欲致届幕府而先倡攘夷之议，夫固知太平太蒙之域，非可以一琅铛绳绝之矣。彼特以为事势之相倚，若影倚形，非言攘夷则无说以讨幕府，非讨幕府则无术以靖天室。然自德川秉政以来，闭关绝市，固二百年矣。攘夷之议起，则人人以为宪章前哲，佩刀羸粮，将其类丑，千里而赴之。及夫草宿路遇，相聚绵绝，饮血明神前，高义者诚接踵，而鼏狠不靖之族，亦自是沓至。当是时，家茂以稚子继立，政在陪臣，天子既以依违不奉敕罪将军，井伊直弼遂肆其凶暴，割剢志士，钳胁卿尹。然士气已涣，属藩崩溃，其余威之足以慑人者，仅若假气游魂。使议者知攘夷之为名，而剪除幕府之为实，则当翼戴天子，与长门、萨摩诸藩，彤弓素羽，东向而征，其举之亦易矣。顾以狃于成事，视其实畸轻，而视其名乃畸重，朝野相顾，惟戎狄豺狼之欲去，侠客亡命，至剸刃西人之腹以为快。及明诏既降，并与其素所亲暱之荷兰而攘之，遂令七国合从，相率进攻。诏令所至，则王室主攘夷，幕府主和议，戎士腭眙，退遂失所，一败涂地，斯固众寡强弱之不相敌，抑亦政出二门之有以致是也。

呜呼！内讧懵懂则如此，外患迫亟则如彼，使七国蓄分地之志，操券而宰割之，则剑玺传器，必白组系颈以献。伦敦之植，植于山城也久矣。然而得延一夕之命以待由枿者，天幸也欤？其亦遭其时欤？距今三十年以往，欧罗巴之志，未欲辟地远东；俄则方事咸海，日不暇给，亦相与

徘徊其间，莫肯先动。是故外患之不至于亡者，遭时之幸，一也。

攘夷党人，大半多浮浪，使处今日，有国会之议，则家家自以为得大横，人人自以为当压纽，神武二千五百年之祚，其可保乎？是时则非直不欲窃大位，亦无敢假相部署以犯名号者。其故由于泰西未通，闻见未广，莫敢以拒违王命为常事。是故内讧之不至于亡者，遭时之幸，二也。

呜呼！天特使日本盛衰兴替之际，前于今三四十祀，其亦哀夫黄种之不足以自立，而故留弹丸黑子以存其类也。及夫倾否之泰，哲王生焉。太阿既返，长子主器，顺天革政，蔚为望国。盛乎哉！大武三曾而偃武与力，大文三曾而贵义与德。

【说明】 本文录自《译书公会报》第四册，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版。

论民数骤增

（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阴阳之气，发敛之度，无古今，一也。丛林乔木，不一日而滋，惟蠛蠓醯鸡蚑，蠕动群蜚，其卵育亦不迮，人者独异是。自嬴氏以前，里闾什伍之数，尚已。盖汉平帝元始二年，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后汉和帝永兴元年，口五千三百二十五万；此据《续汉郡国志》注引伏无忌所记，东汉户口，此为最盛。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口五千八百八十三万；明神宗万历六年，口六千六十九万；清兴以来，康熙四十九年，口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乾隆五十九年，口三万七百四十六万；道光二十八年，口四万二千六百七十三万，其辜较如此。

夫自元始以来，至于康熙，千七百年，民数不相越；及乾隆之季，相去才八十年，而民增十三倍，此何说也？《三十一国志要》曰：今考美国丁口，共六千二百万有奇，较之初立国时，增至二十倍，虽缘生齿繁孳，然百余年中，何能骤至于是，盖大半系欧洲人视为乐土，而趋之若鹜也。案美国至今百有余

年，增至二十倍，遂觉其情未合，则八十年增十三倍，犹斯理也。借曰天下久无事，民不见水火蜂刃，故日以孳乳，然自建武以逮和安，由天宝溯贞观，中原无狗吠之警者，其距年亦相等，而倍不至是。借曰疆域袤延，前代所未有，未有者，即回部耳。汉尝开朝鲜、高句骊以为乐浪、玄菟，今亦未能郡县之也。蒙古今为汗，唐时则灭突厥以置刺史，较其长短广狭，亦略相当。且沙漠之地，固稀人而旷土，其戶口何足选。天府所登，未越九州也。

章炳麟曰：均庸调于地者，始自康熙朝。自康熙而往，上哾秦汉，民皆有口赋，有口赋，则民以身为患，虽有编审，必争自匿矣。有司惧负课，会计其数，又十而匿三四。口赋既免，贫优于富厚，游惰优于勤生，民不患有身，虽不编审，而争以其名效于上矣。故乾隆之民数，增于前十三倍者，向之隐窜伏匿者多也。且升平之世，疆吏喜以膴盛媚于上，彼将曰袤益民数，既不足以累郡县，圣灵斐然，宜有所润色，以乐主听，则虚增之可也。非直虚增尔，戶籍属草稿，多受成于保甲，一人而远游，地既鬲越，有司不相知，榜其名家，复榜其名在所，及要最既上，亡校仇者，卒不为删除重复，若是，则以一人为二人也。一隐之，一增之，故相去若丘谷，至十三倍其旧。然则元始以来民必有盈万万者也。乾隆、道光之世，民不过倍万万也。

虽然，古者乐蕃遮，而近世以人满为虑，常惧疆宇狭小，其物产不足以龚衣食。今淮汉以南，江皋河濒沮洳之地，盖树艺无瓯脱矣。东南之民数，宜必数倍前代。使辟地于巨岛灌莽间，则邻国先之。使从事于河洛，昔之膏

腴，今乃为沙砾。地质易矣，不可以植稻粱，而犹宜于嘉卉，莫挈之则窳也。故弱者道殣，强者略夺，终则略夺不可得，而人且略夺之。章炳麟读《小雅》，至于"螟蛉有子，蜾蠃负之"，喟然叹曰：呜呼！后司农见之矣，言有万民不能治，则能治者将得之也。

【说明】 本文录自《译书公会报》第八册，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訄书》和《检论》均曾收入，题称《民数》。

上李鸿章书

（一八九八年二月）

余杭布衣章炳麟谨再拜言宫太傅伯相阁下：麟，浙之挽辂氓也，生长丘樊，未尝知问学。幼诵六籍，训诂通而已。然于举业，则固绝意不为。年十七，浏览周、秦、汉氏之书，于深山乔木间，冥志覃思，然后学有途径，一以荀子、太史公、刘子政为权度。持此三子以观古今中外之册籍，有旁皇周浃者曰知之矣。涉是曰近之矣。吐言相戾，陈义不相应，则以为未知楚夏，不在六艺之科。会天下多故，四裔之侵，慨然念生民之凋瘵，而思以古之道术振之。盖自三子以后，得四人焉，曰盖次公、诸葛孔明、羊叔子、黄太冲。之四人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然大要知君民之分际，与亲仁善邻之所以长久，而不肯以残夷割剥、陵轹元元者，则数逾千祀，风期一也，如盖氏之言官家，黄氏之标《原君》，其陈义甚高，而荐绅先生或以为难言，虽言之亦不能竟其绩，或祇以违天方命，则麟亦心知其意而已，未敢于岩廊之间道其眇论也。所可道者，则诸

葛、羊公，雅儒之所恒言，虽揭橥之而莫以为怪诧。然推其用意，则皆有潢然兼覆之志，观其伐国取邑，不以盩肝涉血为功，其意固已远矣。诸葛于孙氏，亲之如昆弟交，虽遭挫衄，而不以为憾。及武昌称号，犹驳绝交之议，遣使走贺，盖知共球之锡，不在一家。苟利万姓，孰非当璧。故由其道大用之，则可以怀柔九域，小用之则能使弹丸之蜀，藉之以不灭。羊公知吴之有陆伉也，师江介不奋其武，譬之三仁未亡，而姬后还师于盟津。及夫和门之率，袀服相见，而醪醴膏沐，劳问不绝。未尝怀忮忌，卓哉有司马揖让之风矣。故由其道小用之，可以一江汉；大用之，可以使晋室之隆，比踪三王。嗟乎！今之世，非无其人也，权不统一，则有元黄之战；愤激独断，则离遇雨之愠。盖思古人之踵武，浸假效其一二，而连蹇以去，使其身与国家皆不得有豪毛之益者，是最可哀也。麟每念至此，则壹郁欷唏，仰睎青天而无与语。

乃者胶事良已，德皇子踵至，俄、英、法诸国又以其间觊觎息壤，瓜分之形，皦如泰山。恫天纲之解维，悲横流之靡届。虽自度材质不周世用，窃愿以平日所学，参伍验之。惟公以周、召之才，斡运大夏，夷艰济变，固已多矣。属遭阳九，中道多梗。盖天于哲人，非必欲使素日积劳以旌其伐，而欲使转旋逆流之机，必于是人乎发之，故敢陈其愚戆，以备公之财择焉。

自古强国之形，远交近攻，而弱国则反是。今夫日本，非有深怨于我也，以深怨言，英、法尝犯跸矣。曩者衔之次骨，至于今则交际犹是，何有于日本。夫同种之国，孰

能表东海者，此易知也。而欧人之扰吾边疆，亦恒在左，非得日本，谁与同命。以一时之怨视之，乃不如白种，是犹兄弟争室而授途之人以狐父之戈也。近观日人之所撰述，虽与曩时冈千仞等少异，然其欲连盟中国，以措亚洲于舄础之安，则千夫所言如一喙也。彼穷阎下士之所发愤，纵无当于政府，然其党既盛，其议自不能屈，久之则政府之听于国会者，必当以连华为至计。且日本处大瀛之中，而北与俄罗斯逼处，而东交美利坚，则以檀香山之议，又不能䜣合无衅，其于邻国，舍中国则谁与？中国而强，固同室也；中国而弱，苟独厚日本，则不至私徇他人，以诒太平洋之害，独何不愿之有哉。虽然，彼政府智深而才黠，欲以口舌说之，则彼虽饫心慊志，而犹必示拒以要我，则不如不待其要而有以利之，使操纵在我之为得也。闻去岁有东游日本者，上书枢府，欲其深念同忾，以弭中国之兵革，其见纳与否，尚未可知，麟则以为非中国輶轩之使，而自以才辩求亲于日本者，虽随何、食其之口无益。何者？不能以利益授之也。虽然，吾中国今日不求亲于彼，则坐为欧西各国所鱼肉，谁与拯之，其势固不能已，而又非经常之约言所能致也。必如往者德、意、奥三国合从之举，然后觊于患难相救，欲与日本合从，则莫如与之地而用其材，使彼有藉手而乐于亲我，则事何为而不成。

与之地奈何，曰：威海固日本成邑也，使德据胶湾，俄据旅顺，则威海之在其间，亦腐肉朽骨而已。与其使俄、德得之，何如使日本得之；与其使日本攘而取之，何如以我迎而与之。夫与之腐肉朽骨而足以市恩于彼，何苦而不

为。往者，割澳门以与葡，割巨文岛以与英，此皆承平无事之日也。当是时，饵饟犹充，兵力犹倞，割之无害，不割无所损，而犹毅然奉图籍以畀之，况已挤之必弃之域，而弃之转可以纾难乎。且以俄、德犄角之地，得日本介立其间，则其势足以稍相钳制，而恣睢者犹有所忌焉，此一举而两善具也。

用其材奈何？曰：日本之用客卿也，昔亦借材于欧、美，既而技艺已成，则罢遣西员，而专任其国人。今我于税务则专用英人，于制造局船厂、水师武备诸学堂，则杂用英、德、法人，而特举之大工尚不在是焉。其廪假既厚，而西人至者，其材能率不过中庸，则何如取材于日本，而授之官秩，以为我用乎？往观日人之从事中国者，其取值皆杀减，故廪一西人之禄，足以廪三数日人。而壤地既接，其材之优劣，游者又足以相知。然则用东人者，其收效必过于西人五倍。今税务既深根宁极，不可动摇矣，教习诸员，其取舍则固在我。至于特举大工，自芦汉铁路而外，其他新政，犹不可胜数。又况开矿制械之役乎？夫省饩得材而可以利结日人之心，则是政治饬而合从成也。斯二者，固说士所不能自擅，而惟当轴处中者之有以诺之也。以公瞻言百里，訏谟定命，曷亦以斯入告，而妙选行理，以从事其后乎。

论者必曰等是盟也。自甲午而前，则谓之修好；自甲午而后，则谓之乞哀。虽然，苟有益也，虽乞哀何损。且吾惟推诚布公于日本，加之以恭谨而得一当焉。其与夫羁紥于西人，而为之臧获牧圉者，其荣辱为何如耶？人亦

有言，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夫西人之觇国者，其转移至神速也。往者，土耳其与突厥，中国称东西两痹人，及一胜希腊，而人之视土耳其者，殊绝于畴昔矣。今中国苟与日本相夹辅，内外辑睦，受侮日少，虽不能与日本抗衡，不犹当胜于土耳其乎？夫忍一朝之诟，而以收功于数稔之后者，斯哲人所以异于贩夫贩妇之智也。若夫下民离瘼，疆圉孔棘，天下之势，系于金柅，其忧有甚于瓜分者，非内政修明，不足以自巩，斯固更仆罄竹而不易终其数。

或以齐、鲁之域密迩畿甸，惧戎马蹂躏，将及近郊，而有爰宅之议。然形胜之地，卒勿能定，复为《迁都驳议》一篇，录如别。自惟才质疏伐，于当世利病，冥孥无所通晓，以大驾将泛，厌覆是惧。念今世足以定天保者，无过相国，故不得不鸣其一得之见，以达于持橐之史。虽议论粗觕，不登明堂，然自谓于平日所诵法四君者，庶无偭乎其矩墨矣。若宥其狂瞽，比之胪言，稍有观采，则黄人幸甚，齐州幸甚！

【说明】 此书系手迹，存十四叶，红色八行信笺，正楷缮录，行十八字，上海图书馆藏，末缺一叶，据旧钞补，后有附识："戊戌正月上是书，其三月，威海割界英吉利，己亥十月书。"

正学报缘起

（一八九八年）

光绪二十有四年春，胶州湾既割，是时距辽东之战四年矣。天子方侧席求人材，开特科以致天下士，海内髦杰，踔跃陵厉，北向望风采，以为雪国耻、起民瘼，当在今日。俄而旅顺、金州复迫于朔方之国，并海以南则吴淞，以西南则广州湾，皆滨大瀛，复为邻国要求质质。将相旰食，瞿然未有以应，士气复沮，议论无所薄，稍益流宕，驰说者至欲避难异域，寄籍为流民，计不终朝，民志益涣，𬴂然似无附丽者。南海梁鼎芬、吴王仁俊、侯官陈衍、秀水朱克柔、余杭章炳麟有忧之，于是重趼奔走，不期同时相见于武昌。武昌，天下中枢也，其地为衢国，声闻四达，于中古则称周南，惟苍姬之王，尝斡运之以为风始。冀就其疆域，求所以正心术、止流说者，使人人知古今之故，得以涵泳圣涯，化其颛蒙而成其悬恻，于事为便。惟夫上说下教，古者职之撢人，而今为报章之属。乃佽偶诹访，东求诸日本，西求诸欧、美之洲，得其日月所记，译以华文，比

类错综，终以己之论议，旬为一册，命曰《正学报》。儆成于某月某旬，乃为之要最曰：

权舆生民以来，远者八千祀，惟吾齐州之种，于宙合为最古，其赋质具五常。古中庸之说曰：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智，人之性然也。生于其洲而人偶其洲，生于其国而人偶其国，亦人之性然也。是故君子不耻不能御外侮，而耻不能仁种类；不耻海滨之不靖，而耻萧墙之无以自固。自十七国以降，一二华人，当裔德之竞，迫于羁絷而为之俘虏，流涕沾袍以违冢墓者有矣，未有寇在垣外而乐为之门阑之厮，至短衣剪发以附册籍，一朝自外于其种族而不咽哽，如今日之甚者也。嗟乎！若是者岂冥顽之萌哉！彼亦尝读书识敌情矣，其不耻庳下为臧获，且猥自喜，以骄稚其同类者，何也？非学之不正而何以至是乎？抑夫陆沈泥古之士，亦有以激之矣。方其上在朝市，或穷而伏闾巷，目未营九州，皆虚憍自贵，恶闻异己，言邻国有善政，则掩耳疾走。至于朝不信道，工不信度，不以芥蒂其胸臆，彼背本者之议，亦因是有以激之也。激之无已，邑里儇子故尝习西书者，始掉头而不返，复与西人居，睹其储藏而窥其械用，震怖于其宫室服食之都丽，乃苦不能自致，而愿为之赘属。其悦西国者，为是悦也；其诟中国者，为是诟也。然其蒙面含垢，犹长见笑于搢绅之士。有巧文辩慧者出，铺观中西，能言其利弊，而歆羡于西方之乐，顾重出诸其口，乃取太古久远之事，以矫拂近世，从而建平等之议，倡无分民之法，持之有故，足以傅经义，使人人得以陵轹其上，孤弃其宗族，而

曰是西政之可怀也。若是，则偎子不足以为大诟，而议竟行矣。悲夫！惩创于迂儒之激，使学术不由其正，始以快一二人，终以荡析其一洲之黔首，吾如彼何哉！当斯时也，而不思所以救正之，则遂长往矣。抑魏征有言，使人渐浇诡，不复反朴。今当为鬼为魅，尙安得而化哉？今为是报，盖使孤陋者不囿于见闻以阻新政，而颖异之士，亦由是可以无遁于邪也。嗟夫！昔者《小雅》之诗人，痛宗周衰弱，称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而终之以呼父母，首之以流水之朝宗于海。紬一章竟，未尝不潸焉出涕也。读是报者，可以兴矣。

例　　言

昔陈文恭令人阅邸钞，欲其明习时政、通晓格令也。今则外患迭乘，全球震荡，虽殊洲隔壤，一话一言皆与支那相感触，非寻常案牍所可伦比。若劳神簿领，转昧大势，譬鷦鹩巢苇，纵极坚致，风至则折，复何取焉？故以选译东西各报为主，于邸钞则从略。

古者陈诰，非取喋喋，下教氓庶，亦无冗言。降逮叔季，则质文互变，繁简不同。惟边疆告变，烽墩传语，曾不数言，自足惨凛。若其栋梁方颓，鐏俎犹昔，朝野上下，犹嚶鸣娱乐，颜色无改，斯非意重辞复，难可曲喻。故译报自事实外，多录论议，其亦陈傀诗之意欤。

时事日棘，则词无蕴藉；中外相轧，则语多中伤：西报利病，略尽此矣。由前之说，取怒观者，而有益救弊，閎识

之士，固不欲护美疢、远恶石也。由后之说，乃足以混淆是非，变乱缁素。如去岁兖州之变，西报指斥疆臣，谓其祸国殃民，肉不足以啖狗彘，而华士译之，亦复主张其说，则背锦之文，惨于矛戟矣。今于西报偏激之词，无所指驳，其蜚语中人，荧惑观听者，则必加之案语，力为纠正。盖乌喙长葛，取以疗病，而不能不去其毒，斯固国医所当知也。

异域交涉，若西、美互争，土、希交恶，虽有益闻见，而无与寰中，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殆亦可矣。然波浪相推，东西互掣，薄此厚彼，借鉴在兹。不知德、法相猜，何以知俄人之能远驭，不知非洲地尽，何以知西国之肆东封，劫小制大，䑛糠及米，势自然也。今于彼方国际，不厌详悉，若简丝数米，无关宏旨，则亦从刊落云。

格致、算术、农商、工艺，各有专书，若布之报章，只得较略，何裨实义？然宛转牖启，斯为径隧，故撰录事迹，诠次法程，钩元提要，庶有取尔。若其研精覃思，则专门之学，斯固未暇。以上译报。

马关约后，士稍感奋，风听胪言，渐益增广。然百僚师师，思不出位，以规为瑱，犹慭置焉。岂一行作吏，便尔聋聩，亦立言未善有以致之。综其疵弊，厥有二端：一则陈义甚高，而不知措办所自始；一则能见症结，而不知药石所当施。加以雅诰奥义，听者恐卧，遂令当事以文人相轻，在官以牛鼎为诮，良足悕也。今兹陈论，文尚条达，匪曰鞶帨；意务剀切，无取泛滥；要使曹掾卒史，皆能受读，如《论衡》、《昌言》者，斯可矣。至于王劭《齐志》、义庆《世

说》，里巷鄙词，著为实录，近世西堂、简斋，以此驰骋，浸无义法，斯则义乖雅言，亦吾党所勿与也。

昔刘子玄自叙《史通》，谓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然则报章录事，史之余裔，旁罗众家，亦其宜也。慨乎中学陵迟，经籍道丧，陈说古义，以华妙为高；研究六籍，以训诂为诟。间读《唐·艺文志》，正史类有诸葛亮《论前汉事》一卷、又《音》一卷，在服、应、孟、晋、韦、崔之间。乃知季汉扰攘，日不暇给，而从政之余，不废音训。是则高拟管、乐，犹以《苍》《雅》为涂陈，宁有未识金根，自命稷、契者乎？夫汉儒说理，奥博深宏，北海郑君，实迈韩、董，兰甫《通义》，言之备矣。彼芝房《刍论》、植之《商兑》，斯皆未尝肴胔，谬道甘辛，少一转移，昌狂至是，悲夫！若乃宗仰宋贤，务在崇实，君实、子厚、伯恭、了翁，斯并六艺之支流，后学之燧鉴；爰在近世，宁人、太冲，亦其次也。若濂溪、二程，或遁虚寂，自可名家，难为师法；康节妄诞，伪造图书，罪甚枚颐，益当摈斥。九流腾跃，以兰陵为宗；历史汗牛，以后王为法。举斯艺极，用抒末议，诚愚者之千虑，亦庶免乎幽冥。以上论议。

【说明】 本文录自章士钊先生旧藏原稿。

甲午战争失败后，洋务派大官僚张之洞假装维新，骗取政治资本，章太炎幻想借助他的实力推动变法，于一八九八年春赶到武昌，帮他办《正学报》，本文就是当时所拟“缘起”和“例言”。但斗争的现实，使章太炎认清了张之洞的卖国嘴脸，他公开驳斥

张之洞胡说的“三纲五常”是“中国所以为中国”的荒谬呓语，还写上《艾如张》诗篇，表示吸取这一教训。《艾如张》，最初以《泰风一首寄赠卓如》为题，在《清议报》发表，收入本书，可参看。

弭 兵 难

戊戌春箸，时俄罗斯弭兵会未起

（一八九八年）

祸乱烽燹之既极，有一人焉，扶义而起曰：我必弭兵哉！虽含哺之童，必颂之以为上仁无疑也。是故向戌激而为是，口血未干，陈、蔡之社为京观。宋钘、尹文激而为是，当是时，七国之权力，虽犹有轩轾俯仰，其势足以相御，然而荀卿睹其无成。然则大勇不斗，然后为天下右，苟无生人杀人之柄，而欲禁人以不己杀，此实难矣。今以中国之兵甲，与泰西诸强国相权衡，十不当一，一与之搏击，鲜不溃靡。是故泰西诸国之兵可弭，而必不肯弭兵于中国。譬之盗，有所劫掠[1]，其于群盗之所怀挟婴纕，则勿取焉。至于弱人，则不在是列，虽厥角稽首，与之指九天以为誓，其何益哉！

美利加，亦寡兵之国也。人见弭兵之议，出于美利加，而以为不在强弱之形。嗟乎！美之在西半球，邻无虎狼，顾蚕食所不及耳。坎拿大一日自立而为帝，巴西一日

[1] "劫掠"，《訄书》重印本作"劫略"。

发愤为天下雄，则美方受侵[1]之不暇，其能与之晏安于酖毒欤？今窥中国者，万美利加[2]，公法恒义，且有所不行，而况弭兵乎？必若是，是犹遣将临河以讲《孝经》，而欲以却黄巾也。

说者曰：吾岂徒乞盟，将假贷于彼，而要之相率以卫我，则是以彼之金币为质子也。然后弭兵之盟，可以无渝矣[3]。夫中国地藏之金币，百倍于异域，即有兵革，彼弃其已贷者，而收其未发者，如是，则以什伯偿一二，其贤于出之内府而寄之外府者，亦远矣，夫何所损焉。苟无损，则不足以是为弭兵之券也。吾以为火器之穷，人人殚精竭思而无所进，万国之强弱，斠若画一，当是时，有衅而斗，如两金相扣，先扣者胜，于是人有惧心，而弭兵之策行矣。今日虽弭兵，于小弱犹无益也。何者？避用兵之名，则尺檄可以得地。古者刀锯不戢，流而为甲兵，今甲兵既穷，则且靡而为鞭箠。故中外有衅，则持哀的迈敦书以索地，而踵之以警察千人以分布其邑落，则是鞭箠而天下定也。犹有不率者，则火器固可以用也。曰：是征吾属地，非犯邻国矣。然则今日之弭兵，特假强国以攘夺之柄，而弱国海隅之苍生，终勿能完其首领焉。懿何瘳乎！昔者冈本监辅尝欲置天讨府矣，以为据险阻之地，以直隶于上帝，列国有罪，则遣将征之，是近于弭兵矣。吾以为主天讨者，其氏族不能出于五洲之表也。虽命曰帝臣，其始亦一国

① "受侵"，《訄书》重印本作"戒严"。

② "万美利加"，《訄书》重印本作"万巴西、坎拿大"。

③ "可以无渝矣"，《訄书》重印本作"若则无渝矣"，"然后"二字无。

之氓而已矣。使故国无事，则已[1]；苟有事也，不恸哭以念其里闾之榆柳，其人情乎哉！庇其所暱，而诛其所憎，中人之志也。不然，伉厉守高，矫节操以饰名誉，则故国虽直，必务与之以枉桡之名，苟灭亲而已，又非义也。夫等之食息于行星者，其用意必不能至公，则六师所临，其以无罪死者众矣，又况于贿赂市鬻之师乎？今言弭兵者，其弊盖犹是也。

抑吾又有订焉，自北宋之中叶，至于明季，士大夫多喜言兵事，其说不务训练，而好崇诡道，纷拏错出，流宕而无所薄，至于揭暄之兵法百言，而鄙愈甚矣。学者知谈兵之为腐儒，则思以弭兵之说廓之。盖一质一文，丁世运之变，而以是为琦辞焉。今夫祓彗日用于人，而不得藏于箧者，其道固不足贵也。物之贵者，必大璋青龟，然于世无所用，用之则以崇饰视听。言之贵者，必深微玄眇。如弭兵之说，且近于仁术矣。不縳其本而肇其末，其说亦未可行也。

【说明】 本文撰于一八九八年春，列为《訄书》原刊本第四十篇。

这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帝国主义的蒙惑下，倡"弭兵"之说，唐才常就曾专文论述，说什么"永立和好之约"，"无论因何衅衅，俱有定章办理，使无可疑之处，则强国弱国，俱免误起争端"。（《湘学报》第八号、第九号《各国变法政教之有无公理·弭兵会》，辑入《觉颠冥斋内言》卷一。）这种论调，实际是为帝国主

① "则已"，《訄书》重印本作"则止"。

义的侵略辩解，故章氏撰文批驳。

《訄书》重印时，本文列为第四十四篇。一九一四年，章氏将《訄书》增删，更名《检论》，删去此篇。今按《訄书》原刊本录出，而以重订本校订。

商　　鞅

（一八九八年八月）

商鞅之中于谗诽也二千年，而今世为尤甚。其说以为自汉以降，抑夺民权，使人君纵恣者，皆商鞅法家之说为之倡。呜呼！是惑于淫说也甚矣。法者，制度之大名，周之六官，官别其守，而陈其典，以扰乂天下，是之谓法。故法家者流，则犹西方所谓政治家也①，非胶于刑律而已②。后世之有律，自萧何作《九章》始。《汉·地理志》，箕子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李悝、高祖皆尝有作，然或行于小国，或草创未定之制。若汉、唐及今变本加厉之法，则皆萌芽于何。远不本鞅，而近不本李斯。张汤、赵禹之徒起，踵武何说而文饰之③，以媚人主，以震百辟，以束下民，于是乎废小

① 《检论》作"则犹通俗所谓政治家也"。

② "非胶于刑律而已"以下，《检论》作："鞅固受李悝六篇，次有萧何为《九章》，犹斠然如画一。刑之乱，君之擅，本于决事比。"下接"远不本鞅"，脚注删去。

③ 《检论》作"而近不本萧何。董仲舒、公孙弘之徒，踵武公羊氏而文饰之"。

雅。此其罪，则公孙弘为之魁[1]，而汤为之辅，于商鞅乎何与？

鞅之作法也，尽九变以笼五官，核其宪度而为治本，民有不率，计画至无俚，则始济之以攫杀拨噬，此以刑维其法，而非以刑为法之本也[2]。故太史公称之曰："行法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今夫家给人足而出于虔刘之政乎[3]？功坚其心，纠其民于农牧，使向之游惰无所业者，转而傅井亩。是故盖藏有余，而赋税亦不至于缺乏。其始也觳，其终也交足，异乎其厉民以鞭箠而务充君之左藏者也。若夫张汤[4]，则专以见知、腹诽之法震怖臣下，诛鉏谏士，艾杀豪杰，以称天子专制之意。此其鹄惟在于刑，其刑惟在于簿书筐箧[5]，而五官之大法勿与焉，任天子之重征敛、恣调发而已矣。有拂天子意者，则己为天子深文治之，并非能自持其刑也[6]。是故商鞅行法而秦日富，张汤行法而汉日贫[7]，观于汲黯之所讥，则可知矣。由汤之法[8]，终于盗贼满山，直指四出，上下相蒙，以空文为治，何其与鞅反也，则鞅知有大法，而汤

---

(1) 《检论》作"此其罪，则弘、仲舒为之魁"。

(2) 《检论》作"此以刑维其法，非以为本。刑既著版，又不得剟一字也"。

(3) 《检论》作"今夫家给人足而出于挢虔吏之治乎"。

(4) 重印本作"及夫张汤"，《检论》作"及夫弘、汤、仲舒"。

(5) 《检论》作"其刑惟在于任威斩断"。

(6) 《检论》作"则己为天子深文治之，故非能自持其刑也"。

(7) 《检论》作"弘、汤、仲舒行法而汉日贫"。

(8) 《检论》作"由弘、汤、仲舒之法"。

徒知有狴犹之制耳[1]。法家与刀笔吏[2]，其优绌诚不可较哉！且非特效之优绌而已，其心术亦殊绝矣。

迹鞅之进身与处交游，诚多可议者。独其当官，则正如檠榜而不可紾。方孝公以国事属鞅，鞅自是得行其意，政令出内，虽乘舆亦不得违法而任喜怒，其贤于汤之窥人主意以为高下者亦远矣。辱太子，刑公子虔，知后有新主能为祸福，而不欲屈法以求容阅。呜呼！其魁垒而骨鲠也，庸渠若弘、汤之徒，专乞哀于人主，藉其苛细以行佞媚之术者乎？

夫鞅之一日刑七百人以赤渭水，其酷烈或过于汤，而苛细则未有也[3]。观其定令，如《列传》所言，略已具矣。吾以为酷烈与苛细者[4]，则治乱之殊，直佞之所由分也。何者？诛意之律，反唇之刑，非有所受也。汤以为不如是不足以媚人主[5]，故瘁心力而裁制之，若鞅则无事此矣。周兴、来俊臣之酷烈也，又过于鞅，然割剥之惨，乱越无条理，且其意亦以行媚，而非以佐治，则鞅于此又不屑焉。嗟乎！牛羊之以族蠡传者，虑其败群，牧人去之而无所靳[6]。刑七百人，盖所以止刑也，俄而家给人足，道不拾遗矣。虽不刑措，其势将偃齐斧以攻榱桷。世徒见鞅初政之酷烈，而不考其后之成效，若鞅之为人，终日持鼎镬

① 《检论》作"而弘、汤、仲舒熹为是板荡者耳"。

② 《检论》作"法家与通经致用之士"。

③ 《检论》作"其酷烈或过弘、汤、仲舒，逆诈则未有也"。

④ 《检论》作"吾以为酷烈与逆诈者"。

⑤ 《检论》作"弘、汤、仲舒以为不如是不足以媚人主"。

⑥ 重印本、《检论》都作"牧人去之而无所遴"。

以宰割其民者，岂不缪哉。

余观汉氏以降，刀笔吏之说[1]多傅《春秋》，其义尊君抑臣[2]，流貤而及于民。汤之用决事比，其最傲矣[3]。自是可称道者，特旌旗之以文无害之名，而不能谓之有益于百姓。是其于法家，则犹大岩之与壑也。今缀学者不能持其故，而以抑民恣君蔽罪于商鞅。呜呼！其远于事情哉，且亦未论鞅之世矣。

夫使民有权者，必其辩慧之士可与议令者也。今秦自三良之死，后嗣无法，民无所则效，至鞅之世而冥顽固以甚矣。后百余岁，荀子犹曰秦无儒，此其蠢愚无知之效也。以蠢愚无知之民，起而议政令，则不足以广益，而只以淆乱是非，非禁之将何道哉。后世有秀民矣，而上必强阏之，使不得与议令[4]。故人君尊严若九天之上，萌庶缩朒若九地之下，此诚昉于弘、汤之求媚，而非其取法于鞅也。藉弟令效鞅，鞅固救时之相而已，其法取足以济一时，其书取足以明其所行之法，非若儒、墨之著书欲行其说于后世者也。后世不察鞅之用意，而强以其物色效之，如孙复、胡安国者，则谓之愚之尤，如公孙弘、张汤者[5]，则谓之佞之尤。此其咎皆基于自取，而鞅奚罪焉。

---

(1) 《检论》作"余观汉氏以降，以儒生为吏者"。

(2) 重印本，《检论》都作"其义恣君抑臣"。

(3) 《检论》作"仲舒之用决事比，其最傲矣"。

(4) 《检论》"非禁之将何道哉"下增"鞅之言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此非徒变法制，又易其闺门起居之礼也。是固不可与凡俗议矣。后世风教已饬，国邑所在"一段。下接"有秀民，而上必强阏之，使不得与议令"。

(5) 《检论》作"如公孙弘、董仲舒"者。

吾所为潚鞅者，则在于诋《诗》《书》、毁孝弟而已①，有知其毒之酋腊而制之，其勿害一也。昔者，蜀相行鞅术，至德要道弗踣焉。贾生亦好法矣，而非其遗礼义、弃仁恩。乃若夫挽近之言新法者，以父子异财为宪典，是则法乎鞅之秕稗者也②。宝其秕稗，而于其善政则放绝之，人言之戾也，一至是哉！

夫民权者，文祖五府之法③，上圣之所以成既济也。有其法矣，而无其人，有其人矣，而无其时，则三统之王者起而治之。降而无王，则天下荡荡无文章纲纪，国政陵夷，民生困敝，其危不可以终一餔。当是时，民不患其作乱，而患其骀荡姚易，以大亡其身。于此有法家焉，虽小器也，能综核名实，而使上下交蒙其利，不犹愈于荡乎。苟曰：吾宁国政之不理，民生之不遂，而必不欲使法家者整齐而撙绌之，是则救饥之必待于侁饭，而诚食壶飧者以宁为道殣也。悲夫！以法家之鸷，终使民生；以法家之刻，终使民膏泽。而世之仁人流涕洟以忧天下者，猥以法家与刀笔吏同类而丑娸之④。使九流之善，遂丧其一，而莫不府罪于商鞅。嗟乎⑤！鞅既以刑公子虔故蒙恶名于

---

① 重印本、《检论》作"则在于毁孝弟、败天性而已"。

② 《检论》下加脚注："案鞅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为其男女之别。是则禁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本以防其淫乱耳。秦本周之旧壤，而俗乱如此者，晋败秦师于殽纵淫，其后秦人男女无别，此商鞅所以亟为变革也。父子异财，与禁同室内息相因，鞅固有不得已耳。今伧人亦父子兄弟同坑而不知禁，乃欲父子异财，岂鞅之意哉。"

③ 《检论》作"文祖清庙之法"。

④ 《检论》作"猥以法家与弘、汤、仲舒佞人之徒同类而丑娸之"。

⑤ "嗟乎"二字，《检论》删去。

秦，而今又蒙恶名于后世，此骨鲠之臣所以不可为，而公孙弘、张汤之徒[1]，宁以佞媚持其禄位者也。

【说明】 本文载《訄书》原刊本，重印本、《检论》都曾刊载，今据原刊本录出，而以重印本、《检论》勘校。

原刊本末有附识："叔季陵迟，非整齐严肃无以起废。今西人之异于商君者，惟轻刑一事，其整齐严肃则一也。宁人先生颇善秦法，太冲则夐乎远矣。余著此篇，为世人所骇怪，亦思世无太冲，岂得不与宁人共治邪。凡非议法家者，自谓近于维新，而实八百年来帖括之见也。戊戌七月书。"重印本、《检论》并删。

① 《检论》作"而弘、汤、仲舒之徒"。

杂　　感

（一八九八年）

弱冠通九流，抗志山谷贤。丁此沧海决，危苦欲陈言。重华不可遻，敷衽问九天。溟涬弟尧舜，而不訾版泉[1]。版泉竟何许，志违时亦迁。瞢瞢荐绅子，观书穷天府。掉头辞晏婴，仰梁思贾举。血书已群飞，尙踵前王武。何不诵《大明》，为君陈亥午。嗟嗞论甘生，闻辛先病舌。宁为牛后生，毋为鸡口活。抱此忠义怀，扬灵盟白日。隼厉击孤鸾，鸾高先铩翮。铩翮亦良已，畏此矰笱多。举头望天毕，黯黯竟如何。浊流怀阿胶，谁能澄黄河？独弦非可弹，临风发《商歌》。既不遻重华，安事涕滂沱。蓬莱青未了，散发将淩波。

此去秋将东渡台湾作也。今中夏一帀，复自江户西归，书此不胜今昔之感。

【说明】 本文录自《清议报》第二十八册《诗文辞随录》，一

① “弟”，疑为“弔”之误。

八九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出版,署名"西狩"。

按:文末"附识"谓"此去秋将东渡台湾作也",则应撰于一八九八年秋"政变"发生、东渡台湾以前;"附识"则为次年所加。

致汪康年书

（一八九九年二月十六日）

穰卿仁兄大人执事：去冬由山根处寄上一械，计已登览。《昌言报》改弦以后，未审用何体裁？党锢之禁，近稍解未？闻沪、汉各报，奉其领事官令，不得登康、梁文件；然横滨《清议报》仍自流行，中国不能禁也。伯鸾近作，稍逊于前；对山移檄数四，亦卒无应者。二君皆尝通信，谓与日本社会相合，而政府未必肯听其请。此亦恒情，原不足诧。然至此亦晤无兵枋者之不能变政矣。近复有镜湖同人，移檄自日本来，想孙实甫为之耶？浩吾学堂，能搘柱否？仲巽设教，何必发扬德音？燕生曾有信来，益自言潜心禅学，然与台山、尺木议论颇近，恐堕人天小乘也。东人言及公名，肃然起敬，而缪者或以逸仙并称，则妄矣。肃此，即颂著祺。弟章炳麟顿首。正月七日。

【说明】 此书录自《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上海图书馆藏。

汪康年在函末注明:"己新正廿三收",知写于一八九九年二月十六日(光绪二十五年己亥正月初七日),这时章氏正寓居台湾。

信中所称"伯鸾",指梁启超;"对山",指康有为;"浩吾",指叶瀚;"仲巽",指胡惟志;"燕生",指宋恕;"逸仙",指孙中山。

台北旅馆书怀寄呈南海先生

（一八九九年三月十二日）

一读登楼赋，悠然吾土思。回头忆畴昔，搔首愈踌躇。早岁横江汉，谈经侍丌其。清言凌白马，壮志抗黄羲。忽展埼亭集，逾惊秀楚词。帝秦终蹈海，访武尙明夷。石隐优游日，天王明圣时。操刀期必割，沦鼎待重掎。鹍换雕题服，虬登隐背枝。《唐书·李泌传》：泌尝取松樛枝以隐背，后得如龙形者，因以献帝，四方争效之。佩娲延茂士，赐玦愧遗黎。老泪长门掬，深情故剑知。漂山成众煦，建旐倡群疑。《汉书·隽不疑传》：有男子建黄旐，自谓卫太子。已恸尧台锢，那堪秭灶倓。有行黔墨突，无涕弔湘累。沙麓精灵在，《汉书·元后传》：莽诏扬雄诔曰：太阴之精，沙麓之灵。蓬瀛风鹤危。飞丸穷赵壹，问卜警爰丝。蹈火心非悔，盍簪涂又歧。东洲花树迴，南国羽书迟。斗转空凭眺，河清动夙悲！千年仲宣恨，荼苦更如饴。

【说明】本文录自《清议报》第八册《诗文辞随录》，署名“台湾旅客”，一八九九年三月十二日（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出版。

泰风一首寄赠卓如

（一八九九年三月十二日）

泰风号长杨，白日忽西匿。南山不可居，啾啾鸣大特。狂走上城隅，城隅无栖翼。中原竟赤地，幽人求未得。昔我行东越[1]，道至安溪穷。釃酒思共和，共和在海东。谁令诵《诗》《礼》，发冢成奇功。今我行江汉，候骑盈山丘。借问杖节谁？云是刘荆州。绝甘厉朝贤，木瓜为尔酬。至竟《盘盂》书，文采欢田侯。去去不复顾，迷阳当我路，河图日以远，枭鸱日以怒。安得起槁骨，掺袪共驰步。驰步不可东，驰步不可西，驰步不可南，驰步不可北。皇穹鉴黎庶，均平无九服。顾我齐州产，宁能忘禹域？击磬一微秩，志屈逃海滨。商容冯马徒，誓将除受辛。怀哉殷周世，大泽宁无人。

【说明】 本文录自《清议报》第八册《诗文辞随录》，署名"台湾旅客"，一八九九年三月十二日（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一

(1) 《文录》作"昔我行东冶"。

日)出版。

按：此诗即《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所收《艾如张》。据《艾如张董逃歌序》称：一八九八年春，章氏辞张之洞，“归自夏口，沿于大江，而作《艾如张》一篇，以示孙宝瑄，宝瑄韪之；以示宋恕，宋恕阳为发狂不省”。则应撰于一八九八年。后来“政变”发生，章氏避居台湾，又予投寄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因是诗初载时，题称《泰风一首寄赠卓如》，故系于此。

答学究

（一八九九年五月十日）

章夫子读《傅燮传》，曰：呜呼！生民之瘼，身世之哀，别成知之矣。自古志节才行之士，内不容于谗构，奉身而出，语稍卓诡，而见诋于俗儒乡愿者皆是也。

方革政变起，余在吴、越间，见康氏所移檄，与友人语，友人或非康氏，余固已心怪之。岁莫至台湾，台湾之学究或曰：泄秘谋以速主祸，非忠也；讦宫闱以崇婞直，非恕也。夫博一身之高名，而不恤王事，岸然独与豨韦氏游者，斯支那之志士也已矣。嗟乎！吾勿辩于吴、越间，而今又默于是乎？学究无足语，顾以谇亚东士大夫，则不可以结吾唇吻。夫谓泄之而足以速主祸者，此以慈禧太后为庸女尔，彼其阴贼黠深，方什伯于吕雉，必有秘谋，自康氏之出而知之矣。不然，捕康氏，刑六士，足以雪怨，而何必囚上？且六士之死，未尝具狱成爰书也。彼则曰：吾詗知其情而戮之尔，何待其输情乎？上之囚，亦詗知其情也。康氏虽不言，何损于祸？其果于幽囚而不果于弑也，

以因之则君若赘旒，而位号未改，幸四邻可以无动，而弑之则必不可以侥幸，故剂量生杀之中而用之。康氏知慈禧之必不敢剚刃于上也，虽言之何益于祸？

且夫华士之选懦亦甚矣。彼拘于成俗，而不足以陟皇之赫戏者，横九服而皆是也。是故山崩陵阤，而宴卧者如故，非有驰檄，则气何自作？愤何自发？四邻何自动？武锋精兵何自附？蒯生有言，虽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聋之指挥也。夫为康氏者，其当杜门宛舌，以责成亏于上天乎？其抑当哗釦而与天下陈其义也。若夫以讦发宫闱为婞直者，则可谓儓隶之见耳矣。古者绝交必曰无恶声，居其国必曰不非其大夫，此经常之论，执雌免祸之道，非所语于行权之事也。今祸患之端，始于宫邻，卒于金虎掖庭之上，而罪人在焉。讨之犹可，况数其罪乎？必曰忠于今上者，将不得伤法于其母耶？当唐中宗时，韦氏弑逆之形未著，太子重俊，发宫甲以讨之，而君子不以为戾，此犹嫡母也。鲁之穆姜，姣于侨如，将议废立，成公与季、孟合谋，幽之东宫，而君子不以为戾，此犹所生也。今慈禧于文宗则非正嫡，于今上则非所生。夫为文宗后者则为今上母，不为文宗后者则不为今上母。《传》曰：上堂称妾，屈于嫡也；下堂称夫人，尊于国也。尊之者以毅皇故尊之耳，其于今上天性之爱，柎附之亲不在焉。上虽亲移其宫，犹未若重俊、成公之甚也。康氏非近臣，其所为容说者，又不在于吾君之亲昵。数其忮恶，斥其淫昏，人臣之分也。虽邻国闻之，亦以为人臣之分也。夫何经常之论之可执乎？

呜呼！全身则废道，持正则见訾。生于乱世，而冤颈折翼，至于菹醢而不悔者职矣。又重之以乡愿之议，使其义不得伸，悲夫！吾所谓乡愿者，其持之有故，其言之足以成理者也；今之学究者，其持之未有故，其言之不足以成理者也。虽然，亦足以为乡愿之驸骖矣，吾不可以结吾唇朦矣。

【说明】 本文录自《清议报》第十四册，一八九九年五月十日（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一日）出版，署为"台湾旅客来稿"。

戊戌政变发生后，康有为曾将光绪帝在一八九八年九月十五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三十日）和九月十八日（八月初三日）发出的两次《密诏》内容露布，即文中所谓"移檄"。

《密诏》中指出慈禧太后的干预新政，使光绪帝感到"朕位且不能保"，而嘱康有为等"妥速密筹，设法相救"。这种帝、后之争，主要不是"宫闱"琐事之争，而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阶级斗争所引起的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与斗争。《密诏》露布后，曾引起封建官僚的不满和一些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震惊。章氏撰文批驳，谓"讨之犹可，况数其罪乎？"可知这时他对康有为等，基本上还是表示同情的。

客帝论

（一八九九年五月二十日）

自古以用异国之材为客卿，而今始有客帝。客帝者何也？曰：蒙古之主支那是也⑴。夫整军之将，司税之吏，一切假客卿于欧、美，则以鸡林靺鞨之宾旅，而为客帝于中国也何损？知是而逐蒙之论，殆可以息矣②。抑夫客卿者，有用之者也；客帝者，孰为之主而与之玺绂者乎？北辰大微⑶，不司其勋；岱山梁父，不载其德，盗沃土于支那④而食其赋税，既无主矣，而客于何有？曰：已矣，勿言之矣，云门之均⑸，勿可以入里耳矣。必若言之，吾则曰：支那之共主⑹，自汉以来，二千余年而未尝易其姓也。

⑴ 《訄书》原刊本作“客帝者何也？曰，如满洲之主震旦是也”。重印本作“客帝者何也？曰，如满洲之主中夏是也”。

② 《訄书》原刊本、重印本均作“知是而逐满之论，殆可以息矣”。

③ “北辰大微”，《訄书》原刊本、重印本均作“明堂大微”。

④ 《訄书》原刊本作“盗沃土于震旦”；重印本作“盗沃土于中夏”。

⑤ “勿言之矣”，《訄书》原刊本、重印本均作“勿复道矣”；“云门之均”，《訄书》原刊本、重印本均作“咸池之均”。

⑥ 《訄书》原刊本作“震旦之共主”；重印本作“中夏之共主”。

昔者《春秋》以元统天，而以春王为文王。文王孰谓？则王愆期以为仲尼是已。欧洲纪年以耶稣，卫藏纪年以释迦，而教皇与达赖剌麻者，皆尝为其共主。支那之共主[1]，非仲尼之世胄则谁乎？梅福之讼王章也，见新莽[2]盗汉之朕而塞之也。及王章不可讼，而上绍殷之议，其指归则以圣庶夺嫡为臬，是何忘汉之社稷，而为此阔疏之计耶？

夫固曰，素王不绝，黑绿之德不弛，则支那[3]之域，亘千百世而有共主。若夫摄斧扆、掌图籍者，蒙乎汉乎[4]？则犹鹳雀蚊虻[5]之相过乎前而已矣。由福之说，苟言大同，必求可恃者而后君之，则君固在乎会推，而不得世及矣[6]。若犹是世及也，冠冕未裂，水土未堙，则支那之共主，其必在乎曲阜之小邑，而二千年之以帝王自号者，特犹周之桓、文，日本之霸府也。苟如是，则主其赏罚而不得窃其名位[7]。支那有主，则为霸府于丰、镐、汴、洛、北平者，汉乎蒙乎？亦犹鹳雀蚊虻之相过乎前而已矣[8]。苟

---

(1) 《訄书》原刊本作"震旦之共主"；重印本作"中夏之共主"。

(2) "新莽"，《訄书》原刊本、重印本均作"新室"。

(3) "支那"，《訄书》原刊本作"震旦"，重印本作"中夏"，下同，不另加注。

(4) "蒙乎汉乎？"《訄书》原刊本、重印本均作"新乎汉乎？"

(5) "鹳雀蚊虻"，《訄书》原刊本、重印本均作"菌鹤马蜩"。

(6) "苟言大同"以下，《訄书》原刊本、重印本均作"苟言大同，必有起于侧陋，握石椎而怀神珠者，吾民以为可恃，然后君之，斯固拥戴也，亦不得世及矣"。

(7) "窃其名位"，《訄书》原刊本、重印本均作"尸其名位"。

(8) "支那有主"以下，《訄书》原刊本、重印本均作"则为霸府于丰、镐、秣陵、汴、雒、北平者，汉乎满乎？亦犹菌鹤马蜩之相过乎前而已矣"。

摄之者不得其指，而自以镇抚一国[1]，若天之有释提桓因[2]。斯犹大夫之胪岱，其罪不赦，此汉、魏[3]之所以为亢龙绝气[4]，而客帝之所以愈迫民以攘逐也。

难者曰：今之衍圣公，其爵则五等[5]，其册封则必于京室。今倒植其分，霸其封之者，而帝其受之者，其可乎？曰：已矣，勿言之矣[6]。吾固曰云门[7]之均，勿可以入里耳矣。《繁露》有言，天子不臣二代之后，而同时称王者三，是则杞、宋之在周世，其名则公，其实则王也[8]。夫以胜国之余蘖，不立其图法，不用其官守，而犹通三统而王之，况朝野皆奉其宪法[9]以纲纪品庶者欤？名曰衍圣公，其实泰皇也。若夫锡命之典，自汉之封绍嘉以至于今，更十七姓，七十有余主，而不能以意废黜之。夫非一代之主所得废黜者，则亦非一代之主所得册封也。虽无册封[10]，于孔氏之位何损？其册封者，骄主媚臣之自为僭滥[11]，亦犹乾隆之世，英吉利尝一通聘，而遽书之以为入贡之藩

---

① "镇抚一国"，《訄书》原刊本、重印本均作"镇抚九有"。

② "释提桓因"，《訄书》原刊本、重印本均作"摄提大角"。

③ "汉、魏"，《訄书》原刊本、重印本均作"汉、唐"。

④ "亢龙绝气"，《訄书》原刊本、重印本均作"天囚非命"。

⑤ "其爵则五等"，《訄书》原刊本、重印本均作"其爵则九命"。

⑥ "而帝其受之者"以下，《訄书》原刊本、重印本均作"其左夫！曰：已矣，勿复道矣"。

⑦ "云门"，《訄书》原刊本、重印本均作"咸池"。

⑧ 《訄书》原刊本、重印本下加脚注曰："《书·梓材》，以厥臣达王，惟邦君。《正义》曰：郑以王为二王之后"。

⑨ "宪法"，《訄书》重印本作"宪典"。

⑩ "虽无册封"，《訄书》原刊本、重印本均作"虽微册封"。

⑪ "其册封者"以下，《訄书》原刊本、重印本均作"其册封，则骜主媚臣之自为僭滥"。

也[1]。且昔者成周之末，王赧已虏，而东周特畿内之侯耳，其于七国之王，爵位固不相若，亦奉事贡献惟谨[2]，且听其黜陟焉。宋氏之于金、元，亦尝至乎称臣称侄矣。然而言神州之王统者，终不以彼而夺此。苟以是为比，则衍圣当帝，而人主之当比于桓、文、霸府也[3]，其可议哉？不然，使汉人之帝汉也，则幸犹有寄生之君矣。彼瀛国之既俘，永历鲁监国之既坠，而支那旷数百年而无君也，如之何其可也。

"而人主之当比于桓、文、霸府也，岂顾问哉？虽然，此犹千载之蛊事，臧于石室，史官儒生得守空文以持其义，而世主未尝既其实也。土簪之后，逆取顺守，倘已。方其盛时，持重万钧，环天下而为臣妾，虽临辟雍，固不欲捐其黄屋，以朝孔氏之尝酎，斯已泰矣。及夫陵夷积弱，处逃责之台，被窃鈇之言，大柄既失，势侪于家人，宁奉表以臣敌国，而犹岿然自谓尊于玄圣之裔，岂不恧哉！乃夫宾旅侵突而为君者，故迹梁远，以华夏为异类，锋刃所抵，类禡厥宗，而无所殷痛。扬州之屠，嘉定之屠，江阴之屠，金华之屠，啗肉也如黑鹫，窃室也如群麀，其他掊发窖藏，掘冢坏陵，而取其金鼎玉杯银尊珠襦之宝以为储藏者，不可以簿籍计也。及统一天下，六官犹耦，防营犹设。明末马、阮筑板矶城为西防，左良玉叹曰：今西何所防，殆防我耳！今之驻防，则谁防乎？名不正，言不顺，二百年泄泄然而不改，异夫。托不加赋以为美名，而以胡骑之餫馕，刓敝府库，迮有狱讼，则汉民必不可以得直；迮有剧寇，汉臣

① "入贡之藩也"，《訄书》原刊本、重印本均作"入贡之藩云尔"。

② "王赧已虏"以下，《訄书》原刊本、重印本均作"而东周特畿内之侯也，其于七王，爵位固不相若，亦侍祠贡献惟谨"。

③ 以下《訄书》更动较大，且予增益一千五百字，续予发挥。今据重印本用五号字录之如下，遇有与原刊本有重要不同者，则加注明。

贤劳而夷其难。创痍既起，又置其同族于善地，以乱其治，吾义士之谋攘逐者，亦宁有过职乎？逐加于满人，而地割于白人，以是为神州大诟。夫故结肝下首而不欲逞，非其丧志，鉴于蜀、宋也。蜀相之结荆、扬也，非忘报也，彼惎曹氏，则吴不得怨，故覆于南郡，烬于白帝，再挫之忿，而不敢复焉。宋与女真，宗祢之痛也，引蒙古以灭之，终自戕败，庙算失也，故地处其逼，势处其隍，九世之仇，而不敢复焉。何者？莘牛之斗，玄熊响怒以格其閒，则二牛皆禽也。且夫今世，则又有圣明之客帝，椎胸啮臂，以悔二百五十年之过矣。彼疏其顽童，昵其地主，以百姓之不得职为己大耻，将登荐贤辅，变革故法，使卒越劲，使民果毅，使吏精廉强力，以御白人之侮，大东辛颛之胄，且将倚之以为安隐，若是，又可逐乎？虽然，弗逐，则高义殆乎格，配天之志殆乎息矣。决胜负于一朝，两族皆偾，而不顾其后者，日暮涂远之所计，虽非少康，犹之伍员也。中夏（原刊本作"震旦"）虽坏败，宁无其人耶？其攘逐满洲也，在今日；其不攘逐满洲也，亦在今日。客帝诚圣明，则必取谟于陆贽，引咎降名，以方伯自处。《唐书·陆贽传》：德宗议更益大号，贽奏言：若以时屯，当有变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祗天戒。（原刊本作："《唐书·陆贽传》：德宗议更益大号，贽曰：'今乘舆播越，大憝未去，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隙，陛下宜痛自贬励，不宜益美名以累谦。'德宗曰：'卿言固善，然要当小有变革，为朕计之。'贽奏言：'古之人君，德合于天曰皇，合于地曰帝，合于人曰王。父天母地，以养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称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后世，昏僻之君，始有圣刘天元之号，故人主重轻不在称谓，视德何如耳。若以时屯，当有变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祗天戒，且矫旧失，至明也。损虚饰，大知也，宁与加冗号以受实患哉！'案天子降名之义，自秦以后，废绝久矣。贽独高引古义，用相匡正，岂非二千年中嘉言之端冕乎。至言加冗号受实患，则益为客帝鍼艾矣。"）禘郊之祭，鸡次之典，天智之玉，东序之宝，一切上之于孔氏；彤弓黄钺，纳陛鼍鼍，一切受之于孔氏。退而改革

朝官，皆如宗人府丞。朝官皆满、汉二员，独宗人府丞则只一汉员。（原刊本下多“固以汉人非其仆隶，得临制公族尔。知此微意，夫何远哉！”数句。）圈地之满蒙，驻防之八旗，无置马甲，而除其名粮，一切受治于郡县，自将军以至佐领，皆退为散秩，大政既定，奏一尺书，以告成于孔氏。吾读伊尹书，有九主，有素王。吾读《中侯》，至于霸免。郑注：霸犹把也，把天子之事。有受空之帝。郑注：谓楚义帝。今以素王空帝尸其名位，而霸者主其赏罚，则吾中夏（原刊本作“震旦”）所君事者，固圣胄已。其建霸府于域中，则师不陵正，而旅不逼师，臣民之视客帝，非其后辟，其长官也。霍光也，金日磾也，李晟也，浑瑊也，其种系不同，而其役使于王室也若一。则部曲之翼戴之也，汉乎满乎？亦犹菌鹤马蜩之相过乎前而已矣。君臣不属，则报志可以息，虽弗攘逐，无负于高义。然则二族皆宁，而梅福之大义，且自今始既其实焉。以是流衍于百王而为宪度，其有成劳于中夏（原刊本作“震旦”）也亦大矣。

“难者曰，今中国羸病，炊之则僵，犁五稔必仆，虽尊崇孔氏以息内讧，其何瘳乎？曰，尚观明堂合宫之法，官天下（原刊本作“家天下”）则帝孔氏，百世丕天之大律，非独为猾夏之代而已。且夫发愤为天下雄，则百稔而不仆；怠惰苟安，则不及五稔而亦仆。吾所议者，为发愤之客帝言也，非为怠惰苟安者言也。夫苟怠惰苟安，虽采椽茅茨，若自处于臣虏，可以亡国。发愤而为雄，而后以降名尊主为可恃也。不然，则一饭之顷，已涣然离逷矣，安能五稔？”

【说明】 本文最初发表在《清议报》第十五册，一八九九年五月二十日（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十一日）出版，署为“台湾旅客来稿”，则此文似为戊戌变法失败后，章氏旅居台湾时所撰。

同年冬，《訄书》木刻本（简称“原刊本”）付梓，收入此篇（第

二十九篇)，颇多增改，认为“逐加于满人，而地割于白人，以是为神州大诟”。但是，原刊本还在“为发愤之客帝”进言，还以为“震旦之共主”，“必在乎曲阜之小邑”。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暴露了光绪皇帝卖国主义的真面目，也粉碎了章太炎的“客帝”幻想。他在这年七月后手校的《訄书》上写了一条眉校(上海图书馆藏)：

“辛丑后二百四十年(按为一九〇〇年)，章炳麟曰：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弃本崇教，其流使人相食。终寐而颎，著之以自劾录，当弃市。”

不久，章太炎又写了《客帝匡谬》，对过去的“饰苟且之心”进行匡谬，收入他一九〇二年“删革”的《訄书》(一九〇四年在日本铅字重印，简称“重印本”)，作为“前录”，除文字续有增损外，末后“匡谬”云：

“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按为公元一九〇〇年)，章炳麟曰：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且汉帝虽孱弱，赖其同胤，臣民犹或死之。满洲贱族，民轻之，根于骨髓，其外视亡异欧、美。故联军之陷宛平，民称‘顺民’，朝士以分主五城，食其廪禄，伏节而死义者，亡一于汉种，非人人阘茸佣态，同异无所择，孰甘其死？由是言之，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今弗能昌言自主，而以责宣尼之主祏，面欺。箸之以自劾录，而删是篇。”

一九一四年，章氏将“《訄书》增删，更名《检论》”，此篇删去。今将最初刊行之《客帝论》录出，而以《訄书》原刊本和重印本校注说明。

儒　冠

（一八九九年七月八日）

青青陵麦蔽荒村，溺尽儒冠问叔孙。岂谓禹汤真酷吏，翻怜训注愧谋臣。中庸千载双胡广，明亦有胡广。剧美同时两子云。谷永亦字子云。一笑辽东作龙尾，藜床白帽向谁论？

【说明】 本文录自《清议报》第二十册《诗文辞随录》，署名“蓟汉阁主”，一八九九年七月八日（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初一日）出版。

又致汪康年

（一八九九年七月十七日）

穰卿仁兄国士：春日在台北，接书并«齐天乐»、«卜算子»两曲。五月东渡，见吴越王，复累累言公近状，乃知藜羹不斟，彼此同病。鄙意必不欲入大东版籍，凡入日本籍者，多为所鄙弃。而隆琦之故事，犹勉强可以蹑踪。过西都至清水寺，尝拜月照坟，又与诸浮屠往来，他日此志，宜可遂也。

对山近在伦敦，行将返西半球。伯鸾寄食外务省官房，幸神户、横滨间粤商击毂，时有馈遗。杂居一案，亦借随何之舌，渐能挽回，彼此报酬，得免弹铗，而非吾辈浙人所能联络也。粤商多不通三江语，浙商大抵沾沾自喜。彼欲以造因成果之说处置天下事，其心苦矣。睢盱九域，恐非卷葹，谁能继者？兴公亦在横滨，自署中山樵，尝一见之，聆其议论，谓不瓜分不足以恢复，斯言即浴血之意，可谓卓识。惜其人闪烁不恒，非有实际，盖不能为张角、王仙芝者也。

《昌言》停后，大计何所属？伯鸾旧怨，亦既冰释，渠于弟更谢血气用事之罪。松柏非遇霜雪，不能贞坚，斯人今日之深沉，迥异前日矣。竹林旧好，公宜一修。伯鸾尝问弟曰："穰卿果何如人？"答曰："洛、蜀交讧而终不倾入，章、蔡视木居士何如耶？"自是伯鸾亦念君。水心近况，闻颇艰苦，速成学堂，尚有行脚僧挂单否？颇拳拳也。手肃，即请撰安。弟章炳麟顿首。六月十日。

【说明】 此书录自《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上海图书馆藏，系章氏"五月东渡"，由台湾抵达日本后所发。函中所称"兴公"，即孙中山。《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二十五年三十二岁"记："五月，渡日本。……时卓如（梁启超）在横滨，余往候之。……香山孙文逸仙时在横滨，余于卓如坐中遇之，未相知也。"与此相合，故系于一八九九年。又，"水心"，指叶瀚。

梁园客

（一八九九年九月五日）

闻道梁园客最豪，山中谷永太萧条。鸮余乞食情无那，蝇矢陈庭气尚骄。报国文章隆九鼎，小臣环玦系秋毫。君看鹦鹉洲边月，一阕《渔阳》未许操。

粤海有文士，少入词苑，以纠弹节相罢官，当时颇著直声。既失志，有咄咄书空之感。去秋，遂因政变作符命数篇，诗以记之。

【说明】 此诗录自《清议报》第二十六册“诗文辞随录”，署名“西狩”，一八九九年九月五日（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初一日）出版，系讽刺梁鼎芬而作。

西归留别中东诸君子

（一八九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黄垆此抟抟，神州眇一粟。微命复何有，丧元亮同乐。蛣蜣思转丸，茅鸱惟啖肉。新耶复旧耶？等此一丘貉。轶荡开天门，封事苦偾邀。朝上更生疏，夕劾子坚狱。鲸鱼血故暖，凉液幻殊族。球府集苍蝇，一滴缁楚璞。潜鬻岂齐性，缟玄竟谁觉。吾衰久矣夫，白日曀旁朔。仕宦为金吾，萧王志胡麞。江海此分袂，涕流如雨雹。何以赠君子，舌噤不敢告。弓月保东海，蚡冒起南岳。

【说明】 此诗录自《清议报》第二十八册“诗文辞随录”，署名“西狩”，一八九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出版。

翼教丛编书后

（一八九九年十月）

是书驳康氏经说，未尝不中窾要，而必牵涉政变以为言，则自成其瘢宥而已。且中国学者之疑经，亦不始康氏也；非直不始康氏，亦不始东壁、申受、默深、于廷也。王充之《问孔》、刘知几之《惑经》、程氏之颠倒《大学》、元晦之不信《孝经》、王柏之删《毛诗》、蔡沈之削《书序》，是皆汉、唐所奉为正经者，而捍然拉杂刊除之。其在后世，亦不餍人心。夫二王、刘、蔡无论矣，程、朱则以理学为阘捭者，方俯首鞠躬之不暇，不罪程、朱，而独罪康氏，其偏枯不已甚乎。

苟曰生心害政邪？以去岁变法诸条，使湘人平心处之，其果以为变乱旧章，冒天下之不韪乎？抑不过盱衡厉色而诋之乎？且说经之是非，与其行事，固不必同。昔欧阳永叔痛諆河洛，韩魏公见之，未尝与言《周易》。使魏公如湘中老儒之见，以说经行事同类而并讥之，则当早尸永叔于两观矣。虽然，诋其说经而并及其行事，此一孔之儒

之迂论，犹可说也。乃必大书垂帘逐捕之诏以泄私愤，则吾所不解也。明臣倪元璐《论三朝要案》曰：杨涟辈之争三案，不必尽是；逆阉〔阉〕所引当时之与辩诘者，亦不必尽非。顾其藉是以诬陷善类，则是非不足论也。今康氏经说诸书，诚往往有误，其误则等于杨涟尔。苟执是非以相争，亦奚不可，而必藉权奸之伪词以为柄，则何异逆阉之陷东林乎？吾惧《翼教丛编》方为《三朝要案》之续矣。

是书又引义乌朱侍御与康氏辩论经义诸札，侍御故金华学派，亦上窥两汉古义，其说经诚与康氏绝异，乃其请诛嬖宦以罢官，则行事又未尝不合也。元晦与水心平时论学则相攻，及谗臣以道学之名倾轧元晦，则水心又力救焉。使侍御在今日见康氏之遇祸，方流涕悒僾而道之，岂以其力庇贾、马之见，转用之以力庇权奸哉！

今之言君权者，则痛诋康氏之张民权；言妇道无成者，则痛诋康氏之主男女平等。清谈坐论，自以孟、荀不能绝也。及朝局一变，则幡然献符命、舐痈痔惟恐不亟，并其所谓君权妇道者而亦忘之矣。夫康氏平日之言民权与男女平等，汲汲焉如鸣建鼓，以求亡子，至行事则惟崇乾断、肃宫闱，虽不能自持其义，犹不失为忠于所事。彼与康氏反唇者，其处心果何如耶？噫！使侍御有知，其必当以朱丝萦社而攻之也。

【说明】 本文录自《五洲时事汇报》第三册。

按：《翼教丛编》，苏舆编，自称“专以明教正学为义”，是站在封建顽固派立场诋毁维新运动之作。章氏一八九九年十月四

日(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三十日)《致汪康年书》说："接八月二十日信时，弟适孑处湖上，比归家见信，则已二十八日矣。因草就两篇寄上，乞转致小沂。两文约共二千言。《翼教丛编书后》但与湘中腐儒驳难，未触忌讳也。"(上海图书馆藏)知本文撰于十月初，系寄请汪康年转交沈小沂在上海刊布的。信中所言"两篇"，除本文外，另一篇为《究移植论》。

藩镇论

（一八九九年十月）

自封建之法不行于后世，于是策时事者每以藩镇跋扈为忧，是其言则孤秦陋宋之冢嗣也。苟遍历九服，而观夫旌节旄纛之所建，亦苦其不能跋扈耳。诚使跋扈，则姬汉旧邦之世胄，犹可倚以自保，而有造于齐州也多矣。

夫以陟罚为不出于王室，下擅于诸侯，欲替其庆赏刑诛者，此三古立国之宪法，阿衡氏所以致太平也。化有进退，时有险易，其世既去，其法之善既设，而犹奉其法之弊而守之，则楚戌之所以讥城郢、而治罗马学者之所以讥寡人政体。当其无事，微密独断，贞天下之动于一可也。若外患既至，国家之所以祈天永命，自保其榷落者，在此律令、符节、章服已乎。守其律令、符节、章服，使藩镇一切不得便宜从事，苟此律令也，符节也，章服也，能为吾执干橹以御外侮，若偶人之自踊者，亦何苦而不守之。吾独惜夫分地以备戎者，必在方面；守方面者，必在劲兵；将劲兵者，必在其人，而非夫凭藉天室之宠灵遂可以从事者也。

失火之家，救者则不得先白丈人，非其臣妾臧获之故为跋扈也，不跋扈则不足以息火，苟为之主者，以此督过其臣妾臧获，而曰自门阈以内，吾宁一切焚爇以为灺烬，其救者乃同于子盗父兵之戮，则今之为支那谋者，所以诋諆其藩镇近之矣。且今之藩镇，能若救火之勿白者乎，其未能也。人之哗嚣以为拥重柄者，特其外观足以自壮尔。若夫植守令，布政教，理府库，训步骑，则一切上制于枢府，而下制于六部，一命之秩，不得专授，铢两之饷，不得擅增。夫是故文吏则面从而背憎，爪牙骑士帖首伏谒于前，而涣德离心于后，使之治文书，剿寇盗，则可矣。将驰观于域外，而扶义倜傥以行其意，则吏士有疾走弗顾耳。

若夫诏令既下而有所留阻，弗行者非特督抚之于主上也，虽守令于督抚亦然。苟盱衡厉色，朝夕而程督之，亦无弗疾行者。向背之势，从其所好，不从其所令，上下一也。不然，少有不便，则迁延以缓其事，要其勿行也，特迁延则已耳。其驳议则未有也，其封还诏书则未有也，是何也？震于雷霆万钧之势，虽阴堕其实，而勿敢公违其言。乃者，李鸿章之在北洋，其权藉不为轻矣。海军方立，内府取其经费以治离宫，瞠目噤齿而勿敢诤，况其微者乎？非直无柄也，身之去留，亦惴惴不自保，不当于中枢犹可也，不当于便嬖外戚，朝自激昂，夕去其位矣，夕自激昂，朝去其位矣。故伛偻侦伺，舆金璧以登其门，然后可以数年而弗调。不然，则自破符以往，无异驹之横厉于邮传也。

夫政不己操，而位不久假，其居官也，则无异于提举

祠庙，其勿能跋扈，甚明白矣。然犹赖有数镇稍自奋厉，足以扶危而定倾。故戊戌八月之变，刘坤一正色而立于两江，则桐宫之谋遂止，人比之甘露之难有刘从谏焉。虽然，如从谏之欲清君侧，则弗敢讼言者，非其匡怯，不欲抗志以从古人也。优然而杖钺于其邻者，无不厥角稽首，以聆训政之命。四封无援，介特自立，徒挟湘军与自强军旧部，而能方行如泽洳之师乎。呜呼！观于藩镇之削，则中朝之取法于孤秦陋宋，而甘心于白种之蹂藉也可知已。且夫孤秦则犹有蒙恬以镇边塞也，陋宋则犹以刘、韩、张、吴诸子分镇而御女真也。敌国外患日冯陵而无已。盖虽猜忌如二代者，亦不得不分其大柄以归将帅，如议者之见，以跋扈为藩镇罪，则赵高之杀蒙恬，秦桧之杀岳飞，其功乃与黄帝戮蚩尤等也。且古之听任方面，宪令勿施，黜陟勿知，而与秦、宋相反以为治者，则宁有如唐之叔世者乎？尾大不掉，父子相禅，干名号以取戾。故柳宗元则请封建于前，而赵普则阴废军使于易代之后。至于今，儒人之拳曲而拥肿者，遂无不奉之以为黄帝之李法，其亦闻夫杨志诚之逐李载义于幽州，牛僧孺议之曰，是不足为朝廷忧，第付以节使捍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顺治也。夫失幽州于契丹，孰与失幽州于藩镇，藉藩镇之力而能使契丹不敢南向而牧马，则衡量细微，而以逆顺为言者，虽不比于高、桧之奸谀，其为国家害也则一而已矣。

向者支那藩镇之盛，莫如曾、左。曾氏既夷粤寇，而勿能定九鼎于金陵。曩令知保种之大义，诐僭妄之危言，则吴、楚贤士，云合猋起而附其下，至今三十年，革政可

成，何遽不如暹罗也。曾氏既歿，左氏横于赤县者尚二十年。当是时，白人虽觊觎，犹敛戢勿敢大肆。其克新疆归，有劝进者，长息曰：吾日莫涂远，鬑然而齿堕矣。嗟乎！有其时者无其志，有其志者阻其年，使支那无文武自将之主，而澌灭几至于尽。及其偏裨代兴，率不过局促文法，以守纯臣之节，而敖者犹以跋扈议之，欲其蒲伏弁栗以为顺从，是直欲使十九行省尽沦没于丑虏而无孑遗也，岂不缪哉。

难者曰：东方之国，莫善于立宪政，孰有立宪政而使藩镇得以自擅者乎？曰：向吾固云，化有进退，时有险易，其世不同者，其法未可以一也。物势之相因若激湍，上薄而后下流于溪壑。板荡之世，非得藩镇以尊攘，则宪政不立。且今之斥拟藩镇以为跋扈者，其志果在宪政乎？抑他有所为乎？夫削藩镇以立宪政者，天下之至公也；削藩镇以遂一二肺腑贵人之专欲者，天下之至私也。私之至者，不行媚白人，使朘朘中国以至于尽不已。今藩镇虽离于至公，而犹未合于至私。若皇德贞观，廓夷旧章，示民版法，陶冶天下，而归之一宪，藩镇将奔走趋令，如日本之萨、长二藩，始于建功，而终于纳土，何患自擅。若犹是无宪也，方将倚依以为屏辅，使内慑权要，而外保分地，跋扈之议，其未可宣也。善夫衡阳王公之言曰："晋氏州牧分土，措施不拔，琅邪以延。六代文羸，漫不足纪，遗法余力，仅支江介者二百七十年。使彼孱主孤邦，日斤斤焉以孤寡陵迟、倒柄藩牧为虑，曾不足以建十年，而石、苻、拓跋已褰裳而绝安流矣。""夫无百祀之忧，鲜九垓之辨，曾以

其身于天下，愤盈俦侣，畛畔同气，猜割牵役，弱靡中区，乃霍霍然保尊贵，偷豫尸功，患至而无以御，物逼而无以固，子孙之所不能私，种类之所不能覆，盖王道泯绝，而《春秋》之所大憖也。”呜呼！吾读《黄书》，至于《古仪》、《原极》诸篇，涕潸然矣。

【说明】 本文录自《五洲时事汇报》第四册。

按：章氏于一八九九年十月十二日（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初八日）《致汪康年书》说：“八月三十日，曾寄《究移植论》、《翼教丛编书后》两首，托转致小沂。……今复将《藩镇论》一首寄奉，亦望转致小沂。五洲报馆设在何处，务望示悉，以便他日径寄。”（上海图书馆藏）则本文也是寄请汪康年转交沈小沂在上海刊布的。

分　镇

（一八九九年）

与不得已，官制不及改，则莫若分镇，分镇尚已。昔唐太宗欲世授都督[1]，而马周、李百药之伦，则谓亲属且不可以领土宇，其后淮朔不宾，柳宗元祖述其意，作《封建论》，盖惧镇将世及，尾大蹠戾，黜陟将自主，属时清明，未有外侮，其论议固足以自守也。宋之季而祸发于穹庐，州郡破碎，墓无完槥，里无完室，则李纲始有分镇之议，虽未竟行，南宋卒赖是以自完其方部。然后知封建之说未必非，而郡县之说未必韪也[2]。

定倾之道，一彼而一此，轩辕大角之兽不见，则王者不能以革故。及阳节既尽，必守前世故常之论，以外重内轻为足以亏国家之大柯，此文俗吏之所乐，而知时者固未尝以是为权概也。自明以来，行省则有布政使，主用人治赋，不得操兵柄，其后以疆宇彦荒，非能正众之丈人，使之

① 《訄书》重印本作"节度"。

② 《訄书》重印本作"然后知封建有其韪，而郡县有其非也"。

节制将吏，不足以为治，于是有以大臣为督抚者。当明之衰，直隶一隅，有总督三人，十有三行省，其巡抚乃至二十有九，威权虽众箸，然所驭乃不过数郡，土宇既陋，不足行其意，终于流寇票突，外患蹑迹，如决澥池而莫之夭阏。此无他，劫于马、李、柳氏之论，常惧方镇屈强，不用朝命，故宁削弱其土，使局促不得自展，至于疆宇坼裂而不悔也。

满洲起朔方，因袭明旧，稍省督抚，小者不损一行省，使教令所下，渐及泰远，然犹禀命于六部，不敢自擅。咸丰之季，潢池日扰，重以外寇，天下之势，阽阽如累九丸。赖衮职明圣[①]，枢臣善方略，一昔举缄縢扃鐍之智而破瓴之。自征自抚，自生自杀，自予自夺，一切属其权于疆吏。是时知兵之臣，威令振肸，或出其境外，而上不以文法制之，卒能芟夷巨寇，俾民小愒[②]。由此言之，内外之重轻，所以为利害者，断可知矣。今方镇苶弱，而四裔乘其敝，其极至于虚猲政府，使从而劫疆吏，一不得有所阻桡，割地输币，无敢有异议。彼其所以钳束者，则外轻之效非乎？

与不得已，官制不及改，则莫若以封建方镇为一，置燕、齐、晋、汴[③]及东三省为王畿，注错[④]无所变，其余置五道：曰关陇，附以新疆；曰楚蜀，附以西藏；曰滇黔桂林；曰闽粤；曰江浙。谓三江浙江。道各以督抚才者制之，冠名以地，无以虚辞美称，行政署吏，惟其所令；岁入贡于泉

---

① 《訄书》重印本作“咸丰之季，汉帝已立，重以外寇，孤清之命，阽阽如累九丸，赖大酋明圣”，下同。

② 《訄书》重印本作“卒能翦灭太平，盗其天球”。

③ 《訄书》重印本作“宋”。

④ 《訄书》重印本作“注措”。

府者数十万，毋有缺乏；扶寸地失，惟斯人是问。一受其爵，非丧土缺贡，终其身无所易，死则代以其属吏，荐于故帅而锡命于朝。其布于邻国，则曰：斯吾封建[1]之国也。交会约言在是，天室弗与知[2]。若是，则外人不得挟政府以制九域，冀少假岁月以修内政，人人亲其大吏，争为效命，而天下少安矣。

夫今世[3]名位至滥，独爵号乃重于灵鼍之鼓，蒙古而外，非宗室无有处王位者，虽五等亦非勋臣不得与，此其法昉于汉、明之制。然明永历讨不庭也，何腾蛟则以中湘王封墓，其后如金声桓、李定国数子，皆剖青圭而正王位，其膏不屯，其印不刓。何者？遭值丧乱，则守文之制，固运而往矣。且古者上公九命，子男特五命耳，其位乃下于列卿，是故成周之典，足以度越千世。其在后王[4]，惟唐制最中绳。其秩，亲王正一品，与三公三司同，嗣王郡王，则不过从一品，降及男国，则不过五品，故宰相皆公，而将帅以郡王封者三十余人，以李光弼之部，王者至十校。今俄、英之相，多以王公称者。远则唐制，而近则西邻，以此崇重方镇，夫何牵于往日之制乎？或以唐世河北失驭，其端自方镇之有功始，此皆愚儒无知，惩既成之事，而不知其谋始之所以难也。使唐无方镇，十道且不能保，奚翅失河北而已！其卒旅距抗命者，以武夫騂突之将，勇于趋

---

① 《訄书》重印本作"附庸"。

② 《訄书》重印本下加脚注云"案联邦之制，虽同等联邦，外交固在中央政府也。不同等联邦无论。然清室之于朝鲜，任自遣使，既尝破其例矣"。

③ 《訄书》重印本作"清世"。

④ 《訄书》重印本作"中叶"。

利而未尝知方，故浸寻至不可制。今以文臣而惧其跳踉为桀寇，自唐以来，其孰觌之哉！夫法不外操，而兵不中制，今自九服以内，旬始未出，而瓜分固已亟矣；瓜分而授之外人，孰与瓜分而授之方镇？方镇虽不肖，倘略得三四人，其他或愿悫无雄略。吾闻晚明之将帅，史可法最劣，其次有瞿式耜，其次有李定国、郑成功[1]，后出益倞，则习于戎事故也。始虽愿悫，而代之者必雄略矣，其愈于中制者亦远矣。

且夫利不过幅，则用足也；思不出位，则虑周也；兵不外募，则士附也；吏不旁掣，则功立也。当裔夷之竞，而求之剽末以觊自全，使烝民有立，政府缓带，舍是则无长计矣。若其检式群下，和齐县内，微革更官制，则犹篆车之无轐，而丁时者或未意是也。颂曰：皇以閒之。

【说明】 本文撰于一八九九年，载《訄书》原刊本，列为第三十一篇。一九〇〇年，复为"匡谬"云：

> "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按为公元一九〇〇年），章炳麟曰：怀借权之谋，言必凑是。今督抚色厉中乾，诸少年意气盛壮，而新用事者，其葸畏又过大耋旧臣，虽属以一道，弗能任。《传》曰：负且乘，盗之招也。纵满洲政府能弃，若无收者何？夫提挈方夏在新圣，不沾沾可以偷取。鉴言之莠，而删是篇。"

《訄书》重印本将《分镇匡谬》列为"前录"；一九一四年，章氏将"《訄书》增删，更名《检论》"，此篇删去。今据《訄书》原刊本录出，而以重印本校勘。

---

[1] 《訄书》重印本作"其次有郑成功，张煌言"。

今古文辨义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自刘申受、宋于庭、魏默深、龚瑟人辈诋斥古文，学者更相放效，而近世井研廖季平始有专书，以发挥其义。大抵采摭四人，参以心得。四人者，于《毛诗》、《周礼》、《逸礼》、《古文尚书》、《左传》，率攻击如仇雠，廖氏则于四知[1]皆加驳斥，而独尊左氏，谓不传《春秋》，正群经之总传，斯其异也。其《群经凡例》、《经话》、《古学考》等书，虽所见多偏戾激诡，亦由意有不了，迫于愤悱之余，而以是为强解，非夫故为却偃以衒新奇者。余是以因通人之蔽而为剖释焉。

综廖氏诸说，一曰经皆完书无缺，以为有缺者刘歆也。一曰六经皆孔子所撰，非当时语，亦非当时事，孔子构造是事而加王心也。一曰四代皆乱世，尧、舜、汤、武之治皆无其事也。一曰《左氏》亦今学，其释经亦自造事迹，而借其语以加王心，故大旨与《公》、《穀》同，五十凡无一背

[1] 原刊如此，疑为"四书"之误。

《公》、《穀》也。一曰诸子九流皆宗孔子也。夫廖氏之意，特以宰予尝言夫子贤过尧、舜，苟六经制作，不过祖述宪章，知尧、舜固为作者之程，而孔子特为述者之明，恶得以加于尧、舜之上哉。于此思之不通，则尽谓尧、舜事为虚，而以归之孔子，然后孔子为生民所未有，而群疑皆析矣。及后又得一证，观春秋时公卿大夫烝报残虐，降至而秦、汉以后，斯风渐熄，则意三代以上，其渎乱无人理，必更甚于春秋，而尧、舜、汤、文，遂可一扫空之，至此则其守愈坚矣。古文逸经，多谓出于周公，是则六经为周、孔并制，孔子又不得为生民所未有也，于是谓逸经皆刘歆所伪撰，而孔子乃尊无二上矣。《左氏》述当时事，有极丑恶者，亦有极嘉美者，意春秋既为乱世，则必不得有此美谈，于是谓《左氏》亦自造事迹，而非征实之史。

九流自儒家而外，八家所说古事，虽与经典不无龃龉，而大致三代以上，圣帝明王名臣才士亦略不异于群经。且魄琐小事，亦有与群经合者。使其各为一术，则孔子以前，坟典具在，孔子不能焚去其籍也，彼诸子者，何为舍实事不言而同于孔子虚拟之事乎？于是词穷，则不得不曰庄、墨、申、韩皆宗孔子也。至此则欲摈古文于经义之外，而反引珍说于经义之中；欲摈尧、舜、周公不得为上圣，而反尊庄周、墨翟为大师，则亦仅可鹘突其词，敷衍其语，而于心终不能安，于理终不能晰矣。

综其弊端，不过欲特尊孔子，而彼此棖触，疑义丛生，故不得不自开一径耳。

余则解之曰：孔子贤于尧、舜，自在性分，非专在制作

也。昔人言禹入圣域而未优，斯禹不如尧、舜也；颜渊言欲从末由，斯颜不如孔也。此其比较，皆在性分之内，岂在制作哉！惟然，故惟宰我、子贡、有若辈亲炙者知之，而孟氏则去圣已远，未尝亲睹其气象，故必引三子之言以为证。若制作六经，则孟时全帙具在，以此证其优于尧、舜，自可言从己出，何必远引三子哉？孟言伯夷、伊尹与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是则定太平、制礼乐，夷、尹与孔子同此能事矣，而又言二子不能与孔子相班，然则孔子之所以超越千古者，必不在制作可知也。尧、舜、周公适在前，而孔子适承其后，则不得不因其已成者以为学，其后亦不得不据此删刊以为群经，此犹姜桂因地而生也，而其圣自过三人，此犹姜桂不因地而辛也。夫青胜于蓝，冰寒于水，知过其师，亦何足怪。

然即以群经制作言之，《春秋》自为孔子笔削所成，其旨与先圣不同，即《诗》、《书》亦具录成、康后事，其意亦不必同于尧、舜、周公矣。惟《易》与《礼》、《乐》，多出文、周，然《易》在当时，为卜筮所用，《礼》、《乐》亦为祝史瞽蒙之守，其辞与事，夫人而能言之行之也。仲尼赞《易》为十翼，则意有出于爻象之外者。今七十子传微言于后学，而为之作记，则意有出于《礼》、《乐》本经之外者。注《礼运》、《礼器》、《仲尼燕居》、《三朝记》等篇，非《士礼》、《周官》所能尽也。乐亦可知。至于记中制度有异二礼，则自为孔子制作，兼用夏殷，然不去二礼以存其异者，通三统也。夏殷之礼不存者，文献不足征也。是故经皆孔子之经，而非尧、舜、周公所得据，然彼所以圣过数子者，当不在是。自唐以后，太学遂罢旦而记尼，亦

以孔子圣德，自可度越前哲耳。岂以为《士礼》不出周公，而《周礼》又当摈绝哉？然则孔子自有独至，不专在六经；六经自有高于前圣制作，而不得谓其中无前圣之成书，知此则诸疑冰释，以下无庸再解矣。

然犹必解之者，则以世儒或不明廖氏本恉，而反取其支流以为根据也。春秋时事，秽浊不忍闻，大半皆出君相，此事非秦汉以后所无也。郡国守相，藩镇将帅，亦与古诸侯同。特封建之世，国皆有史，故秽事流传；郡县之世，非天子不得有史，故其事隐秘。不然，齐文宣、隋炀帝、唐太宗、玄宗、梁太祖及元世诸主之淫昏烝报，皆与春秋时事不殊，其君有之，而谓其将吏无之乎？封建变而为县，若弑君则秦汉以后，只奉一共主，固宜其少。然郡则诸侯变而为守令，杀守令亦犹弑君也。明亡以来，与春秋年数相当，历数成案，戕官之事，何止弑君三十六乎？而骨肉相残，如两江总督噶礼之谋酖其母者，更不足论也。要之，此在法令修明与否，而不专在教化，春秋时法令不如汉、唐、宋、明修明，故有此渎乱事耳。若教化则犹此教化也，有此教化，而上之人不能使昭明，斯法令不修之罪也。五帝四王在上，及幽、厉以前小康之世，固无此渎乱矣。而据此逆推，谓三代皆无教化之乱也。何其诬也。

且廖氏又曰：《山海经》，真禹制也，而《禹贡》为孔子之书；《穆天子传》，真周事也，而本纪多弟子所传。夫如是，则《山经》、《穆传》所载神仙妖鬼，乃真确有其事矣。是愿专此教，而反为神仙妖鬼诸事立一实证，虽孔子亦无说以斥其夸诞也，则其说适为淫祠助攻之柄而已矣。《左

氏》借古义美词以释经，余亦尝有是语。其言曰：陆元朗之叙《庄子》也，曰辞趣华深，正言若反；吕成公之论《史记》也，曰文见于此，起义于彼：以此读《左传》，则大通矣。然所谓古义美词者，皆当世自有其言，特左氏缀集以释经耳。且事本不为经发，而《左氏》则借之以申经义，故常有文在彼传，而实以申此经者。若使左氏自造，则不必为此隐见回曲之辞，而不妨于本条之下直造斯语矣。且苟其古义美词，皆非实有，则所谓忝报残虐者，亦安足据哉！

大抵《左氏》以事托义，故说经之处，鲜下己意，而多借他处之义以释之。故其义最为难知，而其功亦如集腋榖材，非二百四十年之遗语，不足以回旋其意也。即孔子作《春秋》，何独不然。苟曰拨乱世以成升平，由升平以成太平，则王者布政不过一世，而民已无不仁矣，何待二百四十年乎？惟春秋非二百四十年则行事不备，无以为法戒，亦犹左氏非二百四十年则嘉语不备，无以相证解耳。然则孔子著经，亦若兼为传人地者，故曰经之与传一体相成，共为表里也。若因服注季札观乐事，云传家据已定言之，遂谓《左氏》他事，亦皆取六经微言大义以裁成之，是则单文孤证也已矣。《左氏》非剿袭国史，其笔削去取之功勤矣，于此偶从已定言之，此《左氏》之文，非国史原文可知，要非于国史之外自撰事实也。至三传大旨，自有相同，而其异者终若瓜畴芋区之不可念。廖氏见近世治《公羊》者，皆明斥《左氏》，而不明斥《榖梁》，然《榖梁》之异于《公羊》，不下《左氏》，而诸儒意见偏枯如此，则不如并《左氏》而进之。且均以为今学也。以廖氏识见卓绝处，亦正其差池处。

盖同为今学，十四博士，其异同犹不可更仆，如韩太傅说《诗》，《艺文志》谓其与齐、鲁间不同，此即其见端也。三传同者自同，异者自异，穿穴鑿凿以相比附，亦何不可。要之，离则双美，合则两伤，调人刘兆，甚无谓也。至于诸子分流，自出畴人散乱之后，家各承其旧学，更相衍说，以成一派，与孔子何与。此不必辨者，廖氏亦不能求其安隐也。即如墨子专与仲尼立异，巧文丑诋，孟、荀皆欲放拒之，此必不能谓其宗孔也。其他虽褒贬互见，要亦如儒家之取老聃，非宗之也。宋世苏氏，学最疏陋，以其牧竖兎园之见，谓庄周尊崇儒术。明世陋者，复扬其波，如《庄子雪》等书是矣，斯何足效乎？谓经皆完书者，以秦焚《诗》、《书》，未及博士所藏耳，不知荀子言秦无儒矣。伏生适通《尚书》，其余博士，非书通经术，彼时固以博士备顾问，非如汉博士之为经师也。古者书无雕本，非儒生献书，其书无由入官。《周礼》之不传于汉初，《礼经》之有逸篇三十九，正以秦无其儒，故博士无其书耳。且酂侯所收，止丞相御史府图籍，此当时政书，与博士之《诗》、《书》何涉？其后咸阳焚于项羽，则博士所藏，亦庸能传布乎？以此末杀古文，未见其可也。

廖氏谓今文重师承，古文重训诂。惟重师承，故不能自为歧说；推重训诂，故可以由己衍解，是亦大误。大小夏侯，同出儿宽，而彼此相非。王式《鲁诗》，江公《穀梁》，皆近本申公，而丑诋狗曲。至《诗纬》本于《齐诗》，而言《诗》含六情五际，绝于申，申者，谓申公也，则齐、鲁《诗》亦如仇敌矣。其相忌克如此，安能恪守师说乎？苟专以

师承为重，矩尺弗违，则五经只应有五师耳。《易》本商瞿，何以分为施、孟、梁丘；《诗》本子夏，何以分为齐、鲁、韩：此见其不守师承，故有争端也。安得有十四博士乎？古文之训诂，如《周礼》杜及大郑等注，在今日视之为平常，不知当时凿山通道，正自不易。盖此诸家未言章句义理，惟求其字句之通，正如今日校勘家，彼此参稽以求通其所不可通。迨其左右采获，征结尽解，则豁然墒斯而不可变，非如今日专执小学以说经者，必欲皮傅形声，舍其已通者而为之别求新说也。此训诂之所以是重，而非穿求崖穴者所可拟矣。近代训诂家如惠、戴、段、王，皆得古人正脉；其后以小学说经者，则多穿求崖穴矣。训诂既通，然后有求大义者，异义所载是也。然贾、马、许、郑皆古文，而说亦有异，此正与十四博士之异义相似。今古文皆然，何独谓古文不重师承乎？

今观廖氏所论，其于《公羊》，则不取劭公日月之说，即董生《繁露》，亦有不满，且并王鲁之说驳之，则大义亦与先师迥异，而犹谓今文重在师承，恐已于今文，已不能重师承矣。若曰吾所言者，与经悉合，经旨自如此，故不敢屈经以从先师也，则何责于古文家哉！

若曰：吾所言者，独合于经，而古文家独否，则深于古文者，亦正有辞以御之耳。至不守先师微言大义之师承，而独守经皆完书之师承，则仰梁自思，当亦觉其可哂矣。

总之，廖氏之见，欲极崇孔子，而不能批却导窾以有此弊。寻其自造六经之说，在彼固以为宗仰素王，无出是语，而不知踵其说者，并可曰孔子事亦后人所造也。噫

嘻！槁骨不复起矣，欲出与今人驳难，自言实有其人实有其事，固不可得矣。则就廖氏之说以推之，安知孔子之言与事，非孟、荀、汉儒所造耶？孟、荀、汉儒书，非亦刘歆所造耶？邓析之杀求尸者，其谋如此；及教得尸者，其谋如彼。智计之士，一身而备输、墨攻守之具，若好奇爱博，则纵横错出，自为解驳可也。彼古文既为刘歆所造，安知今文非亦刘歆所造以自矜其多能如邓析之为耶？而《移让博士书》，安知非亦寓言耶？然则虽谓兰台历史，无一语可以征信，盡如蔚宗之传王乔者亦可矣。而刘歆之有无，亦尚不可知也，乌虖！廖氏不言，后之人必有言之者，其机盖已兆矣。若是，则欲以尊崇孔子而适为绝灭儒术之渐，可不惧与？

观廖氏书，自谓思而不学，又谓学问三年当一小变，十年当一大变，知其精勤虚受，非卤莽狂仞者比。今于尊崇孔子一案，既为解明如此，则诸论皆不必发。吾甚愿廖氏之大变也。若夫经术文奸之士，藉攻击廖士以攻击政党者，则埳井之鼃，吾弗敢知焉。

【说明】 本文录自《亚东时报》第十八号“杂录”，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出版，署名“蓟汉阁主”。

尊　荀

（一八九九年前）

使文质兴废，若画丹之与墨，若大山之与深壑，虽骤变可矣，变不斗绝，故与之涉随以道古。荀子之道古，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色则凡非旧文者举息，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以是不过三代，不式后王，法后王矣，何古之足道？曰近古曰古，大古曰新，綦文理于新，不能无因近古。曰后王，所谓后王者，上非文武，下非始皇帝。何者？一栖七雄，共和之令废，秦虽得陈宝，六国未一，拱球未斠，郊号未称帝，彼天下之君安在？仲尼有言：夏德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之作，以黑绿不足代苍黄，故反夏政于鲁，为新王制，非为汉制也。其所规摹，则政令粲然示于禘矣。荀子所谓后王者，则素王是；所谓法后王者，则法《春秋》是。

《春秋》作新法而讥上，变古易常，使文质兴废，若画丹之与墨，若大山之与深壑，虽骤变可矣，变不斗绝，故与之涉随以道古。古也者，近古也，可因者也。汉因于秦，

唐因于周、隋，宋因于周，因之日以其法为金锡，而已形范之，或益而宜，或损而宜，损益曰变，因之曰不变。仲尼、荀卿之于周法视此矣。

其傃古也，禔以便新也。自东周之季，以至禹，《连山》息，《汨作》废，《九共》绝，绝政虽在，不能无小龋，节奏无龋，惟近古之周。苟作新法，而弃近古，专以夏为蔿夏，大古之属也。名不尔雅，政不乐易，其所谓新者，民无与为新矣。墨翟眩于是，故师禹誓；李斯眩于是，涤荡周旧，而一从秦制。厉其脣吻以为法泰皇。夫泰皇，诚古也，畔周世之随俗雅化，而以殊瑰临民。其傃古也，其傃新也，其傃新也，禔以害新也。是以君子行政，若蚼匠然，熔冶自京室，而卝埴自胜，国由是则治，不由是则乱，后有改作者，虽百世可知也。

【说明】 本文录自《訄书》原刊本，列为第一篇，重印本删去。

儒术真论

（一八九九年）

昔韩非《显学》，胪列八儒，而传者独有孟、荀，其他种别，未易寻也。西京贾傅，为荀子再传，而董、刘诸公，已不能以一家名。且弘、汤之法盛行，而儒杂刀笔；参以灾祥鬼神，而儒杂墨术。自东京以来，盖相率如是。《荀子·儒效》云：其言议谈说，已无以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分别，是俗儒者也。然则七国之季，已有杂糅无师法者，后此何足论。今以《墨子·公孟篇》公孟子、程子与墨子相问难者，记其大略。此足以得儒术之眞。其于八儒虽无可专属，要之微言故训，有上通于内圣外王之道，与夫混淆失眞者，固大有殊矣。由斯推衍，其说可以卢牟六合，经纬冯生。盖圣道之大，无能出其范者。抑括囊无辩，谓之腐儒。今既摭拾诸子，旁采远西，用相研究，以明微旨，其诸君子亦有乐乎此欤？

惠定宇谓公孟子即公明子，为孔子之徒。近人孙诒让仲容则云：《潜夫论》志《氏姓篇》：卫公族有公孟氏，《左

传·定十二年》疏谓公孟絷之后，以字为氏，则自有公孟氏，非公明氏也。《说苑·修文篇》有公孟子高见颛孙子莫及曾子，此公孟子疑即子高，盖七十子之弟子也。以上孙说。余谓子莫告公孟子高之言曰："去尔外厉，与尔内色胜，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今公孟子谓墨子曰："君子共己以待，问焉则言，不问焉则止。"又曰："实为善人孰不知？今子遍从人而说之，何其劳也。"即本子莫去外厉之意，则公孟子即公孟子高明甚。然即此愈知公孟即公明。《孟子·万章篇》有长息问公明高，即为公孟子高。且孟子言舜之怨慕，而举公明高之言以为证。又言："人少则慕父母，五十而慕者，独有大舜。"今公孟子则曰："三年之丧，学吾之慕父母。"墨子驳之则曰："夫婴儿子之知，独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号而不止，此其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则儒者之知，岂有以贤于婴儿子哉！"是公孟子之言，与孟子所述慕父母义，若合镮印。则知公孟子、公孟子高、公明高为一人明甚。公孟、公明虽异族，然同声相借，亦有施之姓氏者。今夫司徒、申屠、胜屠，本一语也。而因其字异，遂为三族。荀与孙、虢与郭，本异族也，而因其声同，遂相假借。今公孟、公明，亦犹荀孙、虢郭，虽种胄有殊，而文字相贸，亦无不可。然既严事曾子，其不得为孔子之徒明矣。惠说亦未合也。今观其立说，亦醇疵互见，而宣尼微旨，于此可睹。掊摭秘逸，灼然如晦之见明者，凡数大端。呜呼！可不谓卓欤？

公孟子谓子墨子曰："昔者圣王之列也，上圣立为天子，其次立为卿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

万物。若使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

按玄圣素王，本见《庄子》。今观此义，则知始元终麟，实以自王，而河图不出，文王既丧，其言皆以共主自任，非图谶妄言也。门人为臣，孔子以为行诈，诸侯卿尹之尊，非所以处上圣，进退失据，故斥言其欺。不然，子弓南面，任为天子，见《说苑·修文篇》。尚无所讳，而辞此区区乎？知此者独有梅子真尔？

公孟子曰："无鬼神。"又曰："君子必学祭祀。"子墨子曰："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子墨子谓程子曰："儒以天为不明，旧脱天字，毕本据下文增。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

按仲尼所以凌驾千圣，迈尧、舜轹公旦者，独在以天为不明及无鬼神二事。《荀子》曰：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儒效篇》。此儒者穷高极远测深厚之义。若夫天体，余尝谓苍苍之天，非有形质，亦非有大圜之气。盖日与恒星，皆有地球，其阿屯以太，上薄无际，其间空气复厚，而人视之苍然，皆众日之余气，固非有天也。王育说，天诎西北为无，其说稍诞。盖天本无物，故无字从天诎之以指事，因下民所见，不得无所指斥，故强以颠义引申之而曰天。六经言天言帝，有周公以前之书，而仲尼删述，未或革更，若曰道曰自然而已矣。郊祭大报天而主日，万物之主，皆赖日之光热，而非有赖乎天。故假言曰帝，其眞即日。或以北极为耀魄宝，北极又大于日九十三倍，故亦尊之，此则恒星万数，上帝亦可云万数。六帝之说，不遍不赅，要非虚增，然恒

星各帝其地球而已，于此地球何与？明堂宗祀，盖自外至者也。且太微五星，固玄远矣，即至昵之日，虽昭昭大明，而非有恩威生杀之志，因上帝而有福善祸淫之说，其害犹细，其识已愚，因是以及鬼神，则诬妄日出，而人伦殆废。

盖太古民俗，无不尊严鬼神，五洲一也。感生帝之说，中国之羲、农，日本之诺、册二神，印度之日朝、月朝，犹太之耶稣，无不相类。以此致无人伦者，中外亦复不异。惟其感生，故有炎、黄异德兄弟婚媾之说，盖曰各出一帝，虽为夫妇，不为黩也。尧之厘降，不避近属，实萌于是。其后以为成俗，则夏、商以来，六世而通婚姻，皆感生之说撼之矣。周道始隆，百世远别，此公旦所以什伯于尧、舜、汤、武，然依违两可，攻其支流，而未堙其源窟。《生民》之诗，犹曰履敏，则犷俗虽革，而精意未宣，小家珍说，反得以攻其阙。惟仲尼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知天为不明，知鬼神为无，遂以此为拔本塞原之义，而万物之情状大著。由是感生帝之说诎，而禽兽行绝矣。此所以冠生民横大陆也。

何以知无鬼神？曰：斫卉木，磔羊彘，未闻其有鬼神，彼人固不得独有也。人所以有知者，分于父母，精虫胚珠是也。二者又摄引各点以为我有，使成官骸，而七情益扩，故成此知识，由于两精相抟，以生神明也。斯如两水相触，即便生浪，水犹精，浪犹神，而两水之所以相触者，亦先有其浪，则父母交感之神也。两味相和，乃生隽永，及精气相离而死，则神亦无存。譬之水既淤堙，浪即无有，两味化分，寻索隽永，了不可得。故精离则死，死则无知，其流定各质，久则合于他物，或入草木，或入胎卵，未有不化者。化

之可见者，茅蒐是已。萇弘之血为碧，郑缓之精为秋柏之实，然已与他物合，则其质既杂，自有柏与碧之知，而非弘、缓之知矣。此精气为物也。气弗聚者，散而从于空气，涣然飘泊，此游魂为变也。夫焉有精化既离，而神识能独立者乎？《圆觉经》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谓发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脑垢色，皆归于地。唾涕脓血，津液涎沫，淡泪精气，大小便利，皆归于水。暖气归火，动转归风。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在何处？《宝积经》云：此身生时，与其父母，四大种性，一类歌罗逻身。若唯地大。无水界者，譬如有人，握干麸灰，终不和合。若唯水界。无地界者，譬如油水，无有坚实，即便流散。若唯地水。无火界者，譬如夏月，阴处肉团，无日光照，即便烂坏。若唯地水火。无风界者，即不增长。《庵提遮女了义经》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风四缘，毕竟未曾自得，有所和合，以为生义。若知地水火风毕竟不自得，有所散，是为死义。是佛家亦以各质相磨而生，各质相离而死，而必言即合即离，生死一致，则黄马骊牛之遁辞矣。然死后六道，不尽为鬼，则亦与精气为物之义相近。其终不决言无鬼者，盖既言真者离身而有如来藏，则不得不言妄者离身而为鬼。然又言饿鬼有胎生化生，则所谓鬼者，亦物魅之类，而与人死者有殊。然则释家盖能识此旨，而故为不了以自圆其说也。

难曰：若以知识为分于父母，则父母安始，追溯无尽，非如来藏而何？然如来藏者，彼岂能道其有始耶？于如来藏亦言无始，而必责万物以有始，亦惑矣。难曰：知识果分于父母，则瞽舜、鲧禹，曷为相反？曰：夫岂独神识

然，形亦然矣。张苍之父，长不满五尺，苍长八尺余，苍子复长八尺，及孙类长六尺余。《汉书·张苍传》。可得云形体非分于父母耶？要之形之短长，知之顽圣，此高下之分，非相反也。以神识言，又岂独父子然。虽一身亦有善恶是非先后相贸者。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索卢参，东方之巨狡也，学于禽滑黎。并为名士显人，《吕氏春秋·尊师篇》。如是者多矣。或有诹政虑事，一念之间，而筹画顿异，至于疚心自讼者。子夏投杖，汉高销印，斯类亦众，夫岂得谓有两身与两心耶？父母与子，何以异是？原夫二气相凝，非亲莫效，及脂膏既就，即有染习，贾生《胎教》，明著其义。是时材性高下，又由其亲一时之行迹而成，斯则得于其亲者，与初凝又少殊矣。及夫免乳以后，则见闻之习，师友之导，情状万端，尟非殊族，其异于亲也固宜。荀子有言：涂之人可以为禹。《性恶篇》。此则君师牧民，由斯以作。然具此可以为禹之材，非父母授之乎？大抵形体智识，一成不移，而形之肥瘠，识之优劣，则外感相因，可入熔冶，不移者由于胚珠，可移者由于所染。夫鲁鸡之伏鹄卵，其雏犹鹄；而桑枝之续桃本，则其实非桑。非物之形性，一可变更，一不可变更也。卵中之胚，是鹄非鸡，故鹄不以鸡伏而易。土蜂煦妪桑虫之旧说，虫学家曾辨其误。树木之胚，是桃非桑，故桃能以桑体为己，此胚珠不移之说也。啮蹄在辔，驯良从御，駃騠无牧，泛驾不习，此因染致移之说也。乃若时代逾久，则物之形体，亦有因智识优劣而渐变者。要

之，改良则分剂增多，退化则分剂减少，上古之颠木，迹层之枯鱼，皆吾郊宗石室，惟其求明趋化，以有吾侪之今日。昊天罔极，如何可酬？抑亲亲之杀，既具斯形，则知爱类而已。

难曰：人见厉魃，经籍多有，近世民俗，亦有传言。宁得自守单辞，谓鬼神为诬惑？曰：以佛家言，六道之中，饿鬼居一，一在地下五百由旬，一在人天之间。是则畛域区处，与人隔绝，人未尝有至饿鬼处者，而饿鬼独能至人处乎？且以阿修罗之强悍，诸天之智力，不至人处，而饿鬼以羸劣之质，独能至人处乎？是岂得以所见证其必有也。然则见者云何？曰：耳目有瘝，齐襄之见彭生是也；心惑若寐，狐突之遇共君是也。二者皆一时假相，非有眞形，乃其眞者，则亦有之。太史公曰：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留侯世家》。此最为豁然墒斯者。山精物魅，如龙夔魍魉者，固未尝无也，以其体不恒见，诡出都市，而人遂以鬼神目之，斯亦惑之甚矣。太古顽民，见鐻惊鬼，有熊蚩尤，惑乱不异，见彼焄蒿，遂崇巫祝。清庙之守，后为墨家，敬天尊鬼，遂与儒术相訾。夫岂非先圣哲王之法，而以难儒术，则犹以金椎攻太山矣。无鬼而祭者，亦知其未尝食，而因是以致思慕。至胙肉必餍饫之者，亦以形体神识，分于二人，己在则亲之神识所分，犹在吾体，故食胙无异亲之食之也。然则祭为其名，而胙致其实，何无客学礼无鱼作罟之可比乎？若夫天神地祇，则因是而准则之，苟有圣王，且当厘汰焉。呜呼！如太史公言，则秦汉间儒者，犹知无鬼神义。然武、昭以后，儒者说经，已勿能守。

独王仲任有《论死篇》，晋人无鬼神论，而儒者又群哗焉。然则荀子谓言议谈说，无以异于墨子者，汉后诸儒，顾不然欤？

附：视天论

滞于有形，则无形者乱，眩于有匠，
则无匠者乱，故列《视天论》。

昔余尝持视天之说，以为远望苍然者，皆内蒙于空气，外蒙于阿屯以太而成是形，非果有包于各耀而成太圜之体者也。既而读汉秘书郎郄萌所记宣夜之说云：天了无质，仰而瞻之，高远无极，眼瞀精绝，故苍苍然也，譬之旁望远道之黄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体也。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焉。是以七耀或逝或住，或顺或逆，伏见无常，进退不同，由乎无所根系，故无异也。见《晋书·天文志》。呜呼！斯言也，可谓合于分刌节度者矣。

而抱朴子非之曰：苟辰宿不丽于天，天为无用，便可言无，何必复云有之而不动乎？夫大钧播物，气各相摄，月摄于地，地摄于日，日复摄于列宿，其所以鼓之舞之旋之折之者，其用大矣。安事此苍苍者为？上古风俗淳朴，见有块然成物者，不敢质言以为必无。彼虹霓特日光水气所激耳，而亦以立名，强名曰天，亦若是尔。且天之云

者，犹曰道曰自然而已。今将指一器一物以为是道也，是自然也，其畴不大噱喷沫者哉！古者主日而郊，今乃知万物之生灭消长，皆由太阳之光热致之，而苍苍者无与焉。然则古人亦知其但有视天而非有真天也明矣。往者宗动天之说，以为诸层玻璃，互相包裹，列宿日地，皆如蚁行，而以天为旋磨，此其说近于浑。盖今者各体相摄之说，以为浮行太空，以己力绕本轴，以摄力绕重心，绕重心久，则亦生离心力，而将脱其韁锁，然于昊穹，则本未尝隶属也。此其说则近于宣夜，以新旧说相较，新者轨合，而旧者辄差。然则视天之说，不愈彰明较著乎？

虽然，泥于所见者，犹以车盖斗蘖相拟，谓上无覆庇，下必不能自立也。若是且得无辨乎？夫体成圆球者，未或不动，动则浑沦四转，无待于覆。地之必有倚赖于太阳者，以其辉润暄蒸，能生万物耳！非专恃其覆庇也。苟无太阳，则自荧惑而外，至于海王，斯五行星者，其体质轨道皆大于地，亦未尝不能摄地，使绕一重心也。而特无力使之发荣滋长耳，若天则何为也哉！昔利玛窦等知地圆而不知地动，奈端、哥白尼等知地动而不知日动，侯失勒等乃知日动。盖太阳之大，较地球三十三万二千倍，而较列宿则为微末。列宿自一等至七等，人目皆能见之，自八等至十六等，则非人目所能见。然恒星大群皆在天河中，故近天河处星最多，而两极则星渐少，即太阳亦天河中之一星，而地球及诸恒星之统于天河，夫何待言矣。凡体大者必能摄小体，地既为日所摄矣，而特蛇夫第七十星光大日一倍，天狼星光大日四十二倍，织女星光大日六十九倍，

北极星光大日九十三倍，皆是能摄日者也。人第见地球为日所摄，而不知日球亦因摄而动，特未知所绕重心，果何所在？梅特勒以为所绕之点在昴宿中，或谓此点离天河半面至二十六度，未可深信，太阳所绕，必在天河。盖众星附丽天河，成大椭球，太阳率八行星，成一世界，而各恒星亦皆有所属之地球，其上所生人物，与此不异，所谓三千大千世界者近之矣。又有星团，则《华严经》所谓世界如白云者也。而天河大群以外，又有星群，散处无所纪者，岂天河以内则所谓欲界，而天河以外则所谓色界无色界乎？然则切利兜率等天，固尚为近人者也。若夫火星之民，能开二渠以转漕，与通达之国不异，则彼长数由旬衣数铢衣者，其必不在行星矣。

以恒星之体言，北极最大，古者以北极为帝星，宜亦有见于此。虽然，圆球则无不动也。北极虽大，宁独无所绕乎？若是则天固非有真形，而假号为上帝者，又安得其至大之尽限而以为至尊也。故曰：知实而无乎处，知长而无本剽，则上帝灭矣，孰能言其造人与其主予夺殃庆耶？綦文理，制等杀，则暐然可见可扪者，以日为继限而已。日虽能以光热生百昌，若养气熅火之活人，犹非能以其知识为予夺殃庆也。呜呼！吾于是知神道设教之故矣。佛氏之约，不得祠诸天鬼神，穷理尽性，斯可谓大智哉！然而复谓以世界付帝释者，其诸婆罗门之信金人，非以权辞诱之，则不能致其尊信欤？睿哲若公旦，其知上帝之有无，与不知上帝之有无，吾不敢知也，苟知之则其心苦矣。

附：菌 说

不知原始，不能反终，故列《菌说》。

曩读《庄子·齐物论》，有云"乐出虚，蒸成菌"，而不谛其所自。夫人心之乐，发于空虚，而能蒸成有形之菌，岂所谓荒唐之言耶？顷之得礼敦根所著《人与微生物争战论》，乃悟其言之不虚也。

凡人有疾，其甚者由微生物撼之。而其为动、为植、为微虫、为微草，则窥以至精之显微镜，犹难悉知，徒可道其有叶绿质者为植物，能转徙者为动物耳。而又不能尽合。盖犹仙桃草之类，其茎叶则卉，其根实则虫，动与植有汗漫而无畔者也。然植物学者，谓寄生之草，至大者为拉弗来写，其花径二丈有五尺，而小者则生于人兽之肺，有则必病，是则所谓菌者是也。德医告格尝究诸病所自生，于霍乱则谓其由于尾点微生物，于肺痨则谓其由于土巴苦里尼，皆同物也。夫霍乱勿论，若肺痨则往往始于耽色极欲，欲之过而为霉者，亦有蚑行芝生之物孽芽其间，斯所谓"乐出虚、蒸成菌"者非耶？其递相传染者，虽与乐无

涉，而其端则必自乐始。医和之言曰：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于文，皿虫为蛊，穀之飞亦为蛊。所谓女室疾者，则肺痨与霉近是已。以微草言则谓之菌，以微虫言则谓之蛊，良以二者难辨，而动植又非有一定之界限也。

动植皆有知，而人之胚珠血轮又有知。其胚珠时出游荡，能发小分文，如掌生指，常出收定质微点，以入胚珠之中，为其食物。如微生动物已种一病，则胚珠必收之。再种之，则有无数白色血轮，行至种病之处，围其微生物，或噬蚀以杀之。是则物能蛊人，而人之胚珠血轮又能蛊物。盖夫爱恶相攻，一身之中而肺肝若胡、越也，岂不哀哉！

虽然，非特淫乐之足以成菌成蛊也。菌蛊已成，则又能强撼人之志念，而使从淫乐。自淫乐以外，喜怒哀乐，又莫不有受其撼者也。佛家谓人身自顶至踵，自髓至肤，有八万戶虫，四头四口，九十九尾，形相非一，一戶复有九万细虫，小于秋毫。《宝积经》云：初出胎时，经于七日，八万戶虫，从身而生，纵横食啖，令身热恼，生有忧愁。《僧伽吒经》云：人将死时，诸虫怖畏，互相啖食，受诸苦痛，男女眷属，生大悲恼。《金匮要略》曰：狐惑之为病，状如伤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闭，卧起不安。蚀于喉为惑，蚀于阴为狐，不欲饮食，恶闻食臭，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说者以为是虫病也。虫固有情，而能以其情使人烦惑变志，斯则蛊之所以立名欤？而菌虽植物，其有知亦不异于蛊矣。

嗟乎！人之始胎也，有不类于“乐出虚、蒸成菌”者耶？有不类于“晦淫生蛊”者耶？而特其形状不别，性情

不异也。故一攻之而一孳乳之，斯亦可以明爱类之说也。今夫生植之始，在男曰精虫，在女曰泡蜑。泡蜑者，即胚珠也。夫妇邂逅，一滴之精，有精虫十数入，啮泡蜑而破之，以成妊娠。彼精虫者，因人之情而为之使，间无以异乎蛊矣。

吾又读《淮南·坠形训》曰：窔生海人，海人生若菌，若菌生圣人，圣人生庶人，凡窔者生于庶人。夫置若菌于海人、圣人之间，则若菌亦人也。既而读《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有莋都夷、白狼王、唐菆等作诗三章，注皆引《东观记》所载夷人本语，每汉语四字，夷语亦四字，其中如"与人富厚"，作"魏菌渡洗"，"部人多有"，作"补菌邪推"，今本误倒作"菌补"。是呼人为菌也。然则"若菌"即"若人"矣，以淮南王著书，其必非用夷语可知，又以知古者谓人为菌，而其语特流传于莋夷也。人之称菌也，其义则必自精虫始，亦以蛊菌为同物，而动植不可以强判尔。

夫其以淫乐而成是菌蛊也，则曷故哉？伏曼客之说《易》曰：蛊，惑乱也，万事从惑而起，故以为蛊事。见《周易集解》。《首楞严经》曰：一切众生，因诸爱染，发起妄情，情积不休，能生爱水。是故心忆珍羞，口中水出；心忆前人，或怜或恨，目中泪盈；贪求财宝，心发爱涎，举体光润；心著行淫，男女二根，自然流液。诸爱虽别，流结是同。由斯二说推之，因人有牝牡之情，而传之于精虫，精虫受之，其情则与人同，而有慕为人形之志，于是为之胚胎以象之。彼十数精虫之造人，犹数千微虫之造珊瑚。微虫果能成珊瑚也，事之起于蛊也。精虫果能成人也，人始已蛊，而精

虫以蛊成其事也。夫非有上帝之造之，而物则自造之，故曰：咸其自取，怒者其谁耶？

呜呼！事之由妄想而成者，岂独胚胎然哉！知此者莫察于太公调。少知问曰：四方之内，六合之里，万物之生恶起。太公调曰：阴阳相照相盖相治，四时相代相生相杀，欲恶去就，于是桥起，雌雄片合，于是庸有。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缓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实之可纪，精‹微›之可志也。随序之相理，桥运之相使，穷则反，终则始，此物之所有。《庄子·则阳篇》。

盖凡物之初，只有阿屯，而其中万殊，各原质皆有欲恶去就，欲就为爱力、吸力，恶去为离心力、驱力，有此故诸原质不能不散为各体，而散后又不能不相和合。夫然，则空气金铁虽顽，亦有极微之知。今人徒以植物为有知者，益失之矣。《楞严经》曰：由因世界，愚钝轮回，痴颠倒故，和合顽成，八万四千枯槁乱想。如是故有无想羯南，流转国土，精神化为土木金石，其类充塞。是佛家亦知金石为有知，要其痴钝，亦可谓之无知；前所谓死后各点无知者，即谓如是。盖与之则可曰有知，夺之则可曰无知，彼其知则欲恶去就而已，不如是不能自成原质，亦不能相引而成草木。夫其桥起而相引也，则于是有雌雄片合，而种类成矣。有种类则又有其欲恶去就，而相易相生相摩，渐以化为异物。故既有草木，则草木亦如瞽之求明，如痿之思起，久之而机械日生，刻意思之以趋于近似，而其形亦遂从之而变，则于是有蜃蛤水母。彼又求明，则递为甲节，为脊骨，复自鱼以至鸟兽而为猿狙猩狒以至为人，此

所谓随序之相理也。

其渐思而渐变也，则又有二端：有以思致其力而自造者焉，有不假于力而专以思自造者焉。致力以自造者，接子或使之说也；不假力而自造者，季真莫为之说也。二说亦少知问语。如鸟之修颔长喙，适可以理毛羽，此或有体操之术，令其胸长而项伸，此致力以自造者也。如夫露巢之鸟，患人之探其卵也，则其卵多非白色，与暗处者迥殊。故巢草莱者，卵必青绿若萌芽；巢河干者，卵必暗绿若芦苇；巢乔木者，卵必光绿若树叶；巢山崖乱石荆棘之中者，卵必棕色而有花点，以与土石相混。夫其色之必同于所处之草木土石者，以眩人之目，使不能辨目。若是者，鸟岂能致力以造是哉？苟曰上帝为造之，而鸟之死于矰缴探雏者，亦自不少，又何其矛盾也？然则必由鸟之思护其卵，积精专思，而遂变其形色，所谓以思自造者也。夫自诸异物而渐化为人者，此亦以思自造者也。若是者则皆所谓以妄想生之，而伏曼容之所谓蛊、《淮南》之所谓菌也。

人之有生，无不由妄，而舍妄亦无所谓真。是故去其太甚，而以仁义檃括烝矫之，然后人得合群相安，斯途径之必出于此者也。若谓身相属妄，而舍利是真，卒之无生灭、增减、变易者，适成其顽，而勿见其灵，学之乃适增其妄也。夫妄性虽成，化以礼义，则自入进步。故最初祖祢孰不兄弟聚麀者，而自政俗日跻，今遂以此为大垢，此进步之说也。苟曰：吾祖有聚麀之妄，而后有我，即不妨效其聚麀，是循妄而勿去太甚也。苟曰：吾生由于聚麀之妄，必无生而后为真，是又成顽而增妄也。昔唐终南沙门

宗密作«原人论»云:孔、老、释迦,皆是至圣,设教殊途,有实有权,二教唯权,佛兼权实,策万行惩恶劝善,同归于治,则三教皆可遵行。推万法穷理尽性,至于本源,则佛教方为决了。夫六经之说,诚亦有权,与人天、小乘、法相、破相等教同意,而穷原反本,则其实确然不拔,乃有卓出一乘显性之上者。要之,儒、佛、庄子三家,皆属理想,亦皆参以实验,较之祆教各家,诚若玉之视燕石矣。而佛必以空华相喻,庄亦间以死沌为词,斯其实之不如儒者也。

太公调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为风俗也。合异以为同,散同以为异。今指马之百体而不得马,而马系于前者,立其百体而谓之马也。«涅槃经»曰:一切众生,不退佛性,名之为有,决定得故,譬如王者告一大臣,汝牵一象,以示盲者。时彼众盲,各以手触。王问之曰:象为何类?其触牙者,即言象形如芦菔根;其触耳者,言象如箕;其触头者,言象如石;其触鼻者,言象如杵;其触脚者,言象如臼;其触脊者,言象如床;其触腹者,言象如瓮;其触尾者,言象如绳。善男子如彼众盲,不说象体,亦非不说,若是众相悉非象者;离是之外,更无别象。说佛性者亦复如是。此二说意旨大同,而以佛性不滞于一体。然数体相合,即为佛性,则正可借证人性之说。盖内有精虫,外有官骸,而人姓始具。使官骸皆殒,而精虫独存,则无声色香味诸欲,而独有牝牡之情。若去就桥起雌雄片合之始而已。此则于生人全性之中而得其见端,倘不能谓性具于是也。说今人之死也,则淡、养、炭、轻诸气,盐、

铁、磷、钙诸质，各散而复其流定之本性，而人之性亡矣。离此流定而复索一舍利性海，亦犹离此诸体而索马索象也。

或谓性海即以太，然以太即传光气，能过玻璃实质，而其动亦因光之色而分迟速。彼其实质，即曰阿屯，以一分质分为五千万分，即为阿屯大小之数。是阿屯亦有形可量。以太流动，虽更微于此，而既有迟速，则不得谓之无体。如《淮南·俶真训》云：秋毫之末，沦于无间，而复归于大矣。芦苻之厚，通于无圻，而复反于敦庞。若夫无秋毫之微，芦苻之厚，四达无境，通于无圻，而莫之要御夭遏者，其袭微重妙，拟搁万物，揣丸变化，天地之间，何足以论之？盖所谓性海，无秋毫之微，芦苻之厚。而阿屯以太，则尚不免于毫末沦无间，芦苻通无圻也，以此相拟，终不相类。即如光、热、电三者，虽不能得其质点，而终与滭然不动者有殊，舍利性海，岂是之比？苟如是，动则速矣，力则厚矣，而亦与极顽之日星同类，宁能超出万有耶？

或谓必知各原质之成于以太，万物之成于各原质，而后知内外四大，至于六道，无一非我，乃为乾元至仁之量，是固然矣。然所以见为殊者，以官骸相阂，所以见为合者，以原质相同。原质有形，即以太亦有至微之形，固不必以邈无倪际之性海言也。然官骸虽一时暂有，而兼爱既济之道，即由官骸而生。何者，以知识为全体，亦不能出乎官骸之外也。人之嗜欲，著于声、色、香、味、触、法，而仁义即由嗜欲而起。独夫为我，即曰贪贼；能近取譬，即曰仁义。故《易》称利物足以和义，明非利亦无所谓义也。

有义则分际有远近，而恩施有隆杀。是故至仁之行，可以强恕求之，而其量无可尽之理。随俗雅化，则周、孔不能舍刍豢；有物勿戕，则释迦亦不能唊〔废〕栄果，此皆以义裁断者。而谓至戚不异于行路，华种无间于晳人，其可乎？是故内圣外王，无不托始于六根三欲，制为礼义，所以养欲给求，而为之度量分界。《荀子·礼论篇》。余所谓舍妄无真者是也。若必轻其官骸，而重其性海，兹义递衍，则遂以二亲为凡民，而阿阇世王之弑父，亦可悔悟入道。见《涅槃经》。夫岂释氏之论独高耶？亦由不得其本而已。

总之，轮回之说，非无至理，而由人身各质所化，非如佛家所谓灵魂所化也。六道升降，由于志念进退，其说亦近，而所化者乃其胤胄，非如佛家谓灵魂堕入诸趣也。故理想之学，少渐多顿；实验之学，有渐无顿。

或曰：人固有自忆其前生者，安得谓轮回无与于灵魂耶？曰：夫异体相知，则有虾与水母矣。然则吾所谓自忆为前生者，宁知非他人所亲历，而吾以异体知之，亦若虾之与水母耶？且以演若达多照镜事况之，彼眉目可见，而忽然以为魑魅，至于狂走，见《楞严经》。此则非有因缘而致。彼忆前生者，亦若是则已矣。且中国未有前生之说时，人未有忆前生者也，即忆之亦未尝以为前生。自闻前生之说，而始以所忆者当之耳。亦犹乍忆高冈，如见其峦峤嵯峨、陵阜耸峻者，而心以为是华岳、岱山，然究未登华、岱也。彼忆前生，亦复如是。然何以以为华、岱，而不以为妄拘假名之山，华、岱之名，其所已闻也。彼闻有前生之说，而以所忆为前生者，亦复如是。

前生之说替，而上帝造人之说起，彼亦非持之无故也。盖曰有养气，无淡气，则人将喝瀎以死，而今分剂适合。他如卵中白质，未出之雏，足以自养，草木子中之胚乳，亦能化糖以养苗，而叶又有依螺线而生，巧合算理者，非上帝为此人物，而配其分剂，调其节度，资其匮乏耶？曰：夫久处于是，则寝食衣被，亦以是为调适。麋鹿食荐，夏虫茹腐，非甘之也，彼生乎其地，长乎其时，则自以此为适矣。卵白胚乳之给养，岂有他哉？舍是无可食，则致命遂志于是而不愿其外矣。老子曰：草食之兽，不疾易薮，水生之虫，不疾易水。《庄子·田子方篇》。此言生此地，食此饵，故能成此形，具此性也。使有养无淡，则亦自有一物能当此浓郁之气者，生乎其间。如人不能入水火，而火鼠海鱼，初不以为患也。且亦安知其无人哉？没人泅水，与鲸鲵同乐，为取珠耳，非不得已也。果不得已，则人将常习于水。有养无淡，则人将常习于养，亦自可以不死。而毛羽鳞介，渐则因其思力而生。彼鲛之化鹿，雉之为蜃，有明征也。故曰：万物皆出于几，皆入于几。夫上帝为何者哉？

《论衡·自然》曰：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万物之生，含血之类，知饥知寒，见五谷可食，取而食之；见丝麻可衣，取而衣之。或说以为天生五谷以食人，生丝麻以衣人，此谓天为人作农夫桑女之徒也。不合自然，故其义疑，未可从也。此言可谓洞幽明之故矣。吾尝谓文明之民，其初生蕃也，一旦皆为台隶，浸被逼遁逃入山，食异而血气改，衣异而形仪殊，则未有不反其故。

王船山《思问录》盖惧之矣。夫兖州桑土，今为野茧，故家豚于草泽，则化为豪猪，麄豕尽然，人独何能自保？故《鞞婆沙论》谓，或金翅鸟，或龙或人，皆具卵、胎、湿、化四种，而《江总白猿传》谓欧阳纥妻为猿所窃，因而生询，见《文献通考·经籍门》。皆不尽诬妄。然则异物化人，未有底止，人之转化，亦无既极，誃予手足，而叹兹形之将然，滋足戚也。

抑人之易地也，神识未殊，而何以能变？得无与以思自造之说缪耶？曰：思力所至，形体自更，此谓无阻力耳。苟有阻力，则不足以宣通矣。要使力能抵之，则固足以自立，其道奈何？曰：荀子曰，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他故焉，得之分义也。《王制篇》。是故合群明分，则足以御他族之侮；涣志离德，则帅天下而路。

或曰：性善性恶之说，皆不如言无善无恶者，曰：子将言人性乎？抑自有所谓性乎？夫言人性，则必有善有恶矣。彼无善无恶者，盖佛之所谓性海，而非言人之性也。何也？自其未生言，性海湛然，未有六道，而何人性之云。自既有六道言，亦各有如来藏隐伏其中，而人与鸟兽，初未尝异，又岂得专为人之性也。孟、荀所言，专为人言之也。

虽然，以符验言，则性恶为长。然非谓其同于鸟兽也。盖举孩提之爱亲者，未知初生之时，坼副其母而不少

顾也。举稍长之敬兄者，未知乳哺之顷，少有不慊而瞋目作色也。孟举其善而忘其恶，荀则以善恶皆具，不能纯善，则以恶名之，故其言曰：繁弱、巨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檠，则不能自正。桓公之葱，太公之阙，文王之录，庄君之曶，阖闾之干将、莫邪、巨阙、辟闾，此皆古之良剑也，然而不加砥厉则不能利，不得人力则不能断。骅骝、骐骥、纤离、绿耳，皆古之良马也，然而前必有衔辔之制，后必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驭，然后一日而致千里也。《性恶篇》。夫惟弓故可檠，剑故可厉，马故可辔。苟非三物者，则虽檠之、厉之、辔之而无所用，此即谓其本异于鸟兽矣。又曰：今涂之人者，皆内可以知父子之义，外可以知君臣之正。是则即孟子所谓善者，而荀子以其偏险悖乱，亦由天授，既非纯善，即谓之恶，犹之既舂之米，谓之精凿，未舂之米，谓之粗粝。粗粝云者，对精凿言之，而非谓其与稂莠比肩也。然一人之行，固以习化，而千世之性，亦以习殊。泰古豨韦之民，犷悍贪暴，以水火毒药相亏害，夫人而有此性也。自先觉者教化之，至于文明之世，则相亏相害者，固不能绝，而具此性者稍少。故学可以近变一人之行，而又可以远变千世之质。荀子于首篇《劝学》，即曰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夫固谓一人锲而不舍，则行美于本性矣；千世锲而不舍，则性亦美于祧墠矣。仲尼之言，性相近，习相远，亦兼二义，而不言灵魂。

夫肢体一蹶，前万世而不昭，则孰肯致死。或者以为民气选懦，不能与释迦、基督布教之国抗者，由是故也。

然惟无鬼神，而胤嗣之念，乃独切于他国。今知不合群致死以自御侮，则后世将返为蛮獠狙获，以此为念，则足以倡勇敢也必矣。是故不言鬼神，而能使人致死者，必于爱类，爱类必于知分。荀子曰：万物同宇而异体。《富国篇》。以异体故必自亲亲始，以同宇故必以仁民爱物终。惟其群而有分，故有墨子兼爱、上同之善，而畛域有截矣。

仲虺有言：兼弱攻昧，是道家之说也。其心独鸷，亦独明于天人之故。凡以昧弱遇智勇，鲜不败衄；而以昧勇遇智勇也亦然。然则万物之胜负，决于智而已矣。大盗盗国，窃取圣法，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斯智也。是故徒善而无法者，煦煦孑孑，必不足与校，惟知合群明分，则足以御之尔。若专以是非枉直相角，则天下皆恶直丑正者矣。吾观《六波罗蜜经》，言切利天临命终时，天女眷属皆悉远离，弃之如草。是诸天之无礼义也，远甚于人，而其种反驾乎人上。果使其言非夸，则知所以驾人者，特智勇有胜而已矣。乃者，红、黑、棕色之种，伏于黄人，黄人复制于白人。白人果有大同之志，博施济众之仁，能胜于黄人也。惟其智勇能窃圣法焉尔。夫自有花刚石以来，各种递变，而至于人，则各种皆充其鼎俎，以人智于各种尔。然则继人之后，亦必有变而智于人者。夫如是，则黄白人皆其脔胾也。不然，则皆其骖服也。彼人之自保则奈何？曰：合群明分而已矣。苟能此，则无不自立。譬之蜜蜂，虽细不败。苟不能此，则无不受侮。譬之狮子，为罗马所杀者，四月至万一千头，虽大而亦绝矣。然则以大智而充仁义之量，诚无如荀子所言哉？然而洁身中清者，将安往

矣。呜呼！吾于是知兼弱攻昧，则迫务光于清冷，而驱伯夷于首阳也。彼大盗者，诚非独行之士所能与处也。

公孟子谓子墨子曰："有义不义，无祥不祥。"公孟子曰："贫富寿夭，齰然在天，不可损益。"子墨子曰："儒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

按墨子背周而从夏，《洪范》五行之说，以义不义，推祥不祥。禹陈九畴，而墨子畅之，皆天鬼之说所流行也。惟墨子于五行，信其德而不信其方位。阴阳家之言，则所必绝，故其答日者曰："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若用子之言，则是禁天下之行者也。"《洪范》之言，则因五行以施五德，而顺之者吉，逆之者凶，故墨子独所尊信。汉初伏生，可谓大儒，然《五行传》犹拘牵天道。西京尊尚此学，实墨者之余烬也。荀子曰：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尝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天论篇》。是则于五行感应之说，儒者已显斥之。而仲尼删《书》犹登《洪范》者，明夷六五，赵宾以为阴阳气亡箕子。箕子者，万物方荄兹也。盖《易》与箕子，若为两途。《彖传》于明夷，一曰文王以之，一曰箕子以之，独以二人并称。缘伏羲以河图为《周易》，而文王衍其词；禹以洛书为《洪范》，而箕子畅其义。文王之说，当行于域中；而箕子之说，可被于营州玄菟之境，与中国之教殊矣。录之者见施政要服，有与京周异术者也。若夫督宗之教，于五福六极，固非所信焉尔。

虽然，禹与箕子之陈《洪范》，亦草创之初得其觕义耳！其精者则固异于祸福感应之说，而知各质散点相吸相离之自然。此其说在《庄子·天运》。其言曰：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耶？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耶？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问何故？巫咸袑曰：来！吾语女，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备，监照下土，天下载之，此谓上皇。以上《庄子》。九洛即洛书九畴；六极五常，即六极五福。而其事由于帝王之自取，非由上皇为主宰，亦诊无眚符瑞以为劝戒，其成败治乱，应其行政而致。若天运地处，竟无主张维纲也，此则非墨子所知矣。

命之为说，公孟只言贫富寿夭，而墨子后增以治乱安危，盖诬儒者矣。治乱安危，惟人所措。至于贫富寿夭，则固有说，如伯夷之夭，原思之贫，此其志愿，又不可言命也。若夫单豹之遇虎，则夭有命矣；邓通之寄死，则贫有命矣。所谓命者，词穷语绝，不得已之借名，其所自出，则佛氏亦以为因果，是又以祸福感应与定命合而为一，其论巧矣。然师子尊者受挥刀断首之祸，而佛亦罹木枪马麦之患，虽至成道，尚不能免难，是则其所谓因果者，乃恩怨之报酬，而非善恶之赏罚矣。余谓报酬之义，异于《洪范》。盖非自主宰，而在私相予夺，此固理之必然者。悬土囊而击之，则土囊亦反触人，物莫不有跃力，况有知者乎？

《吕览·诬徒》云：草木鸡狗牛马，不可谯诟遇之，谯诟遇之，则亦谯诟报人。然则命固有偶遇者，而亦有由于报酬者，然非如佛家所谓前生事也。自吾始祖以往，鱼鸟兽猿之祖，不知其更数百世，吾岂能知其恩怨所在哉？德几无小，灭宗无大，九世之仇，百年之德，至于今而始报之子孙，即报者亦不知其所以。盖先人之神识伏藏体中也是。故《易》说余庆余殃，必以家言，明其报复在种胄也。凡言命者，斯亦一端。至夫禄命推验，则非可凭矣。全谢山《原命》引宋景濂谓：一日之内，同时生者不少，而显晦吉凶寿夭悬绝，故赵普与军校，蔡京与粉儿，高叔嗣与陈友谅皆同命。童轩亦言高穀与李昂，单昂与王稽，皆同甲子而绝不相似。余中之衍《皇极经世》之说，推其渊源于王天悦，谓某甲之年月，必得某甲之日时而后富寿，苟得某甲之日时而遂贫贱，水陆舟车之所产，东西南北之所居，莫不有合，此其所以有同物而不同运者。余谓同物相应，多在细微，而非禄命家所能推。以余所见，鸿胪卿朱克勤，与大学士李鸿章，生同物，而朱夭李寿，显晦亦殊，然其女则先后适张佩纶、吴伟才与左宗棠。生同物，后左为大帅，屠寇数万。吴为屠者，刲豕数万。然则择壻多杀，则同矣。而升沈荣辱之事，长短久近之期，则截然各异，以此知支干甲子所应非诬，而毫毛冥合，无关大体，是岂禄命家所能知乎？故古之言知命者，谓知其不可如何，而非谓其禨祥算数也。要之一人际遇，非能自主，合群图事，则成败视其所措。故一人有命，而国家无命。荀子曰：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尽亡矣。《天论篇》。此以见一人之命有定限，而一

国之命无定限也。又曰：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是则以天为不足称颂，而国命可自己制，其何有天哉？曰：天者自然而已。曰：命者遭遇而已。从俗之言，则曰天命，夫岂以苍苍者布令于下哉？嗟乎！愚者之颂天，宋偃之射天，上官安之骂天，其敬慢不同，而其以天为有知，或则哀吁，或则怨望，其愚一也。汉世之儒，勿信祸福感应而独言命者，惟王仲任耳！然执泥小数，至谓项羽用兵，实过高祖，其兴亡亦由天命。若国之安危，亦不能不出于此者，是亦固矣。若夫大儒之说，天无威庆而人有报施，一人则成亏前定，而合群则得丧在我，斯所以异于阴骘下民之说也。

右三事，儒术所以深根宁极，无出其范者。神怪之教，婴之自溃，昧此而言儒，汉后所以无统纪也。非儒有抵諆孔子语，则所举儒说，亦必不可尽信。其驳昏丧诸礼，又皆小节，故勿论。

【说明】 本文录自《清议报》第二十三——三十四册，一八九九年八月十七日——一九〇〇年二月十日（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初一日——二十六年正月初一日；其中第二十六——二十七册未曾续载）出版。

《清议报》刊录本文既竣，章氏后加"附录"云：

"作《儒术真论》已，检《梁书》至《儒林范缜传》，观其《神灭论》，卓诡倜傥，与余合契。盖卯金以降，儒流论著，鲜其畴矣。惟知言命而不知非相，知遭遇而不知报施，知无鬼而不知有物，知人物有知而不知草木亦有知，是其所蔽也。又言知此神灭，所以救浮屠之害政，绝桑门之蠹俗，则与傅奕、姚

祟所见亦同。要之微言眇义，洗心藏密，肯者有间，而举刀无厚，固非退之辈驰骛于外而不知其内者比也，今取其论，著于左方。

“初，缜在齐世尝侍竟陵王子良，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贫贱？’缜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溷粪之侧。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退论其理，著《神灭论》。”（以下为范缜《神灭论》，略。）

庚子拳变与粤督书

（一九〇〇年六月）

乃者读公《谕粤中士民书》，自以八十衰翁，不惜糜顶，壮哉言乎！北方糜烂且两月，奸回倒柄，强敌乘间，衅起畿甸，波及东南。某等所望于公者，则明绝伪诏，更建政府，养贤致民，以全半壁，不仅以奋蹈危难期也。何者？近畿兵状，官匪环拿，棼不可理。列强以剿匪为名，而不明言宣战，然伪政府则既宣战矣。疆臣外惮列强，内惮政府，迁延两可，持重不断。自公电咨群帅，谓五月二十五日以后之诏，不当遵奉，然后群帅内有所恃，始立保护长江之约，然于政府则隐拒而非明绝，于列强则私约而非公盟，西邻责言，祸且未艾。江南李、鹿二帅[1]，复以勤王北上。勤王者，则汗漫兼容之辞耳，剿匪者得举是以为号，助匪者亦得举是以为号，二帅之名曰勤王，其实助匪也。同列不沮，岘帅[2]且授之士卒，何能取信于外人耶？神京

(1) 按：指李秉衡和鹿传霖（时任江苏巡抚）。

② 按：指两江总督刘坤一。

既陷，兵祸必及于东南。故吴淞炮台之修，港督已沮其增缮。是知列强特与南方委蛇，而其心已阴有所忌矣。以此偷安，叶相国之祸[1]，方在群帅。且伪诏已宣言挞伐，而疆臣犹与列强交通，此政府之所谓方命也。诃问罢黜，计不旋踵。今日宣战之诏，可隐拒矣；他日罢黜之诏，能拒之乎？

夫群帅所惮于列强与政府者，其贤者为民命，不肖者即为爵位要领焉耳！今龊龊为两可之谋，而爵位要领，卒不可保，外有责言，进退罪也；内有谴诃，始终罪也。二者皆穷，孰与明绝政府，而示列强以藩镇之可恃乎？虽然，迹诸帅所以环视，无敢以更建政府唱者，亦以分职相等，莫适为主也。今公处元辅之重，当分陕之任，勋藏于天府，信闻于四裔，于位则宜，于望则宜。公若先发，群帅孰不翕然应者。或以半壁之计，形势无先于两江，此言地利则然。然民气选愞，人无固植，其商贾又吝啬不知大计，人荒财匮，不可与立。粤中昔多志士，复饶财赋，秔稻蒲鱼銀铜果布之美，輻凑于南海，富人多任侠轻利，越海得南洋诸岛，可倚以为外府，此其势则优于两江灼灼矣。闻公已建置议院，募练材技，毁家纾难，以为民倡，四方喁喁，莫不延颈归德。今若绝诏建府，以纾近祸；延擢材骏，以为后图，其势宜可以不败。

又戊戌之狱，逐臣废官，逃难海外，至不可计，其人大率锐敏轶材之士也。方时无故，尚将澡濯而用之；今祸变

---

① 按：指一八五六年英、法发动侵略战争，次年，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事。

已亟，必当开释禁网，引与立功。贤材众多，则布之湘、鄂、江、皖、闽、浙诸幕府，使藩镇辑协，若肩臂胫跖之相使，则政何为而不理？民何为而不附？又是属多与南洋诸商深相约结，得其人则度支所出，馔饷所转，抑可以有资矣。语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乘北祸未已，中外相拿，欧、美、日本之兵，尚缀于黄海，犹得舂容措置，以为南人遗种之计。失此不为，恐他日之粤海，亦犹今之津沽也。藉令无此，外人折骨衄血以靖大寇，而使吾族得因其成以自立乎？

曩者公在北洋，规建新法，天下想望，徒以位非枢府，不得变置大政。今事机既迫，钧石之重，集于一人，想远犹閎略，筹之已夙。某等鄙浅，诚不足裨补万一。傥以是为市人之臚言耶？抵冒威严，不任主臣屏营之至。

【说明】 本文录自《甲寅》第一卷第四十二号《太炎集外文》（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二日出版）。《甲寅》主编章士钊并加"附识"云："按：庚子，先生主先外舅（指吴保初，号君遂）北山楼，此篇手稿，近从残书中理出。史材手迹，两俱可宝。士钊谨识。"

按：李鸿章于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署两广总督，次年（一九〇〇年）七月九日（六月十三日）奉命调任直隶总督，文中提及六月二十日（五月二十四日）"上谕"，称李鸿章为"粤督"，则本文应撰于一九〇〇年六、七月间。

解 辫 发

（一九〇〇年八月）

《后汉书·西南夷传》：哀牢夷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箸尾。尾者，其今满洲之辫发乎？《汉书·终军传》：解编发，削左衽。师古曰：编读曰辫。斯其来远矣。

支那总发之俗，四千年亡变更，满洲入，始鬅其四周，交发于项，下及髋髀。一二故老，以为大辱，或祝发箸桑门衣以终。《通典·乐》六：天竺乐，乐工皂丝布，幞头巾，白练襦，紫绫裤，绯帔。舞二人，辫发，朝霞袈裟，若今之僧衣也，行缠碧麻鞋。据此，是天竺亦有辫发。其言若今僧衣者，只指朝霞袈裟耳。又今印度人皆幞头而不辫发。然则舞时偶一用之，平日则否，故乐工仍不辫发也。盖冠簪高髻之饰，既不可复，则宁尽毁之以章吾志，其情隐矣。其后习夷俗久，耏鬓垂鬣，以为当然，亡所怪愕。日本人至，始大笑悼之；欧罗巴诸国来互市者，复蚩鄙百端，拟以猳豚，旧耻复振。然士人多要幸儋石之禄，犹前却持两可，未尽芟夷也。

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秋七月，余年三十三矣，是时

满洲政府不道，戕虐朝士，横挑强邻，戮使略贾，四维交攻，愤东胡之无状，汉族之不得职，陨涕涔涔曰：余年已立，而犹被戎狄之服，不违咫尺，弗能剪除，余之罪也。将荐绅束发，以复近古，日既不给，衣又不可得。于是曰：昔祁班孙、释隐玄，皆以明氏遗老，断发以殁。《春秋·穀梁传》曰：吴祝发。《汉书·严助传》曰：越劗发。晋灼曰：劗，张揖以为古剪字也。余故吴、越间民，去之，亦犹行古之道也。会执友以欧罗巴衣笠至，乃急断发易服。欧罗巴者，在汉则近大秦，与天毒同柢，其衣虽迮小，方袷直下，犹近古之端衣，惟吾左辅之日本，亦效法焉，服之盖与箸桑门衣无异趣云。《传》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由是萌芽，令他日得端委以治《周礼》，固余之志也。昔者，《小雅》诗人，闵宗周危乱，发愤而作，始之以流水之朝宗于海，而终之以邦人诸友谁无父母。呜呼！余惟支那四百兆人，而振刷是耻者，亿不盈一，钦念哉！

【说明】 本文录自《訄书》重印本，原为该书最后一篇（第六十三篇）。

一九〇〇年七月，上海张园“国会”召开时，章氏对自立会“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模糊宗旨，表示不满。于是“宣言脱社，割辫与绝”。本文亦称于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秋七月（一九〇〇年八月）“断发易服”。则章氏的“断发”和撰述此文，应在上海张园会议以后，故为《訄书》原刊本所未载；一九〇〇年七月后，章氏手校《訄书》，录有此目；一九一四年，章氏将“《訄书》增删，更名《检论》”，删去此篇。

祓三厉文

（一九〇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重光赤奋若之岁，三月甲戌，余杭章炳麟谨以戈彗桃茢，祓故尙书徐公、故侍郎许公、故太常卿袁公之梾曰:

乌虖哀哉！曲突徙薪，六烈峨峨。焦头烂额，曾不足多。尙书荐言，废帝立哥。侍郎太常，或寝或吪。首施观望，唯之与阿。退则窝卷，进则婞婀。昌言剿寇，阴市于俄。金缯在前，遑恤菹醢。

乌虖哀哉！南山剖竹，不足书罪。毙之萧斧，孰云天醉。跖蹻自戕，焚身谁怼。繄古义烈，贤劳尽瘁。戡荡强胡，颅糜顶瓴。尸祝鬼雄，是曰无愧。今也不然，熏莸易类。华衮所褒，汪黄与桧。

呜呼哀哉！王甫之尸，阳球是磔。赵伦之墓，阎缵是轹。闻尔梾至，鲍鱼一石。吴淞泼泼，余臭上彻。我无金椎，椎尔血额。斫以赤刀，黄肠拱柏。愿尔国殇，灵旗搏格。讼我天阍，来取我魄。呜呼哀哉！

【说明】 本文录自《清议报》第八十册，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出版，署名“蓟汉阁主”。

按:“三厉”，指徐用仪、许景澄、袁昶三人而言。当义和团运动展开后，徐用仪、许景澄、袁昶等坚持半殖民地统治阶级的顽固立场，对内严厉镇压，对外屈辱退让。他们曾要求慈禧调董福祥出城，派荣禄组织枪手、刀斧手关闭城门，搜捕义和团。但在义和团的压力下，慈禧不敢轻试，分别于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八日和八月十一日将袁、许、徐三人斩首。本文注明写于“重光赤奋若之岁三月甲戌”，则应撰于一九〇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八日)。

唐烈士才常像赞

（一九〇一年九月）

湘江大波[1]，水与星沓。百灵闪尸，或吐或欲。𦬆生浏澼[2]，蛟鼍入怀。玄黄之战，鬼搏神赞。材实非地，地载其器。幼睨藩棠，恬为台隶[3]。南学既阊，于谋于毖。岂不怀革？烝民尚盲。诡循建虏，以牢骏强。大陆何斋，斋于夏口。余有谍揆，将发群丑[4]。寇来扼之，膊之磔之[5]。江汉为镬，炙而核之[6]。梦梦之天，荡荡之帝。弃我神州，而眷胡裔。鄂盗斯张，歼厥明懿[7]。文昌之瞰，浏澼死后，之洞枭其首于文昌门[8]。赤矑犹视。浏澼目赤

① 《文录》作"潇湘大波"。

② 《文录》作"竺生浏澼"。

③ "幼睨藩棠，恬为台隶"二句，《文录》无。

④ 《文录》作"将搏群丑"。

⑤ 《文录》作"寇来搤之，燔之炙之"。

⑥ 《文录》作"膊而磔之"。

⑦ 《文录》作"黄鹤夜鸣，歼兹明懿"。

⑧ 《文录》作"才常死后，枭首文昌门"。

色[1]。视余无恙，书此罔象。

共和纪元二千七百四十二年八月，后死章绛太炎书[2]。

【说明】 本文录自《唐才常烈士遗著·附录》，载《逸经》第二十二期（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出版），《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亦有是篇，题为《唐才常画像赞》。按：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一日（七月二十七日），唐才常起事失败，为张之洞捕捉，次日就义。文末章氏自署"共和纪元二千七百四十二年八月"，应为一九〇一年九月所撰。

---

(1) 《文录》作"才常目赤色"。

(2) 《文录》无此句。

秦献记

（一九〇一年）

秦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百官公卿表》。识于《史记》者[1]，叔孙通、伏生最著。仆射周青臣用面谀显，淳于越相与牴牾，衅成而秦燔书。其他，《说苑》有鲍白令之斥始皇行桀、纣之道，乃欲为禅让，比于五帝。《至公篇》。其骨鲠次淳于。《汉·艺文志》儒家有《羊子》四篇，凡书百章；名家四篇则《黄公》。黄公名疵，复作秦歌诗，二子皆博士也[2]。京房称赵高用事，有正先，用非刺高死。《汉书·京房传》[3]，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最在古传记，略得八人，于七十员者九一耳。青臣朴樕不足齿，其七人或直言无挠辞，不即能制作，造为琦辞，遗令闻于来叶。其穷而在蒿艾，与外吏无朝籍，烂然有文采论撰者，三川有成公生，与黄公同时，当李斯子由为三川守，而成公生游谈不

---

① 《文录》作"识于太史公书者"。

② 《文录》作"二子皆秦博士也"。

③ 《汉书·京房传》五字，《文录》无。

仕，著书三篇，在名家[1]。从横家有《零陵令信》一篇，难丞相李斯。皆见《艺文志》。秦虽钳语烧《诗》、《书》，然自内外荐绅之士，与褐衣游公卿者，皆抵禁无所惧，是岂无说哉？

或曰：秦焚《诗》、《书》、百家语在人间者，独博士如故，将私其方术于己，以愚黔首，故叔孙通以文学徵待诏博士。而陈胜之起，诸生三十余人得引《公羊》"人臣无将"以对二世[2]。郑樵、马端临说，实本之王仲任[3]。《论衡·正说篇》曰："令史官尽烧五经，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者刑，惟博士官乃得有之[4]。"近人多从其说。或曰：秦火及六籍，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可观。王仲任说，见《论衡·书解篇》。又赵邠卿《孟子题辞》曰：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士，孟子徒党尽矣。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不泯绝，是亦谓诸子不焚也。《文心雕龙·诸子篇》亦从此说[5]。

夫李斯以淳于越之议，夸主异取，故请杂烧以绝其原。越固博士也。商君以《诗》、《书》、《礼》、《乐》为六虱，《靳令篇》。欲尽划灭之[6]，而以法家相秦者宗其术。然则秦不以六艺为良书，虽良书亦不欲私之于博士。其云"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倒言之，即是

---

(1) "书"字，手稿落，据《文录》补。按："三篇"，《汉书·艺文志》作"五篇"。

(2) "二世"二字，《文录》删。

(3) 《文录》作"实本《论衡》"。

(4) 《文录》作"惟博士乃得有之"。

(5) 此段脚注，《文录》删去，仅"见《论衡·书解篇》"。以下移作正文"孟子徒党虽尽，其篇籍得不泯绝"。注"《孟子题辞》"。下接"夫李斯"正文。

(6) 《文录》作"尽划灭之"。

“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非博士官所职者”，正谓《诗》、《书》、百家语，非博士官所职也①。自仲任误读②，乃谓博士官独有其书，郑、马之徒，沿袭新说③，遂为今日争端。即前议非矣。

斯以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为祸始。故夫滑稽便辞而不可轨法者，则六国诸子是也。不燔六艺，不足以定一尊④。诸子之术，分流至于九家，游说乞贷，人善其私，其相攻尤甚于六艺⑤。今即弗焚，则恣其曼衍乎？诸子与百家语，名实一也。不焚诸子，则《史记》为谬语矣⑥。诸子所以完具者，其书多空言不载行事，又其时语易晓，而口耳相授者众⑦。自三十四年焚书，讫于张楚之兴，首施五年⑧，记诵未衰，故著帛为具。验之他书，诸侯史记与《礼》、《乐》诸经，多载行事法式，不便谙讽⑨，而《尚书》尤难读，故往往残破；《诗》有音均则不灭，亦其徵也。此则后议复非矣。

余以为著于法令者，自秦纪⑩、医药、卜筮、种树而

---

① “正谓《诗》、《书》、百家语，非博士官所职也”句，《文录》无。

② 《文录》作“自仲任误解”。

③ 《文录》作“沿袭斯论”。

④ 《文录》作“不足以尊新王”。

⑤ 《文录》作“其相攻甚于六艺”。

⑥ 《文录》作“不焚诸子，其所议者云何？”下接“诸子所以完具者”。

⑦ 《文录》作“而口耳相传者众”。

⑧ 《文录》作“首尾五年”。

⑨ 《文录》作“不便谙诵”。

⑩ 《文录》作“自秦纪史篇”，下增注文“秦八体有大篆，〈知〉不焚史篇”。

外，秘书私箧无所不烧，文学述作①无所不禁②。然而斯之奉法，不能坚牢如卫鞅也。鞅挫辱太子，而上不肆行，非令者徙，便令者亦徙，而民不窃议，故《新序》称之，以为“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今斯令始皇始自称朕，后自称真人，微行咸阳，皆尽诛石旁居人。至于徐市、卢生之徒，妄妖求仙，荧惑主听，皆不能以法令裁制。然则朝廷以爱憎无常，侵越宪度，即刑赏不信无疑也。斯特以法令为文具，诏版既下，终不钩考以致其必行，故零陵令与斯辩难，成公生乃奸说其子，著书自见，一切无所穷治，又况粟粟羊、黄之徒乎？呜呼！斯则骫于用法，顾使秦之黎献，以是得优游论著，亦斯赞之矣。

若其咸阳之坑四百六十人③，是特以卢生故，恶其诽谤，令诸生传相告引，亦犹汉世党锢之狱，兴于一时，非其法令必以文学为戮。数公者，诚不以抵禁幸脱云。

---

① 《文录》作“方策述作”。

② “无所不禁”以下，《文录》作“然而文学辩慧，酖于人心，上下所周好，虽著令弗能夺也。烧书者，本秦旧制，不始李斯，自斯始旁及因国耳。韩非言商鞅焚诗书，明法令，塞私门之请，以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以显耕战之上。（《和氏篇》）其验也。商君既诛，契令犹在，遗法余教未替。然张仪、范雎、蔡泽之伦，结轶敏关，游谈不绝，亦数称六艺成事。及不韦〈且〉著书以县国门，秦之法令，弗能绝也。后李斯者，汉初挟书之令未剟，然娄敬以戍卒輓辂，上谒高帝，亦引《大誓》为征。汉之法令，弗能绝也。夫高祖则溺儒冠，秦之诸王，非能如李斯知六艺之归也。然其律令在官，空为文具，终不鉤考以致其诚。今始皇不起白屋，而斯受学孙卿，好文过于余主，此则令之之谏、零陵之难、成公之说，一切无所穷治，自其分也。又况粟粟羊、黄之徒乎？以斯骫于用法，顾使秦之黎献因是得优游论著，亦斯赞之矣。”下接“若其咸阳之坑”。

③ 《文录》作“若其咸阳之坑，死者四百六十人”。

【说明】 本文北京图书馆藏有章氏手稿两份：一份在标题下注有“辛丑”，则应撰于一九〇一年；另一份标题下写有“故事部”三字。查注有“辛丑”一份，与《雅言》第六期（一九一四年四月出版）所刊相同，当系初稿；注有“故事部”一份，则与一九一〇年在日本排印的《学林》第二册“故事部”所刊相同，即《文录》“定本”，当系改稿。今据“辛丑”手稿录出，而以《文录》勘校；《文录》个别文字刊落，另据“故事部”手稿补于< >号之中。

致吴君遂书

（一九〇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君遂我兄国士：被初九日书，以《惜誓》语相拟，殊过。下走被羁系久矣，犹未至摇尾求食耳！褫吾皮以为鼓，恐亦不足郊天。如彼蚩尤，音响尚闻五百里，麢而角者，又不足拟也。蒋侯《选报》，汪蹐定文，皆不受他人掣曳。仆明岁亦相从为马二先生事业，此事功效，实较教育为巨，然竖轼论鏠，断谦轨范，方雾塞一世，则能辨臭味者尠矣。

尊恉欲借本初之力[1]设局编辑，垂训方来，规模闳远，于今日尤为急务。仆于朋辈中，昔尝见蚿牛鼎不可泊鸡，今则已矣。上不辞为庾仲容、马总，下不辞为史游、周兴嗣矣。编辑一事，头绪闠䦳，然其大要，不过数端，教科问答之书，不可近于策本；删定成家之书，不可类于御纂：此二种固等而下之之言也。稍高言之，则曰当辨雅俗，不必辨繁简而已。雅而简约，无害为传书，《群书治要》是也；

[1] "借本初之力"五字，《国粹学报》删去。

俗而繁博，无减其伧陋，《文献通考》是也[1]。贵与全无学术，与今之书贾编策等耳！持此权度，统纪自得，未审尊恉然否。致本初书[2]，宜与《新世界》诸君子商定拟发[3]。如俟下走到沪，则当在寅末，恐或太晚耳！然君为此议，志愿宏大，又不宜于岁晏猝发，使彼视之，以为百无聊赖而计及于此也。献岁昭苏，便可飞檄。本初方汲汲文学，想于田沮诸俊而外[4]，必当听应仲远一言乎？蒋侯闻欲往金陵听讲《大乘起信论》，卻聘书已交去，望转告[5]。已发轫否？残年与子言唱和[6]，兴味当更增也。手肃，即颂侍祉不既。弟□□顿首。十二日[7]。

【说明】 此书手迹，用"东吴大学日记"笺纸，共二叶四片。上海图书馆藏。

书中称："下走被羁系久矣，犹未至摇尾求食耳。"查戊戌政变后，章氏迁台湾。一九〇〇年，唐才常自立军失败，"钩党甚亟"，章氏"亦被连染"，旋即"归乡里度岁"。《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二十七年三十四岁记："会苏州东吴大学求教员"，因吴君遂推荐，"乃赴苏州"。此书用"东吴大学日记"作笺，则应为苏州任教时所书。书末仅署"十二日"，未标年月，查书称"岁晏猝发"，"残年"，"献岁昭苏"，则应书于十二月十二日，当一九〇二年一月二

---

① "俗而繁博，无减其伧陋，《文献通考》是也"，《国粹学报》刊落。

② 《国粹学报》作"致□□书"。

③ "拟发"二字，《国粹学报》刊落。

④ 《国粹学报》作"□□方汲汲文学，想于田□诸俊而外"。

⑤ 注文，《国粹学报》删去。

⑥ 《国粹学报》作"残年与无已唱和"。

⑦ 《国粹学报》作"手肃，即颂道祉不既，弟章绛顿首"。

十一日。

"本初"，指袁世凯，袁初事吴父长庆，所以吴君遂"欲借本初之力"。次年正月，吴君遂有《呈政务处代奏吁请归政疏》，见《北山楼集·北山楼文补》。"蒋侯"，指蒋智由。

又，此书即《国粹学报》第一年乙巳第九号所载《答某君论编书书》，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十日出版。《国粹学报》有删节，已分别注明。

致吴君遂等书

（一九〇二年三月十八日）

君遂、允中、性柴、叔雅我兄国士左右：被书，具审一切。鄙人东行已二十日，初寓新民丛报社，后入东京，寓牛込区天神町六十五番支那学生寓中，有湘人朱菱溪为东道，任公之弟子也。屏居多暇，仍为广智删润译稿，閒作文字登《丛报》中，以供旅费而已。回忆三年前至此，相知惟任公、念劬，今则留学生中，旧识有十数人，稍不寂漠也。

得纯公书，乃知发难者塙为臭沟，而挑拨之者象虎也。大龟近策，以为使孙、康二人自相残杀，而后两害可殊，其计甚毒。今者，任公、中山，意气尚不能平，盖所争不在宗旨，而在权利也。任公曩日，本以□□为志，中陷□□，近则本旨复露，特其会仍名□□耳。彼固知事无可为，而专以昌明文化自任。中山则急欲发难。然粤商性本马鹿，牵掣东西，惟人所命。任公知□□，而彼辈惟知保皇，且亦不知保皇为何义，一经熔铸，永不能复化异形，中山欲以革命之名招之，必不可致，此其所以相攻击如仇

雠也。然二子意气，尚算和平，鄙人在此，曾见□□数次，彼颇叹南海为奇男子，而惜为世界转移，不能转移世界。其论诚平允矣。康门有徐君勉，最与中山水火。孙党有秦力山，本任公弟子，而宗旨惟在革命，后与任公寻仇，至不相往来，然其人尚可谓刚者；如虬斋，则非其比也。戢元丞志在革命，与力山最合，与任公为冰炭，与中山亦不协。近见任公，示我赵月生书，痛诋□□，至云：革党之欲甘心于任公，较逆洄为尤甚。嘻！非彼之欲甘心，有此意见，恐适中大龟之谗搆耳。地发杀机，龙蛇起陆，在今日楼榴甚微，而他日必有巨祸。吾不敢谓支那大计，在孙、梁二人掌中，而一线生机，惟此二子可望。今复交搆，能无喟然。常以无相搆怨，致为臭沟、大龟利用，婉讽中山，而才非陆贾，不能调和平、勃，如何如何！然不敢不勉也。

任公云："君遂株守上海，为气节名士，甚无谓，何不赴东国一扩眼界。"弟亦苦望君来。允中本欲来此，偕行甚乐。一月后，樱花正开，可以作苏、李河梁之咏矣。

允中以选文相属，甚愿任此。来时望挈古书数部，以作选料。伯器已见三次，风采举止，殊有蒋侯青骨，非特凤毛也，乍见几不能辨。叔雅果往袁处否？念念。

有家书一纸，祈君遂加封转寄。知拙夫顿首。阳三月十八日，阴二月八日。

【说明】 此书手迹，凡四纸，上海图书馆藏。末署"阴二月八日"，疑为"阴二月九日"之误；又书中缺字，系用墨色所涂，疑为

原有而经吴君遂抹去者。

函中所称："允中"，汪德渊；"叔雅"，丁惠康；"任公"，梁启超；"念劬"，钱恂；"虬斋"，沈翔云；"徐君勉"，徐勤；"戢元丞"，戢翼翚；"赵月〔日〕生"，赵必振；"逆洞"，指张之洞。

致吴君遂书

（一九〇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君遂仁者左右：登轮舶后，次日抵舍，无候门之稚子，而忻乐自若，尙赖数册残书耳。人不学道，不能无所系著。庄生云：“不刻意而高，无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寿。”和、汉文籍，吾侪之江海也。不能去江海以求乐，则去纯素同帝之道远矣。呜呼！不习止观，终为形役，将欲绝累去悲，宁可得耶！史事将举，姑先寻理旧籍，仰梁以思，所得渐多。太史知社会之文明，而于庙堂则疏；孟坚、冲远知庙堂之制度，而于社会则隔；全不具者为承祚，徒知记事；悉具者为渔仲，又多武断。此五家者，史之弁旃也，犹有此失。吾侪高掌远蹠，宁知无所陨越，然意所储积，则自以为高过五家矣。

修通史者，渔仲以前，梁有吴均，观其诬造《西京杂记》，则通史之芜秽可知也。言古史者，近有马驌，其考证不及乾、嘉诸公，而识断亦伧陋，惟愈于苏辙耳。前史既难当意，读刘子骏语，乃知今世求史，固当于道家求之。

管、庄、韩三子，皆深识进化之理，是乃所谓良史者也。因是求之，则达于廓氏、斯氏、葛氏之说，庶几不远矣。太炎遗老者，二百五十年之彭铿也，其用在抽象不在具体，以是为过于彭矣。

允中想已赴明京，不知理卿已返未？君近读《楞严》，宁有理解耶？性柴常谈否？曰生所属作叙，当待其书刻成，《社会学》亦欲其寄两部云。溽暑珍卫。弟支猎胡顿首。廿五日。

【说明】 此书手迹，凡四纸，上海图书馆藏。末署"廿五日"，未标明年月。书称："登轮舶后，次日抵舍"。查章氏于一九〇二年旧历二月"东渡"，"留日本三月"，五、六月间返国，则此书应撰于六月，与函末"溽暑珍卫"正合，应为六月二十五日所书，当一九〇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书中所称"理卿"，施夔均；"曰生"，赵必振。所称"廓氏、斯氏、葛氏之说"，指廓模德、斯宾塞尔、葛通哥斯（吉丁斯）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说。

致梁启超书

（一九〇二年七月）

（前略）酷暑无事，日读各种社会学书，平日有修«中国通志»之志，至此新旧材料，融合无间，兴会勃发。教育会令作«教育杂志»，作新译书局令润色译稿，一切谢绝，惟欲成就此志。窃以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典志有新理新说，自与«通考»、«会要»等书，徒为八面锋策论者异趣，亦不至如渔仲«通志»蹈专已武断之弊。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四千年中帝王数百，师相数千，即取其彰彰在人耳目者，已不可更仆数。通史自有体裁，岂容为人人开明履历。故于君相文儒之属，悉为作表，其纪传则但取利害关系有影响于今日社会者为撰数篇。犹有历代社会各项要件，

苦难贯串，则取械仲纪事本末例为之作记。全书拟为百卷，志居其半，志记纪传亦居其半。盖欲分析事类，各详原理，则不能仅分时代，函胡综叙，而志为必要矣；欲开浚民智，激扬士气，则亦不能如渔仲之略于事状，而纪传亦为必要矣。

顷者东人为支那作史，简略无义，惟文明史尚有种界异闻，其余悉无关闳旨。要之彼国为此，略备教科，固不容以著述言也。其余史学原论，及亚细亚、印度等史，或反于修史有益，已属蔡君鹤庼购求数种。百卷之书，字数不过六七十万，或尚不及，尽力为之，一年必可告竣。顷阅《新民丛报》，多论史学得失，十一期报中又详举东人所修中史，定其优劣，知公于历史一科，固振振欲发抒者。鄙人虽驽下，取举世不为之事，而以一身任之，或亦大雅所不弃乎？

史目如左：

五表：　帝王表以朴略时代、人文时代、发达时代、衰微时代概括之。　方舆表　职官表　师相表　文儒表

十二志：志名，或病其旧，拟取《逸周书》篇题名号，改命曰解，俟商。　种族志　民宅志此与方舆志不同者，彼略记沿革，此因山川防塞，以明社会风俗之殊异，故不得不分为二。食货志　工艺志　文言志　宗教志　学术志　礼俗志除祭礼入宗教。　章服志　法令志　沟洫志　兵志

此十二志，每志约须分四、五卷。

十记：　革命记　周服记　秦帝记　南胄记　唐藩记　党锢记　陆交记　海交记　胡寇记　光复记

八考纪：　秦始皇考纪　汉武帝考纪　王莽考纪　宋武帝考纪　唐太宗考纪　元太祖考纪　明太祖考纪　清三帝考纪

二十七别录：　管商萧诸葛别录　李斯别录　董仲舒公孙弘张汤别录　刘歆别录　崔浩苏绰王安石别录　孔老墨韩别录　朱熹王守仁别录其余学者，皆详学术志，此数人事迹较多，故列此两传。许衡魏象枢汤斌李光地别录　顾黄王颜别录　盖宽饶傅干曾静别录　辛弃疾张世杰金声桓别录　郑成功张煌言别录　多尔衮别录　张廷玉鄂尔泰别录　曾李别录　杨雄庾信钱谦益别录　孔融李绂别录　洪秀全别录此或入纪，俟商。　康有为别录　游侠别录　货殖别录　刺客别录　会党别录　逸民别录　方技别录　畴人别录　序录

【说明】　此书原载《新民丛报》第十三号《饮冰室师友论学笺》栏，一九〇二年八月四日（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一日）刊行，题称《章太炎来简》，衔款等发表时原经删略，并注明撰于“壬寅六月”。又所附《中国通史目录》，与《訄书》重印本第五十九篇《哀清史》所附基本相同。惟此系初稿，《訄书》则经修改。《訄书》把“志”改为“典”，其中《沟洫志》改为《浚筑典》、《兵志》改为《兵备典》；“考纪”中增列《洪秀全考纪》；“别录”则删去《刘歆别录》、《朱（熹）、王（守仁）别录》、《洪秀全别录》，别增《王猛别录》，并改《杨（雄）庾（信）钱（谦益）别录》为《杨（雄）颜（之推）钱（谦益）别录》，余同。

社会学自序

（一九〇二年七月）

社会学始萌芽，皆以物理证明，而排拒超自然说。斯宾塞尔始杂心理，摈引浩穰，于玄秘淖微之地，未暇寻也；又其论议，多踪迹成事，顾鲜为后世计，盖其藏往则优，而匱于知来者。美人葛通哥斯之言曰：社会所始，在同类意识，俶扰于差别觉，制胜于模效性，属诸心理，不当以生理术语乱之。故葛氏自定其学，宗主执意，而宾旅夫物化，其于斯氏优矣。日本言斯学者，始有贺长雄，亦主斯氏；其后有岸本氏，卓而能约，实兼取斯、葛二家，其说以社会拟有机，而曰非一切如有机，知人类乐群，亦言有非社会性，相与偕动，卒其祈向，以庶事进化，人得分职为侯度，可谓发挥通情知微知章者矣。余浮海再东，初得其籍，独居深念，因思刘子骏有言：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固知考迹皇古，以此先心，退藏于密，乃能斡人事而进退之。考迹皇古，谓之学胜；先心藏密，谓之理胜；然后言有与会，而非夫独应者也。岸本氏之为书，综合故言，尙乎中行，虽

异于作者，然其不凝滞于物质，穷极往逝，而将有所见于方来，诚学理交胜者哉！乃料简其意，译为一编，无虑五万余言，有知化独往之士，将亦乐乎此也。壬寅六月，章炳麟序。

【说明】 章氏所译日人岸本能武太《社会学》一书，共二卷，一九〇二年九月（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出版，上海广智书局发行。《序》中“斯宾塞尔”，指斯宾塞：《社会学原理》（中译本于一九〇三年由马君武译出一部分出版）；“葛通哥斯”，即美人吉丁斯，所著《社会学原理》，其提纲《社会化理论》，于一九〇三年由吴建常译出，名《社会学提纲》，而章氏译书则刊于一九〇二年，所以他是翻译资产阶级社会学成本著作最早的人。

致吴君遂书

（一九〇二年八月八日）

君遂我兄仁者左右：前月二十三日抵家后即作一械，计已察阅。乡闱密迩，哲嗣想已南来。君近在沪抑在金陵，所乐在诗抑在对策八面锋，所务在教育会计抑在钟山薛荔。允中近寓何处，能知其方位否？若详悉者，幸即见示。

史事前已略陈，近方草创学术志，觉定宇、东原，真我师表，彼所得亦不出天然材料，而支那文明进化之迹，藉以发见。赤帝师鳌，犹无所吝，况二儒之彰彰者乎？斯论一出，半开党必谓我迂，亦不避也。麟家实斋，与东原最相恶，然实斋实未作史，徒为郡邑志乘，固无待高引古义。试作通史，然后知戴氏之学，弥仑万有，即小学一端，其用亦不专在六书七音。顷斯宾萨为社会学，往往探考异言，寻其语根，造端至小，而所证明者至大。何者？上世草昧，中古帝王之行事，存于传记者已寡，惟文字语言间留其痕迹，此与地中僵石为无形之二种大史。中国寻审语

根，诚不能繁博如欧洲，然即以禹域一隅言，所得固已多矣。

君与允中皆皖人，与东原生同乡里，当知鄙见为不缪。下走之于实斋，亦犹康成之于仲师，同宗大儒，明理典籍，宗仰子骏，如晦见明，私心倾向久矣。独于是论，非所循逐，亦自谓推见至隐之道，较诸吾宗差长一日也。

抵家旬数，谷稼是沓。幸有陈书数簏，浊醪在罍，昼晚奠爵，雠方校石，足用自乐；所苦史藏未具，取精用弘，不得其道。霜时倘当赴沪，甫能成此大业，亦未知允中于意云何？曰生属序，书尚未到，前求《社会学》一二部，亦竟寀宗，怅甚怅甚。手肃，即颂秋祉不具。弟麟再拜言。初五日。

【说明】 此书手迹，凡四纸，上海图书馆藏。末署"初五日"，未标年月。查书称"前月抵家后，即作一椷"，宜指一九〇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一函（见前），则"初五日"，应为"七月"，当一九〇二年八月八日。

学　变

（一九〇二年）

汉晋间，学术则五变：

董仲舒以阴阳定法令，垂则博士，教皇也[1]。使学者人人碎义逃难，苟得利禄，而不识远略，故杨雄变之以《法言》。《法言》持论至剀易，在诸生间，陖矣。王逸因之为《正部论》，以《法言》杂错无主，然己亦无高论。《正部论》元书已亡，诸书援引，犹见大略。下论亡书准此。顾猥曰：颜渊之箪瓢，则胜庆封之玉杯。《艺文类聚》七十三、《御览》七百五十九引。欲以何明，而比拟违其伦类，盖忿悁之亢辞也。

华言积而不足以昭事理，故王充始变其术，曰："夫笔著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也。"作为《论衡》，趣以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孔氏[2]。汉得一

(1)　《检论》作"董仲舒以阴阳定法令，垂则博士，神人大巫也"。

②　《检论》作"不避上圣"。

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未有能逮者也[1]。然善为锋芒摧陷，而无枢要足以持守，斯所谓烦琐哲学者[2]。惟内心之不充颎，故言辩而无继。充称桓君山素丞相之迹，存于《新论》。《定贤篇》。《新论》今亡，则桓、王之事亦绝。或曰：今之汉学，论在名物，不充其文辩，其正虚妄，审乡背，近之矣[3]。

东京之衰[4]，刑赏无章也。儒不可任，而发愤者变之以法家。王符之为《潜夫论》也，仲长统之造《昌言》也，崔寔之述《政论》也，皆辨章功实，而深嫉浮淫靡靡，比于五蠹。又恶夫以宽缓之政，治衰敝之俗。《昌言》最恢广，上视杨雄诸家，牵制儒术，奢阔无施，而三子闳达矣。

法家之教[5]，任贤考功，期于九列皆得其人，人有其第，官有其伍。故姚信《士纬》作焉[6]。乱国学者，盛容服而饰辩说，以贰人主之心。"修誉不诛，害在词主。"二语即阮子《正论》之言，见《意林》四引。故阮武《正论》作焉。自汉季以至吴、魏[7]，法家大行，而钟繇、陈群、诸葛亮之伦，皆以其道见诸行事，治法为章。然阔疏者苟欲修古[8]，亦欲以是快其佚荡，故魏衰而说变。

当魏武任法时，孔融已不平于酒儿，又著论驳肉

---

(1) 《检论》作"亦尟有能逮者也"。

(2) "斯所谓烦琐哲学者"句，《检论》删。

(3) 《检论》作"《新论》在者，其言往往近于仳琐。或曰：宋人小说札记之流，论在名物，其正虚妄，审乡背，近之矣"。

(4) 《检论》作"东京之末"。

(5) 《检论》作"名法之教"。

(6) 《检论》作"官有其位，故刘劭《人物志》、姚信《士纬》作焉"。

(7) 《检论》作"自汉季以至蜀、魏"。

(8) 《检论》作"然阔疏者苟欲务古"。

刑[1]。及魏杜恕，倜傥任意，盖孟轲之徒也。凡法家，以为人性忮驿，难与为善，非制之以礼，威之以刑，不肃。故魏世议者言，凡人天性多不善，不当待以善意，更堕共调中。惟杜恕甚闻之，而云已得此辈，当乘桴蹈仓海，不能自谐在共间也。《魏志·杜恕传》注引杜恕《新书》。恕为《兴性论》，共书不传。推校之，则为主性善者。其作《体论》，自谓疏惰饱食，父忧行丧，在礼多愆，孝声不闻。引见《意林》五。荀卿所谓顺情性而不事礼义积伪者也。

盖自魏武审正名法，钟、陈辅之，操下至严。文、明以降，中州士大夫厌检括苛碎久矣[2]，势激而迁，终以循天性、简小节相上，固其道也[3]。会在易代兴废之间，高朗而

---

(1) “又著论驳肉刑”句，《检论》无。

(2) 《检论》下有一段脚注：“魏武严刑，文帝已不谓善，故黄初五年诏书曰：‘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无所措其手足。吾佩儒者之风，服圣人之遗教，岂可以目翫其辞、行违其诫者哉。广议轻刑以惠百姓。’又谓：‘汉文帝宽仁玄默，务欲以德化民，有贤圣之风。’著《太宗论》，谓‘孝文弘三章之教，恺弟之化，欲使曩时累息之民，得阔步高谈，无危惧之心。若贾谊之才敏，筹画国政，特贤臣之器，管、晏之资，岂若孝文大人之量哉’。其意与武帝绝相反，然卒不副其言，盖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者也。”

(3) 《检论》下增一段：“又自雒邑、许昌之际，士守恭俭，故有位至列卿，盐豉蒜果，不过一箭，日食干饭，以纸补被。魏武虽豪家，后宫食不重肉，衣不锦绣，茵蓐不缘，物无丹漆。（见《魏志·卫觊传》）其臣化之朝府大吏，或挈壶飧以入官寺。（见《魏志·和洽传》）日食酱豍，（桓阶事，见《御览》四百三十一引《桓阶别传》）而有赐子一绢，犹疑以在官妄得者。（胡质事，见《魏志·胡质传》注引《晋阳秋》）夫俭不中度，解说不流，故憔悴思返，而蟋蟀山樞之诗作，魏时诸乐府犹是也。民不堪隘，宕以之奢，奢实生贪，则逾泆而无度制，然后何曾淫于嗜味，石崇果于劫略，夏侯湛侈于起居，悠悠风尘，皆冒货之士，曾、湛犹以孝友礼法称也。故曰：窃鉤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侯之门，仁义存。絜士知不可矫以廉贞，由是屏弃功利，殚残圣法，以镌饕夫。”下接“夫会在易代兴废之间”。

不降志者，皆阳狂远人。礼法浸微，则持论又变其始。嵇康、阮籍之伦，极于非尧、舜，薄汤、武。载其厌世，至导引求神仙，而皆崇法老、庄，玄言自此作矣。魏晋间言神仙者①，皆出于厌世观念，故多借老、庄抒其愤激。独葛洪笃信丹药而深疾老、庄，恶放弃礼法者如仇雠。观《抱朴》外篇《疾谬》、《诘鲍》，其大旨在是矣。盖吴士未遭禅让，无所忿恚，故论多守文，及其惑于仙道，根诸天性，亦视愤世长往者为甚也。

凡此五变②，各从其世。云起海水，一东一西，一南

---

① 《检论》下面脚注改动较大，作："魏晋间言神仙者，皆由厌薄人间，与屈平《远游》同指，故必借老、庄抒其愤激，独葛洪笃信丹药，深疾老、庄，其后陶弘景亦务服饵，而有夷甫谈空之诮，则知老、庄与神仙绝殊。魏、晋人本以老、庄为宗神仙，则其所假托耳。汉世方士，虽亦间托老、庄，如张衡、张鲁所为者，此则巫道惑人，又与神仙有异矣。大抵今之道士，本于五斗米道，其始亦托墨翟，要与导引致寿、白日冲天之说尙殊。葛洪《抱朴》内篇言丹药，外篇重儒术，如《疾谬》、《诘鲍》诸篇，大旨与魏、晋人绝异，盖吴士未遭禅让，无所感激，故论多守文，其惑于仙道，则洪之天性有然，与愤世长往者异趣矣。"

② "凡此五变"前，《检论》增正文一段："诸言形名者，亦一二傅丽道家，(《魏志·锺会传》，会死后，于会家得书二十篇，名曰《道论》，而实刑名家也。其文似会。)裴頠《崇有》似名法，管辂论五行鬼神之情多发自然，似阴阳家。(汉以后但有数术、方技之书，虽仲舒、翼奉辈，技亦如此而已。未能备九流称阴阳家也，独管辂简核清要，与诸家有异。)鲍生好老、庄，以为儒称天生烝民，而树之君，岂其皇天谆谆命之，隶属役御，由乎争强弱而校智愚，彼苍天果无事也。古者无君，胜于今世，君臣既立，变化遂滋，养游手之人，长侵割之患，虽有茅茨土阶，杂囊为帷，俭以率物，以为美谈。所谓盗跖分财，取少为让也。或难以为贼杀并兼起于自然，无主将乱。曰：夫民身无在公之役，家无输调之费，内足衣食之用，外无势利之争，操杖攻劫，非人情也。且细民之争，不过小小匹夫，校力亦何所至，势不能以合徒众，威不足以驱异人。孰与王赫斯怒，陈师鞠旅，推无仇之民，攻无罪之国，僵尸万计，流血丹野。无道之君，无世不有，肆其虐乱，天下无邦，忠良见害于内，黎民暴骨于外，岂徒小小争夺之患邪？借使桀、纣并为匹夫，性虽凶奢，安得穷其骄淫，屠割天下也。(鲍生说，见《抱朴子·诘鲍篇》)此其说虽抗如嵇康，固不敢道近，知圣人之所忧患矣。当是时，辩智闳达，浸淫反于九流，用学不师授，而其时又好笔札琦辞，故其业中绝，精絜之士，辐凑于桑门，以通幽隐，自此始也。"

一北，触高冈、象林木而化。初世雄逸，化成于草昧，而最下矣。然著书莫易以杂说搀比诸家。故季汉而降，其流不绝，汉时周生烈已为«要论»，其后蒋济作«万机论»，谯周作«法训»，顾谭作«新语»，陆景作«典语»，杜夷作«幽求新书»，杨泉作«物理论»，秦菁、唐滂之徒，皆有论著。或称杂家，或缘儒、老，上者稍见行事兴坏[1]，其次乃以华言相耀，惟荀悦、徐干为愈，«申鉴»湓湓，怀宝自珍，«中论»朴质理达矣。殷基曰："质胜文，石建；文胜质，蔡邕；文质彬彬，徐干庶几也[2]"。

【说明】 本文录自«訄书»重印本。一九一〇年，章氏手订«訄书»，本文有较大增改。一九一四年，«訄书»改为«检论»，后半篇又有改动。今将«检论»修改情况，校注说明。

---

1) "兴坏"二字，«检论»无。

(2) «检论»后有附录«黄巾道士缘起说»一篇。

订　孔

（一九〇二年）

远藤隆吉曰：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也。夫差第韶、武，制为邦者四代，非守旧也。处于人表，至岩高，后生自以瞻望弗及，神葆其言，革一义，若有刑戮，则守旧自此始。故更八十世而无进取者，咎亡于孔氏。祸本成，其胙尽矣。远藤氏：«支那哲学史»。

章炳麟曰：凡说人事，固不当以禄胙应塞，惟孔氏闻望之过情有故。曰：六艺者，道、墨所周闻，故墨子称«诗»、«书»、«春秋»多太史中秘书。女商事魏君也，衡说之以«诗»、«书»、«礼»、«乐»，从说之以«金版»、«六弢»。«金版»、«六弢»，道家大公书也，故知女商为道家。异时老、墨诸公，不降志于删定六艺，而孔氏擅其威。遭焚散复出，则关轴自持于孔氏，诸子却走，职矣。«论语»者晻昧，«三朝记»与诸告饬、通论，多自触击也。下比孟轲，博习故事则贤，而知德少歉矣。荀卿以积伪俟化治身，以隆礼合群治天下。不过三代，以绝殊瑰，不贰后王，以綦文理。百物以礼穿

敹，故科条皆务进取而无自戾。《荀子·王制》上言"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下言"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色则凡非旧文者举息，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夫是之谓复古"。二义亦非自反。雅声旧文旧器，三代所用，人间习识。若有用五帝之音乐服器于今以为新异者，则必毁废。故倞注曰："复三代故事，则是复古不必远举也。"其正名也，世方诸仞识论之名学，而以为在琐格拉底、亚历斯大德间。桑木严翼说。由斯道也，虽百里而民献比肩可也，其视孔氏，长幼断可识矣。

夫孟、荀道术皆踊绝孔氏，惟才美弗能与等比，故终身无鲁相之政，三千之化。才与道术，本各异出，而流俗多视是崇堕之。近世王守仁之名其学，亦席功伐已。曾国藩至微末，以横行为戎首，故士大夫信任其言，贵于符节章玺。况于孔氏，尚有踊者。孟轲则踬矣。虽荀卿却走，亦职也。荀卿学过孔子，尚称颂以为本师，此则如释迦初教，本近灰灭，及马鸣、龙树，特弘大乘之风，而犹以释迦为本师也。

夫自东周之季，以至禹，《连山》息，《汩作》废，《九共》绝，墨子支之，只以自陨。老聃丧其征藏，而法守亡，五曹无施。惟荀卿奄于先师，不用。名辩坏，故言淆，进取失，故业堕，则其虚誉夺实以至是也。虽然，孔氏，古良史也，辅以丘明而次《春秋》，料比百家，若旋机玉斗矣。谈、迁嗣之，后有《七略》。孔子死，名实足以伉者，汉之刘歆。

白河次郎曰：从横家持君主政体，所谓压制主义也；老庄派持民主政体，所谓自由主义也。孔氏旁皇二者间，以合意干系为名，以权力干系为实，此儒术所以能为奸雄利器，使百姓日用而不知，则又不如从横

家明言压制也。案所谓旁皇二者间者，本老氏之术，儒者效之，犹不若范蠡、张良为甚。庄周则于《马蹄》、《胠箧》诸论，特发老氏之覆。老、庄之为一家，亦犹输、墨皆为艺士，其攻守则正相反，二子亦不可并论也。故今不以利器之说归曲孔氏。余见《儒道篇》。

【说明】 本文录自《訄书》重印本。一九一〇年，章氏手改《訄书》，把“孔氏”都改作“孔子”。重印本后面几句，“虽然，孔氏古良史也”，还只把孔丘、左丘明、司马迁、刘歆等写在一起。而手改本却增加了一大段，说是：“自老聃写书征藏以诒孔子，然后竹帛下庶人，六籍既定，诸书复稍稍出金匮石室间，民以昭苏，不为徒役，九流自此作，世卿自此堕，不曰贤于尧、舜，岂可得哉，校之名实，孔子古良史也。”最后还在“名实足以伉者，汉之刘歆”下加上：“微孔子则学皆在官，史乘亦绝，民不知古，乃无定臬”一段。和过去的“订孔”不一致了。

一九一四年，章氏手定《章氏丛书》，把《訄书》改为《检论》，把《订孔》析为上、下，说什么“圣人之道，罩笼群有”，孔丘的“洋洋美德乎，诚非孟、荀之所逮闻也”。革命时期的《订孔》，已落在他的视野之外了。

今据《訄书》重印本录出，而将《检论》的《订孔》上、下篇辑附于后。

附：订　孔上

日本有远藤隆吉者，自以为习汉事。其言曰：孔子出于支那，则支那之祸本也。夫差第韶、武，制为邦者四代，

非一意循旧也。以其卓踩过人,后生自以瞻望弗及,重神有言,革一义,若有刑戮,则一意循旧自此始。故更八十世而无进取者,咎亡于孔氏。祸本成,其胙尽矣。略举远藤氏:《支那哲学史》。

章炳麟曰:一意循旧者,汉世博士有之,魏晋以后亡是也。追惟仲尼闻望之隆,则在六籍。六籍者,道、墨所周闻,故墨子称《诗》、《书》、《春秋》多太史中秘书,而老聃为守藏史,得其本株。异时倚相、苌叔诸公,不降志于删定六艺,墨翟虽博闻,务在神道珍秘,而弗肯宣继志述事。缵老之绩而布彰六籍,令人人知前世废兴,中夏所以创业垂统者,孔氏也。遭焚散复出,则关轴自持于孔氏,诸子却走,职矣。且古者世禄,子就父学为畴官,后世虽已变更,九流犹称家。孟轲言法家拂士,荀卿称家言邪学,百家无所窺,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其遗迹也。宦于大夫,谓之宦御事师,《曲礼》,宦学事师,学亦作御。言仕者又与学同。《说文》:仕,学也。明不仕则无所受书。《周官》宾兴万民,以礼、乐、射、御、书、数,六籍不与焉。礼乐亦士庶常行者耳,必无《周官》之典。尚犹局于乡遂,王畿方百万里,被教者六分一耳。及管子制五官技能,为《诗》、《易》、《春秋》者,予之一马之田,一金之衣,《山权数》。甿庶之识故事者,若此其寡也。管子虽历学不徧九服,又令细民以是干小禄、致末秩,其学蕞陋,长见笑于大方之家。自老聃写书征藏,以诒孔氏,然后竹帛下庶人,六籍既定,诸书复稍稍出金匮石室间。民以昭苏,不为徒役,九流自此作,世卿自此堕,朝命不擅威于肉食,国史不聚歼于故府。故直诸

夏覆亡，虽无与立，而必有与毙也。不曰贤于尧、舜，岂可得哉！

夫神化之道，与时宜之故，五帝不同礼，三王不沿乐，布六籍者，要以识前事，非谓旧章可永循也。汉初古文，既不远布，而仲尼名实已高岩矣，诸儒睹秦余敝法，欲有更易，持之未有其故，由是破瓴六籍，定以己意，参之天官、历象、五行、神仙诸家，一切假名孔氏，以为魁柄，则六籍为巫书。哀、平之间，《周官》、《左氏》始兴，神道渐褫，更二百年而得黄初。后王所以更制者，未尝不随时经变，何乃无进取哉？且旧章诚不可与永守，政不骤革，斟酌鄘今，未有不借资于史。先汉之史则谁乎？其惟姬周旧典见于六籍者。故虽言通经致用，未害也。迁、固承流，而继事者相次十有余家，法契之变，善败之数，则多矣。犹言通经致用，则不与知六籍本意。

章炳麟曰：仲尼，良史也，辅以丘明而次《春秋》，料比百家，若旋机玉斗矣。谈、迁嗣之，后有《七略》。孔子殁，名实足以抗者，汉之刘歆。书布天下，功由仲尼，其后独有刘歆而已，微孔子，则学皆在官，民不知古，乃无定臬。然自秦皇以后，书复不布。汉兴，虽除挟书之禁，建元以还，百家尽黜，民间唯有五经。《论语》犹非师授不能得，自余竟无传者。东平王求《史记》于汉廷，桓谭假庄子于班嗣，明其得书之难也。向、歆理校雠之事，书既杀青，复可移写，而书贾亦赁鬻焉。故后汉之初，王充游雒阳，书肆已见有卖书者。其后邠卿章句之儒，而见《周官》；康成草莱之氓，而窥《史记》：则书之传者广矣。至梁时，阮孝绪以处士撰《七录》，是为天禄、石渠之守移于民间也。然以钞

撮重烦，犹多窒滞。及冯道为镂版之术，而负贩益多矣。《宋史·邢昺传》，景德二年，上问昺经板几何？昺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则他书可以例推。由此观之，冯道功亦不细。学之高下，行之衺正，非此所论也。

订　孔下

往时定儒学，莫若孟、荀。私以《论语》晻昧，《三朝记》与诸告饬，总纰经记，辞义缺如也。下比孟轲，博习故事则贤，而辩察少歉矣。荀卿以积伪俟化治身，以隆礼县群众，道不过三代，以绝殊瑰，法不贰后王，以綦文理，始终以礼穿敹，故科条皆浞然，无自戾者。其正名也，与墨子相扶持，有所言缘，先于西来桑门之书。由斯道也，虽百里而民献比肩可也。其视孔子，长幼断可识矣。

夫孟、荀道术皆踊绝孔氏，惟才美弗能与等比，故终身无鲁相之政，三千之化。才与道术本异出，而流俗多视是崇堕之。故仲尼名独尊，其道术固未逮也。怀是者十余年，中间颇论九流旧闻。上观庄生为《齐物论释》，又以闲暇质定老聃、韩非、惠施诸书，方事改革，负緤东海，独抱持《春秋》。窥识前圣作史本意，卒未知其道术崇庳也。以炎、黄、礜、尧之灵，幸而时济，光复旧物，间气相搰，逼于舆台，去食七日，不起于牀，䀣然叹曰：余其未知羑里、匡人之事。夫不学《春秋》，则不能解辫发，削左衽；不学《易》，则终身不能无大过，而悔吝随之。始玩爻象，重籀

《论语》诸书，髴然若有寤者。圣人之道，罩笼群有，不亟以辩智为贤，上观《周易》，物类相召，埶数相生，足以彰往察来。审度圣人之所忧患，与其《卦》、《序》所次时物变迁，上考皇世而不缪，百世以俟后王群盗而不惑，洋洋美德乎，诚非孟、荀之所逮闻也。诸所陈说，列于《论语》者，时地异制，人物异训，不以一型锢铸，所谓大道固似不肖也。

人亦有言，西极之圣，守其一术，强聒而不舍，娄遇而不异辞，大秦三哲以之。东极之圣，退藏于密，外虞机以制辞言，从其品物，因变流形，浮屠、老聃、仲尼、庄周以之。虞机虽审，权议虽变，岂直无本要哉。道在一贯，持其枢者忠恕也。躬行莫先而方移以为学，则守文者所不省已。心能推度曰恕，周以察物曰忠，故夫闻一以知十，举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恕之事也。夫彼是之辨，正处正色正味之位，其候度诚未可壹也。守恕者善比类，诚令比类可以偏知者，是絜榘可以审方圆，物情之纷，非若方圆可以量度也。故用榘者困，而务比类者疑。周以察物，举其征符，而辨其骨理者，忠之事也。故疏通知远者恕，文理密察者忠。身观焉，忠也；方不障，恕也。上者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中之方人用法，察迩言也。下者至于原本山川，极命草木，合契比律，审曲面埶，莫不依是。以知忠恕于学，犹鸟有两翮，而车之左右轮，学不兼是，菩沛将蔽之。日中而主爝水沫为谪也，而况于躬行乎？荀卿盖云：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此谓用忠者矣。坐于室而见四海，

处于今而论久远，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里，此谓用恕者矣。夫墨子者，辩以经说，主以天志，行以兼爱尚同，天志尚同之末，以众暴寡，墨子《兼爱》、《天志》诸篇，亦论以众暴寡之非，然既云天志、尚同，设有异天志而殊群众者，不为众之所暴，得乎？物类洮汰，孰自然也。惟尽恕远忠也。荀卿虽解蔽，观其约束，举无以异于墨氏。荀子虽非墨氏，惟其文质异流耳。《墨子·尚同篇》极论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之非，欲令万民上同天子，天子所是必是之，天子所非必非之。荀卿论治，正与相符。体忠恕者，独有庄周《齐物》之篇，恢恑谲怪，道通为一，三子之乐蓬艾，虽唐尧不得更焉。兹盖老聃之所流传，儒道所以不相舛牾，夫何晻昧矣哉。《三朝记》小辨亦言忠恕，《三朝记》，哀公欲学小辨，孔子对以力忠信，云，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内思毕心曰知中，中以应实曰知恕，内恕外度曰知外。此言以忠恕为学，则无所不辨也。周以察物，疑其碎矣。物虽小别，非无会通，内思毕心者，由异而观其同也。其余华泽也。

定 版 籍

（一九〇二年）

章炳麟谓孙文曰：后王视生民之版[1]，与九州地域广轮之数，而衰赋税，大臧则充。古之为差品者，山林之地，九夫为度，九度而当一井，迭为九衰，至于衍沃而止矣。今之大法，自池井海堧有盐而外，露田稻最长，黍稷粱麦各有品也，居宅与树艺之地次之，山及池沼次之，江干沙田次之。以是征税。观于民间而辨其物。桑田者，其利倍稻。梨枣蒲陶橘柚桃李竹漆梧桐及杂树松栎足以给薪者，其利自三。山有植苦荼者，与桑田比，种竹者亦如之，杂莳粮药者为下。粘与文杏，不高冈而有，足以偫宫室械器，其利倍苦荼。椑黟丹木者自四。池沼大者容鱼或数万头，不作劳而其利加于露田十倍。江干沙田宜木绵，其衰如桑。然则定赋者以露田为质，上之而桑荼之地，果漆椠薪之地，桢干之地，至于鱼池，法当数倍稼矣。独居宅为尼訾，穷巷之宅，不当蹊隧者，视露田而弱；当孔道者，

① 《检论》作"清之末，章炳麟谓孙文曰：后之林烝视生民之版"。

鱼池勿如，别为差品。以是率之，赋税所获，视今日孰若？

孙文曰：兼并不塞而言定赋，则治其末已。夫业主与佣耕者之利分，以分利给全赋，不任也。故取于佣耕者，率参而二。古者有言，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夫贫富斗绝者，革命之媒[1]。虽然，工商贫富之不可均，材也。杇人为人黝垩，善画者图其幅帛，其为龙蛇象马草树云气山林海潮爟火星辰人物舟车，变眩异态，于以缘饰墙壁，一也。然或一日所成而直百钱，或一日所成而直赢于万金。挽步辇者，与主海船者，其为人将行，一也。一以为牛马，一以为宗主，是岂可同哉！彼工商废居有巧拙，而欲均贫富者，此天下之大愚也。方土者，自然者也；自然者，非材力。席六幕之余壤，而富斗绝于类丑，故法以均人。后王之法[2]，不躬耕者，无得有露田。场圃池沼，得与厮养比而从事，人十亩而止。露田者，人二十亩而止矣。以一人擅者，畎垄沟洫，非有其壤地也。场圃之所有，杝落树也；池之所有，堤与其所浚水容也；宫室之所有，垣墉栋宇也。以力成者其所有，以天作者其所无，故买鬻者庚偿其劳力而已，非能买其壤地也。夫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故贡彻不设，不劳收受而田自均。

章炳麟曰：善哉，田不均，虽衰定赋税，民不乐其生，

---

① 《检论》作"寇盗之媒"。

② 《检论》作"后之林烝之法"。

终之发难，有帑庤而不足以养民也[1]。昔者余在苏州，过冯桂芬祠堂，人言同治时，桂芬为郡人减赋，功德甚盛。余尝闻苏州围田，吴、越沃野，多称圩田，本由围田，音误作圩。围田多邕遏沼泽为之，今则遍以称水田。皆在世族，大者连阡陌，农夫占田寡，而为佣耕。其收租税，亩钱三千以上。有阙乏，即束缚诣吏，榜笞与逋赋等。中夏兼并最少，惟苏州世族尚有之。桂芬特为世族减赋，顾勿为农人减租，其泽格矣。荀悦言汉世田制，官收百一之税，而民输豪强大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以惠不下通，而威福分于豪民。今不正其本，务言复除，适足以资富强也。桂芬于苏州，仕宦为达，诸世族皆姻娅，通门籍，编户百万，号呼之声，未彻于耳，将厚薄殊邪？其专立祠堂，宦学者为请之，农夫入其庭庑，而后知报功也。

均　田　法[2]

凡土，民有者无得旷。其非岁月所能就者，程以三年。岁输其税什二，视其物色而衰征之。

凡露田，不亲耕者使鬻之，不雠者鬻诸有司。诸园圃，有薪木而受之祖、父者，虽不亲邕，得有其园圃薪木，

---

(1) “终之发难”，《检论》删去，下作“虽有帑庤而不足以养民也”。并增“虽然，中国所包方域，夷夏尽有之，塞下不可虚，其地广莫，量以缅索而不计步，此不能无业主，内及腹中膏腴之壤，有人耕二亩者矣。是故宽乡宜代田，陿乡宜区田，独宽陿适者可均田耳。辅自然者重改作。今欲惠佣耕，宜稍稍定租法”一段。

(2) “均田法”，《检论》删去。

无得更买。池沼如露田法。凡寡妻女子当户者，能耕，耕也；不能耕，即鬻。露田无得佣人。

凡草莱，初辟而为露田园池者，多连阡陌，虽不躬耕，得特专利五十年。斯尽而鬻之，程以十年。

凡诸坑冶，非躬能开浚硩采者，其多寡阔陿，得恣有之，不以露田园池为比。

【说明】 本文原为《訄书》重印本中之第四十二篇，原刊本未曾收载。

查上海图书馆藏有本文一九〇〇年初稿，原名《定赋》；一九〇二年，章氏与孙中山"定交"后，改成此篇。

致陶亚魂、柳亚庐书

（一九〇三年五月）

陶、柳二子鉴[1]：简阅传文，知二子昔日，曾以纪孔、保皇为职志。人生少壮，苦不相若，而同病者亦相怜也。鄙人自十四五时，览蒋氏《东华录》，已有逐满之志。丁酉入时务报馆，闻孙逸仙亦倡是说，窃幸吾道不孤，而尚不能不迷于对山之妄语。《訄书》中《客帝》诸篇，即吾往岁之覆辙也。今将是书呈览。二子观之，当知生人智识程度本不相远，初进化时，未有不经纪孔、保皇二关者，以此互印何如？章炳麟白。

【说明】 此书撰于一九〇三年五月（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发表在《复报》第五号（中国开国纪元四千六百四年——一九〇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版），署名“西狩”，原题《致□□二子书》。章氏逝世后，柳亚子辑《太炎先生遗札》，刊于《制言》第六十一期（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版），题称《致陶亚魂、柳亚庐书》，则“□□二子”，即系陶、柳二人。

---

(1) 《复报》原作“□□二子鉴”。

革命军序

（一九〇三年五月）

蜀邹容为《革命军》方二万言，示余曰：欲以立懦夫，定民志，故辞多恣肆，无所回避，然得无恶其不文耶？余曰：凡事之败，在有其唱者而莫与为和，其攻击者且千百辈，故仇敌之空言，足以堕吾实事。

夫中国吞噬于逆胡，已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然自乾隆以往，尚有吕留良、曾静、齐周华等持正议以振聋俗，自尔遂寂泊无所闻。吾观洪氏之举义师，起而与为敌者，曾、李则柔煦小人，左宗棠喜功名、乐战事，徒欲为人策使，顾勿问其韪非枉直，斯固无足论者。乃如罗、彭、邵、刘之伦，皆笃行有道士也。其所操持，不洛、闽而金溪、余姚，衡阳之《黄书》，日在几阁，孝弟之行，华戎之辨，仇国之痛，作乱犯上之戒，宜一切习闻之。卒其行事，乃相缪戾如彼！材者张其角牙以覆宗国，其次即以身家殉满洲，乐文采者，则相与鼓吹之。无他，悖德逆伦，并为一谈，牢不可破。

故虽有衡阳之书，而视之若无见也。然则洪氏之败，不尽由计画失所，正以空言足与为难耳！

今者风俗臭味少变更矣，然其痛心疾首，恳恳必以逐满为职志者，虑不数人。数人者，文墨议论，又往往务为温藉，不欲以跳踉搏跃言之，虽余亦不免是也。

嗟乎！世皆嚚昧而不知话言，主文讽切，勿为动容，不震以雷霆之声，其能化者几何？异时义师再举，其必堕于众口之不俚，既可知矣。今容为是书，壹以叫咷恣言，发其惭恚，虽嚚昧若罗、彭诸子，诵之犹当流汗祇悔，以是为义师先声，庶几民无异志，而材士亦知所返乎！若夫屠沽负贩之徒，利其径直易知而能恢发智识，则其所化远矣。藉非不文，何以致是也！抑吾闻之，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容之署斯名，何哉？谅以其所规画，不仅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

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1]四月，余杭章炳麟序。

【说明】 邹容：《革命军》一书，于一九〇三年五月出版，章氏曾为撰《序》。是年六月九日（五月十四日），《苏报》刊《新书介绍》一则，题：《读革命军》；次日（六月十日），补刊章氏序文。二十天后，即发生“苏报案”。

---

① 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即公元一九〇三年。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一九〇三年五月）

长素足下：读《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谓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援引今古，洒洒万言。呜呼长素，何乐而为是耶？热中于复辟以后之赐环，而先为是龃龉不了之语，以耸东胡群兽之听，冀万一可以解免，非致书商人，致书于满人也。夫以一时之富贵，冒万亿不韪而不辞，舞词弄札，眩惑天下，使贱儒元恶为之则已矣。尊称圣人，自谓教主，而犹为是妄言，在己则脂韦突梯以佞满人已耳；而天下之受其蛊惑者，乃较诸出于贱儒元恶之口为尤甚。吾可无一言以是正之乎？

谨案长素大旨，不论种族异同，惟计情伪得失以立说。虽然，民族主义，自大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乃始发达，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长素亦知种族之必不可破，于是依违迁就以成其说，援引《匈奴列传》，以为上系淳维，出自禹后。夫满洲种族，是曰东胡，西方谓之通古斯种，固与匈奴殊类。虽以匈奴言之，彼既

大去华夏，永滞不毛，言语政教，饮食居处，一切自异于域内，犹得谓之同种也耶？智果自别为辅氏，管氏变族为阴家，名号不同，谱牒自异。况于戕虐祖国，职为寇仇，而犹傅以兄弟急难之义，示以周亲肺腑之恩，巨缪极戾，莫此为甚。近世种族之辨，以历史民族为界，不以天然民族为界。借言天然，则禘祫海藻，享祧猿蜼，六洲之氓，五色之种，谁非出于一本，而何必为是聒聒者耶？

长素又曰：氐、羌、鲜卑等族，以至元魏所改九十六姓，大江以南，骆越、闽、广，今皆与中夏相杂，恐无从检阅姓谱而攘除之。不知骆越、闽、广，皆归化汉人而非陵制汉人者也。五胡代北，始尝宰制中华，逮乎隋、唐统一，汉族自主，则亦箸土傅籍，同为编氓，未尝自别一族，以与汉人相抗，是则同于醇化而已。日本定法，夙有蕃别，欧、美近制，亦许归化。此皆以己族为主人，而使彼受吾统治，故一切可无异视。今彼满洲者，其为归化汉人乎？其为陵制汉人乎？堂子妖神，非郊丘之教；辮发璎珞，非弁冕之服；清书国语，非斯、邈之文。徒以尊事孔子，奉行儒术，崇饰观听，斯乃不得已而为之，而即以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若言同种，则非使满人为汉种，乃适使汉人为满种也。

长素固言大同公理非今日即可全行。然则今日固为民族主义之时代，而可混淆满、汉以同熏莸于一器哉？时方据乱而言大平，何自悖其三世之说也？

长素二说，自知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得已复援引《春秋》，谓其始外吴、楚，终则等视。不悟荆、扬二域，

《禹贡》既列于九州，国土种类，素非异实。徒以王化陵夷，自守千里，远方隔阂，沦为要荒。而文化语言，无大殊绝，《世本》谱系，犹在史官，一日自通于上国，则自复其故名，岂满洲之可与共论者乎？

至谓衣服辫发，满人已化而同之，虽复改为宋、明之服，反觉不安。抑不知此辮发胡服者，将强迫以成之耶？将安之若性也？禹入裸国，被发文身，墨子入楚，锦衣吹笙，非乐而为此也。强迫既久，习与性成，斯固不足以定是非者。吾闻洪、杨之世，人皆蓄发，不及十年，而曾、左之师摧陷洪氏，复从髡剃。是时朋侪相对，但觉纤首锐颠，形状𨶒异。然则蓄发之久，则以蓄发为安；辮发之久，则以辮发为安。向使满洲制服，涅齿以黛，穿鼻以金，刺体以龙，涂面以垩，恢诡殊形，有若魑魅，行之二百有六十年，而人亦安之无所怪矣。不问其是非然否，而惟问其所安，则所谓祖宗成法不可轻变者，长素亦何以驳之乎？野蛮人有自去其板齿，而反讥有齿者为犬类，长素之说，得无近于是耶？

种种缪戾，由其高官厚禄之性素已养成，由是引犬羊为同种，奉猳尾为鸿宝，向之崇拜《公羊》，诵法《繁露》，以为一字一句皆神圣不可侵犯者，今则并其所谓复九世之仇而亦议之。其言曰：扬州十日之事，与白起坑赵、项羽坑秦无异。岂不曰秦、赵之裔未有报白、项之裔者，则满洲亦当同例也。岂知秦、赵、白、项，本非殊种，一旦战胜而击坑之者，出于白、项二人之指麾，非出于士卒全部之合意。若满洲者，固人人欲尽汉种而屠戮之，其非为豫酋

一人之志可知也。是故秦、赵之仇白、项，不过仇其一人；汉族之仇满洲，则当仇其全部。且今之握图籍、操政柄者，岂犹是白、项之胤胄乎？三后之姓，降为舆台，宗支荒忽，莫可究诘，虽欲报复，乌从而报复之？至于满洲，则不必问其宗支，而全部自在也；不必稽其姓名，而政府自在也。此则枕戈剸刃之事，秦、赵已不能施于白、项，而汉族犹可施于满洲，章章明矣。明知其可报复，犹复饰为瘖聋，甘与同壤，受其豢养，供其驱使，宁使汉族无自立之日，而必为满洲谋其帝王万世祈天永命之计，何长素之无人心一至于是也！

长素又曰：所谓奴隶者，若波兰之属于俄，印度之属于英，南洋之属于荷，吕宋之属于西班牙，人民但供租税，绝无政权，是则不能不愤求自立耳。若国朝之制，满、汉平等，汉人有才者，匹夫可以为宰相。自同治年来，沈、李、翁、孙，迭相柄政，曾、左及李，倚为外相，恭、醇二邸，但拱手待成耳。即今除荣禄、庆邸外，何一非汉人为政。若夫政治不善，则全由汉、唐、宋、明之旧，而非满洲特制也。然且举明世廷杖、镇盗、大户加税、开矿之酷政而尽除之。圣祖立一条鞭法，纳丁于地，永复差徭，此唐、虞至明之所无，大地万国所未有。他日移变，吾四万万人必有政权自由，可不待革命而得之也。夫所谓奴隶者，岂徒以形式言耶？曾、左诸将，倚畀虽重，位在藩镇，蕞尔弹丸，未参内政。且福康安一破台湾，而遂有贝子郡王之赏；曾、左反噬洪氏，挈大圭九鼎以付满洲，爵不过通侯，位不过虚名之内阁。曾氏在日，犹必谄事官文，始得保全首

领。较其轻重，计其利害，岂可同日而道！近世军机首领，必在宗藩。夫大君无为而百度自治，为首领者，亦以众员供其策使。彼恭、醇二邸之仰成，而沈、李、翁、孙之有事，乃适见此为奴隶而彼为主人也。阶位虽高，犹之阉宦仆竖而赐爵仪同者，彼固仰承风旨云尔，曷能独行其意哉！一条鞭法，名为永不加赋，而耗羡平余，犹在正供之外。徭役既免，民无恶声，而舟车工匠，遇事未尝获免。彼既以南米供给驻防，亦知民志不怡，而不得不借美名以媚悦之。玄烨、弘历，数次南巡，强勒报效，数若恒沙。己居尧、舜、汤、文之美名，而使佞幸小人间接以行其聚敛，其酷有甚于加税开矿者。观唐甄之《潜书》与袁枚之《致黄廷桂书》，则可知矣！庄生有云：狙公赋芧，朝三暮四，众狙皆怒，朝四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此正满洲行政之实相也。况于廷杖虽除，诗案史祸，较诸廷杖，毒螫百倍。康熙以来，名世之狱，嗣庭之狱，景祺之狱，周华之狱，中藻之狱，锡侯之狱，务以摧折汉人，使之噤不发语。虽李绂、孙嘉淦之无过，犹一切被赭贯木以挫辱之。至于近世，戊戌之变，长素所身受，而犹谓满洲政治为大地万国所未有，呜呼！斯诚大地万国所未有矣！李陵有言，子为汉臣，安得不云尔乎？

夫长素所以不认奴隶，力主立宪以摧革命之萌芽者，彼固终日屈心忍志以处奴隶之地者尔。欲言立宪，不得不以皇帝为圣明，举其诏旨，有云“一夫失职，自以为罪”者，而谓亟亟欲开议院，使国民咸操选举之权以公天下，其仁如天，至公如地，视天位如敝屣，然后可以言皇帝复辟

而宪政必无不行之虑。则吾向者为《正仇满论》，既驳之矣。盖自乙未以后，彼圣主所长虑却顾，坐席不暖者，独太后之废置我耳。殷忧内结，智计外发，知非变法，无以交通外人得其欢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欢心，无以挟持重势，而排沮太后之权力。载湉小丑，未辨菽麦，铤而走险，固不为满洲全部计。长素乘之，投间抵隙，其言获用。故戊戌百日之政，足以书于盘盂，勒于钟鼎，其迹则公，而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曩令制度未定，太后夭殂，南面听治，知天下之莫予毒，则所谓新政者，亦任其迁延堕坏而已。非直堕坏，长素所谓拿破仑第三新为民主，力行利民，已而夜娶伏兵，擒议员百数及知名士千数尽置于狱者，又将见诸今日。何也？满、汉两族，固莫能两大也。

今以满洲五百万人，临制汉族四万万人而有余者，独以腐败之成法愚弄之、锢塞之耳！使汉人一日开通，则满人固不能娶处于域内，如奥之抚匈牙利、土之御东罗马也。人情谁不爱其种类而怀其利禄，夫所谓圣明之主者，亦非远于人情者也，果能敝屣其黄屋而弃捐所有以利汉人耶？藉曰其出于至公，非有满、汉畛域之见，然而新法犹不能行也。何者？满人虽顽钝无计，而其怵惕于汉人，知不可以重器假之，亦人人有是心矣。顽钝愈甚，团体愈结，五百万人同德戮力，如生番之有社寮。是故汉人无民权，而满洲有民权，且有贵族之权者也。虽无太后，而掣肘者什伯于太后；虽无荣禄，而掣肘者什伯于荣禄。今夫建立一政，登用一人，而肺腑昵近之地，群相欢譊，朋疑众难，杂沓而至，自非雄杰独断如俄之大彼得者，固弗能胜

是也。共、驩四子，于尧皆葭莩姻娅也，靖言庸回，而尧亦不得不任用之。今其所谓圣明之主者，其聪明文思，果有以愈于尧耶？其雄杰独断，果有以侪于俄之大彼得者耶？往者戊戌变政，去五寺三巡抚如拉枯，独驻防则不敢撤。彼圣主之力与满洲全部之力，果孰优孰绌也？由是言之，彼其为私，则不欲变法矣；彼其为公，则亦不能变法矣。长素徒以诏旨美谈视为实事，以此诳耀天下。独不读刘知几《载文》之篇乎？谓魏、晋以后，诏敕皆责成群下，藻饰既工，事无不可，故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此足以知戊戌行事之虚实矣。

且所谓立宪者，固将有上下两院，而下院议定之案，上院犹得以可否之。今上院之法定议员，谁为之耶？其曰皇族，则亲王、贝子是已；其曰贵族，则八家与内外蒙古是已；其曰高僧，则卫藏之达赖、班禅是已。是数者，皆汉族之所无而异种之所特有，是议权仍不在汉人也。所谓满、汉平等者，必如奥、匈二国并建政府而统治于一皇，为双立君主制而后可。使东三省尚在，而满洲大长得以兼统汉人，吾民犹勉自抑制以事之。今者满洲故土既攘夺于俄人，失地当诛，并不认为满洲君主，而何双立君主之有？夫戴此失地之天囚以为汉族之元首，是何异取罪人于囹圄而奉之为大君也！乃曰：朋友之交犹贵久要不忘，安有君臣之际，受人之知遇，因人之危难，中道变弃，乃反戈倒攻者！诚如是，则载湉者，固长素之私友而汉族之公仇也。况满洲全部之蠢如鹿豕者，而可以不革者哉？

虽然，如右所言，大抵关于种类，而于情伪得失未暇

论也，则将复陈斯旨，为吾汉族筹之可乎？长素以为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则立宪可不以兵刃得之耶？既知英、奥、德、意诸国，数经民变，始得自由议政之权。民变者，其徒以口舌变乎？抑将以长戟劲弩飞丸发旝变也？近观日本，立宪之始，虽徒以口舌成之，而攘夷覆幕之师在其前矣。使前日无此血战，则后之立宪亦不能成。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为立宪所无可幸免者。长素亦知其无可幸免，于是迁就其说以自文，谓以君权变法，则欧、美之政术器艺可数年而尽举之。夫如是，则固君权专制也，非立宪也。阔普通武之请立宪，天下尽笑其愚，岂有立宪而可上书奏请者？立宪可请，则革命亦可请乎？以一人之诏旨立宪，宪其所宪，非大地万国所谓宪也。长素虽与载湉久处，然而人心之不相知，犹挃一体而他体不知其痛也。载湉亟言立宪，而长素信其必能立宪，然则今有一人执长素而告之曰：我当酿四大海水以为酒，长素亦信其必能酿四大海水以为酒乎？夫事之成否，不独视其志愿，亦视其才略何如。长素之皇帝圣仁英武如彼，而何以刚毅能挟后力以尼新法，荣禄能造谣诼以耸人心，各督抚累经严旨皆观望而不辨，甚至章京受戮，己亦幽废于瀛台也？君人者，善恶自专，其威大矣，虽以文母之抑制，佞人之谗嗾，而秦始皇之在位，能取太后、嫪毐、不韦而踣覆之。今载湉何以不能也？幽废之时，犹曰爪牙不具。乃至庚子西幸，日在道涂，已脱幽居之轭，尚不能转移俄顷，以一身逃窜于南方，与太后分地而处，其孱弱少用如此。是则仁柔寡断之主，汉献、唐昭

之俦耳！太史公曰："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是故志士之任天下者，本无实权，不得以成败论之，而皇帝则不得不以成败论之。何者？有实权而不能用，则不得窃皇帝之虚名也。夫一身之不能保而欲其与天下共忧，督抚之不能制而欲其使万姓守法，庸有几乎！

事既无可奈何矣，其明效大验已众箸于天下矣。长素则为之解曰：幽居而不失位，西幸而不被弑，是有天命存焉。王者不死，可以为他日必能立宪之征。呜呼！王莽渐台之语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今之载湉，何幸有长素以代为王莽也。必若图录有征，符命可信，则吾亦尝略读纬书矣。纬书尙繁，《中庸》一篇固为赞圣之颂，往时魏源、宋翔凤辈，皆尝附之三统三世，谓可以前知未来，虽长素亦或竺信者也。然而《中庸》以"天命"始，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终。"天命"者，满洲建元之始也；"上天之载"者，载湉为满洲末造之亡君也。此则建夷之运，终于光绪；奴儿哈赤之祚，尽于二百八十八年。语虽无稽，其彰明较箸，不犹愈于长素之谈"天命"者乎？

要之，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今以革命比之立宪，革命犹易，立宪犹难。何者？立宪之举，自上言之，则不独专恃一人之才略而兼恃万姓之合意；自下言之，则不独专恃万姓之合意而兼恃一人之才略。人我相待，所倚赖者为多。而革命则既有其合意矣，所不敢证明者，其才略耳。然则立宪有二难，而革命独有一难，均之难也，难易相较，则无宁取其少难而差易者矣。

虽然，载湉一人之才略，则天下信其最绌矣。而谓革命党中必无有才略如华盛顿、拿破仑者，吾所不敢必也。虽华盛顿、拿破仑之微时，天下亦岂知有华盛顿、拿破仑者？而长素徒以阿坤鸦度一蹶不振相校。今天下四万万人之材性，长素岂尝为其九品中正而一切检察差第之乎？借曰此魁梧绝特之彦，非中国今日所能有，尧、舜固中国人矣，中国亦望有尧、舜之主出而革命，使本种不亡已耳，何必望其极点如华盛顿、拿破仑者乎？

长素以为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革命以后，必将日寻干戈，偷生不暇，何能变法救民，整顿内治！夫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之民，不可革命而独可立宪，此又何也？岂有立宪之世，一人独圣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蛮者哉？虽然，以此讥长素，则为反唇相稽，校软无已，吾曰不可立宪，长素犹曰不可革命也。则应之曰：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且勿举华、拿二圣，而举明末之李自成。李自成者，迫于饥寒，揭竿而起，固无革命观念，尚非今日广西会党之侪也。然自声势稍增而革命之念起，革命之念起而剿兵救民赈饥济困之事兴。岂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竞争既久，知此事之不可已也。虽然，在李自成之世，则赈饥济困为不可已；在今之世，则合众共和为不可已。是故以赈饥济困结人心者，事成之后，或为枭雄；以合众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后，必为民主。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征之今日，义和团初起时，惟言扶清灭洋，而景廷宾之师，则知扫清

灭洋矣。今日广西会党，则知不必开衅于西人，而先以扑灭满洲、剿除官吏为能事矣。唐才常初起时，深信英人，密约漏情，乃卒为其所卖。今日广西会党，则知已为主体而西人为客体矣。人心进化，孟晋不已。以名号言，以方略言，经一竞争，必有胜于前者。今之广西会党，其成败虽不可知，要之继此而起者，必视广西会党为尤胜，可豫言也。然则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长素以为今之言革命者，或托外人运械，或请外国练军，或与外国立约，或向外国乞师。卒之堂堂大国，谁肯与乱党结盟，可取则取之耳。吾以为今日革命，不能不与外国委蛇，虽极委蛇，犹不能不使外人干涉。此固革命党所已知，而非革命党所未知也。日本之覆幕也，法人尝通情于大将军，欲为代平内乱。大将军之从之与否，此固非覆幕党所能豫知，然以人情自利言之，则从之为多数而不从为少数，幸而不从，是亦覆幕党所不料也。而当其歃血举义之时，固未尝以其必从而少沮。今者人知恢复略有萌芽，而长素何忍以逆料未中之言，沮其方新之气乎？呜呼！生二十世纪难，知种界难，新学发见难，直人心奋厉时难。前世圣哲，或不遇时，今我国民，幸睹精色。哀哀汉种，系此刹那，谁无父母，谁无心肝，何其夭阏之不遗余力，幸同种之为奴隶以必信其言之中也！且运械之事，势不可无，而乞师之举，不必果有。今者西方数省，外稍负海，而内有险阻之形势，可以利用外人而不为外人所干涉

者，亦未尝无其地也。略得数道，为之建立政府，百度维新，庶政具举。彼外人者，亦视势利所趋耳，未成则欲取之，小成则未有不认为与国者，而何必沾沾多虑为乎！

世有谈革命者，知大事之难举，而言割据自立，此固局于一隅，所谓井底之蛙不知东海者，而长素以印度成事戒之。虽然，吾固不主割据，犹有辩护割据之说在，则以割据犹贤于立宪也。夫印度背蒙古之莫卧尔朝，以成各省分立之势，卒为英人蚕食，此长素所引为成鉴者。然使莫卧尔朝不亡，遂能止英人之蚕食耶？当莫卧尔一统时，印度已归于异种矣，为蒙古所有与为英人所有，二者何异？使非各省分立，则前者为蒙古时代，后者为英吉利时代，而印度本种并无此数十年之国权。夫终古不能得国权与暂得国权而复失之，其利害相越，岂不远哉！语曰："不自由，无宁死！"然则暂有自由之一日而明日自刎其喉，犹所愿也，况绵延至于三四十年乎！且以印度情状比之中国，则固有绝异者。长素《论印度亡国书》，谓其文学工艺远过中国，历举书籍见闻以为证。不知热带之地，不忧冻饿，故人多慵惰，物易坏烂，故薄于所有观念，是故婆罗、释迦之教，必见于印度而不见于异地，惟其无所有观念，而视万物为无常，不可执箸故。此社会学家所证明，势无可遁者也。夫薄于所有观念，则国土之得丧，种族之盛衰，固未尝概然于胸中。当释迦出世时，印度诸国已为波斯属州，今观内典，徒举比邻诸王而未见波斯皇帝，若并不知已国之属于波斯者。厥有愤发其所能自树立者，独阿育王一家耳。近世各省分立之举，亦其出于偶

尔而非出于本怀，志既不坚，是故迁延数世，国以沦丧。夫欲自强其国种者，不恃文学工艺，而惟视所有之精神。中国之地势人情，少流散而多执箸，其贤于印度远矣。自甲申沦陷，以至今日，愤愤于腥羶贱种者，何地蔑有！其志坚于印度，其成事亦必胜于印度，此宁待著蔡而知乎！

若夫今之汉人，判涣无群，人自为私，独甚于汉、唐、宋、明之季，是则然矣。抑谁致之而谁迫之耶？吾以为今人虽不尽以逐满为职志，或有其志而不敢讼言于畴人，然其轻视鞑靼以为异种贱族者，此其种性根于二百年之遗传，是固至今未去者也。往者陈名夏、钱谦益辈，以北面降虏，贵至阁部，而未尝建白一言，有所补助，如魏徵之于太宗、范质之于艺祖者。彼固曰异种贱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为立于其朝者，特曰冠貂蝉、袭青紫而已，其存听之，其亡听之。若曰为之驰驱效用而有所补助于其一姓之永存者，非吾之志也。理学诸儒，如熊赐履、魏象枢、陆陇其、朱轼辈，时有献替，而其所因革，未有关于至计者。虽曾、胡、左、李之所为，亦曰建殊勋、博高爵耳！功成而后，于其政治之盛衰，宗稷之安危，未尝有所筹画焉，是并拥护一姓而亦非其志也。其他朝士，入则弹劾权贵，出则搏击豪强，为难能可贵矣；次即束身自好，优游卒岁，以自处于朝隐；而下之贪墨无艺、怯懦忘耻者，所在皆是。三者虽殊科，要其大者不知会计之盈绌，小者不知断狱之多寡，苟得廪禄，以全吾室家妻子，是其普通之术矣。无他，本陈名夏、钱谦益之心以为心者，固二百年而不变也。明之末世，五遗倾覆，一命之士，文学之儒，无不建义旗以抗

仇敌者，下至贩夫乞子，儿童走卒，执志不屈而仰药剚刃以死者，不可胜计也。今者北京之破，民则愿为外国之顺民，官则愿为外国之总办，食其俸禄，资其保护，尽顺天城之中，无不牵羊把茅，甘为贰臣者。若其不事异姓，躬自引决，缙绅之士，殆无一人焉。无他，亦曰异种贱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为立于其朝者，特曰冠貂蝉、袭青紫而已。其为满洲之主则听之，其为欧、美之主则听之，本陈名夏、钱谦益之心以为心者，亦二百年而不变也。然则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非种不锄，良种不滋，败群不除，善群不殖，自非躬执大彗以扫除其故家污俗，而望禹域之自完也，岂可得乎？以上录旧箸《正仇满论》。

夫以种族异同，明白如此，情伪得失，彰较如彼，而长素犹偷言立宪而力排革命者，宁智不足、识不逮耶？吾观长素二十年中，变易多矣。始孙文倡义于广州，长素尝遣陈千秋、林奎往，密与通情。及建设保国会，亦言保中国、不保大清，斯固志在革命者。未几，瞑瞒于富贵利禄，而欲与素志调和，于是戊戌柄政，始有变法之议。事败亡命，作衣带诏，立保皇会，以结人心。然庚子汉口之役，犹以借遵皇权，密约唐才常等，卒为张之洞所发。当是时，素志尚在，未尽澌灭也。唐氏既亡，保皇会亦渐溃散。长素自知革命之不成，则又瞑瞒于富贵利禄，而今之得此，非若畴昔之易，于是宣布是书。其志岂果在保皇立宪耶？亦使满人闻之，而曰长素固忠贞不贰，竭力致死以保我满

洲者，而向之所传，借遵皇权保中国不保大清诸语，是皆人之所以诬长素者，而非长素故有是言也。荣禄既死，那拉亦耄，载湉春秋方壮，佗日复辟，必有其期，而满洲之新起柄政者，其势力权借或不如荣禄诸奸，则工部主事可以起复，虽内阁军机之位，亦可以覬覦矣。长素固云：穷达一节，不变塞焉。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抑吾有为长素忧者，曩日革命之议，哗传于人间，至今未艾。陈千秋虽死，孙文、林奎尚在；唐才常虽死，张之洞尚在；保国会之微言不箸竹帛，而入会诸公尚在；其足以证明长素之有志革命者，不可件举，虽满人之愚蒙，亦未必遽为长素欺也。呜呼哀哉！“南海圣人”，多方善疗，而梧鼠之技，不过于五，亦有时而穷矣。满人既不可欺，富贵既不可复，而反使炎、黄遗胄受其蒙蔽，而缓于自立之图。惜乎！己既自迷，又使他人沦陷，岂直二缶钟惑而已乎！此吾所以不得不为之辨也。

若长素能跃然祇悔，奋厉朝气，内量资望，外审时势，以长素魁垒耆硕之誉闻于禹域，而弟子亦多言革命者，少一转移，不失为素王玄圣。后王有作，宜昭国光，则长素之像屹立于星雾，长素之书尊藏于石室，长素之迹葆覆于金塔，长素之器配崇于铜柱，抑亦可以尉荐矣。借曰死权之念，过于殉名，少安无躁，以待新皇。虽长素已槁项黄馘，卓茂之尊荣，许靖之优养，犹可无操左契而获之，以视名实俱丧，为天下笑者何如哉？书此，敬问起居，不具。章炳麟白。

【说明】 本文撰于一九〇三年，曾与邹容《革命军》"同时刊出，不及一月，数千册销行殆尽"（蒋维乔：《章太炎先生轶事》，见《制言》第二十五期）。同年六月二十九日（闰五月初五日），上海《苏报》选录此文，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刊布。

按：康有为等改良派在戊戌政变后，于海外组织保皇党，高唱复辟。一九〇二年，康有为又发表《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两文均载《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一书中）等文，反对革命。本文即系针对康有为撰文予以驳斥，措词激烈，且斥光绪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中外反动派的惶恐和震怒，《苏报》选登此文的次日（六月三十日），章氏被捕，震动全国的"苏报案"发生。

今据单行刊本录出，并将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摘录附后，并供参考。

附：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摘录）

康　有　为

顷得书，以回銮半年，皇上不得复辟，西后、荣禄仍柄大权，内地纷纷加税，民不聊生，以赔荣禄通拳匪围使馆之款，广西变起，众情积愤，怒不可遏，恐皇上长为荣禄所挟，永失中国。且吾会备极忠义以保皇，而政府反以为逆

党，反以为匪会，捕逮家属，死者数人，监者累年，以竭忠为逆，以保皇为匪，今虽再竭忠义，亦恐徒然耳。事势如此，不如以铁血行之，效华盛顿革命自立，或可以保国民。览书惶骇，何乃至此！想诸君热心太盛，以为回銮之后，西后必归政，荣禄必逐故也。一旦失望，愤怒交并，忧国诚切，迫而出此。近者天下纷纷怨怒，皆在此事，岂独诸君哉！

夫以荣禄为通拳匪围使馆之罪魁，而能欺弄八国，不独不杀，且柄政如故，此由各国公使，因其曾馈瓜果所致。荣禄巧营二面，一面命董福祥围使馆，一面馈使馆瓜果，于事成则受其功，若事败时则不受其过，今竟得售其奸，脱然事外，挟权加税，以虐吾同胞，伪为变法，以欺各外国。今则并不变法，逍遥高卧而执政权，诸君之愤之怒之宜也。然愤激之余，遽欲为革命自立，独不念舍身救民之圣主乎？不独与保皇会宗旨相悖，且考时度势，则仆窃以为不可，盖有数说焉，惟仁人志士察之！

今欧、美各国，所以致富强，人民所以得自主，穷其治法，不过行立宪法、定君民之权而止，为治法之极则矣。……统计欧洲十六国，除法国一国为大革命，实与俄之一国为专制者同，皆欧洲特别之情。其余十余国，无非定宪法者，无有行革命者。然法倡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而所言革命民权之人，旋即借以自为君主，而行其压制，如拿破仑者，凡两世矣。然使法国之制独善，法国之力独强，法民之乐更甚，由之可也。今各国之宪法，以法为最不善，国既民主，亦不能强，能革其君，而不

能革其世爵之官，其官之贪酷，压民甚至，民之乐利，反不能如欧洲各国。此则近百年来，欧洲言革命不革命之明效大验矣。然各国民党之起，皆在其京师，故能迫其君相，而成大事，其间有自边省起者，亦皆去京师不远，然皆少为势援，大要不在是也。若不在京师起者，则调大兵立平之，未见一国民权党能在边省成功者，此不可不取以为鉴也。

若夫民主大国，惟美与法。美为新造之邦，当是时，人民仅三百万，与欧洲隔绝，风气皆新，无一切旧制旧俗之拘牵其后。后渡海赴之者，皆厌故国，乐自由，故大更大变，事皆极易，故法革命而无效，美自立而见功。若我中国万里地方之大，四万万人民之众，五千年国俗之旧，不独与美迥绝不同，即较之法亦过之绝远。以中国之政俗人心，一旦乃欲超跃而直入民主之世界，如台高三丈，不假梯级而欲登之；河广十寻，不假舟筏而欲跳渡之，其必不成而堕溺，乃必然也。夫孔子删《书》，称尧、舜以立民主；删《诗》，首文王以立君主；系《易》，称见群龙无首，天下治也，则平等无主。其为《春秋》，分据乱、升平、太平三世。据乱则内其国，君主专制世也；升平则立宪法，定君民之权之世也；太平则民主平等，大同之世也。孔子岂不欲直至太平大同哉，时未可则乱反甚也。今日为据乱之世，内其国则不能一超直至世界之大同也；为君主专制之旧风，亦不能一超至民主之世也。不然，国者，民之所积者也；国者，民之公产也。孔子言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固公理也。欧洲十余国，万战流血，力争而得民权者，何不

皆如法之革命，而必皆仍立君主乎？必听君主之世守乎？甚且无君主则迎之异国乎？此非其力之不能也，有不得已之势存焉。故礼时为大，势为大，时势之所在，即理之所在。公理常与时势相济，而后可行，若必即行公理，则必即日至大同，无国界、无家界然后可，必妇女尽为官吏而后可，禽兽之肉皆不食而后可，而今必不能行也。仆在中国实首创言公理，首创言民权者，然民权则至在必行，公理则今日万不能尽行也。盖今日由小康而大同，由君主而至民主，正当过渡之世，孔子所谓升平之世也，万无一跃超飞之理。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法国其已然者矣。既当过渡之时，只得行过渡之事，虽有仁人志士，欲速之而徒生祸乱，必无成功，则亦可不必矣。不然，以欧洲十余国之志士才人，万亿千计，累更百年，何以皆至君主立宪法而即止，不复更进至民主大革命哉！乃者英君后之丧，民戴之如此，英新皇之加冕，民尊之如彼，凡有礼会，必免冠起立，同颂祝其君，彼欧人之明智，岂伪为如是哉？诚以审时势而为义理，不可不如是也。若使百年来欧洲十余国之亿兆志士才人，稍有知也，然而彼十余国不为革命而国日强，但求立宪法、定君民之权耳！虽别称君主之国，其为立宪民权无异，但得自由自主之乐，斯已矣。君主民主皆虚位耳，民之实权不可失，故必求之；君主之虚位，无关要事，则可听之。实考欧、美治强之故，人民之权利若此，若未尝深思其故，反复其势，绎按其时，徒见美国独立之盛，但闻法国革命之风而慕之行之，妄言轻举，徒致败乱，

此仆之所未敢从也。

今日天下滔滔，志士发愤，或舍弃身命而为之，岂非欲中国变法自强，不受分割哉？岂非欲吾旅外同胞，不受欺辱，独立不羁哉？岂非欲吾国民自由有立宪法有议政权哉？凡此皆天下之公理，万国之大效，而仆生平之素论定志，舍身为之，与天下志士有同心者也。故仆昔在京师，曾合各直省举人与京师士夫，开强学会、保国会，争民权矣，盖不得于上，则欲争于下也。然前言英、法变争百数十年，流血数百万而后得之，其餘各国虽不至是，然皆几经争变流血而后得。惟戊戌之年，皇上赫然变法，百日维新，薄海额手而望自强，万国变容而为起敬，已然之效，天下所知，非同虚想也。……夫万国力争流血所不得者，而皇上一旦以与民，我四万万〈人〉不待流血，不待力争，而一旦得欧洲各国民自由民权之大利，此何如其大德哉！有君如此，岂忍负之！皇上以救民变法，不幸被废，竟不得行，然以寻常言之，人以救我而至大祸，我乃不能救之，于报施之理，已为不公，况因恩人不幸在祸，被缚于贼之时，而反戈攻之，曰革命，曰扑满，是以怨报德，以仇报恩也。吾国人岂可出此！……因恶西后、荣禄之故，而概攻之曰满清政府，是岂非并舍身救民之皇上而攻之乎？因恶西后、荣禄之故，而慨言革命，是岂非并舍身救民之皇上而并革之乎？……西后、荣禄，满人也，皇上亦满人也，汤、武之革命，乃诛无道之桀、纣耳，非诛有道之夏启、武丁也。以一二人之罪而恶及一国，乃并其爱我恩我之人并除之，此岂为公理乎？故仆实不欲闻革命扑满之言，非徒为感

皇上之知遇也，非为曾仕国朝也，实以公理不安，不忍闻也。……西后、荣禄年六十餘，危于朝露；皇上年仅三十，春秋鼎盛，相较显然。一旦有变，皇上可复辟，一也；荣禄自知通拳匪围使馆为罪魁之罪魁，得罪各国，岌岌不保，虽用诡谋，假于瓜果馈公使，仅以自免，然其部将董福祥犹在，荣禄督董围使馆，乃董革而荣存，董甚怨之，若各国诘问之，实情终露，奸雄诈术，岂能久存，不久当败露，荣若败露，上即复辟，二也；又各国咸知皇上圣明，今惑于荣党之言，以为皇上复能朝觐，已复权矣，故各纷纷言上复权，久之知上并未复权，太后仍复专政，必请归政矣，皇上即可复辟，三也；即不然而各国咸认皇上敬皇上，诸贼亦必不敢复行废弑，是皇上尚可从容而待复辟，四也。皇上一复辟，可立行变法自强，立与民权议政，立与国民自由，诸君何不少俟之！与其忍公理肆自屠求革命，而必不能成，甚者且以资敌，何如仍誓保皇，发愤敌忾，以冀皇上之复辟，而民权自由为必可得耶？

夫革命非一国之吉祥善事也，就使革命而获成矣，为李自成之入燕京矣，为黄巢之破长安矣，且为刘、项之入关中矣。然以中国土地之大，人民之众，各省各府，语言不相通，各省各府，私会不相通，各怀私心，各私乡土，其未大成也，必州县各起，省府各立，莫肯相下，互相攻击，各自统领，各相并吞，各省屠城，血流成河，死人如麻，秦、隋、唐、元之末季，必复见于今日。加以枪炮之烈，非如古者刀矛也，是使四万万之同胞，死其半也。……夫欧、美一切之美政美学美术，皆承平暇豫，而后能为之，岂有举国

内乱，割据仓皇，民不聊生，工商俱废，奔走不暇，而能兴内治乎？法国之地与民，不得中国什分之一，而革命一倡，乱八十年，第一次乱，巴黎城死者百卅九万，中国什倍其地，什倍其民，万倍于巴黎，而又语言不通，山川隔绝，以二十餘省之大，二百餘府之多，二千餘县之众，必不能合一矣。若有大乱，以法乱之例推之，必将数百年而后定，否亦须过百年而后定。方列强竞争，虎视逐逐，今方一统，犹危殆岌岌，若吾同胞相残毁，其待我数百年平定而后兴起内治乎？鹬蚌相持，渔人得利，必先为外人有矣，若印度是也。谁生厉阶，演此惨剧。夫今志士仁人之发愤舍身命而倡大变者，其初岂非为救国民哉？乃必自杀数万万人，去中国人类之半而救之，孟子言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况于屠戮同种数万万人哉！……夫始为变法自强而来，终为内乱自亡而去；始为救国保种而来，终为鬻民灭国而去。在妄发者，岂料其末祸至是！然放火之人，无能知火之所止者，彼放小火耳。风之所来，谁能定之？测火风犹若是，而况倡革命者！放大火燎炸药以烧中国，又当四邻窥伺之时，彼虽号为智者，能料其所终乎？即智者妄谓能料之，其可信乎？方印度诸自立国，倡言背蒙古朝时，岂料不数十年，国种全灭而隶英哉？言革命者，必谓非经大杀戮，不能得大安乐，故杀人数万万，乃其本怀，原不足动其心，然使杀之而必能救中国犹可也，然自相屠杀，剪其种族数万万，而必至鹬蚌相持，渔人得利也。志士仁人，何忍出此！……

且倡革命者，必以民权自立为说，公举民主官吏为

言，近引法、美，切乎时势，合乎人心，当水深火热之余，莫不信之望之。夫民权自由之与革命，分为二者也。欧洲十余国，皆有民权，皆能自由者，除法国革命外，余皆有君主，然则必欲予民权自由，何必定出于革命乎？革命未成，而国大涂炭，则民权自由，且不可得也。是故真有救国之心，爱民之诚，但言民权自由可矣，不必谈革命也。然则革命者之言民权自立，不过因人心之所乐，而因以饵之，以鼓动大众，树立徒党耳！假令革命果成，则其魁长且自为君主，而改行压制之术矣。不见法之拿破仑乎？始则专倡民权，每破一国，辄令民背其主，既为民主，事事皆俛顺民情，而挟其兵力以行之，于是复自为君主矣。又不见拿破仑第三乎？始为议员，则事事必言利民，新为民主，则誓守旧章，三年之先，凡卫民厚民保民之事，无不力行，且补旧章之不及，以买人心。已而夜宴一夕，伏兵擒议员百数，民党头目及知名士千数，尽置于狱，流于而美嵌监绝地中，拥兵五十万而称帝矣。盖能以革命成大事之人，其智术必绝伦，又必久拥兵权者。中国枭雄积于心脑者，人人有汉高、明太之心，吾见亦多矣。古今天下安得遇尧、舜、华盛顿？法国累更革命，积化百年，定章极严，而拿破仑第三犹如此，况中国向来本无议论，更无立宪定章，彼枭雄能指挥十八省者，其拥兵权何止五十万，如此则何为不可！夫华盛顿之时，美国人仅四百万，中国乃百倍之，其人之才能控制十八省四万万人，破万里之全国者，非有秦政、刘邦、曹操、刘裕、朱元璋之枭雄术略，好杀自私，必不能也。夫秦政、刘邦、曹操、刘裕、朱元璋再出，

方出新法，以大肆屠戮而行其压制，而立其君权，其先言民权者，亦不过为拿破仑第三之买民心耳。今所见革命之人，挟权任术，争锱铢小利而决裂者，不可胜数，如此之人，使其有天下而使其行尧、舜、华盛顿之事，是望盗跖之让国也。故即有华盛顿之仁，盖其人亦只能抚四百万人，而必不能定四万万人。盖以人心未化之国，非极枭雄术略之人，肆其杀戮专制之权，必不能定之也。故今日中国，必无骤出华盛顿之理，不必为此妄想也。……故尧、舜之为民主大同之公天下，孔子倡之，而不能即行之。今民主之法，大同之道，乃公理之至义，亦将来必行者也。而今中国，实未能行民主也，世界实未能大同也。……一二文学好异求速之人，日读法、美之书，而不审中国之势，妄为此说，此以四万万之人命为戏场也。余人不深审本末，但乐闻其民主自立之说、改革新政之言，而嫉于西后、荣禄之割地，暴民遂发愤而从之，徒弃身命、沉宗族而自鬻其宗邦，即幸于万一，必无而仅有之事；至于有成，亦不过助秦政、刘邦、曹操、朱元璋之帝业，然则岂其本心哉！

善乎满人瓜尔佳之言也。瓜尔佳曰："民主者，天下公理也，能爱民变法，天下莫如皇上，若举民主，莫如皇上也。"吾以为今之言革命民主者，糜烂四万万之人，大战数十百年而必不能成革命，必不能保中国。假而有成，而得一秦政、刘邦、曹操、朱元璋、拿破仑为民主，则益水深火热矣。即不可谓薄待天下人，或冀幸于万一而有华盛顿者出，然与其望之空虚必无有未可信未出现未著效之华盛顿，何如望之已有已现已效之皇上乎？……以皇上之仁

圣英武，通于外事，足以变法而强中国；以皇上之久历艰难，能公天下，足以立宪而兴民权。天生皇上之圣仁，令其阅历变难，正所以救中国生民者也。夫使众议纷纭，革命大乱而后能变法，则待之数百年而后成。夫中国为黄种之独国，与法、美迥异，方今外人侵压之力，岂能从容以百年之乱待之乎。若欲速变，非君主之权不能也。……皇上既早欲开议院、与民权矣，先以专制之君权变法，徐以公议之民权守成，不待革命糜烂之争，而可安享民权自由、变法自强之乐。吾为中国计，为四万万之同胞计，妄谓莫善于此！

……

谈革命者，又谓中国积弊既深，习俗既久，静性既甚，守旧实深，虽皇上复辟，亦难大变之。非大震雷霆，大鼓风雨，以洗荡扫除其旧人旧性，如法之大举革命然，必不能眞变也，故不望其成，但欲其大动大变以警醒之，甘为水火，甘为炸药，甘为大疫，宁杀三分有二之人，以望将来之大乐。若其筑室以庇之，行医以药之，则将来自有其人，今不暇计也。远引法、美之效，近法欧洲之风，谓变法自强，必无安然可致一统大同之理，不如鼎峙竞争之各出智力，各出议论。此其决裂破坏，无所顾虑，但求欲速以成功名，可谓勇锐残忍以图事者矣。仆以为易动而难静者，民之性也，岂中国人独不然哉！……近观数年之变，自甲午败后，变法议倡，积极而有戊戌维新之事；其反潮则翻新政、废君上、诛党人，而积极成庚子拳匪之祸；及都邑破、乘舆出、巨款赔，积极而复有近者勉强变法之诏。然

而学堂既开，报馆既出，译书既盛，游学既众，民智日开，新说日出，即如戊戌之春，湖南已发自立易种之论，幸而皇上赫然维新，故异说稍释。及己、庚之间，溥儁立，京城失，人心骚动，革命之说复起。及去年旧党渐诛，回銮日闻，天下人人侧望，咸以为皇上立即复辟，异说渐静。及回銮后，不闻复辟，至今半年，天下复嚣然愤然而谈革命自立矣，广西之乱又起矣。顷闻撤帘有信，而贼臣阻之。呜呼！此皆李莲英、荣禄二人并力以亡国也。各宗室大臣、各疆臣环视而不动，是助荣禄、李莲英以亡之也。夫人心之变，岂有极哉！民主之制，出自公举，可谓公之至矣；美国之治效，可谓盛矣，麦坚尼之总统，东定古巴，西收菲律宾，可谓殊勋矣，而尚有无君党以刺之。近年工党之变日起，均产之论日多。夫论转石流川之势，则千数百年后，必至太平大同之世，群龙无首之时，公产平均之日。若在今日，则无君均产之事，中国固未萌芽，而欧、美岂能行哉！夫美之不能遽行无君均产，犹中国之未可行革命民主也。欧洲须由立宪君主，乃可渐致立宪民主；中国则由君主专制，必须历立宪君主，乃可至革命民主也。……

且既动之后，不能复静，变乱滋生，不可复止。不观于法国乎？法之初革命也，废尊称，更新历，起尊崇道理之教，举旧政旧俗，扫弃而尽改之，举国若狂，言愈发而愈激，愈激而愈偏。限行政之权，至于事不能举行，空想之论，使人皆无产，献工金之半于政府，既无名分以统一之，于是诸党争权而相争，各省称兵而反斗，其革命裁判所，自王后以下，乃至杀戮名士贵爵数千人。遍派侦探，疑似

辄杀，人人疑惧，此则秦始皇之坑儒，桓、灵之钩党，魏忠贤之诛东林，凡帝国专制之酷政，无此惨矣。已而异党复起，展转相攻，党魁数百，皆被诛戮。凡各党之争，甚类晋八王故事，死者百廿九万人。名为公议，而其专制过于无道之帝政，欲求治安，而其毒乱过于列国之互攻。盖革命之余，必至如此。诸党大乱之后，惩艾其乱，则厌民主之说，于是拿破仑复立为君。拿破仑既逐，布尔奔继立，法议员则公议严刑以罚民主之说，既而有七月二日。两大革命，连逐两君，复思拿破仑而立其后。及拿破仑第三见擒于德，乱民争位之时，前后三次，巴黎扰乱，死亡载道，贸易皆无，工贾俱绝，谋食无所。其幸生者，或贫穷而无归，或积郁而致乱。于是相与为乱，劫掠官民，盘踞宫殿，流血成渠，积骸成山。故民党之意，虽日倡自主平等同胞，终无济而益乱矣。英国鉴之，故宁迟迟变法，而力戒革命民主之说，果得渐进之益。夫以区区之法，区区之巴黎，一唱革命，变乱无厌已如此，况于百倍法国、万倍巴黎之中国者哉！其惨状变态益难思议矣。且谓中国安然变法亦非也。戊戌篡废之举，庚子拳匪之祸，皆始自京师，已从流血百万而来矣。各国皆变自京师，岂必边省并变哉！若暹逻以君权变法，则未闻有一人流血之事，又岂必引法事为变法铁案乎？吾则恐大动之后，湍流直奔，大火延烧，不知几百年而无以善其后也，况敢作俑乎？

谈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此为大怪不可解之事。……然则满洲、蒙古，皆吾同种，何从别而异之？其辫发衣服之不同，犹泰伯断发文身耳。且中国昔经晋时氐、

羌、鲜卑，入主中夏，及魏文帝改九十六大姓，其子孙遍布中土，多以千亿。……又大江以南，五溪蛮及骆越、闽、广，皆中夏之人，与诸蛮相杂，今无可辨。当时中国民数，仅二三千万计，今四万万人中，各种几半姓同中土，孰能辨其为夷裔夏裔乎？……若夫政治专制之不善，则全由汉、唐、宋、明之旧，而非满洲特制也。……若国朝之制，满、汉平等，汉人有才者，匹夫可为宰相，自同治年来，沈文定、李文正、翁常熟迭相柄政，曾文正、左文襄、李文忠则为外相，倚畀极重。而若孙毓汶之奸邪，独当国十余年，满人侧目，无可如何。除近年荣禄以预废君之谋，独专大政外，举国四十年政权，皆在汉人之手。恭、醇二邸，位虽最高，但拱手待成耳！即今除荣禄、庆邸外，何一非汉人为政乎？军机除荣禄外，王文韶、鹿传霖、瞿鸿禨三相，皆汉人也。若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三督之权，至于朝廷不敢去之。若将兵之权，尤国所倚，则袁世凯、马玉崑、宋庆、苏元春、张春发，何一非汉人乎？满人无一统大兵者，即为总督者，仅一崧蕃耳。其极边将军大臣之用满人，则以用满蒙文字，为汉人不识之故，而将来亦必改之，观新疆改省可见。即今步军警察，改用汉人，东三省亦拟改行省矣。故除京官满、汉并设，满籍人少，迁移较易，似为占优，然当时分设满、汉者，已自有故。乾隆时，舒赫德曾请删除满、汉，谓开国时圣祖本欲删除，后恐满大臣权大，至使汉人无官，有若元时，故特分满、汉之缺。然则所以分之之故，盖专为汉人计也。……若外官则惟才是视，绝无满、汉之分。至海关织造等官，明世原用阉人，而士人不

屑为之，今满籍之贪横，尚不如明世宦官之甚也。……今革命者，日言文明，何至并一国而坐罪株连之？革命者，日言公理，何至并现成之国种而分别之？是岂不大悖谬哉！……

夫今日中国积弱，众强环视，苟汉之与满洲，割而为台湾，亡而为印度、波兰，则必不得政权平等自由之利，是则可忧也。然既非其比矣，则国人今日之所当忧者，不在內讧，而在抗外也。欲抗外而自保，则必当举国人之全力，聚精会神而注于是，或可免也。方当同舟共济之日，若为內讧，则兄弟阋墙，外御其侮，恐为阿坤鸦度之能脱于西班牙，而适利美国之渔人，至时则永为奴隶，永无自立，求如今者，不可得也。乃国之志士，不能审此，而颠倒误用之，吾恐若印度眞奴之不远矣。

昔戊戌在京时，有问政体者，吾辄以八字言之，曰"满、汉不分，君民同体"。皇上甚韪之。因言魏文改姓迁都事，皇上决将满、汉二字删除，凡官之分满、汉缺者亦删去。其任官惟才，不问何籍，各地驻防，皆附其地，听其谋四民之业。其满洲旧姓，皆取一字而行之，如魏故事。故只有所谓中国，无所谓汉、满。帝统宗室，不过如汉刘、唐李、宋赵、明朱，不过一家而已。不筑堤防，何有水涨？虽欲攻满，何从攻之？……君而无道，不能保民，欲革命则革命耳，何必攻满自生內乱乎？实推其意，不过为起兵动众藉口耳！然则革命自立皆不可，而西后、荣禄常柄政，则吾同胞，当安坐以待灭亡鬻卖乎？是又不然。试观数年以来，推翻新政，禁报馆，捕党人，停学堂，止译书，其暴横

之举，与前百年欧洲诸国之压制其民相等。今不二三年，已废八股、弓刀、漕运，开学堂，译西书，派游学，满、汉通婚矣。风潮所卷，正反相承，其后不能复止。皇上而复辟，固能维新自强，以与民权；皇上而有变，必有变乱相随焉，有伪朝篡乱而可久者乎？况西后、荣禄，皆已老矣。……

夫考之欧洲之事，则各国皆行立宪而国势安固，民权自由之乐如彼；法国独为革命，印度分省自立，而国势陵夷丧乱灭裂之害如此。审之中国之故事，则必秦、隋、蒙古之无道，又无洋枪轮船之精巧，乃有匹夫革命之事。今求之时地事势而皆非，考之人心义理而不协，而妄听一二人之辩言，以构滔天之大祸，而斩削分鬻四千年一万里之国土，毒戕涂炭四万万之同胞，此则仁人志士所不为，而仆万不敢闻者也。……若夫仆者，受圣主之知遇，赞百日之维新，亲受衣带之诏，躬受筹救之责，数年以来，与诸公戮力，勤王无成，罪宜万死。夫朋友之交，犹贵久要不忘，安有君臣之际，受人之知遇，因人之危难，中道变弃，乃反戈倒攻者乎？……

来书频谓……今皇上挟于西后、荣禄之手，虽回銮而无权如故。荣禄自挟天子而令天下，于今五年矣，若如汉献故事，是中国永割，而吾黄帝四万万神明之胄终亡，则是不行革命所致也。夫君与国孰重？一人与四万万人孰重？孟子曰：民为贵，君为轻。岂可徇小谅而忘大事哉！是其说甚辩，而亦不然也。当献帝时，群雄割据已成，大势瓦解已定，献帝必无复权之理；即使复权，而献帝既非

英主，群雄既皆立定，亦无恢复之望。故先主不得不取荆、益以图存汉祚。若今者，各省有已割据者乎？大势有已瓦解者乎？不过六十老翁之西后、荣禄二人擅朝耳。举国大小臣工，下及民庶，外及友邦，莫不归心皇上。一日归政，天子当阳，焕然维新，以上定立宪之良法，下与民权之自由，在反掌耳！皇上既非献帝之比，今亦岂汉末之比哉！时事迥殊，亦不能附会古义也。愿诸君审度时势，力终其忠义，厚蓄其实力，姑少待之，无误于异论，无鼓动于浮言，无惑乱于少变，坚守保皇会义，圣主必复，中国必全，幸福必至。刻心写腹，幸察鄙言，不胜惓惓翼翼之至！

与吴君遂书

（一九〇三年五月十八日）

君遂我兄左右：自君遂徙金陵，而吾不复得佯狂避世之友于海上，宙合虽大，可与言者几何。顷以煢居，遂毁我室，无妃匹之累，而犹有弱女三数，然亦近于弃捐也。在学社久，无可为知己道，私自寻理，乃知读书为玩物丧志，程氏之言，诚卓绝已。以此律己，则默坐澂心，差足为消极主义；以此对人，亦谓全学社中宜毁弃一切书籍，而一以体操为务。如是三年，其成效必有大过人者。不然，汤盘孔鼎，既不足为今世用；西方新学，亦徒资窃钩发冢，知识愈开，则志行愈薄，怯葸愈甚。观夫留东学子，当其始往，岂无颖锐陵厉者，而学成以后，则念念近于仕涂。盖人之劳苦为学，固将以求报偿，今习此技术，而于社会尚无所用，则舍仕宦一涂安往哉？是故言借权立宪者，必其学业已就者也。得允中书，言入义勇队者，大氐留学不及一年之人，即此知成学诸生之志矣。

向在张园，尝以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昭示大众，是时教

育会初开，爱国学社初立，而仆已持此义，至今一岁，犹坚持未变，亦自以为顽锢之渠魁矣。他人闻此，必以因噎废食为讥，如君明哲，当不我诟。世未有尘垢秕康而足以陶铸尧、舜者，则知以书籍图史教人，必不为教育之良法，而况圣人不死，有大盗不止之惧邪。书此狂言，略尽愚戇。颇欲西上秣陵，一抒沈郁，未知相宅今在何所，其有以示我也。敬候起居不一。绛再拜。四月廿二日。

【说明】 此书录自马宗霍先生《章氏佚文辑存》。据马先生考证：

“霍按：先生《自定年谱》称：‘光绪二十九年，妻王氏歿’。书中言‘顷以甇居，遂毁我室，无妃匹之累’云云，即谓此也。《年谱》于是年内又称：蔡元培就上海租界设爱国学社，‘招余讲论，多述明、清兴废之事，意不在学也’云云，亦与书中所言在学社久相符，然则此书盖作于光绪二十九年。是年闰五月上旬，先生与邹容同在上海被逮，羁系租界，而书末署四月二十二日，正就逮前一月也。书中又有‘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之语，圣人即斥康有为。”

据此，则此书应撰于一九〇三年五月十八日（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驳革命驳议

（一九〇三年六月十二——十三日）

昨读某报《革命驳议》，自谓主张维新，而不主张革命，大致以今日革命之难，一在外界干涉，一在内容腐败，故不如降心壹志，研究实学，以为异日辅佐君国、兴起宗邦之用。语多鹘突，未能分析明了，不知异日获用，将以立宪政体，辅佐君国、兴起宗邦乎？抑将小小变法，补苴罅漏，而遂可以辅佐君国、兴起宗邦乎？若仅变法而已，康有为戊戌之事，成鉴未远，诚使胡牝就戮，明辟当阳，百日新政，延至百岁，而外人之侵犯国权，要求割地，果能御之与否？若言立宪，某报既知人心腐败，以凿井耕田为本分，输租纳税为常职，初不知何者为自由，何者为不自由矣。而欲其决议税则，规复权利，此又必不可得之数也。夫小小变法，不过欺饰观听，而无救于中国之亡，立宪足以救中国之亡，又非不知自由者所能就，然则研究实学果安所用耶？然而维新之极点，则必以立宪为归矣。彼所以侈陈维新、讳言革命者，非谓革命之举，必伏尸百万，流

血千里，大蹂大搏，以与凶顽争命，而维新可从容晏坐以得之耶？

夫各国新政，无不从革命而成。意大利、匈牙利之轰轰烈烈，百折不回，放万丈光芒于历史者，无论矣。英伦三岛，非以不成文宪章，与宪政祖国之名，自豪于大地者乎？然一千二百十五年之革命何如？一千四百八十五年之革命何如？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之革命又何如？使英人而不革命，则一土耳其耳！东睨日本，非以皇统绵绵，万世一系，贡媚言于其君主者乎？然萨、长二藩，尊王覆幕之革命何如？西乡、南洲、鹿儿岛之革命又何如？使日本而不革命，则一朝鲜耳。然则革命与维新，又何择焉？

某报言论，洋洒万千，而莠言荧听，最足破众庶之胆，而短英雄之气者，则曰外人干涉而已。夫干涉亦何足惧？使革命思想能普及全国，人人挟一不自由毋宁死之主义，以自立于抟抟大地之上，与文明公敌相周旋，则炎、黄之胄，冠带之伦，遗裔犹多，虽举扬州十日、嘉定万家之惨剧，重演于二十世纪之舞台，未必能尽歼我种族。不然，逆天演物竞之风潮，处不适宜之位置，奴隶唯命，牛马唯命，亦终蹈红夷棕蛮之覆辙而已！菲立宾前事，尤吾党所捶胸泣血、饮恨终夕者也。虽然，以阿圭拿度之英杰，菲国国民之义愤，今虽茹辛含苦，暂为强敌所屈伏，而仰视天，俯视地，咄咄书空之情态，殆不可以一日已。黄河伏流，一泻千里，大地风云，朝不谋夕，吾敢昌言曰：十年以后，太平洋中，无复美利坚人之殖民政略矣。即不然，而当日义旗一指，千里从风，西班牙九世之仇，亦既扫荡无余，不犹

愈于伈伈伣伣，长为奴隶者乎？彼谓乡村富户，值群盗在门之时，其主人与仆从，唯有齐心协力，抵御外侮；若两造同室操戈，先已筋疲力尽，迨至群盗破门而入，即更不复能抵御，此固一定之理矣。吾不知彼之所谓主人与奴隶者，将何所指乎？夫中国国民，固为全国之主人翁，若今之政府，不能尽公仆之天责，而反摧夷辱戮我民以为快，直群盗之尤无赖者耳！內盗不去，盘堂踞奥，而嚣嚣然曰：拒外盗拒外盗，缚手足与人斗，乌可胜乎？

且彼既排革命而主张维新矣，而维新终未可从容晏坐以得之，则仍不得不望诸民党之崛起。彼政府之仇视我也，见我民之稍有气节、稍有举动者，莫不欲得而甘心，又岂知革命与维新之有别哉！唐才常昌言勤王而伏尸鄂市，日本留学生以服从政府为主义而下诏大索海內，况维新、革命，相去不能以寸乎？吾知一旦宪政党出现于中国，而政府之追讨，外人之干涉，犹如故也。夫低首下心，以求所谓维新者而终不成，何如昌言革命，反有万一之希冀哉！彼谓中国之民，未有怨政府之心，不可以言革命。夫我国民，岂生而具奴隶之性质、牛马之资格，任政府之食吾毛、践我土而不动于心哉？毋亦智识未开，浸淫于四千年来之邪说，而号称提倡民权如某报者，复从而揜之，上天下泽，名分等严，虽有怨尤，末如之何耳！使有人决此藩篱，昌明大义，二十世纪之中国，何讵不如十九世纪之欧洲乎？然则彼所谓明目张胆于稠人广众之中，公言不讳，并登诸报章，以期千人之共见者，正以中国国民未知革命，而求所以知之之道耳。

彼谓联络会党，殊不足恃，而引拳匪为鉴。夫拳匪之事，岂可与革命党同日语哉！彼挟一扶清灭洋之宗旨，既可以皇汉之贵种，而靦然自称大清之顺民，帖耳俯首，受治异族，无复廉耻矣。又何不可以为大英、大法、大日本之顺民乎？能为张氏奴，亦必能为李氏奴，性质如此，无足怪者。而遽以区区少数，并多数之未必如是者，而同类并讥之，亦謷言而已。抑今日之主张革命者，虽词严义正，不必如某报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阳和之韵，不入里耳，逞臆为谈，犹多歧路。无已，请比较革命立宪之难易，还以商榷之义，与海内外人士质之可乎？

革命之举，虽事体重大，然诚得数千百铮铮之民党，遍置中外，而有一聪明睿知之大人，率而用之，攘臂一呼，四海响应，推倒政府，驱除异族。及大功告成，天下已定，而后实行其共和主义之政策，恢复我完全无缺之金瓯，则所革者政治之命耳，而社会之命，未始不随之而革也。若夫维新，则必以立宪为始基；立宪则必以人人能守自治之法律，人人能有担任宪政之资格，然后得以公布宪法，为举国所同认。今以数千年遗下懦弱疲玩之社会性质，俯首屏息于专制政体之下，一旦欲其勃焉而兴，胥人人而革之，以进于光明伟大立宪国之国民，吾恐迟之十年、数十年后，仍不能睹效于万一，而中国之亡，已亟不能待，况满清政府之初无立宪思想乎？

夫对此扞格不谋之敌体，出此迂远无补之希望，如醉如痴，如梦如寐，外人乃朝换一约，暮索一款，伺我内情之懈弛，徐行其扩张权利之计，使我膏涸血竭，财穷智绌，遍

国人无能为抵御之策，而彼乃印度我、波兰我，支那大陆，永永陆沈，吾不知行立宪主义者，尙足以救波兰、印度之亡否耶？无奋雷之猛迅，则万蛰不苏；无蒲牢之怒吼，则晨梦不醒；无掀天揭地之革命军，则民族主义不伸。民族主义不伸，而欲吾四万万同胞，一其耳目，齐其手足，群其心力，以与眈眈列强竞争于二十世纪之大舞台，吾未闻举国以从也。彼又谓中国一隅之地，往往彼焉怨咨，此焉讴歌。至证以科举之丑态，厘金亩捐之弊政，是眞大惑不解者矣。科举者，愚民之术，有志之士，不入其彀中，即以常人言之，获者不过少数，而不获者仍是多数，是固讴歌少而怨咨多也。厘金亩捐，凿损元气，举国皆蒙其害，况于生物成物运物之农工商，随在有密切之关系。吾未闻工商受厘金之酷虐，而农者讴歌于野；农者受亩捐之勒派，而工商讴歌于市。虽有讴歌，亦如哭泣痛苦之中，暂而饮酒以慰无聊而已！及其旣醒，则怨咨如故也。此何足为独倡寡和，不能革命之证哉！

总之，国民与政府，立于对待之地者也。革命之权，国民操之，欲革命则竟革命。维新之权，非国民操之，不操其权，而强聒于政府，亦终难躐此革命之一大阶级也。悲夫！放弃国民之天职，而率其四万万神明之同胞，以仰一异种胡儿之鼻息，是又昌言维新者所挟以自豪乎？无量头颅无量血，即造成我新中国前途之资料。畏闻革命者，请先饮汝以一巵血酒，以壮君之胆，毋再饶舌，徒乱乃公意。

【说明】 本文原载一九〇三年六月十二——十三日《苏报》。据柳亚子：《我和言论界的因缘》称：

“公元一九〇三年（清光绪二十九年），我第一次到上海，进了爱国学社。这时候，和章太炎、邹威丹两位先生很接近。在阴历五月中旬，《新闻报》登了一篇《革命驳议》（按：《革命驳议》原载一九〇三年六月八至九日——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三至十四日《中外日报》），太炎先生便写《驳革命驳议》来反驳它。开了一个头，他不高兴写了，叫我续下去。我续了一段；同邑蔡冶民先生也续了一段；末尾是威丹先生加下去的。我的一段，是关于菲律宾独立的问题。……这篇文章在《苏报》发表。这便是我和言论界第一次的因缘”（《逸经》创刊号，一九三六年三月五日出版）。

据此，则此文系章氏和柳亚子、蔡冶民、邹容合撰，针对《中外日报》而予驳斥的。又据章士钊：《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一九六一年十月中华书局出版），则谓此文系章士钊所作。《中外日报·革命驳议》一文，曾辑入《苏报案纪事》，读者可以参看。

狱中答新闻报

（一九〇三年七月六日）

读《新闻报·论革命党》一篇，保皇拒俄阻法、义勇队国民会诸事，不知何人发端，而吾章炳麟未尝与焉。自十六七岁时读蒋氏《东华录》、《明季稗史》，见夫扬州、嘉定、戴名世、曾静之事，仇满之念固已勃然在胸。中岁主《时务报》，与康、梁诸子委蛇，亦尝言及变法。当是时，固以为民气获伸，则满洲五百万人必不能自立于汉土。其言虽与今异，其旨则与今同。昔为间接之革命，今为直接之革命，何有所谓始欲维新，终创革命者哉？《訄书》之作，与康、梁保皇同时。巴县邹容肄业日本，元旦演说，已大倡排满主义。此皆在拒俄阻法、义勇队国民会之先，孰云始为大清国民，无端而不认大清者？夫民族主义炽盛于二十世纪，逆胡羶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吾之序《革命军》，以为革命、光复，名实大异。从俗言之，则曰革命；从吾辈之主观言之，则曰光复。会朝清明，异于汤、武；攘除贵族，

异于山岳党。其为希腊、意大利之中兴则是矣，其为英、法之革命则犹有小差也。

逆胡挑衅，兴此大狱，盗憎主人，固亦其所。吾辈书生，未有寸刃尺匕足与抗衡，相延入狱，志在流血，性分所定，上可以质皇天后土，下可以对四万万人矣。而租界权利为外人所必争，坚持此狱，不令陷入内地。此自各行其志，与吾辈宗旨不同。既以租界为大罗，而欲轶出界外以求流血，此必不可得之数也。谁为吾辈请律师、筹讼费者？下狱之日，神气激扬，宁暇谋及此事！而以四万万人之公心，激于义愤，而相率奔走驰逐以图之。吾以致命遂志为心，彼以公理战胜为的，亦任其从旁规画而已！愚者不察，辄以始勇终怯，妄相诋诮，岂非见夏峰之营救，而讥左、魏之贪生耶？且今日狱事起于满洲政府，以满洲政府与汉种四万万人构此大讼，江督关道则满洲政府之代表，吾辈数人则汉种四万万人之代表。为四万万人者固欲本种之获伸，而不欲其为异种所胜，况乎满、汉争讼，则裁判之权自非满洲官吏所能有。以英、美诸国中立而判此狱，于法则宜，宁能听其阑出租界，使裁判之权悉归于诉讼人之手乎？此固四万万人之公心，而非吾辈所能阻止，亦非吾辈所当阻止者也。

去矣，新闻记者！同是汉种，同是四万万人之一分子，亡国覆宗，祀逾二百，奴隶牛马，躬受其辱。不思祀夏配天，光复旧物，而惟以维新革命，锱铢相较，大勇小怯，秒忽相衡，斥鷃井蛙，安足与知鲲鹏之志哉！去矣，新闻记者！浊醪夕引，素琴晨张，郁素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

暘。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无多聒聒可也。

【说明】 本文原载《苏报》一九〇三年七月六日（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二日），次日（七月七日），《苏报》即遭封闭。

狱中诗三首

狱中赠邹容

（一九〇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狱中闻沈禹希见杀

（一九〇三年八月四日）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螭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狱中闻湘人某被捕有感

（一九〇三年八月十日）

神狐善埋搰，高鸟喜回翔。保种平生愿，征科绝命方。

马肝原识味，牛鼎未忘香。千载《湘军志》，浮名是锁缰。

衡岳无人地，吾师洪大全。中兴沴诸将，永夜遂沈眠。长策惟干禄，微言是借权。藉君好颈子，来者一停鞭。

【说明】 以上三诗，录自《浙江潮》第七期，一九〇三年九月十一日（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二十日）出版，署名"太炎"。其中《狱中赠邹容》，注明撰于"闰五月廿八日"（七月二十二日）；《狱中闻沈禹希见杀》，注明撰于"六月十二日"（八月四日）；《狱中闻湘人某被捕有感》，注明撰于"六月十八日"（八月十日）。

按：沈禹希，即沈荩（沈克諴），曾参加自立军。一九〇三年七月十九日（闰五月廿五日）在京被拘，同月三十一日被清政府杖死于刑部。《狱中闻沈禹希见杀》一诗，除载于《浙江潮》外，又见《国民日日报》一九〇三年八月十四日和支那汉族黄中黄（章士钊）所撰《沈荩》一书。其中"中阴当待我"句，均作"中阴应待我"，与《浙江潮》异。又两书附有邹容"和诗"，幷录之如下：

"中原久陆沉，英雄出隐沦。举世呼不应，抉眼悬京门。一瞑负多疚，长歌召国魂。头颅当自抚，谁为墨新坟？"

又据许寿裳：《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制言》第二十五期），《狱中闻湘人某被捕有感》，原题《狱中闻湘人杨度被捕有感》。想系《浙江潮》将"湘人杨度"改为"湘人某"者。

狱中与吴君遂、张伯纯书

（一九〇三年）

君遂、伯纯鉴：自闰月六日[1]入狱，七日到案。逾数日得君遂手书，并墨银三百圆，资助讼费，高义薄云，感激无量。此案各领事与工部局坚持，不令陷入内地。伪关道袁树勋以兵五百人，解去号褂，潜伏新衙门后，将劫以入城，捕房戒严。传讯时，每一人以一英捕陪坐，马车复有英捕跨辕，数英捕驰车带剑，夹在前后，街巷隘口，亦皆以巡捕伺守，谋不得发。

既往听诉，则闻南洋法律官带同翻绎，宣说曰："中国政府到案。"曰："中国政府控告苏报馆大逆不道，煽惑乱党，谋为不轨"；曰："中国政府控告章炳麟大逆不道，煽惑乱党，谋为不轨"；曰："中国政府控告邹容大逆不道，煽惑乱党，谋为不轨"。乃各举书报所载以为证：贼满人、逆胡、伪清等语，一切宣读不讳。

噫嘻！彼自称为中国政府，以中国政府控告罪人，不

(1) 按：指一九〇三年六月三十日（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六日）。

在他国法院，而在己所管辖最小之新衙门，真千古笑柄矣。诉毕，钱、程二子，自辩本无干涉；仲岐代父入狱，亦已为大众所知，当可开释。弟与威丹，罪状自重。其所控我，自革命逐满外，复牵引玄烨、弘历、载湉小丑等语，以为干犯庙讳，指斥乘舆，不知律师如何申辩？龙积之无事可执，乃云系富有票会匪[1]，犯事在汉口，情节支离，不值一辩。最可笑者，新衙门委员孙某，不甚识字，觳觫殊甚，但云公等速说，我与公等无仇无怨而已。事毕，乘马车归捕房，观者填咽，诵"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而返。麟白。

【说明】 《狱中与吴君遂、张伯纯书》、《又致吴君遂》二书，均撰于一九〇三年，刊于《甲寅》第一卷第四十三号《太炎集外文》(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出版)。《甲寅》主编章士钊并加附识云："'苏报案'为革命史中大狱，当时甚为煊赫。愚固是报中主撰，名捕独免，此办案者江苏候补道俞恪士先生特私于愚，愚耻之而无如何。章、邹本可扬去，故意就逮，以示风节。狱中宁静之态，读此二书，可见一斑。是案本六人，号六君子。实则除章、邹外，惟龙积之(泽厚)略有时望。余三人，一陈仲岐，为苏报馆主陈梦坡之子；一陈〔程〕吉孚，为馆中帐房；一则钱保仁也。审此，革命党滥窃时名以终者，夫岂少哉，录竟怃然。士钊。"

---

① 一九〇〇年唐才常组织自立军起事时，曾散发"富有票"。

又致吴君遂

（一九〇三年）

君遂我兄左右：昨寄一函，计已昭察。今见西报，满洲以十万金易我辈头颅，抑何可哂！狱中近尚清洁。邹君本是同志；积之议论，亦复水乳交融；陈仲岐略有怨尤，亦尚宁静；无如程、钱二子，搅扰不安。钱保仁本镇江流氓，积之在镇江时，曾雇为佣役，后以诳骗銀钱一案，投入教会，今又在籍犯法，逃至上海，当张园演说时，满口胡言，自命为三点头目，且与积之书云："尔勿败我事，否则尔首领不保矣。"以是积之不敢明言。梦坡本有痰病，遂受其诈。常言某处有一金佛，可往取归，一生吃著不尽，而梦坡竟信之，欲以《苏报》交彼办理。幸仲岐窥破其诈，得以保守，然已骗去墨银三四百圆矣。前日禹稽亭来，彼亦相识，辄妄言我与张伯纯曾在某处谋开矿山，矿中五金皆具，似伯纯亦尝受其欺者。而其人识字甚少，所书俗语，亦如拉丁文大悲咒，不可猝解，不知梦坡何以称之？近阅《儒林外史》，每举洪憨仙烧银事，以为谈笑，彼竟不晓。又

时诵王褒《僮约》云：奴不听教，当笞一百，亦聊以为狱中谈柄也。此系奇事，特报君知。伯纯闻之，当为哑然。绛顿首。

【说明】 此书撰于一九〇三年，录自《甲寅》第一卷第四十三号《太炎集外文》（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出版）。

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

（一九〇三年八月九日）

科学兴而界说严，凡夫名词字义，远因于古训，近创于已见者，此必使名实相符，而后立言可免于纰缪。不然，观其概义则通，而加以演绎，则必不可通；观其固有名词则通，而证以事实，则必不可通，此之谓不成文义而已矣。中国文辞，素无论理，新学迭起，更立名号，亦或上本经典，点窜《诗》、《书》，徒取其名义相似，而宗旨则一切不顾，欺饰观听，侜张为幻。其最可嗤鄙者，则有格致二字。格致者何？日本所谓物理学也。一孔之儒，见《礼记·大学》有格物致知一语，而郑君旧注与温公、阳明诸说，皆素所未知，徒见元晦有云穷致事物之理者，以此妄学本义，固无足怪[1]；就如元晦所言，亦非以格竹为格物。徒以名词妄用，情伪混淆，而缪者更支离皮傅，以为西方声光电化有机无机诸学，皆中国昔时所固有，此以用名之误，而

① 《国民日日报汇编》作"以此妄相附会，遂谓物理学为格致，此其远于《大学》本义，固无足怪"。

貤缪及于实事者也。

其较诸格致尤缪者，则有维新二字。维新之语，始见于《大雅》，再见于伪《古文尙书》。如《大雅》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此谓以千数百年西岐之侯国，忽焉宠受帝眷，统一神州，而为万国之共主，是故谓之新命。若今之政府，则帝制自为也久矣，更安有所谓其命维新者？欲言维新，则惟有英雄崛起，历数在躬，而后得副此称尔，而妄者以维新为变法，其缪一也。

伪《古文尙书》，虽出自东晋人，而所辑旧文，皆有来历。况其书著录，迄今已有千四百余年，虽不必以《尙书》尊之，而自可以东晋学者之言尊之。如彼所说："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亦可见未有不先流血而能遽见维新者。特以神武不杀，哀者能胜，故无取乎漂橹成渠耳！而欲洒此旧污，则独夫元恶，本〔未〕有不斩之轻吕悬之太白者，若并此而不歼，则维新必不可就，而妄者以维新为温和主义，其缪二也。

且彼亦知新之为义乎？衣之始裁为之初，木之始伐谓之新，故衣一成后，不可复得初名；木一枯后，不可复得新名，犹人既老耄，无可以复得幼稚之名也。衣成矣，加以修饰，未尝不灿然耀目，而可以谓之修饰，不可以谓之初。木枯矣，加以黝垩，未尝不掩其朽腐，而可以谓之黝垩，不可以谓之新。新者，一人一代，不过一新而不可再。满洲之新，在康熙、雍正二世，今之政府，腐败蠹蚀，其材已不可复用，而欲责其再新，是何异责垂死之翁以呱啼哺乳也。

呜呼！不正其名而言其实，紾戾不通，至于如是，徒使人害于名则已耳！乃至指鹿为马，认贼作子。一言之失，而荼毒被于天下，非言无论理，字无界说，有以致之乎？自兹以后，三段之文，五旌之教，愿以是遍告全国八面论师新闻记者矣。

【说明】 本文原载《国民日日报》一九〇三年八月九日，署名“绛叔”，收入《国民日日报汇编》第一集（一九〇四年九月，东大陆图书译印局本）。

按：一九〇三年《苏报》被封后，章士钊、何梅士、陈去病、张继等于一九〇三年八月续创《国民日日报》，时称为“《苏报》第二”。清政府下令禁止售卖和阅读，《国民日日报》刊行数月即停刊。

祭沈禹希文

（一九〇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黄帝四千三百九十四年秋七月，□□等谨以清酌庶羞祭国士沈君之灵曰[1]：呜呼哀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纷建虏之横行，菹孑遗而为鲊。昔扬灵于洞庭，有而农与曾生。建《黄书》而为律，植攘夷以作经。粤洪氏之天德，挞汉武于胡清。列缺辟历下击埃眚兮，霩七十二峰而清明。旻天罔极，为反为侧。破镜群翔，国藩、林翼。緊荆楚与珠申，覆黄炎以深墨。沦三翮六翼使塡泗水兮，缨香木青珠而为繁勒。悼南土之不灵，藉国仇而骋力。呜呼哀哉！

荒荒衡岳泯无卉木兮，帝赤熛怒下监而悲伤。闪尸元气死以分离兮，铄镔銕鏐银以成光。六种震动师子夜吼兮，曰圣沈荩初度于沅湘。亮不读书而击剑兮，赍三戶

---

(1) 《沈藎》作“黄帝四千六百十四年秋七月朔，某等谨以清酌庶羞祭国士沈君之灵曰”；《国民日日报汇编》第四集无此句；《文录》作“岁在昭阳单阏、月在窒相，某某等谨以清酌庶羞奠国士沈君之灵曰”。

以巼秦。块抱关于大别兮，龙蛇虎豹坌沓而鱼鳞。遭夏口之涂地兮，吾将驰乎析木之津。津方冥冥兮，欧满交捽。单于西跳兮，蜩螗群沸。假太阿于哲人兮，烹千胡而啖其胏。何大功之不卒成兮，闐从怨于群憝。虹蜺旬始氛兹黄天兮，直北辰之方醉。嗟博进之不偿兮，愆干糇而犴狴。悲夫！丈夫固烹五鼎兮，况牺牲于胤族[1]。却外援于大东兮，漆吾身以待三木。盲风暴雨汨集若卢兮，果天民乎是椓。苍鹰击殿雅乌头白兮，群马悲鸣而生角。呜呼哀哉！

政变之狱，实陨谭、林。媚于天囚，厥死非祲。勤王之败，唐、傅是罹。为满干城，划类则宜。今钧天百神之忘震旦兮，方授人以金版。赍赤棒于膻胡兮，独芟夷兹姬汉。惟夫子之一瞑兮，泰皇、女娲之魂长往而不返。呜呼哀哉！

不有死者，谁申民气？不有生者，谁复九世？哀我遗黎，不绝如系。大波相续，云谁亡继？重曰：支那[2]有人兮君千万岁。像写良金兮云之外。魂归来兮淞江介。蜺为旌兮翠为盖。径路刀兮绵蕝位。犁清廷兮神哉沛。黄帝归兮，鼎湖返兮，汉土曼兮度无界。呜呼哀哉！尚飨。

【说明】 本文录自《浙江潮》第九期，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光绪二十九年九月三十日）出版；又见《国民日日报汇编》第四集（一九〇四年九月，东大陆图书译印局本），题为《上海公

---

(1) 《文录》作"况为牺以飨胤族"。

(2) "支那"，《沈藁》作"中国"，《文录》作"中夏"。

祭沈愚溪国士文»；亦见«沈荩»一书，题为«祭沈荩文»，署名“西狩”；收入«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改题为«沈荩哀辞»。

按：沈荩于一九〇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六月初八日）被清政府杖死于刑部，据«沈荩»一书所载，章文首有“黄帝四千六百十四年秋七月朔”句，«文录»作“岁在昭阳单阏”，则为光绪二十九年癸卯七月朔。“七月朔”为八月二十三日。又据«国民日日报汇编»，题为«上海公祭沈愚溪国士文»，章士钊：«疏黄帝魂»称：“«祭沈荩文»，此太炎狱中之笔，癸卯七月一日，开追悼会于愚园，吾于所设影堂前，宣读此文。”（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一九六一年十月中华书局出版。）则此文应为一九〇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公祭”沈荩而作，可见章氏在狱中与革命党人仍有联系。«国民日日报汇编»中多缺字，如“胡清”、“殪胡”、“洪氏”等，均以“□□”表之；又书刊所载，都有错字，今经互勘更正，不另一一加注。

沈荩序

（一九〇三年）

沈荩之杖死于宛平也，余在狱震恸，因以思唐才常、林圭等皆树勤王为职志，以丧要领，而荩死独异。荩之进化，速乎哉！当唐氏建国会时，荩与其议，余方以勤王、光复，议论不合，退而毁弃毛发以自表。唐氏败，荩则杖马箠走天津，与联军诸将士往来，伪庄王、启秀等，皆死其笔札间，其志将锄满人，使无遗育，以建设支那政府。功不卒就，其过勤王什伯。荩之进化，速乎哉！

勤王之党，今犹未艾，不镜于沈荩以自鞭策，是终身沦于幽谷，故余弟中黄辑其事状，以谏往者，而告邦人士大夫伯叔弟兄。

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西狩序。

【说明】 本文原载支那汉族黄中黄（章士钊）所撰《沈荩》一书，文中所云“余弟中黄”，即指章士钊而言。按：文末题“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则亦为一九〇三年所作。

致柳亚庐书

（一九〇三年十月）

亚庐仁弟左右：别数月，忽得《江苏》杂志，见弟所为《郑成功传》，曩吾睹弟之面，而今睹弟之心矣。杂志草创时，辞颇噎塞，数期以来，挥斥慷慨，神气无双，进步之速，斯为极点。而弟所纂《郑传》，亦于斯时发现，可谓智勇参会，飙起云合者也。

松岑到沪数次，询弟近况，知家庭雍穆，无所阻碍，为慰为快。亚魂、冶民，想时聚首，崇论闳议，亦能渐入俗耳否？

自教育会分散以来，爱国诸君，亦既票摇失所，常熟殷君复蹈水死，恐塔后亦少达者。昨闻浔溪公学又以小衅分裂。自兹以往，私设诸校，益凌迟衰微矣。同川之存，千钧系发，复得诸弟与松岑、□□、□□诸君①，尽力持护，一成一旅，芽蘖在兹。当使朱鹤龄、陈长发辈知后

①按：《复报》原作"□□、□□、□□诸君"，而《太炎先生遗札》则作"松岑诸君"。

起有人，积薪居上，亦令奴性诸甕，不以爱国分散之故，遂谓天下之莫予毒也。狱事稍懈，强寇昌狂，今也老矣，岁中当与弟辈握手，嘿坐以待。手肃，即颂纂祉。兄章炳麟白。

【说明】 此书撰于一九〇三年十月（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录自《复报》第五号（中华开国纪元四千六百四年——一九〇六年八月二十五日），署名“西狩”，原题《致□君书》。章氏逝世后，柳亚子辑《太炎先生遗札》，刊于《制言》第六十一期（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版），题称《致柳亚庐书》。

章氏撰此书时，正在“苏报案”发生后不久，等到《复报》刊布，章氏虽已出狱，但书中所有姓名字号，仍以□□表之，今据《太炎先生遗札》补出。书中所提姓名，松岑系指金天翮，亚魂系指陶亚魂，冶民系指蔡冶民；常熟殷君则为殷次伊，殷为中国教育会常熟支部负责人之一，与丁初我等创塔后小学，及“苏报案”起，愤懑自杀。书中排印错字，经互勘更正，不另加注。

失　　题

（一九〇三年）

流汗蒙头愧黑辛，赵家熏腐解亡秦。江湖满地呜呼派，只逐山膏善骂人。

【说明】 本文录自柳亚子：《太炎先生遗札》，系于“癸卯”，见《制言》第六十一期。

又，壬寅（一九〇二年）三月初一日出版的《选报》第十二期，载有《名学会摄影书后》诗二首，署名“支那夫”，其中一首即此。惟其中“解亡秦”作“足亡秦”，“善骂人”作“善詈人”，则此诗系写于壬寅而于癸卯写赠柳亚子的。另一首为：“天南余烬思皇会，江左清谈哲学家。地发杀机终爆裂，昭苏万蛰起龙蛇。”

孙逸仙题辞

（一九〇三年）

索虏昌狂泯禹绩，有赤帝子断其嗌[1]，
揜迹郑洪为民瞻[2]，四百兆人视兹册。

【说明】 《孙逸仙》一书，白浪庵滔天著，黄中黄（章士钊）译编，《荡虏丛书》之一。一九〇三年在日本出版。此系章氏卷首题辞。又见《汉帜》第二号（一九〇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文苑"栏旧民《旧民诗话》。

---

(1) 《汉帜》作"有赤帝子断其臂"。

(2) 《汉帜》作"揜迹郑洪为民辟"。

附：狱中与威丹唱和诗

（一九〇七年一月）

威丹素知雕刻摹篆之术，因窥小学，诵五百四十部首说解，皆略上口，而不习为韵语。既入狱，欲以诗歌遣闷。余曰："第为之，虽不工亦无害。"威丹即题《涂山》为一绝。涂山在蜀，世传涂山女故国也。其诗曰："苍崖坠石连云走，药叉带荔修罗吼。辛壬癸甲今何有，且向东门牵黄狗。"

余素疑威丹不能诗，及读是绝，奇谲似卢同、李贺，以为天才。戏作一绝和之曰："头如蓬葆犹遭购，足有旋轮未善驰。天为老夫留后劲，吾家小弟始能诗。"

狱久不决，量满洲政府意，余当重于威丹，计齿则余长威丹且二十岁，百年大剂，先死固其分也。《涂山》一绝，比于李斯之思上蔡，既非身具五刑，则斯言亦为泰过。不意斯人，先我彫殒！杨子有曰：苗而不秀者，吾家之童乌乎？威丹固蜀人，上揆童乌，所志已远，亦幸余非杨子，无寂寞投阁之诟耳。

狱事既决，狱卒始不以人道相待，时犹闭置空室，未

入铁槛，视狱卒陵暴状，相与咋舌裂眦。余语威丹:“尔我体皆弱，又不忍辱，与为白人陵藉而死也，无宁早自为计。然以禁锢期限计之，我三年，尔二年，尔当生，我当死。”威丹哽咽流涕曰:“兄死，余不得不死!”余曰:“不闻子胥兄弟事耶?且白人内相陵逼，而外犹恶其名。余死，彼惧烦言之不解也，必宽假尔。”因复议引决事，时刀索金环毒药诸物既被禁绝，惟饿死。威丹曰:“饿死，小丈夫事也。”余曰:“中国饿死之故鬼，第一伯夷，第二龚胜，第三司空图，第四谢枋得，第五刘宗周。若前三子者，吾不为；若后二子，吾为之。”因作绝命词三首，前二首与威丹联句成者；最后一绝，余续成之。

“击石何须博浪椎(邹)，群儿甘自作湘累。要离祠墓今何在(章)，愿借先生土一坯(邹)。”

“平生御寇御风志(邹)，近死之心不复阳(章)。愿力能生千猛士(邹)，补牢未必恨亡羊(章)。”

“句东前辈张玄箸，天盖遗民吕晦公。兵解神仙儒发冢，我来地水火风空(章)。”

既入铁槛，余断食七日不死，方五六日所，稍作欬，必呕血数刀圭。因忆周亚夫事，非必由愤懑致之，盖不食则血上溢也。同系者告余曰:“断食七日不必死，有素嗜鸎粟膏者，眩掉呕写，绝粒四十二日，犹故不死，况于彼为六分之一耶?”因复进食。然所食皆麦饭带稃，日食三合，粗粝鲠会咽，顾视便利，则麦复带稃而出，其不能输精成血可知。同系五百人，一岁死者百六十人，盖三分而瘐毙其一矣。余复谓威丹曰:“食亦死，知必死，吾有处之之道。”

自是狱卒陵藉，余亦以拳拟之，或夺其椎。固自知力不逮，亦太史公所谓知死必勇者，以是遭狱卒踶趹二次。印度人尤暴横，每举足不择腰膂腹背，既仆地，则数狱卒围而击之，或持椎捣其胸间，至闷绝，乃牵入铁槛中。以伤死者甚众，既无检尸具结之事，故恣肆无所顾忌。或时为医生检得，则罚金四五圆耳。而狱卒复造私刑为钳制计，其法以帆布为梏，反接两手缚之，加以木楔，名曰软梏。梏一小时许，则血管麻木，两臂如针刺状，虽巨盗弗能胜，号呼宛转，声彻全狱，其虐较拶指为甚。凡狱囚与外交通书札，则以此钳制之，故暴戾之状，不闻于外。余复受梏三次（自去岁上海罢市后，白人危惧，囚者始得稻食，狱卒陵暴，亦稍衰矣，而软梏至今犹存）。由今思之，可以致死者数矣。威丹略解英语，稍与委蛇，未罹斯酷，而威丹竟先余死，呜呼哀哉！

仲春二月，时近清明，积阴不开，天寒雨湿，鸡鸣未已，吾弟以亡，旦日十点钟顷，余始往视，距气绝八十〔小〕时矣，目犹未瞑，同系者亦多〈目〉为疑案，呜呼哀哉！

威丹既殁，白人稍善视余，使任执爨之役，因得恣意啖食。余之生，威之死为之也。假令业识不亡，复循旧趣，他日生千猛士，砉然可知。恨含敛时未令医师剖验，不知果以病终否耳。遗文泯绝，存此数章，愿与四百兆同种诵之。

章太炎先生答问

张　庸

（一九一二年）

壬子四月七日，章太炎先生自沪来通，从先生者为无锡孙北萱君。庸既谒太炎先生，因顾北萱君，谓章先生生平志行，予粗闻之，而不能了了，私窃为恨。今先生之来，通之人无弗愿闻先生历史者，君来有所操乎？北萱曰无。予曰：是宜有述。明日，南通统一党分部，假座商会，开会欢迎先生，农工商军学各界咸至，江易园先生招予同去，因是得再谒太炎先生，乘间问先生居东事。其答问如下：

问：先生何年东渡？

答：予之出狱也，在丙午六月，是月即东渡。

问：东渡何为？

答：不得已也。方出狱时，官判三日内出租界，不准停留；又出狱日，友人邀住中国公学（在租界外巴子路），公学之人皆惴惴，且虑有害予者，迫予去，故留三日即去。

问：欲害先生者为何人？

答：人言官场将使刺客刺予，实则未必有是事也。

问：出狱时孙中山曾遣人接先生，有此事否？

答：有之，曾遣人来。

问：先生到东何作？

答：东京民报馆办笔墨。

问：《民报》创者何人？

答：同盟会所设，胡汉民、汪精卫为主笔。方予将出狱时，胡、汪先有书来招，故就之。

问：住民报馆几年。

答：三年，其后为东京巡警总厅禁止出版。

问：何故禁止？

答：此难言也。时前清方遣唐少川赴美（时盛倡联美主义），日人忌之，藉禁《民报》以为见好中国起见，亦未可知。

问：禁止出版，有无理由？

答：突如其来，有何理由。

问：既无理由，警厅何以干涉？

答：彼谓我扰乱秩序，妨害治安。

问：何所指？

答：指报中登有《革命之心理》一篇，山西汤某所作。

问：先生辨乎？

答：如何弗辨。彼来传吾时，我方他出，及归，知有此事，即赴地方裁判厅起诉，彼邦辨护士五六辈，亦来助我。

问：先生胜乎？

答：理胜而事不胜。我语裁判长，扰乱治安，必有实证，我买手枪，我蓄刺客，或可谓扰乱治安，一笔一墨，几句文字，如何扰乱？厅长无言。我语裁判长，我之文字，或扇动人，或摇惑人，使生事端，害及地方，或可谓扰乱治安。若二三文人，假一题目，互相研究，满纸空言，何以谓之扰乱治安？厅长无言。我语裁判长，我言革命，我革中国之命，非革贵国之命，我之文字，即鼓动人，即扇惑人，扇惑中国人，非扇惑日本人，鼓动中国人，非鼓动日本人，于贵国之秩序何与？于贵国之治安何与？厅长无言。我语裁判长，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文明国法律皆然，贵国亦然，我何罪？厅长无言。我语裁判长，我言革命，我本国不讳言革命，汤、武革命，应天顺人，我国圣人之言也。故我国法律，造反有罪，革命无罪，我何罪。厅长无言。

问：究竟结果如何？

答：无结果，最后开庭，彼仍判禁止出版数字，判后不容人辨。惟曰：若不服者，可向上级官厅起诉。闻彼承内务省命令，弗能违也。

问：《民报》既停，先生作何生活？

答：讲学。

问：生徒何国人？

答：中国之留学生，师范班、法政班居多数，日本人亦有来听者，不多也。

问：人数多少？

答：先后百数十人。

问：先生讲何种学？

答：中国之小学及历史，此二者，中国独有之学，非共同之学。

问：先生何时归国？

答：去年九月。

问：先生归国，是否有人相招？

答：无。

此四月八日在商会问答语也，归而记之如是，然仅知先生半截耳。如何入狱？如何出狱？及其他事，仍不得知，心耿耿不能寐。明日早九时，师范校请先生演说，乃肃先生于校之寿松堂，复申前请。先生容貌霭然，意真而气和，有所叩，无弗应，若绝不厌人之琐琐其旁者。再答问语如下：

问：人言先生八九岁时，即有革命思想，然否？

答：是或有之，然少年非有一定宗旨也。

问：先生前清时曾应试否？

答：予少时多病，时文亦弄过，旋即废弃，未应试也，然亦适然耳，非有意为之。

问：先生是否从曲园先生游？

答：曲园先生，吾师也，然非作八股，读书有不明白处，则问之。

问：先生学问从何做起？

答：学问只在自修，事事要先生讲，讲不了许多。予小时多病，因弃八股，治小学，后乃涉猎经史，大概自求者为多。

问：先生著作出版者几种？

答：无甚著作，居东时略有之。

问：先生少时留学日本否？

答：未尝留学，曾去游历几次，两三月便回。

问：先生下狱在何年？

答：癸卯五月(前清光绪二十九年)。

问：被捕时在何处？

答：在上海爱国学社。

问：先生以何事被逮？

答：因《驳康有为书》。

问：书中何语？

答：康言保皇，予驳之，此书传布于外，因被祸。

此事尚有原因，时湖南陈范办《苏报》，大声倡革命，无所讳；蔡孑民办爱国学社，与群弟子大声讲革命，四出演说，亦无所讳。于是官场乃发难。

问：发难者为何人？

答：人皆言魏光焘(前清两江总督)，此自表面言之耳，其实别有人在。

问：先生被逮时状况如何？

答：先数日已得消息，未几《苏报》被封，陈范逃，蔡孑民与予议，谓舍走无他法，孑民遂走，予遂被逮。

问：被逮后柰何？

答：拘至会审公堂，英领事出《驳康书》问予，此书是你作的不是？予答是。遂送入英捕房，不准出。

问：自后如何定罪？

答：定罪甚奇，予住捕房十个月，甚闷。某日，会审公堂忽传予，谓上海道有文书来，北京外务部与各公使会议，定汝罪监禁西牢三年，是夕移入狱。

此事甚奇，外部掌外交，民刑事自有主管衙门，予罪乃烦外部判定；予为中国人，各公使为外国人，定予罪乃烦各公使会议，奇奇。

问：先生入狱后，曾受何等苦楚？

答：他无所苦，苦不准与人接谈，附耳一二语尚得，多则巡捕来干涉。

问：牢中能读书否？

答：不能，进狱时一物不得带，那得来书？然向主者要求，有时亦可得，惟洋装书不许入狱。

问：狱中能作字否？

答：不能，无笔无墨，那得作字？然欲作家书与寄朋友书，亦能要求得之，书须交主者阅过，乃肯代递。

问：然则先生在狱何作？

答：作工。

问：先生能工乎？

答：予作裁缝。

问：先生裁缝乎？

答：予縫袜底，縫衣时亦为之。

问：先生能縫何等衣？

答：犯人衣。（复笑曰：）草草縫去，不能工也。

问：犯人衣柰何？

答：粗布单衫，粗布单裤，皆牢中犯人所縫，犯人所著，予

亦著之。

问：此外尚有何工？

答：工甚多，击石子最苦。大抵牢中派事，亦视其人之能胜与否而任之，商人多派粗工，老犯人又欺侮之，故商人最苦。予所作皆轻工，盖已在优待之列矣。

问：先生裁缝外曾作何工？

答：予担任者二：缝袜底，一也；犯人衣上编号写字，二也。最后升一美缺，曰烧饭。

问：烧饭美缺乎？

答：牢中人以为甚美，厨房派八犯人，各司其事，混言之曰烧饭，予职实称饭也。每犯每顿各得饭重一磅，一律无多少，惟烧饭者之权利可偷饭，予之权利亦然。故予之此缺，他犯人皆极羡之。

问：牢中工作，有限制否？

答：时间有限制，每日作工八小时。作工多少无限制，予缝衣写字，随多随少，未尝限也。

问：牢中有私刑否？

答：此事无之。

问：牢中有索贿者否？

答：索则无之，若馈之金，亦未尝不受也。

问：牢中饮食如何？

答：星期日有肉吃，非星期日吃素菜。

问：予不善问，请先生更言其余。

答：牢中星期日停工，各犯得稍稍游行，惟有巡捕监视之。星期日必有教士来讲道，劝犯人改过，有数教士

恒至予室慰问，或作长谈，与教士谈，虽久，巡捕弗来干涉矣。

予在牢中，有不相识之西人，亦时来视予。

予在牢中，有西人携食物欲馈予，为巡捕所阻。

入牢时必换犯人衣，原有衣服，悉使脱去，有人代为收藏，俟出狱时给还。此事多有笑话，有冬月入狱，夏月释出者，脱去犯人衣，仍着皮袍而出。

犯人衣分冬夏两副，一副单衫单裤，一副棉袄棉裤，皆粗布为之。

三月底一律脱去棉衣，著单衣；九月底一律脱去单衣，著棉衣。此时最苦，体弱者中寒成病，或竟死，邹容亦死此牢中。

计牢中五百人，每年死者约百人，比牢外人，死较多矣。

每犯一室，室深八尺，广四尺，廊外装电灯。

衣服居处，还算洁净。

卧无被褥，每犯各给线毯一条。

饭：麦六分，米四分，初时粗粝难下咽，后亦习之。

问：邹容下狱，是否与先生同时？

答：是，予与渠曾在一室缝衣。

问：先生与邹容是否旧识？

答：非也，予在沪上，渠以所作《革命军》一书来请予改，因是相识。文字当使人易解，彼书尚好，予未为改也。

问：邹容之死，人谓有毒之者，信乎？

答：是或有之，然难言也。邹容在牢时，容色甚悴，若疯

若颠，夜不寐，大声骂人。且问之，渠似不知，人谓渠有精神病。牢中每星期必有医生来察视，犯人有病，则为之治，病甚者由医报告，送入病院。邹容病急时，已许某日某时出狱矣，先一夕服医生药，遂死。故外间生疑，多谓遇毒。

问：是时先生有忧乎？

答：忧之何益。然邹容死，外论颇哗，因是不毒我，亦未可知。虽然，我无病，进药亦无因也。

问：先生在牢中身体如何？

答：犯人多胖，予亦然。

问：先生何由出狱？

答：三年期满，彼乃释我。将出狱，先数日即送予至捕房，予定罪虽三年，然扣去捕房十个月，实住牢中二十六月也。

此四月九日在校中答问语也。惜先生匆匆去，未能尽所怀。又客与先生言者多，语辄中断，过时或得接续，或竟言他，不得接续，意有未尽，言有未竟，为可惜也。然而先生生平重踏叠困，陷坎入凶，历十余年而其气浩然，不以丝毫挠屈。观于此，亦可以得其略矣。今日奔走党事，将遍历乎长江流域，而海内之慕先生者，益延颈企踵而旦夕皇皇。诗曰：未见君子，惄如调饥。读是编也，或亦稍慰海内调饥之意乎？民国元年四月十二日，昆山张庸志。

【说明】 这里辑附章氏自撰《狱中与威丹唱和诗》和张庸在一九一二年所记《章太炎先生答问》。前文载《汉帜》第二期（一

九〇七年一月出版)，署名"太炎"。后文录自钱须弥编:《太炎最近文录》(一九一五年四月，国学书室本)。

在《狱中与威丹唱和诗》中，章氏历述与邹容在狱中斗争的情况。

《章太炎先生答问》则系章氏于一九一二年在南通时，与张庸问答的记录。按：据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二日《大共和日报》称：章氏曾于是年四月初，"应统一党南通县分部之邀，演说政见。"张庸"乘间"叩问，录成此篇。它对章氏革命思想的酝酿和发展有所记述；对"苏报案"的发生及其与日本帝国主义压抑《民报》革命言论的斗争均曾提到；对研究章氏早期革命思想和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后的革命活动，可资参考。但以《唱和诗》和《答问》参阅，其中亦有歧异，如《答问》谓："狱中有私刑否?"章答："此事无之。"而《唱和诗》则谓："而狱卒复造私刑为钳制计，其法以帆布为梏，反接两手缚之，加以木楔，名曰软梏。"疑《答问》有记录不实或有意点窜之处，宜加注意。

因二文都与一九〇三年"苏报案"有关，故辑入本卷，作为附录。



卷　二

（一九〇六年一——一九一一年十月）

编者按： 这里选录章太炎在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一年十月写的政治论文、演说辞、时评、函札、序跋、诗歌等，凡四十五篇。

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章氏出狱，中国同盟会派员至沪迎章赴日，担任《民报》主编。《民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创刊于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日本东京印刷。从第七号起（一九〇六年九月五日出版），由章氏主《民报》笔政。编至第十八号（一九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章氏以脑病辞职，由张继接办一期（十九号），陶成章接办三期（第二十——二十二号）。二十三号（一九〇八年八月十日出版）起，仍由章氏主编。出至二十四号时（一九〇八年十月十日出版），《民报》被封禁。在这一段时期中，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了不少重要政治论文，鼓吹革命排满，并和抵制革命的立宪党人展开尖锐的斗争。这些论文，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和章氏思想的重要

资料。

与此同时，章太炎曾在《汉帜》、《复报》等刊物，和宣传革命的书籍上，发表诗文或撰序介绍；他后来刊落的《诸子学略说》，也在《国粹学报》发表。这些，本卷也予选录。

《民报》封禁前后，章太炎与同盟会发生磨擦，旋和陶成章等重组光复会。又在日本讲学，先后完成《小学答问》、《新方言》、《文始》、《齐物论释》、《国故论衡》等专著，在语文、历史、哲学方面，均有创获，对近代学术产生很大影响；但一九〇九年后，他的政治论文，却相对地减少了。

本卷以《章氏丛书》没有收录的选辑为多，凡是编入《丛书》的，这里均按当时报刊发表时原文录出，据《丛书》校勘。并将立宪党人等的反面文章酌附于后，以供参考。

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

（一九〇六年七月十五日）

今日承诸君高谊，开会欢迎，实在愧不克当；况且自顾生平，并没有一长可恃，愈觉惭愧。只就兄弟平生的历史，与近日办事的方法，略讲给诸君听听。

兄弟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但两先生的话，却没有甚么学理。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当时对着朋友，说这逐满独立的话，总是摇头，也有说是疯颠的，也有说是叛逆的，也有说是自取杀身之祸的。但兄弟是凭他说个疯颠，我还守我疯颠的念头。

壬寅春天，来到日本，见著中山，那时留学诸公，在中山那边往来，可称志同道合的，不过一二个人。其余偶然来往的，总是觉得中山奇怪，要来看看古董，并没有热心

救汉的心思。暗想我这疯颠的希望，毕竟是难遂的了，就想披起袈裟，做个和尚，不与那学界政界的人再通问讯。不料监禁三年以后，再到此地，留学生中助我张目的人，较从前增加百倍，才晓得人心进化，是实有的。以前排满复汉的心肠，也是人人都有，不过潜在胸中，到今日才得发现。自己以前所说的话，只比得那"鹤知夜半，鸡知天明。"夜半天明，本不是那只鹤、那只鸡所能办得到的，但是得气之先，一声胶胶喔喔的高啼，叫人起来做事，也不是可有可无。到了今日，诸君所说民族主义的学理，圆满精致，真是后来居上，兄弟岂敢自居先辈吗？只是兄弟今日还有一件要说的事，大概为人在世，被他人说个疯颠，断然不肯承认，除那笑傲山水诗豪画伯的一流人，又作别论，其余总是一样。独有兄弟却承认我是疯颠，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颠，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为甚么缘故呢？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诸君且看那希腊哲学家琐格拉底，可不是有神经病的么？那提出民权自由的路索，为追一狗，跳过河去，这也实在是神经病。那回教初祖摩罕默德，据今日宗教家论定，是有脏燥病的。象我汉人，明朝熊廷弼的兵略，古来无二，然而看他《气性传》说，熊廷弼剪截是个疯子[1]。近代左宗棠的为人，保护满奴，残杀同类，原是不足道的。但他

① 按：《熊廷弼遗书》中有《性气先生传》，此处作《气性传》，疑误。

那出奇制胜的方略，毕竟令人佩服。这左宗棠少年在岳麓书院的事，种种奇怪，想是人人共知。更有德毕士马克，曾经在旅馆里头，叫唤堂官，沒有答应，便就开起枪来，这是何等性情呢？仔细看来，那六人才典功业，都是神经病里流出来的。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现面〕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略高一点的人，富贵利禄的补剂，虽不能治他的神经病，那艰难困苦的毒剂，还是可以治得的，这总是脚跟不稳，不能成就甚么气候。兄弟尝这毒剂，是最多的。算来自戊戌年以后，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以前三次，或因别事株连，或是普拿新党，不专为我一人；后来四次，却都为逐满独立的事。但兄弟在这艰难困苦的盘涡里头，并沒有一丝一毫的懊悔，凭你甚么毒剂，这神经病总治不好。或者诸君推重，也未必不由于此。若有人说，假如人人有神经病，办事必定瞀乱，怎得有个条理？但兄弟所说的神经病，并不是粗豪卤莽，乱打乱跳，要把那细针密缕的思想，装载在神经病里。譬如思想是个货物，神经病是个汽船，沒有思想，空空洞洞的神经病，必无实济；沒有神经病，这思想可能自动的么？以上所说，是略讲兄弟平生的历史。

至于近日办事的方法，一切政治、法律、战术等项，这都是诸君已经研究的，不必提起。依兄弟看，第一要在感

情，沒有感情，凭你有百千万亿的拿破仑、华盛顿，总是人各一心，不能团结。当初柏拉图说："人的感情，原是一种醉病"，这仍是归于神经的了。要成就这感情，有两件事是最‹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先说宗教。近来象宾丹、斯宾塞尔那一流人崇拜功利，看得宗教都是漠然。但若沒有宗教，这道德必不得增进，生存竞争，专为一己，就要团结起来，譬如一碗的干麨子，怎能团得成面？欧、美各国的宗教，只奉耶苏基督，虽是极其下劣，若沒有这基督教，也断不能到今日的地位。那伽得《社会学》中，已把斯宾塞‹尔›的话，驳辩一过。只是我们中国的宗教，应该用那一件？若说孔教，原有好到极处的。就是各种宗教，都有神秘难知的话杂在里头，惟有孔教，还算干净，但他也有极坏的。因为孔子当时，原是贵族用事的时代，一班平民，是沒有官做的，孔子心里，要与贵族竞争，就教化起三千弟子，使他成就做官的材料。从此以后，果然平民有官做了。但孔子最是胆小，虽要与贵族竞争，却不敢去联合平民，推翻贵族政体。他《春秋》上虽有"非世卿"的话，只是口诛笔伐，并不敢实行的，所以他教弟子，总是依人作嫁，最上是帝师王佐的资格，总不敢觊觎帝位。及到最下一级，便是委吏乘田，也将就去做了。诸君看孔子生平，当时摄行相事的时候，只是依傍鲁君，到得七十二国周游数次，日暮途穷，回家养老，那时并且依傍季氏，他的志气，岂不一日短一日么？所以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自

汉武帝专尊孔教以后，这热中于富贵利禄的人，总是日多一日。我们今日想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若夹杂一点富贵利禄的心，就象微虫霉菌，可以残害全身，所以孔教是断不可用的。若说那基督教，西人用了，原是有益；中国用了，却是无益。因中国人的信仰基督，并不是崇拜上帝，实是崇拜西帝。最上一流，是借此学些英文、法文，可以自命不凡；其次就是饥寒无告，要借此混日子的；最下是凭仗教会的势力，去鱼肉乡愚，陵轹同类。所以中国的基督教，总是伪基督教，并沒有眞基督教。但就是眞基督教，今日还不可用。因为眞基督教，若野蛮人用了，可以日进文明；若文明人用了，也就退入野蛮。试看罗马当年，政治学术，何等灿烂，及用基督教后，一切哲学，都不许讲，使人人自由思想，一概堵塞不行，以致学问日衰，政治日敝，罗马也就亡了。那继起的日耳曼种，本是野蛮贱族，得些基督教的道德，把那强暴好杀的心，逐渐化去，就能日进文明，这不是明白的证据么？今日的中国，虽不能与罗马并称，却还可称伯仲，断不是初起的日耳曼种可相比例。所以眞正的基督教，于中国也是有损无益。再就理论上说，他那谬妄可笑，不合哲学之处，略有学问思想的人，决定不肯信仰，所以也无庸议。孔教、基督教，既然必不可用，究竟用何教呢？我们中国，本称为佛教国。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但今日通行的佛教，也有许多的杂质，与他本教不同，必须设法改良，才可用得。因为净土一宗，最是愚夫愚妇所尊信的。他所求的，

只是现在的康乐，子孙的福泽。以前崇拜科名的人，又将那最混账的《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等，与净土合为一气，烧纸、拜忏、化笔、扶箕，种种可笑可丑的事，内典所没有说的，都一概附会进去。所以信佛教的，只有那卑鄙恶劣的神情，并没有勇猛无畏的气概。我们今日要用华严、法相二宗改良旧法。这华严宗所说，要在普度众生，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与人，在道德上最为有益。这法相宗所说，就是万法惟心。一切有形的色相，无形的法尘，总是幻见幻想，并非实在真有。近来康德、索宾霍尔诸公，在世界上称为哲学之圣。康德所说"十二范畴"，纯是"相分"的道理。索宾霍尔所说"世界成立全由意思盲动"，也就是"十二缘生"的道理，却还有许多哲理，是诸公见不到的。所以今日德人，崇拜佛教，就是为此。在哲学上今日也最相宜。要有这种信仰，才得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佛教里面，虽有许多他力摄护的话，但就华严、法相讲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所靠的佛祖仍是靠的自心，比那基督教人依傍上帝，扶墙摸壁，靠山靠水的气象，岂不强得多吗？

有的说中国佛教，已经行了二千年，为甚没有效果？这是有一要点。大概各教可以分为三项：一是多神教，二是一神教，三是无神教。也如政体分为三项：一是贵族政体，二是君主政体，三是共和政体。必要经过君主政体的阶级，方得渐入共和政体；若从这贵族政体，一时变成共和政体，那共和政体必带种种贵族的杂质。必要经过一神教的阶级，方得渐入无神教，若从这多神教一时变成无

神教，那无神教必带种种多神教的杂质。中国古代的道教，这就是多神教。后来佛教进来，这就是无神教。中间未经一神教的阶级，以致世人看佛，也是一种鬼神，与那道教的种种鬼神，融化为一。就是刚才所说的烧纸、拜忏、化笔、扶箕等类，是袁了凡、彭尺木、罗台山诸人所主张的。一般社会，没有一人不堕这坑中，所以佛教并无效果。如今基督教来，崇拜一神，借摧陷廓清的力，把多神教已经打破，所以再行佛教，必有效果可见的了。

有的说印度人最信佛教，为甚亡国？这又是一要点。因为印度所有，只是宗教，更没甚么政治法律。这部《摩拏法典》，就是婆罗门所撰定。从来没有政治法律的国，任用何教，总是亡国。这咎不在佛教，在无政治法律。我中国已有政治法律，再不会象印度一样。若不肯信，请看日本可不是崇信佛教的国么？可象那印度一样亡国么？

有的说佛教看一切众生，皆是平等，就不应生民族思想，也不应说逐满复汉。殊不晓得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必要除去。满州〔洲〕政府待我汉人种种不平，岂不应该攘逐？且如婆罗门教分出四性阶级，在佛教中最所痛恨。如今清人待我汉人，比那刹帝利种虐待首陀更要利害十倍。照佛教说，逐满复汉，正是分内的事。又且佛教最恨君权，大乘戒律，都说："国王暴虐，菩萨有权，应当废黜。"又说："杀了一人，能救众人，这就是菩萨行。"其余经论，王贼两项，都是并举。所以佛是王子，出家为僧，他看做王就与做贼一样，这更与恢复民权的话相合。所以提倡佛教，为社会道德上起见，固是最

要；为我们革命军的道德上起见，亦是最要。总望诸君同发大愿，勇猛无畏。我们所最热心的事，就可以干得起来了。

次说国粹。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兄弟这话，并不象做《格致古微》的人，将中国同欧洲的事，牵强附会起来；又不象公羊学派的人，说甚么三世就是进化，九旨就是进夷狄为中国，去仰攀欧洲最浅最陋的学说，只是就我中国特别的长处，略提一二：

先说语言文字。因为中国文字，与地球各国绝异，每一个字，有他的本义，又有引申之义。若在他国，引申之义，必有语尾变化，不得同是一字，含有数义。中国文字，却是不然。且如一个天字，本是苍苍的天，引申为最尊的称呼，再引申为自然的称呼。三义不同，总只一个天字。所以有《说文》、《尔雅》、《释名》等书，说那转注、假借的道理。又因中国的话，处处不同，也有同是一字，彼此声音不同的；也有同是一物，彼此名号不同的。所以《尔雅》以外，更有《方言》，说那同义异文的道理。这一种学问，中国称为“小学”，与那欧洲“比较语言”的学，范围不同，性

质也有数分相近。但是更有一事，是从来小学家所未说的，因为造字时代先后不同，有古文大篆沒有的字，独是小篆有的；有小篆沒有的字，独是隶书有的；有汉时隶书沒有的字，独是《玉篇》、《广韵》有的；有《玉篇》、《广韵》沒有的字，独是《集韵》、《类篇》有的。因造字的先后，就可以推见建置事物的先后。且如《说文》兄、弟两字，都是转注，并非本义，就可见古人造字的时代，还沒有兄弟的名称。又如君字，古人只作尹字，与那父字，都是从手执杖，就可见古人造字的时代，专是家族政体，父权君权，并无差别。其余此类，一时不能尽说。发明这种学问，也是社会学的一部。若不是略知小学，史书所记，断断不能尽的。近来学者，常说新事新物，逐渐增多，必须增造新字，才得应用，这自然是最要，但非略通小学，造出字来，必定不合六书规则。至于和合两字，造成一个名词，若非深通小学的人，总是不能妥当。又且文辞的本根，全在文字，唐代以前，文人都通小学，所以文章优美，能动感情。两宋以后，小学渐衰，一切名词术语，都是乱搅乱用，也沒有丝毫可以动人之处。究竟甚么国土的人，必看甚么国土的文，方觉有趣。象他们希腊、梨俱的诗，不知较我家的屈原、杜工部优劣如何？但由我们看去，自然本种的文辞，方为优美。可惜小学日衰，文辞也不成个样子。若是提倡小学，能够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这爱国保种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的。

第二要说典章制度。我个[们]中国政治，总是君权专制，本沒有甚么可贵，但是官制为甚么要这样建置？州

郡为甚么要这样分划？军队为甚么要这样编制？赋税为甚么要这样征调？都有一定的理由，不好将专制政府所行的事，一概抹杀。就是将来建设政府，那项须要改良？那项须要复古？必得胸有成竹，才可以见诸施行。至于中国特别优长的事，欧、美各国所万不能及的，就是均田一事，合于社会主义。不说三代井田，便从魏、晋至唐，都是行这均田制度。所以贫富不甚悬绝，地方政治容易施行。请看唐代以前的政治，两宋至今，那能仿佛万一。这还是最大最繁的事，其余中国一切典章制度，总是近于社会主义，就是极不好的事，也还近于社会主义。兄弟今天，略举两项 一项是刑名法律。中国法律，虽然近于酷烈，但是东汉定律，直到如今，沒有罚钱赎罪的事，惟有职官妇女，偶犯笞杖等刑，可以收赎。除那样人之外，凭你有陶朱、猗顿的家财，到得受刑，总与贫人一样。一项是科场选举。这科举原是最恶劣的，不消说了，但为甚隋、唐以后，只用科举，不用学校？因为隋、唐以后，书籍渐多，必不能象两汉的简单。若要入学购置书籍，必得要无数金钱。又且功课繁多，那做工营农的事，只可阁〔搁〕起一边，不能象两汉的人，可以带经而锄的。惟有律赋诗文，只要花费一二两的纹銀，就把程墨可以统统买到，随口咿唔，就象唱曲一般，这做工营农的事，也还可以并行不悖，必得如此，贫人才有做官的希望。若不如此，求学入官，不能不专让富人，贫民是沈沦海底，永无参预政权的日了。这两件事，本是极不好的，尙且带几分社会主义的性质，况且那好的么？我们今日崇拜中国的典章制度，

只是崇拜我的社会主义。那不好的，虽要改良；那好的，必定应该顶礼膜拜，这又是感情上所必要的。

第三要说人物事迹。中国人物，那建功立业的，各有功罪，自不必说，但那俊伟刚严的气魄，我们不可不追步后尘。与其学步欧、美，总是不能象的；何如学步中国旧人，还是本来面目。其中最可崇拜的，有两个人：一是晋末受禅的刘裕，一是南宋伐金的岳飞，都是用南方兵士，打胜胡人，可使我们壮气。至于学问上的人物，这就多了。中国科学不兴，惟有哲学，就不能甘居人下。但是程、朱、陆、王的哲学，却也无甚关系。最有学问的人，就是周秦诸子，比那欧洲、印度，或者难有定论；比那日本的物茂卿、太宰纯辈，就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了。日本今日维新，那物茂卿、太宰纯辈，还是称颂弗衰，何况我们庄周、荀卿的思想，岂可置之脑后？近代还有一人，这便是徽州休宁县人，姓戴名震，称为东原先生，他虽专讲儒教，却是不服宋儒，常说"法律杀人，还是可救；理学杀人，便无可救"。因这位东原先生，生在满洲雍正之末，那满洲雍正所作朱批上谕，责备臣下，并不用法律上的说话，总说"你的天良何在？你自己问心可以无愧的么？"只这几句宋儒理学的话，就可以任意杀人。世人总说雍正待人最为酷虐，却不晓是理学助成的。因此那个东原先生，痛哭流涕，做了一本小小册子，他的书上，并沒有明骂满洲，但看见他这本书，沒有不深恨满洲。这一件事，恐怕诸君不甚明了，特为提出。照前所说，若要增进爱国的热肠，一切功业学问上的人物，须选择几个出来，时常放在心里，这

是最紧要的。就是没有相干的人，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当初顾亭林要想排斥满洲，却无兵力，就到各处去访那古碑古碣传示后人，也是此意。

以上所说，是近日办事的方法，全在宗教、国粹两项，兄弟今天，不过与诸君略谈，自己可以尽力的，总不出此两事。所望于诸君的，也便在此两事。总之，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诸君，更传染与四万万人。至于民族主义的学理，诸君今日，已有余裕；发行论说刊刻报章的事，兄弟是要诸君代劳的了。

【说明】 章太炎于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初八日）出狱，同盟会派员迎章赴日，主办《民报》。东京留学生曾于七月十五日开会欢迎，本文即系章氏在欢迎会上的《演说辞》，它与民意：《纪七月十五日欢迎章炳麟枚叔先生事》，同载《民报》第六号，一九〇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版。

同期《民报》，章氏曾登"告白"云：

"接香港各报馆暨厦门同志贺电，感愧无量，惟有矢信矢忠，竭力致死，以塞诸君之望。特此鸣谢！"

《民报》另载"广告"称：

"本报社编辑人兼发行人张继君有南洋之行，适余杭章炳麟枚叔先生出狱来东，特继其任，自次号始。敢告读者。本报社白。"

诗 二 首

咏南海康氏

（一九〇六年七月十五日）

北上金台望国氛，对山救我带犹存！
夺门伟绩他年就，专制依然属爱新。

杂 感

（一九〇六年七月十五日）

万岁山边老树秋，瀛台今复见尧囚。
群公辛苦怀忠愤，尚忆扬州十日不？

谁教雨〔两〕犬竞呀呀，貂尾方山总一家。
恨少舞阳屠狗侣，扫除群吠在瀛华。

【说明】 以上二诗，录自《复报》第四号，中国开国纪元四千六百四年（一九〇六年）七月十五日出版，署名“西狩”。

与刘师培书

（一九〇六年八月）

《学报》钩微探赜，宣扬国光，诚所崇仰。独其中所录《公羊》诸说，时有未喻。严、颜立学，须以发策决科；劭公《解诂》，独推胡毋条例。彼既远在汉初，未睹《左氏》，随文发例，亦无瞢焉；劭公生值炎季，古文师说，灼然见明，然犹党同妒真，自誓墨守，捃摭纬候，多及百条，适足使人迷罔。魏晋以来，其书废阁，非无故也。

刘申受辈，当戴学昌明之世，研寻古义，苦其烦碎，拾此吐果，自名其家，固所以便文士。常州儒人，娼嫉最盛。古文辞之笔法受之桐城，乃欲自为一派，以相抗衡，其所谓今文学派者，志亦若是而已。然犹援据师说，语必有宗，不欲苟为皮傅。公羊学之所以为公羊学者，本贵墨守，不贵其旁通也。□□□耳食欧书，惊其瑰特，则又旁傅驺氏，通其说于赤县神州，至谓“雅言即翻译，翻译即改制”。荒谬诬妄，更仆难终。仆尝见其全书，举《庄子》玄圣素王之语，谓玄圣即周公，按玄圣即孔子，见《剧秦美新》。纬

书以孔子为水德，黑绿不代苍黄，故旧有玄圣之号。□氏以庙讳书玄圣作元圣，谓即周公。周公在古未有元圣之名，《逸周书》言元圣武夫，非指周公。为说称周公为元圣者，始于时文家之破题耳。□乃据以为说，伧陋实甚。此可谓全未读书者。今乃录其学说，不已过乎？

又□□□文学深湛，近世鲜其畴类，仆亦以为第二人也。而门下标榜，乃谓搀迹史迁，俾倪韩、柳，则亦誉过其职。鄙意提倡国学，在朴说而不在华辞，文学诚优，亦足疏录。然壮言自肆者，宜归淘汰。经术则专主古文，无取齐学。《穀梁》、《鲁诗》，皆可甄录；《公羊》、辕固，则无取焉。

君家世治《左氏》，诚宜笔其精粹，以示后生。仆亦素崇子骏，考迹《新论》，则知子政父子，非有异端。前已有一书言之。由此上窥，乃及贾生训诂。昔尝作《左氏读》，约有五十万言，藏在箧中，未示学者，曾以语君，求为编次。当时书箭已失，今复寻检得之。复欲他人编排年月，则已不可得矣。臣精销亡，又未能躬自第录，唯《叙录》一篇，文成二万，当觅书手迻写，更以寄君。窃谓申受见之，唯有匍匐却走耳。宋人程公说《春秋分记》，寻求未获，孙渊如尝赞是书，以为远过顾栋高辈，更望代为寻取。书此达意，兼问起居。如有德音，无吝金玉。

【说明】 此书原载《国粹学报》第二年丙午第十二号，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题《某君与某书》，《太炎文录》未曾收入。钱玄同：《章太炎黄季刚二君关于刘申叔君之文十首》题

《与刘光汉书三》,系于“前六年丙午”。

钱玄同辑录此书后，末附案语:“此书中第一□□□及注中之□，原文为‘廖季平’三字及‘廖’字。章公所讥廖氏之说,见《国粹学报》第十九期所载廖氏《公羊春秋补证后序》、《公羊验推补证凡例》、《春秋孔子改制本旨三十问题》三文之中,略一检寻,即可审知。至第二□□□，则原文为‘王壬秋’三字,此余昔年亲闻诸章公者。”查“雅言即翻译,翻译即改制”二语,即《春秋孔子改制本旨三十问题》之一。《国粹学报》第十九期，一九〇六年八月九日(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出版，则此书应写于八月之后。

诸子学略说

（一九〇六年九月）

所谓诸子学者，非专限于周秦，后代诸家，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为主。盖中国学说，其病多在汗漫。春秋以上，学说未兴，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故。故中国之学，其失不在支离，而在汗漫。自宋以后，理学肇兴。明世推崇朱氏，过于素王。阳明起而相抗，其言致良知也，犹云朱子晚年定论。孙奇逢辈遂以调和朱、陆为能，此皆汗漫之失也。

惟周秦诸子，推迹古初，承受师法，各为独立，无援引攀附之事，虽同在一家者，犹且矜己自贵，不相通融。故荀子非十二子，子思、孟轲亦在其列。或云子张氏之贱儒，子游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诟詈嘲弄，无所假借。《韩非子·显学篇》云：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

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眞孔、墨，孔、墨[1]不可复生，谁使定世之学乎[2]！此可见当时学者，惟以师说为宗，小有异同，便不相附，非如后人之忌狭隘、喜宽容、恶门戶、矜旷观也。盖观调和独立之殊，而知古今学者远不相及。佛家有言，何等名为所熏，若法平等，无所违逆，能容习气，乃是所熏。此遮善染，势力强盛，无所容纳，故非所熏。若法自在性，非坚密能受习气，乃是所熏。此遮心所。及无为法，依他坚密，故非所熏。见《成唯识论》。此可见古学之独立者，由其持论强盛，义证坚密，故不受外熏也。

或曰：党同门而妒道眞者，刘子骏之所恶，以此相责，得无失言。答曰：此说经与诸子之异也。说经之学，所谓疏证，惟是考其典章制度与其事迹而已。其是非且勿论也。欲考索者，则不得不博览传记，而汉世太常诸生，唯守一家之说，不知今之经典，古之官书，其用在考迹异同，而不在寻求义理。故孔子删定六经，与太史公、班孟坚辈，初无高下，其书既为记事之书，其学惟为客观之学，党同妒眞，则客观之学，必不能就，此刘子骏所以移书匡正也。若诸子则不然。彼所学者，主观之学，要在寻求义理，不在考迹异同。既立一宗，则必自坚其说，一切载籍，

① “孔、墨”二字原脱，据《韩非子·显学篇》补。

② 《韩非子·显学篇》作：“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

可以供我之用，非束书不观也。虽异己者，亦必睹其籍，知其义趣，惟往复辩论，不稍假借而已。是故言诸子，必以周秦为主。

古之学者，多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时，百姓当家，则务农商畜牧，无所谓学问也。其欲学者，不得不给事官府为之胥徒，或乃供洒扫为仆役焉。故《曲礼》云：宦学事师。学字本或作御。所谓宦者，谓为其宦寺也；所谓御者，谓为其仆御也。故事师者，以洒扫进退为职，而后车从者，才比于执鞭拊马之徒。观春秋时，世卿皆称夫子。夫子者，犹今言老爷耳。孔子为鲁大夫，故其徒尊曰夫子，犹是主仆相对之称也。《说文》云："仕，学也。"仕何以得训为学？所谓宦于大夫，犹今之学习行走尔。是故非仕无学，非学无仕，二者是一而非二也。学优则仕之言，出于子夏。子夏为魏文侯师。当战国时，仕学分途久矣，非古义也。秦丞相李斯议曰："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亦犹行古之道也。惟其学在王官，官宿其业，传之子孙，故谓之畴人子弟。见《史记·历书》。畴者，类也。汉律，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各从其父学，此之谓也。近世阮元作《畴人传》，以畴人为明算之称，非是。其后有儒家、墨家诸称，《荀子·大略篇》云：此家言邪学，所以恶儒者。当时学术相传，在其子弟，而犹称为家者，亦仍古者畴官世业之名耳。《史记》称老聃为柱下史，庄子称老聃为征藏史，道家固出于史官矣。孔子问礼老聃，卒以删定六艺，而儒家亦自此萌芽。墨家先有史佚，为成王师，其后墨翟亦受学于史角。阴阳家者，其所掌为文史星历之事，则《左氏》所载瞽史之徒，

能知天道者是也。其他虽无征验，而大抵出于王官。是故《汉·艺文志》论之曰：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此诸子出于王官之证。惟其各为一官，守法奉职，故彼此不必相通。《庄子·天下篇》云：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是也。亦有兼学二术者，如儒家多兼纵横，法家多兼名，此表里一体，互为经纬者也。若告子之兼学儒、墨，则见讥于孟氏，而墨子亦谓告子为仁，譬犹跂以为长，隐以为广，其弟子请墨子弃之。见《墨子·公孟篇》。进退失据，两无所容，此可谓调和者之戒矣。

今略论各家如左：

一论儒家。《周礼·太宰》言儒以道得民，是儒之得称久矣。司徒之官，专主教化，所谓三物化名。三物者，六德、六行、六艺之谓。是故孔子博学多能，而教人以忠恕。虽然，有商订历史之孔子，则删定《六经》是也；有从事教育之孔子，则《论语》、《孝经》是也。由前之道，其流为经师；由后之道，其流为儒家。《汉书》以周秦、汉初诸经学家录入《儒林传》中，以《论语》、《孝经》诸书录入《六艺略》中，此由汉世专重经术，而儒家之荀卿，又为《左氏》、《穀梁》、《毛诗》之祖，此所以不别经、儒也。若在周

秦，则固有别。且如儒家巨子，李克、宁越、孟子、荀卿、鲁仲连辈，皆为当世显人，而《儒林传》所述传经之士，大都载籍无闻，莫详行事。盖儒生以致用为功，经师以求是为职。虽今文古文，所持有异，而在周秦之际，通经致用之说未兴，惟欲保残守缺，以贻子孙，顾于世事无与。故荀卿讥之曰：鄙夫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免埤污庸俗。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见《非相篇》。此云腐儒，即指当时之经师也。由今论之，则犹愈于汉世经师，言取青紫如拾芥，较之战国儒家亦为少愈，以其淡于荣利云尔。

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盖孔子当春秋之季，世卿秉政，贤路壅塞，故其作《春秋》也，以非世卿见志，公羊家及左氏家张敞皆有其说。其教弟子也，惟欲成就吏材，可使从政。而世卿既难猝去，故但欲假借事权，便其行事。是故终身志望，不敢妄希帝王，惟以王佐自拟。观荀卿《儒效篇》云：大儒者，天子三公也。杨注，其才堪王者之佐也。小儒者，诸侯大夫士也。众人者，工农商贾也。是则大儒之用，无过三公，其志亦云卑矣。孔子之讥丈人，谓之不仕无义。孟子、荀卿皆讥陈仲，一则以为无亲戚君臣上下，一则以为盗名不如盗货。见《荀子·不苟篇》。而荀子复述太公诛华仕事。见《宥坐篇》。由其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见《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是儒家之湛心荣利，较然可知。所以者何？苦心力学，约处穷身，必求得雠，而后意歉，故曰："沽之哉！沽之哉！"不沽则吾道穷矣。

《艺文志》说儒家云，辟者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

哗众取宠。不知哗众取宠，非始辟儒，即孔子固已如是。庄周述盗跖之言曰:“鲁国巧伪人孔丘，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吞，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此犹曰道家诋毁之言也，而微生亩与孔子同时，已讥其佞，则儒家之真可见矣。孔子干七十二君，已开游说之端，其后儒家率多兼纵横者。见下。其自为说曰:“无可无不可。”又曰:“可与立，未可与权。”又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荀子曰:“君子时绌则绌，时伸而伸也。”见《仲尼篇》。然则孔子之教，惟在趋时，其行义从事而变，故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如《墨子·非儒》下篇讥孔子曰:

> 孔子穷于陈、蔡之间，藜羹不糂十日，子路为烹豚，孔丘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褫人衣以酤酒，孔丘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哀公迎孔丘，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进请曰:“何其与陈、蔡反也?”孔丘曰:“来!吾语汝!曩与汝为苟生，今与汝为苟义。”夫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赢饱，则伪行以自饰①。污邪诈伪，孰大于此。

其诈伪既如此。及其对微生亩也，则又以疾固自文，此犹叔孙通对鲁两生曰:“若真鄙儒不知时变也。”所谓中庸，实无异于乡愿。彼以乡愿为贼而讥之。夫一乡皆称愿人，此犹没身里巷、不求仕宦者也。若夫逢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则一国皆称愿人。所谓中庸者，

① “则”字原脱，据《墨子·非儒》下补。

是国愿也，有甚于乡愿者也。孔子讥乡愿，而不讥国愿，其湛心利禄又可知也。

君子时中，时伸时绌，故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必求其是，惟期便于行事则可矣。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俗谚有云："书中自有千钟粟。"此儒家必至之弊。贯于征辟、科举、学校之世，而无乎不遍者也。用儒家之理想，故宗旨多在可否之间，论议止于函胡之地。彼耶稣教、天方教，崇奉一尊，其害在堵塞人之思想，而儒术之害，则在淆乱人之思想，此程、朱、陆、王诸家所以有权而无实也。虽然，孔氏之功则有矣，变禨祥神怪之说而务人事，变畴人世官之学而及平民，此其功亦敻绝千古。二千年来，此事已属过去，独其热中竞进在耳。

次论道家。道家老子，本是史官，知成败祸福之事，悉在人谋，故能排斥鬼神，为儒家之先导。道家如老、庄辈，皆无崇信鬼神之事，列子稍近神仙，亦非如汉世方士所为也。《老子》"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等语，未知何指。道士依傍其说，推为教祖，实于老子无与，亦以怵于利害，胆为之怯，故事事以卑弱自持。所云无为权首，将受其咎，人皆取先，己独取后者，实以表其胆怯之征。盖前世伊尹、太公之属，《汉·艺文志》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皆为辅佐，不为帝王。学老氏之术者，周时有范蠡，汉初有张良，其位置亦相类，皆惕然于权首之戒者也。孔子受学老聃，故儒家所希，只在王佐，可谓不背其师说矣。

老子非特不敢为帝王，亦不敢为教主。故云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大抵为教主者，无不强梁，如释迦以勇猛无畏为宗，尊曰大雄，亦曰调御，而耶稣、穆罕默德辈，或称帝子，或言天使，遇事奋迅，有愍不畏死之风，此皆强梁之最也。老子胆怯，自知不堪此任，故云"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如是而已。然天下惟胆怯者权术亦多，盖力不能取，而以智取，此事势之必然也。老子云："道法自然。"太史论老、庄诸子，以为归于自然。自然者，道家之第一义谛，由其博览史事，而知生存竞争，自然进化，故一切以放任为主。虽然，亦知放任之不可久也。群龙无首，必有以提倡之，又不敢以权首自居。是故去力任智，以诈取人，使彼乐于从我，故曰：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老氏学术，尽于此矣。

虽然，老子以其权术授之孔子，而征藏故书，亦悉为孔子诈取。孔子之权术，乃有过于老子者。孔学本出于老，以儒道之形式有异，不欲崇奉以为本师，亦如二程子之学本出濂溪，其后反对佛老，故不称周先生，直称周茂叔而已。东原之学，本出婺原，其后反对朱子，故不称江先生，直称吾郡老儒江慎修而已。而惧老子发其覆也，于是说老子曰：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见《庄子·天运篇》。意谓己述六经，学皆出于老子，吾书先成，子名将夺，无可如何也。老子胆怯，不得不曲从其请。逢蒙杀羿之事，又其素所怵惕也。胸有不平，欲一举发，而孔氏之徒，遍布东夏，吾言朝出，首领可以夕断，于是西出函谷，知秦地之无儒，而孔氏

之无如我何，则始著《道德经》以发其覆。借令其书早出，则老子必不免于杀身，如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见《论衡·讲瑞篇》。犹以争名致戮，而况老子之陵驾其上者乎！呜呼！观其师徒之际，忌刻如此，则其心术可知，其流毒之中人，亦可知已。

庄子晚出，其气独高，不惮抨弹前哲，愤奔走游说之风，故作《让王》以正之；恶智力取攻之事，故作《胠箧》以绝之。其术似与老子相同，其说乃与老子绝异，故《天下篇》历叙诸家，已与关尹、老聃裂分为二。其褒之以至极，尊之以博大真人者，以其自然之说，为己所取法也。其裂分为二者，不欲以老子之权术自污也。或谓子夏传田子方，田子方传庄氏，是故庄子之学，本出儒家，其说非是。庄子所述，如庚桑楚、徐无鬼、则阳之徒多矣，岂独一田子方耶！以其推重子方，遂谓其学所出必在于是，则徐无鬼亦庄子之师耶？南郭子綦之说，为庄子所亟称，彼亦庄子师耶？

次论墨家。墨家者，古宗教家，与孔、老绝殊者也。儒家公孟言无鬼神。见《墨子·公孟篇》。道家老子言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是故儒、道皆无宗教。儒家后有董仲舒，明求雨禳灾之术，似为宗教。道家则由方士妄托，为近世之道教，皆非其本旨也。惟墨家出于清庙之守，故有《明鬼》三篇，而论道必归于天志，此乃所谓宗教矣。兼爱、尚同之说，为孟子所非；非乐、节葬之义，为荀卿所驳。其实墨之异儒者，并不止此。盖非命之说，为墨家所独胜。儒家、道家，皆言有命，其善于持论者，神怪妖诬之事，一切

可以摧陷廓清，惟命则不能破，如《论衡》有《命禄》、《气寿》、《幸遇》、《命义》等篇是也。其《命义篇》举儒、墨对辩之言曰：

> 墨家之论，以为人死无命。儒家之议，以为人死有命。言有命者，见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言无命者，闻历阳之都，一宿沈而为湖。秦将白起，坑赵降卒于长平之下四十万众，同时皆死。春秋之时，败绩之事，死者数万，尸且万数，饥馑之岁，饿者满道，温气疫疠，千戶灭门，如必有命，何其秦、齐同也？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众，一历阳之都，一长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当溺死，故相聚于历阳；命当压死，故相积于长平。犹高祖初起，相工入丰、沛之邦，多封侯之人矣，未必老少男女俱贵而有相也。卓跞时见，往往皆然，而历阳之都，男女俱没，长平之坑，老少并陷，万数之中，必有长命未当死之人，遭时衰微，兵革并起，不得终其寿。人命有长短，时有盛衰，衰则疾病被灾蒙祸之验也。宋、卫、陈、郑，同日并灾，四国之人，必有禄盛未当衰之人，然而俱灾，国祸临之也。故国命胜人命，寿命胜禄命。

凡言禄命而能成理者，以此为胜。

虽然，命者孰为之乎？命字之本，固谓天命。儒者既斥鬼神，则天命亦无可立。若谓自然之数，数由谁设，更不得其征矣。然墨子之非命，亦仅持之有故，未能言之成理也。特以有命之说，使其偷惰，故欲绝其端耳。其《非

命»下篇云：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能其颊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今王公大臣，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则必怠乎听狱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矣，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纴矣。是故非命者，不必求其原理，特谓于事有害而已。

夫儒家不信鬼神而言有命，墨家尊信鬼神而言无命，此似自相刺缪者。不知墨子之非命，正以成立宗教，彼之尊天右鬼者，谓其能福善祸淫耳。若言有命，则天鬼为无权矣。卒之盗跖寿终，伯夷饿夭，墨子之说，其不应者甚多，此其宗教所以不能传久也。又凡建立宗教者，必以音乐庄严之具感触人心，使之不厌。而墨子贵俭非乐，故其教不能逾二百岁。秦汉已无墨者。虽然，墨子之学，诚有不逮孔、老者，其道德则非孔、老所敢窥视也。

次论阴阳家。阴阳家亦属宗教，而与墨子有殊观。《墨子·贵义篇》云：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返焉。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人不得北，北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以戊己杀黄龙于中方。若用子之言，则是禁天下之行者也。"盖墨家言宗教，以善恶为祸福之标准，阴阳家言宗教，以趋避为祸福之标准，此其所以异也。或疑《七略》以阴阳家录入诸子，而《数术》自为一略，二者何以相异？

答曰：以今论之，实无所异，但其理有浅深耳。盖数术诸家，皆繁碎占验之辞，而阴阳家则自有理论，如《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邹奭子》十二篇，观《史记·孟荀列传》所述，邹衍之说，穷高极深，非专术家之事矣。《南公》三十六篇，即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者，是为豫言之图谶，亦与常占有异。如杨雄之《太玄》、司马光之《潜虚》、邵雍之《皇极经世》、黄道周之《三易洞玑》，皆应在阴阳家，而不应在儒家六艺家，此与蓍龟形法之属，高下固殊绝矣。

次论纵横家。纵横家之得名，因于从人横人，以六国抗秦为从，以秦制六国为横，其名实不通于异时异处。《汉志》所录，汉有《蒯子》五篇、《邹阳》七篇。蒯劝韩信以三分天子鼎足而居，邹阳仕梁，值吴、楚昌狂之世，其书入于纵横家，亦其所也。其他秦《零陵令信》一篇、《主父偃》二十八篇、《徐乐》一篇、《庄安》一篇，《待诏金马聊苍》一篇，身仕王朝，复何纵横之有。然则纵横者，游说之异名，非独外交颛对之事也。

儒家者流，热中趋利，故未有不兼纵横者，如《墨子·非儒》下篇记孔子事，足以明之：

> 孔丘之齐，见景公，景公欲封之以尼谿。晏子曰："不可。"于是厚其礼，留其封，数见而不问其道，孔乃恚怒于景公与晏子，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焉。归于鲁。有顷间，齐将伐鲁，告子贡曰："赐乎，举大事于今之时矣。"乃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劝之伐吴，以教高、国、鲍、

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乱。

《越绝书》内传《陈成恒篇》亦记此事云：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是则田常弑君，实孔子为之主谋，沐浴请讨之事，明知哀公不听，特借此以自文。此为诈谖之尤矣。便辞利口，覆邦乱家，非孔子、子贡为之倡耶？《庄子·胠箧》云：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举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窃钩者死，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此即切齿腐心于孔子之事也。

自尔以来，儒家不兼纵横，则不能取富贵。余观《汉志》儒家所列，有《鲁仲连子》十四篇、《平原老》七篇、《陆贾》二十三篇、《刘敬》三篇、《终军》八篇、《吾丘寿王》六篇、《庄助》四篇。此外，则有郦生，汉初谒者，称为大儒。而其人皆善纵横之术。其关于外交者，则鲁仲连说辛垣衍，郦生说田横，陆贾、终军、严助谕南越是也。其关于内事者，则刘敬请都关中是也。吾丘寿王在武帝前，智略辐辏，传中不言其事，寿王既与主父偃、徐乐、庄助同传，其行事宜相似。而平原老朱建者，则为辟阳侯审食其事，游说嬖人，其所为愈卑鄙矣。

纵横之术，不用于国家，则用于私人，而持书求荐者，又其末流。曹丘通谒于季布，楼护传食于五侯。降及唐世，韩愈以儒者得名，亦数数腾言当道，求为援手。乃知儒与纵横，相为表里，犹手足之相支、皮革之相附也。宋儒稍能自重。降及晚明，何心隐辈又以此术自豪。及满洲而称理学者，无不习捭阖，知避就矣。孔子称达者察言

观色，虑以下人，闻者色取行违，居之不疑。由今观之，则闻者与纵横稍远，而达者与纵横最近，达固无以愈于闻也。程、朱末流，惟是闻者；陆、王末流，惟是达者。至于今日，所谓名臣大儒，则闻达兼之矣。若夫纵人横人之事，则秦皇一统而后，业已灭绝，故《隋书·经籍志》中，惟存《鬼谷》三卷，而梁元帝所著《补阙子》与《湘东鸿烈》二书，不知其何所指也。

次论法家。法家者，略有二种，其一为术，其一为法。《韩非子·定法篇》曰：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然为术者，则与道家相近；为法者，则与道家相反。《庄子·天下篇》说慎到之术曰：椎拍輐断，与物宛转，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此老子所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也。此为术者与道家相近也。老子言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惧之。太史公《酷吏列传》亦引法令滋章、盗贼多有之说，而云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此为法者与道家相反也。亦有兼任术法者，则管子、韩非是也。《汉志》，《管子》列于道家，其《心术》、《白心》、《内业》诸篇，皆其术也，《任法》、《法禁》、《重令》诸篇，皆其法也。韩非亦然，《解老》、《喻老》，本为道家学说。少尝学于荀卿，荀卿隆礼义而杀诗书，经礼三百，固周之大法也。韩非合此二家，以成一家之说，亦与管子相类。惟《管子·幼

宦》诸篇，尚兼阴阳，而韩非无此者，则以时代不同也。后此者惟诸葛亮专任法律，与商君为同类。故先主遗诏，令其子读《商君书》，见裴松之《三国志注》引《诸葛亮集》。知其君臣相合也。其后周之苏绰、唐之宋璟，庶几承其风烈。

然凡法家必与儒家、纵横家反对，惟荀卿以儒家大师，而法家韩、李为其弟子，则以荀卿本意在杀诗书，固与他儒有别。韩非以法家而作《说难》，由其急于存韩，故不得不兼纵横耳。其他则与儒家、纵横家未有不反唇相稽者[1]。《商君·外内篇》曰：奚为淫道，为辩知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此兼拒儒与纵横之说也。《靳令篇》曰：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此专拒儒者之说也。《韩非·诡使篇》曰：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婴上而不得见，巧言利辞[2]，行奸轨以幸偷世者数御。《六反篇》曰：游居厚养，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曲语牟知[3]，伪诈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辩智之士"。此拒纵横家之说也。《五蠹篇》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显学篇》曰：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主必从而礼之。国平则养儒侠，难至则用介士，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所以乱也。此拒儒家之说也。《五蠹篇》曰：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此拒一切学者之说也。至汉公孙弘、董仲舒辈，本

① 原作"其余则与儒家从纵横未有不反唇相稽者"，据国学讲习会本改。

② 原作"巧言利群"，据《韩非子·诡使篇》改。

③ 《韩非子·六反篇》作"语曲牟知"。

是经师。其时经师与儒已无分别。弘习文法吏事，而缘饰以儒术；仲舒为《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以应廷尉张汤之问，儒家、法家，于此稍合。自是以后，则法家专与纵横家为敌，严助、伍被，皆纵横家，汉武欲薄其罪，张汤争而诛之。主父偃亦纵横家，汉武欲勿诛，公孙弘争而诛之。而边通学短长之术，亦卒谮杀张汤。诸葛治蜀，赏信必罚，彭羕、李严，皆纵横之魁桀，故羕诛而严流。其于儒者，则稍稍优容之。盖时诎则诎，能俯首帖耳于法家之下也。然儒家、法家、纵横家，皆以仕宦荣利为心，惟法家执守稍严，临事有效。儒家于招选茂异之世，则习为纵横；于综核名实之世，则吡于法律。纵横是其本真，法律非所素学。由是儒者自耻无用，则援引法家以为己有。南宋以后，尊诸葛为圣贤，亦可闵已。然至今日，则儒、法、纵横，殆将合而为一也。

次论名家。名家之说，关于礼制者，则所谓"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也。关于人事百物者，则所谓"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也。《庄子·天下篇》云：《春秋》以道名分，非特褒贬损益而已。《穀梁传》曰：陨石于宋五，先陨而后石何也，陨而后石也。于宋四竟之内曰宋[1]。后数，散辞也，耳治也。六鹢退飞过宋都。先数，聚辞也，目治也。石、鹢且犹尽其辞，而况于人乎说曰：陨石，记闻也，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六鹢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飞，是关于散名者也。凡正名者，亦非一家之术，儒、道、

① "四竟"，原作"西竟"，据《春秋穀梁传·僖公十六年》改。

墨、法，必兼是学，然后能立能破，故儒有荀子《正名》，墨有《经说》上、下，皆名家之眞谛，散在余子者也。若惠施、公孙龙辈，专以名家著闻，而苟为鉥析者多，其术反同诡辩。故先举儒家荀子《正名》之说，以征名号。其说曰:

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香、臭、芬、郁、腥、臊、洒、酸、奇臭，以鼻异；疾、养、沧、热、滑、鈹、轻、重，以形体异。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此所缘而以同异也。

然后随而命之，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又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又别，至于无别然后止。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状同而为异所者，虽可合，谓之二实。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此事之所以稽实定数也。此制名之枢要也。

按此说同异何缘，曰缘天官。中土书籍少言缘者，故

当征之佛书。大凡一念所起，必有四缘：一曰因缘，识种是也；二曰所缘缘，尘境是也；三曰增上缘，助伴是也；四曰等无间缘，前念是也。缘者是攀附义。此云缘天官者，五官缘境，彼境是所缘缘，心缘五官见分，五官见分是增上缘，故曰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五官非心不能感境，故同时有五，俱意识为五官，作增土缘。心非五官不能征知，故复借五官见分为心作增上缘。五官感觉，惟是现量，故曰五官簿之而不知。心能知觉，兼有非量、比量，初知觉时，犹未安立名言，故曰心征之而无说。征而无说，人谓其不知，于是名字生焉。

大抵起心分位，必更五级：其一曰作意，此能警心令起；二曰触，此能令根即五官、境识三和合为一；三曰受，此能领纳顺违俱非境相；四曰想，此能取境分齐；五曰思，此能取境本因。作意与触，今称动向，受者今称感觉，想者今称知觉，思者今称考察。初起名字，惟由想成，所谓口呼意呼者也。继起名字，多由思成，所谓考呼者也。凡诸别名，起于取像，故由想位口呼而成。凡诸共名，起于概念，故由思位考呼而成。同状异所，如两马同状，而所据方分各异；异状同所，如壮老异状，而所据方分是同。不能以同状异所者，谓为一物；亦不能以异状同所者，谓为二物。然佛家说六种言论，有云众法聚集言论者，谓于色、香、味、触等事和合差别，建立宅舍，瓶衣车乘军林树等种种言论，有云非常言论者，或由加行谓于金段等起，诸加行造环钏等异，庄严具，金段言舍，环钏言生。或由转变，谓饮食等于转变时，饮食言舍便秽言生。见《瑜伽师

地论》。然则同状异所者，物虽异而名可同，聚集万人，则谓之师矣。异状同所者，物虽同而名可异，如卵变为鸡，则谓之鸡矣。荀子未言及此，亦其鉴有未周也。

次举《墨经》以解因明。其说曰：

> 故所得而后成也。《经上》。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无然，若见之成见也。体若二之一，尺之端也。《经说上》。

荀子惟能制名，不及因名之术，要待墨子而后明之。何谓因明？谓以此因明彼宗旨。佛家因明之法，宗因喻三分为三支，于喻之中，又有同喻异喻。同喻异喻之上，各有合离之言词，名曰喻体，即此喻语，名曰喻依，如云声是无常，宗。所作性故，因。凡所作者，皆是无常，同喻如瓶。凡非无常者，皆非所作。异喻如太空。喻。墨子之"故"，即彼之"因"，必得此因，而后成宗，故曰"故所得而后成也"。小故大故，皆简因喻过误之言，云何小故，谓以此大为小之因。盖凡"因"较宗之"后陈"，其量必减，如以所作成无常，而无常之中，有多分非所作者，若海市电光，无常起灭，岂必皆是所作。然凡所作者，则无一不是无常。是故无常量宽，所作量狭，今此同喻合词。若云凡无常者，皆是所作，则有"倒合"之过，故曰"有之不必然"。谓有无常者，不必皆是所作也。然于异喻离词，若云凡非无常者，皆非所作，则为无过，故曰"无之必不然"。谓无无常者，必不是所作也。以体喻宽量，以端喻狭量，故云"体也若有端"。云何大故？谓以此大为彼大之因。如云声是无常不遍性，故不遍之与无常，了不相关，其量亦无宽狭。

既不相关，必不能以不遍之因，成无常之宗，故曰“有之必无然”。二者同量，若见与见，若尺之前端后端，故曰“若见之成见也，体若二之一，尺之端也”。

近人或谓印度三支，即是欧洲三段。所云宗者，当彼断按；所云因者，当彼小前提；所云同喻之喻体者，当彼大前提。特其排列逆顺，彼此相反，则由自悟悟他之不同耳。然欧洲无异喻，而印度有异喻者，则以防其倒合，倒合则有减量换位之失。是故示以离法，而此弊为之消弭。村上专精据此以为因明法式长于欧洲。乃墨子于小故一条已能如此，是亦难能可贵矣。若鸡三足、狗非犬之类，诡辩繁辞，今姑勿论。

次论杂家。杂家者，兼儒、墨，合名、法，见王治之无不贯，此本出于议官。彼此异论，非以调和为能事也。《吕氏春秋》、《淮南》内篇，由数人集合而成，言各异指，固无所害，及以一人为之，则漫羡无所归心，此《汉志》所以讥为荡者也。《韩非子·显学篇》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世以为[1]俭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世以为孝而礼之。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俭、侈，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夫是漆雕之廉，将非宋荣之恕也；是宋荣之宽，将非漆雕之暴也。今宽、

① 《韩非子·显学篇》作“世主以为”，下同。

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礼之。自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争而人主俱听之；故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举，安得无乱乎？韩非说虽如是，然欲一国议论如合符节，此固必不可得者。学术进行，亦借互相驳难，又不必偏废也。至以一人之言而矛盾自陷，俛仰异趋，则学术自此衰矣。东汉以来，此风最盛，章氏《文史通义》谓近人著作，无专门可归者，率以儒家、杂家为蛇龙之菹，信不诬也。

次论农家。农家诸书，世无传者，《氾胜之书》，时见他书征引，与贾思勰之《齐民要术》、王桢之《农书》义趣不异。若农家止于如此，则不妨归之方技，与医经经方同列。然观《志》所述云："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则许行所谓神农之言犹有存者。《韩非·显学篇》云：今世之学士语治者，多曰："与贫穷地，以实无资。"是即近世均地主义，斯所以自成一家欤？

次论小说家。周秦、西汉之小说，似与近世不同。如《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臣寿周纪》七篇、《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与近世杂史相类，比于《西京杂记》、《四朝闻见录》等，盖差胜矣。贾谊尝引《青史》，必非谬悠之说可知。如《伊尹说》二十七篇、《鬻子说》十九篇、《宋子》十八篇、《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则其言又兼黄老。《庄子·天下篇》举宋钘、尹文之术，列为一家，荀卿亦与宋子相难。今尹文入名家，而宋子只入小说，此又不可解者。以意揣之，宋子上说下教，强聒不舍，见《庄

子·天下篇》。盖有意于社会道德者。所列黄老诸家，宜亦同此。街谈巷议，所以有益于民俗也。《笑林》以后，此指渐衰，非刍荛之议矣。

上来所述诸子，凡得十家，而《汉志》称九流者，彼云九家可观，盖小说特为附录而已。就此十家论之，儒、道本同源而异流，与杂家、纵横家合为一类，墨家、阴阳家为一类，农家、小说家为一类，法家、名家各自独立，特有其相通者。

【说明】 本文原载《国粹学报》第二年丙午第八、第九号，一九〇六年九月八日、十月七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八月二十日）出版，署名“章绛”。同年九月，《国学讲习会略说》出版，日本秀光社铅字排印本，内有《论诸子学》，即本文。此后，《章太炎文钞》曾辑入，《文录》则刊落。今录自《国粹学报》。又，《国学讲习会略说》本末后尚有“两汉以后，著述尚多，以时日迫促，却后再论”数句。

洪秀全演义序

（一九〇六年十月）

演义之萌芽，盖远起于战国。今观晚周诸子说上世故事，多根本经典，而以己义增饰，或言或事，率多数倍。若《六韬》之托于太公，则演其事者也；若《素问》之托于岐伯，则演其言者也。演言者，宋、明诸儒因之为《大学》衍义；演事者，则小说家之能事，根据旧史，观其会通，察其情伪，推己意以明古人之用心，而附之以街谈巷议，亦使田家妇子知有秦、汉至今帝王师相之业。不然，则中夏齐民之不知国故，将与印度同列。然则演事者虽多皮傅，而存古之功亦大矣。禺山世次郎作《洪秀全演义》，盖比物斯志者也。余惟满洲入据中国全土，且三百年，自郑氏亡而伪业定，其间非无故家遗民推刃致果，然不能声罪以章讨伐，虏未大创，旋踵即仆，微洪王，则三才毁而九法斁。洪王起于三七之际，建旗金田，入定南都，握图籍十二年，旌旄所至，执讯获丑，十有六省，功虽不就，亦雁行于明祖。其时朝政虽粗略未具，而人物方略，多可观者。若石达

开、林启荣、李秀成之徒，方之徐达、常遇春，当有过之。虏廷官书虽载，既非翔实，盗憎主人，又时以恶言相詆。近时始有搜集故事，为太平天国战史者，文辞骏骤，庶足以发潜德之幽光，然非里巷细人所识。夫国家种族之事，闻者愈多，则兴起者愈广。诸葛武侯、岳鄂王事，牧猪奴皆知之，正赖演义为之昭宣令闻。次郎为此，其遗事既得之故老，文亦适俗。自兹以往，余知尊念洪王者，当与尊念葛、岳二公相等。昔人有言：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洪王朽矣，亦思复有洪王作也。

丙午九月，章炳麟序。

【说明】《洪秀全演义》，禺山世次郎（黄世仲，字小配）撰。一九〇五年起，连载于《有所谓报》和《少年报》，凡五十四回而止。次年（一九〇六年），香港中国日报社始发行完整的六十四回本，卷首有章氏序文，注明撰于是年十月（丙午九月）。

革命之道德

（一九〇六年十月八日）

古之所谓革命者，其义将何所至耶？岂不曰天命无常，五德代起，质文相变，礼时为大耶？夫如是，则改正朔、易服色、异官号、变旗识，足以尽革命之能事矣。名不必期于背古，而实不可不务共惬心。吾所谓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复也，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以此光复之实，而被以革命之名。呜呼！天步艰难，如阪九折，墨翟、禽滑厘之侍，犹不能期其必效，又乃况于柔脆怯弱如吾属者。世无黄中通理之人，而汲汲焉以唇舌相斫，论议虽笃，徒文具耳！旷观六合之邦家，虽起废不常，盛衰相复，若其沦于异族，降为台隶者，则亦鲜有；有之，必素无法律政治与愚昧无知之民也。中国之学术，章章如彼，其民不可谓愚。秦、汉以降，政虽专制，非无宪章著于官府，良治善法，足以佐百姓者，亦往往而有。举吾炎頊嬴刘之苗裔，提封万里，民籍巨亿，一旦委而弃之于胡羯，其根本竟安在耶？晋之乱于五胡也，

桓温、刘裕起而振之；宋之割于女眞也，岳飞、虞允文出而匡之；蒙古不道，宰割诸夏，改玉改步，人无异心，濠州眞人，奋臂大泽之间，元政瓦解，北方郡县，传檄而定。综观往古戎夏交捽之事，侵入者不过半壁，全制者不逾百年，硕果虽食，不远而复。今者，满洲之在中国，疆域已一统矣，载祀已三百矣，川楚磨顶于前，金田跻足于后，陨身赤族，卒无一成，是孰使之然耶？昔王而农发愤于晚明之丧，推而极之，至于孤秦陋宋，以为藩鎮削弱，州郡无兵，故夷狄之祸日亟，此可为汉族自治之良箴，非所论于覆亡之后也。

近世学者，推寻祸始，以为宋世儒者妄论《春秋》，其教严于三纲，其防弛于异族，故逆胡得利用其术以阻遏吾民爱国之心。然自季明以后，三纲之名虽存，其实废久矣。而里巷鄙人之言鞑靼者，犹相率以为鄙夷之名，是其心亦未尝泯绝也。或者又谓祸本之成，咎在汉学，虽日本人亦颂言之。夫讲学者之媠于武事，非独汉学为然。今以中国民籍，量其多少，则识字知文法者，无过百分之二；讲汉学者，于此二分，又千分之一耳！且反古复始，人心所同，裂冠毁冕之既久，而得此数公者，追论姬汉之旧章，寻绎东夏之成事，乃适见犬羊殊族，非我亲昵。彼意大利之中兴，且以文学复古为之前导，汉学亦然，其于种族，固有益无损已。于此数者，欲寻其咎而咎卒不可得，微芒暗昧，使人疑眩。冥心而思之，寤寐而求之，其衅始于忽微，其积坚于盘石。呜呼！吾于是知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也。

今与邦人诸友,同处革命之世，偕为革命之人,而自顾道德，犹无以愈于陈胜、吴广，纵令瘏其口、焦其唇、破碎其齿颊,日以革命号于天下，其卒将何所济？道德者，不必甚深言之,但使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则可矣。虽然,吾闻古之言道德者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今之言道德者曰:公德不逾闲,私德出入可也。道德果有大小公私之异乎？于小且私者,苟有所出入矣；于大且公者,而欲其不逾闲,此乃迫于约束，非自然为之也。政府既立,法律既成,其人知大且公者之逾闲，则必不免于刑戮；其小且私者，虽出入而无所害。是故一举一废,应于外界而为之耳。政府未立,法律未成，小且私者之出入，刑戮所不及也；大且公者之逾闲，亦刑戮所不及也。如此,则恣其情性,顺其意欲,一切破败而毁弃之,此必然之势也。吾辈所处革命之世，此政府未立，法律未成之世也。方得一芥不与，一芥不取者,而后可与任天下之重。若曰有狙诈如陈平、倾险如贾诩者，吾亦可以因而任之，此自政府建立后事,非今日事也。今世之言革命者,则非直以陈平、贾诩为重宝,而方欲自效陈平、贾诩之所为,若以此为倜傥非常者。悲夫！悲夫！

方今中国之所短者,不在智谋而在贞信,不在权术而在公廉,其所需求，乃与汉时绝异。楚、汉之际，风尚淳朴,人无诈虞,革命之雄,起于吹箫编曲。汉祖所任用者，上自萧何、曹参,其下至于王陵、周勃、樊哙、夏侯婴之徒，大抵木强少文,不识利害。彼项王以勇悍仁强之德,与汉氏争天下,其所用皆廉节士。两道德相若也,则必求一不

道德者而后可以获胜，此魏无知所以斥尾生、孝己为无用，而陈平乃见宝于汉庭矣。

季汉风节，上轶商、周，魏武虽任刑法，所用将士，愍不畏死，而帷幄之中，参豫机要者，钟、陈、二荀，皆刚方皎白士也。有道德者既多，亦必求一不道德者而后可以获胜，故贾诩亦贵于霸朝矣。其所见贵者，以其时倾险狙诈之才不可多得而贵之也。庄周云："药也，其实堇也，豕零也，鸡痈也，桔梗也，是时为帝者也。"风教陵夷，机械日构，至于今日，求一质直如萧、曹，清白如钟、陈、二荀，奋厉如王陵、周勃、樊哙、夏侯婴者，则不可得；而陈平、贾诩所在有之。尽天下而以诈相倾，甲之诈也，乙能知之；乙之诈也，甲又知之；其诈即亦归于无用。甲与乙之诈也，丙与丁疑之；丙与丁之诈也，甲与乙又疑之。同在一族，而彼此互相猜防，则团体可以立散。是故人人皆不道德，则惟有道德者可以获胜，此无论政府之已立未立，法律之已成未成，而必以是为臬矣。

谈者又曰：识世务者，存乎俊杰，所谓英雄，在指麾而定尔。世有材桀敢死之士，吾能任之，使为己死，则大业可成，逆胡可攘。若必亲莅行陈，以身殉事，此无异于斗鸡狗者，亦天下之大愚也。呜呼！为是言者，若云天下可以不战而定，则亦已矣；若犹待战，宁有不危而获者。最观上世之事，汉高与项氏战，涉险被创，垂死数四，太公、吕后、孝惠、鲁元之属，登俎堕车，固不暇顾。广武之矢，荥阳之围，皆以身冒白刃，然后士卒用命，乐为尽力。光武昆阳之役，亲率将士以与虎豹相搏，幸而获济。魏武智

计殊绝于人，然犹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伯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此其成事可见者。夫其政府已立，军队已成，驱使将校，易如转轴，犹必躬受矢石而后获之，又况天造草昧，壮士乌集，纪律未申，符籍未著，不以一身拊循士卒，共同安危，而欲人为尽力，虽乳儿知其不能矣。且汉、魏诸君，志在为己，与诸将固有臣主之分，主逸臣劳，主生臣死，犹可以名分责之。今之革命，非为一己而为中国，中国为人人所共有，则战死亦为人人所当有，而曰甲者当为其易，乙者当为其难，可乎？若以人材难得，不欲使之创寿于旗幢者，不悟艰难之事，固非一人所任，为权首者常败，而成者必在继起之人。且人材非天成也，固以人事感发而兴起之，前者以身殉中国矣，后者慕其典型，追其踵武，则人材方益众多，夫何匮乏之忧乎？昔华盛顿拯一溺儿，跃入湍水，盖所谓从井救人者。若华盛顿作是念曰：溺儿生死，轻于鸿毛，吾之生死，重于泰山，空弃万姓倚赖之躯，而为溺儿授命，此可谓至无算者，如是，则必不入湍矣。华盛顿以分外之事而为之死，今人以自分之事而不肯为之死，吾于是知优于私德者亦必优于公德，薄于私德者亦必薄于公德，而无道德者之不能革命，较然明矣。

且道德之为用，非特革命而已，事有易于革命者，而无道德亦不可就。一于戊戌变法党人见之，二于庚子保皇党人见之。戊戌变法，惟谭嗣同、杨深秀为卓厉敢死。林旭素佻达，先逮捕一夕，知有变，哭于教士李佳白之堂。杨锐者，颇圆滑知利害，既入军机，知其事不可久，时张之

洞子为其父祝寿京师，门生故吏皆往拜，锐举酒不能饮，徐语人曰："今上与太后不协，变法事大，祸且不测，吾属处枢要，死无日矣。"吾尝问其人曰："锐之任此，固为富贵而已，既睹危机，复不能去，何也？"其人答曰："康党任事时，天下望之如登天，仕宦者争欲馈遗或不可得。锐新与政事，馈献者踵相接，今日一袍料，明日一马褂料，今日一狐桶，明日一草上霜桶，是以恋之不能去也。"呜呼！使林旭、杨锐辈，皆赤心变法无他志，颐和之围，或亦有人尽力。徒以萦情利禄，贪著赠馈，使人深知其隐，彼既非为国事，则谁肯为之效死者？戊戌之变，戊戌党人之不道德致之也！庚子保皇之役，康有为以其事属唐才常，才常素不习外交，有为之徒龙泽厚为示道地。其后才常权日盛，凡事不使泽厚知，又日狎妓饮燕不已，泽厚愤发，争之不可得，乃导文廷式至武昌发其事。才常死，其军需在上海，共事者窃之以走。是故庚子之变，庚子党人之不道德致之也！彼二事者，比于革命，其易数倍，以道德腐败之故，犹不可久，况其难于此者。积芦灰以塞鸿水，断鳌足以立四极，非弘毅负重之士，孰能与于此乎？

或曰：彼二党之无道德者，以其没于利禄、耽于妻子也。今革命者则异是，大抵年少，不为禄仕，又流宕无室家。人亦有言，人不婚宦，情欲失半，则道德或可以少进乎！若然，吾将大计国人之职业而第论之：

孟轲云：矢人惟恐不伤人，函人惟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今之道德，大率从于职业而变。都计其业，则有十六种人：一曰农人，二曰工人，三曰裨贩，四

曰坐贾，五曰学究，六曰艺士，七曰通人，八曰行伍，九曰胥徒，十曰幕客，十一曰职商，十二曰京朝官，十三曰方面官，十四曰军官，十五曰差除官，十六曰雇译人。其职业凡十六等，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虽非讲如画一，然可以得其概略矣。农人于道德为最高，其人劳身苦形，终岁勤动，田园场圃之所入，足以自养，故不必为盗贼，亦不知天下有营求诈幻事也。平居之遇官长，虽甚谨畏，适有贪残之吏，头会箕敛，诛求无度，则亦起而为变，及其就死，亦甘之如饴矣。工人稍知诈伪，楛窳之器，绵薄之材，有时以欺市人，然其强毅不屈，亦与农人无异。裨贩者，有二种：其有荷蒉戴盆，求鬻于市者，则往往与农工相类。若夫千里求珍，牵车载牛，终日辎重不离身，其人涉历既多，所至悉其民情谣俗，山谷陵阪之间，有戒心于暴客，则亦习拳勇、知击刺，其高者乃往往有游侠之风，恤贫好施，金钱飞洒，然诪张为幻之事，亦稍以益多矣。坐贾者，倚市廛，居奇货，其朴质不逮农工，其豁达不逮裨贩。以啬为宝，以得为期，然不敢恣为奸利，懋迁有无，必济以信，其有作伪罔利者，取济一时，久亦无以自立，此则贾人自然之法式也。学究者，其文义中律令，其言语成条贯，坚守其所诵习者，而不通于他书。贫无所赖，则陶诞突盗之事亦兴，乃有教人作讼，以取温饱，而亦辄与官吏相抗，其他猥鄙，不可历数，然无过取给事畜。迂疏之士，多能乐天，家无斗筲，鸣琴在室，虽学术疏陋，不周世事，而有冲夷自得之风。二者虽有短长，然未至折腰屈膝为他人作狗马也。艺士者，医方绘画书法雕刻之属，其事非一，此其以术自

赡，固无异于工贾。书画雕刻之士，多为食客，而医师或较量贫富，阿谀贵人。然高者往往傲岸自好，虽有艺术，值其情性乖角之际，千金不移，固亦有以自重也。通人者，所通多种，若朴学、若理学、若文学、若外学，亦时有兼二者。朴学之士多贪，理学之士多诈，文学之士多淫，至外学则并包而有之。所恃既坚，足以动人，亦各因其时尚以取富贵，古之鸿文大儒，邈焉不可得矣。卑谄污漫之事，躬自履之，然犹饰伪自尊，视学术之不已若者，与资望之在其下者，如遇仆隶；高已者则生忌克；同已者则相标榜；利害之不相容，则虽同已者而亦嫉之。若夫笃信好学，志在生民者，略有三数狂狷之材，天下之至高也。行伍者，多由家人子弟起而从军，亦多闾里无赖，奸劫剽暴，是其素习。近世徵兵，则学究亦稍稍预之，清淳朴质之气既亡，而骄横恣妄之风以起。虽然，其取之也，不以诈而以力；其为患也，不以独而以群。大抵近世军人，与盗贼最相似，而盗贼犹非最无道德者也。胥徒者，其取以诈不以力矣，其患在独不在群矣。曩者胥史尚习文法知吏事，徒役虽横，犹必假借官符而后得志，收发委员作而猾诈甚于门丁，地方警察兴而拘逮由其自便。舆台皂隶，尊为清流；条狼执鞭，厚自扬诩。言必曰团体，议必曰国家，有靦面目，曾不自怍？此其可愤，亦其可笑者也。幕客者，其才望驾胥徒而上之，其持书求荐，援引当道，浮伪谀佞，则胥徒所无也；其受贿骫法，高下在心，虽有法律而不可治，则有甚于胥徒者也。大略亦分三种：其最下者，厘局之司事，州县之征收，饰小说以干县令，徒欲得哺餟求饱暖，而

无乡里讼师强毅不屈之风；其稍高者，则闲习法律，明识款目，或曰刑名，或曰升铨，或曰钱谷，略有执守，而舞弄文法，是所擅场，其卑鄙则不如司事征收之甚；其最高者，所谓传食幕府，治例外之奏议条教者也，世之通人，多优为之，以简傲为谄媚，以跅弛为捭阖，以察言观色，固结主知，其术弥工，其操弥下，郡邑守令，仰望风采，陟罚臧否，在其一言，商鞅之所必诛，韩非之所必戮，在此曹也。职商者，非谓援例纳捐，得一虚爵，谓其建设商会，自成团体。或有开矿筑路通航制器，直隶于商部者。自满洲政府贪求无度，尊奖市侩，得其欢心，而商人亦自以为最贵，所至阻挠吏治，掣曳政权。己有欺罔赃私之事，长吏诃问，则直达商部以解之；里巷细民，小与己忤，则嗾使法吏以治之。财力相君，权倾督抚，官吏之贪污妄杀者不问，而得罪商人者必黜；氓庶之作奸犯科者无罚，而有害路矿者必诛。上无代议监督之益，下夺编户齐民之利。或名纺纱织布而铸私钱，或托华族寓居而储铅弹，斯乃所谓大盗不操戈矛者。若夫淫佚悉报，所在有之，则不足论也已。京朝官者，或出学究，或出艺士，或出通人，而皆离其素朴，胥徒幕友之所为，率尽能之。然其位置最高，得自恣肆，列卿以下，或以气节文章自托，韩愈之博奕饮酒，欧阳修之帷薄不修，又其素所效法者，以为无伤大节也。阁部长官，多自此出，其气益颓，欲以金钱娱老而已。若夫新增诸部，则其人兼与职商同行，又其下劣者也。方面官者，其行又不逮京朝官。府县诸吏，虐民罔利，其失尚小；督抚监司，则无不以苞苴符券得之，或有交通强国以自引

重，投命异族，贰心旧君，而督抚则兼有军官资格。军官者，其杀人不必如方面官之援律例也，军法从事而已；其取利不必如方面官之受贿赂也，无事刻饷，有事劫掠而已。督抚为坏法乱纪之府，提镇为逋逃盗贼之魁。自此以下，则仆役尔。差除官者，其浮竞污辱，又甚于京朝方面。各省之局所，皆以候补道员莅之，其人率督抚之外嬖也，同卧共起，吮痈舐痔者，是其天职然也，俄而主人更易，新外嬖来，而旧外嬖无所容纳，则往往有劾罢者。昔者天子弄臣，盖有所谓茸技狗官，今乃徧于藩镇，士之无行，于斯极矣。然其次犹有雁译者，则复为白人之外嬖，非独依倚督抚而已。故以此十六职业者，第次道德，则自艺士以下，率在道德之域；而通人以上，则多不道德者。九等人表，不足别其名；九品中正，不能尽其实。要之知识愈进，权位愈申，则离于道德也愈远。今日与艺士、通人居，必不如与学究居之乐也；与学究居，必不如与农工、裨贩、坐贾居之乐也；与丁壮有职业者居，必不如与儿童无职业者居之乐也。呜呼！山林欤？皋壤欤？使我欣欣而乐欤？乐未毕也，哀又继之，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

今之革命党者，于此十六职业，将何所隶属耶？农工、裨贩、坐贾、学究、艺士之伦，虽与其列，而提倡者多在通人，使通人而具道德，提倡之责，舍通人则谁与？然以成事验之，通人率多无行，而彼六者之有道德，又非简择而取之也，循化顺则不得不尔。浸假农为良农，工为良工，贾为良贾，则道德且不可保；学究、艺士，进而为通人，

资藉既成，期于致用，其道德又爽然失矣！此犹专就齐民无位者论之也。今之革命，非徒弄兵潢池而已，又将借权以便从事，自雁译外，行伍而上，其职八等，置彼周行，森然布列，湛于利禄，牵于豢养，则遂能不失其故乎？往者，士人多以借权为良策，吾尝斥之，以为执守未坚，而沦没于富贵之中，则鲜不毁方瓦合矣。湘军盛时，常有一方仕宦、一方革命者，彼其党援众多，虽事发而不为害，革命不成，仕宦如故，其志既携，则必无专心于大事者。又其军中统领，率以会党渠帅起家，既得凭藉，取悦上心，则不惮残贼同类，以求翎顶，盐枭亦然。故以会党制会党，盐枭制盐枭者，逆胡之长策也。以革命党而借权于彼，彼则亦以是法处之，少者必壮，壮者必老，终为室家妻子所牵，即不得不受其羁絷。权不可借，而己反被借于人，后之噬脐，虽悔何及！故必以不婚不宦期革命党者，必无效之说也。呜呼！层累益高，阽危愈甚，纵情则为奔驹，执德则如朽索，趋利则如坠石，善道则如悬丝，杨朱之哭歧涂，墨子之悲染练，不图于吾生亲见之也。

如上所说，则道德堕废者，革命不成之原，救之何术，固不可知。虽然，必待由、光、夷、齐而后正之，则如河清之不可俟矣。昔顾宁人以东胡僭乱，神州陆沈，慨然于道德之亡，而著之《日知录》曰：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昔者稽绍之父康，被杀于晋文王，至武帝时，山涛荐之入仕，绍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于人乎？一时

传诵，以为名言，不知其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也。自正始以来，大义不明，遍于天下，山涛既为邪说之魁，遂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顾。夫邪正之说，不容两立，使谓绍为忠，则必谓王裒为不忠而后可也，何怪其相率臣于刘聪、石勒，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案顾所谓保国者，今当言保一姓；其云保天下者，今当言保国。余深有味其言，匹夫有责之说，今人以为常谈，不悟其所重者，乃在保持道德，而非政治经济之云云。吾以为天地屯蒙之世，求欲居贤善俗，舍宁人之法无由！吾虽凉德，窃比于我职方员外。录其三事，以与同志相切厉，则道德其有瘳乎？

一曰知耻。《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不廉不耻，则祸败乱亡，无所不至。然而四者之中，耻为尤要。故曰：行己有耻。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吾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顷读《颜氏家训》，有云：齐朝一士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

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犹为此言，尚有《小宛》诗人之意，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愧哉！

二曰重厚。世道下衰，人材不振，王伾之吴语，郑綮之歇后，薛昭纬之浣溪沙，李邦彦之俚语舞曲，莫不登诸岩廊，用为辅弼。至使在下之人，慕其风流，以为通脱，而栋折榱崩，天下将无所庇矣。及乎板荡之后而念老成，播迁之余而思耆俊，庸有及乎？侯景数梁武帝十失，谓皇子吐言止于轻薄，赋咏不出桑中；张说论阎朝隐之文，如丽服靓妆，燕歌赵舞，观者忘疲，若类之风雅，则罪人矣。今之词人，率同此病，淫辞艳曲，传布国门，诱惑后生，伤败风化，宜与非圣之书同类而焚，庶可以正人心术。何晏之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邓飏之行步舒纵，坐立倾倚；谢灵运之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数人，后皆诛死。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杨子《法言》曰：言轻则招忧，行轻则招辜，貌轻则招辱，好轻则招淫。

三曰耿介。读屈子《离骚》之篇，乃知尧、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则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是之谓耿介。反是谓之昌披。夫道若大路然，尧、桀之分，必在乎此。

呜呼！如吾宁人之说，举第一事，则矜欧语者可以戒

矣；举第二事，则好修饰者可以戒矣；举第三事，则喜标榜者可以戒矣。必去浮华之习，而后可与偕之大道，徽巾葛拂，缊袍麻鞋，上教修士，下说齐民，值大事之阽危，则能悍然独往，以为生民请命。若于此三者犹未伏除，则必不能忘情于名利，名利之念不忘，而欲其敌忾致果，舍命不渝，又可得乎？

抑吾于宁人所举三事之外，又得一不可缺者曰必信。信者，向之所谓重然诺也。昔人以信为民宝，虽孔氏之权谲，而犹曰无信不立。又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余以为知耻、重厚、耿介三者，皆束身自好之谓；而信复周于世用，虽萑苻聚劫之徒，所以得人死力者，亦惟有信而已。今之习俗，以巧诈为贤能，以贞廉为迂拙，虽歃血莅盟，犹无所益。是故每立一会，每建一事，未闻其有始卒。其或稍畏清议，而欲食其前言，则曰吾之所为，乃有大于此者。知祸患之将至，则藉口于远求学术，容身而去矣。见异己之必胜，则遁辞于大度包容，委事而逸矣。言必信，行必果，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必欲正之，则当立一条例。今有人踵门而告曰："尔其为我杀人掘冢。"应曰："诺。"杀人掘冢，至恶德也，后虽悔之，而无解于前之已诺，则宁犯杀人掘冢之恶德，而必不可失信，以信之为德，足以庚偿杀人掘冢之恶而有余也。夫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商鞅与秦民约，能徙木者，与之十金，民果徙木，鞅亦竟以十金与之。昔人以为长德善政，今人为之，则必讥其无谓。然欲建立信德，必自此始。若其校量大小，比絜

长短，而曰某事当信，某事不当信，则虽处当信之事，而亦必无践言之实矣。

举此四者，一曰知耻、二曰重厚、三曰耿介、四曰必信，若能则而行之，率履不越，则所谓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者，于是乎在。呜呼！端居读书之日，未更世事，每观管子所谓四维，孔氏所谓无信不立者，固以是为席上之腐谈尔！经涉人事，忧患渐多，目之所睹，耳之所闻，坏植散群，四海皆是。追怀往诰，惕然在心。为是倾写肝鬲，以贻吾党。若曰是尚可行，则请与二三君子守此迂介。幸而时济，庶几比于铅刀一割；不幸不济，根本既立，虽死不僵，后人必有能继吾志者。雪中原之涂炭，光先人之令闻，寄奴、元璋之绩，知其不远。若曰迂儒鄙生，以此相耀，不足以定胜负之数也，则分崩之祸，不出数岁，将使七十二代之遗民，终于左衽，吾亦惟被羊裘以游大泽矣。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说明】 本文原载《民报》第八号（一九〇六年十月八日），收入《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并将标题改为《革命道德说》。

遣王氏

（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涂说之士羡王守仁。夫学术与事功不两至，鬼谷明从横，老聃言南面之术，期于用世，身则退藏于密。何者？人之材力有量，思深则业厌也。守仁之学至浅薄，故得分志于戎事，无足羡者。抑守仁所师者，陆子静也。子静剪爪学射①，欲一当女眞而与之搏；今守仁所与搏者，何人也？仲尼之徒，五尺童子，言羞称乎桓、文，犹曰鄙儒迂生所执。观桓、文之斩孤竹、挞荆舒，非峒谷之小蛮夷也。晋文诛子带以定襄王，子带康回之篡，夫襄王非有罪也。以武宗之童昏无艺，宸濠比之，为有长民之德，晋文而在，必不辅武宗、蹶宸濠明矣。其学既卑，其功又不足邵。校功能之高下，而曰尧、舜犹黄金万镒，孔子犹九千镒，然则守仁之圣，其将浮于万镒者耶？

【说明】 本文原载《民报》第九号（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收入《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一《说林》上。

① 《文录》作"子静剪爪善射"。

衡 三 老

（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季明之遗老，惟王而农为最清。宁人居华阴，以关中为天府，其险可守，虽著书，不忘兵革之事。其志不就，则推迹百王之制，以待后圣，其材高矣！征辟虽不行，群盗为之动容，使虏得假借其名以诳耀天下。欲为至高，孰与船山榛莽之地，与群胡隔绝者。要有规画，则不得不处都市。王之与顾，未有以相轩輖也。黄太冲以明夷待访为名，陈义虽高，将俟虏之下问。昔文天祥言以黄冠备顾问，世多疑其语为诬，端居而思，此不亦远乎？以死拒征，而令其子百家[1]从事于徐、叶间。若曰[2]明臣不可以贰，子未仕明，则无害于为虏者，以《黄书》种族之义正之，则嗒焉自丧矣！

【说明】 本文原载《民报》第九号（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收入《太炎文录》卷一《说林》上。

---

[1] 《文录》无“百家”二字。

[2] 《文录》作“谅曰”。

民报一周年纪念会祝辞

（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二日）

我汉族昆弟所作《民报》，俶载至今，适盈一岁。以皇祖轩辕之灵，洋溢八表，方行无阂。自兹以后，惟不懈益厉，为民斗杓，以起征胡之铙吹，流大汉之天声。白日有灭，星球有尽，种族神灵，远大无极。敢昭告于尔丕显皇祖轩辕，烈祖金天、高阳、高辛、陶唐、有虞、夏、商、周、秦、汉、新、魏、晋、宋、齐、梁、陈、隋、唐、梁、周、宋、明、延平、太平之明王圣帝。相我子孙，宣扬国光，昭彻民听，俾我四百兆昆弟，同心戮力，以底虏酋爱新觉罗氏之命。扫除腥膻，建立民国，家给人寿，四裔来享。呜呼！发扬蹈厉之音作而民兴起，我先皇亦永有依归。[1]

《民报》万岁！

汉族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

---

[1] 《文录》至此为止，以下数句未曾录入。

【说明】 本文原载《民报》第十号（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民意：《纪十二月二日本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事及演说辞》一文中，收入《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

民报一周年纪念会演说辞

（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二日）

今日是《民报》纪元节大会，目下言论渐已成熟，以后是实行的时代。但今日实行上有一种魔障，不可不破。因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强盗有力量，秀才沒有力量。强盗仰攀不上官府，秀才仰攀的上官府，所以强盗起事，沒有依赖督抚的心，秀才就有依赖督抚的心。前此数年，遍地是借权的话。直到如今，讲革命的，也想借到督抚的权，好谋大事，这眞胡涂得很。颇有人说：学界中人，不如会党；会党中人，不如强盗。依兄弟看来，知识高下，且不必说。但强盗从沒有靠官造反的心，会党略有数分，学界中人，更加数倍。论他志气的下劣，与自信力的薄弱，较之会党、强盗，不免有些惭愧（大拍掌）。只是思量办事的人，沒有不舍难取易的，他看自己革命，不如借用督抚略为容易，不知不觉，这下劣的思想，就随地涌现出来。殊不知志气果好，便万分险阻艰难的事，也办得去。若依赖督抚，到〔倒〕比自己革命

更难百倍(大拍掌)。这是什么原由？

第一、督抚引用学生，不过充当文案，预备顾问，就有练陆军办警察的，总不能自成一部，原象从前的督标中军一样，也不能得他的亲信。若善于谄媚的呢，还可以侥幸得几分；假如才气略长些，议论略多些，风骨略高些，就永远不能得志。若要得志，除是想几件压制革命党的政策，或杀戮几个革命党人，方得有小小权柄到手，这还靠得住么？(大拍掌)

第二、今日的督抚，富贵尊荣，与皇帝相差无几，难道放著平坦大路不走，反去革命，自寻荆棘？从来藩镇不是逼到沒路的时候，断不轻易造反。远大且不必说，就看近来吳三桂，本要想步武石敬瑭的后尘，做一个干儿皇帝，但不到撤藩的时候，吳三桂尙不敢举兵作难，因吳三桂自已有这心肠，将士却不肯应，故只得迟迟不发。后来有撤藩的事，此时平西王也去，将也去，兵也去，滇藩一部的人，沒一个不失了饭碗，才能够激成大举。请看今‹日›的督抚，权力比得吳三桂吗？就象袁世凯，是最有兵权的，满洲政府也不敢轻易动他。就动了他一人，北洋将校仍是依然无恙。一人愿革命，人人都不愿革命，这是万不得成的(大拍掌)。

第三、那老耄昏瞶的督抚，往往有几个儿孙出洋留学，与学生通同一气，学生见他可用，就推心置腹，奉承个不了。这一班纨袴子弟，也趁他祖父老耄昏瞶，卖差卖缺，无所不为，一面又与学生同谋举义。试想此辈胸中，究竟所思何事？起得事来，他的权力，岂肯轻轻送你？奉

这蝇营狗苟的顽童，作为革命首领，还成个世界吗？（大拍掌）

因此三事，所以督抚革命，万无可望。再说向上一层，假如督抚革命，果然成事，虽则种族问题可以解决，那政治改良的事，仍是不成。且看从古革命历史，凡从草茅崛起的，所用都是朴实勤廉的人士，就把前代弊政一扫而尽；若是强藩内侵，权臣受禅，政治总与前朝一样，全无改革。因为帝王虽换，官吏依然不换，前代腐败贪污的风俗，流传下来，再也不能打扫（拍掌大喝采）。象现在官场情景是微虫霉菌，到处流毒，不是平民革命，怎么辟得这些瘴气（拍掌大喝采）。若把此事望之督抚，眞是其愚不可及了（拍掌大喝采）。目下满洲政府，正有中央集权的意思，要把财政兵政，都归几个满员掌握，外省督抚不过留个空名，有几个识见不到的人，都说此事若行，革命愈难措手。若依兄弟看来，正是相反。以前满洲将士，曾打准噶尔、回部、青海等处，每战必胜。到得川楚教匪起来，满洲兵就不能抵敌，全是杨芳、杨遇春等为虎作伥，方得制教匪的死命。太平王起来时候，赛尙阿、乌兰泰辈，没一个不一败涂地，修〔终〕竟靠着几个湖南督抚，就地捐厘，兼办团练，才能够打破洪氏。照这样看，督抚无权，革命军正是大利，有甚么不好呢？（大拍掌）从今以后，我汉人兄弟，请把依赖督抚的一念，早早打消。但想当兵，不要想当奸细；但想做将士，不要想做参谋。这革命大事，不怕不成；中华民国，不怕不立。何必怀着那下劣心思，为会党、强盗所笑呢？（拍掌大喝采）

【说明】 本文原载《民报》第十号（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民意：《纪十二月二日本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事及演说辞》一文中，《太炎文录》未曾录入。

箴新党论

（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党锢之名自汉始，迄唐、宋、明，皆有党人，其材望行义，虽有高下，未有如新党之阘茸者也。是何也？合百千万人而为一朋，其执守必与众异，然后可以自固其群，非乌合兽聚之谓也。前世党人，虽无远略，犹不失其正鹄，独新党则异是。

中国士民，流转之性为多，而执著之性恒少，本无所谓顽固党者；特以边陬之地，期月之时，见闻不周，则不能无所拘滞，渐久渐通，彼顽固者又流转而为新党。往者科举取士之世，新程墨出，则旧程墨必废，未有执守旧文，悬悬以继承故武为念者。外界之刺戟虽异，而内心之流宕则同。彼新党者，犹初习新程墨者也。是非之不分，美恶之不辩，惟以新为荣名所归。故新党之对于旧党，犹新进士之对于旧进士，未有以相过也。原其用心，本以渴慕利禄之故，务求速化；一朝摈斥，率自附于屈原、韩愈之徒。盖魏公子牟有云，身在江湖之上，心在魏阙之下。庄周述

之，以为热中之戒，而是族反举此以为美谈，何异相如自述以琴心盗卓文君事乎？

虽然，党人之所以自高者，率在危言激论，而亦藉文学以自华。今之新党，于古人固不相逮。若夫夸者死权，行险侥幸，以求一官一秩，则自古而有之。汉世甘陵之党，多正人卓立其间，所与争者，惟奄竖与椒房之亲，以此求胜，宜称无罪。朝野流言，转入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自牢修密告其事，而辞所连及者，莫不禁锢终身。若郑康成以山东大师，传授经术，未尝问王朝治乱之事，名在党中，实由株连所及，此本不得以党人论者。郑公之门，黄巾罗拜，其德之下被于民，当与虞舜所居成都相比。微特唐、宋诸党弗能逮其咫尺，以当时李、杜之伦拟之，正犹燕石之与美玉耳！若夫汝南许劭，名有臧否人伦之鉴，而与其兄许靖不协，摈之马磨，则知朋党相倾，不足以洽人望久矣。郭林宗以在野之士，昵迹公卿，虽不应徵辟，终不出于浮华竞名之域。是以葛洪正之曰：

林宗有机辩风姿，又巧自抗遇而善用，且好事者为之羽翼，延其声誉于四方，故能挟之见推慕于乱世。片言所褒，则重于千金；游涉所经，则贤愚波荡；可谓善击建鼓而当扬日月者耳，非眞隐也。盖欲立朝则世已大乱，欲潜伏则闷而不堪，或跃则畏祸害，确尔则非所安，彰偟不定，载肥载臞，而世人逐其华而莫研其实，玩其形而不究其神，故遭雨巾坏，犹复见效，不觉其短，皆是类也。或劝之以仕进，林宗对曰：

吾昼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废，不可支也。按林宗之言，其知汉之不可救，非其才之所辨审矣。法当仰跻商洛，俯泛五湖，追巢、由于峻岭，寻渔父于沧浪，若不能结踪山客，离群独往，则当掩景渊洿，韬鳞括囊。而乃自西徂东，席不暇温，欲慕孔、墨栖栖之事。圣者忧世，周流四方，犹为退士所见讥弹。林宗才非应期，器不绝伦，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风易俗；入不能挥豪属笔，祖述六艺；行衒自耀，亦既过差；收名赫赫，受饶颇多；然卒进无补于治乱，退无迹于竹帛，观倾视汨，冰泮草靡，未有异庸人也。无故浮沈于波涛之间，倒屣于埃尘之中，遨集京邑，交关贵游，轮刓筴弊，匪遑启处，遂使声誉翕熠，秦胡景附，巷结朱轮之轨，堂列赤绂之客，轺车盈街，载奏连车，诚为游侠之徒，未合逸隐之科也。有道之世而臻此者，犹不得厕高洁之条贯，为秘丘之俊民，奚足多哉！故太傅诸葛元逊曰：林宗隐不修遁，出不益时，实欲扬名养誉而已！街谈巷议以为辩，讪上谤政以为高，时俗贵之歙然，犹郭解、原涉见趋于曩时也。

夫以林宗高名之士，而比于独行隐逸诸公，犹多勿逮；至其竞逐当道，借交养名，则可以为世戒矣！

下至唐世，牛、李以旧家新进相争，如李之言，则犹汲黯所云陛下用人如积薪，后来居上者也；如牛之言，则犹《春秋》非世卿也。二者各有所守，然材略足以相当，虽欲乘其贬黜，阴相贼杀，惟以朝士自倾朝士，外之未尝借资于藩镇，内之未尝假权于奄人，此其材行，必非近世党人

所能仰跂；然其醉心权利之事，以汉世党人视之，则犹腐鼠之比神羊矣。

宋之洛、蜀，交相丑诋，程颐持正而不周于学，苏轼利口而不济于用，其所争不关政事，惟以琐细节奏之间而相侵陵。若其寄心王室，闻故主之嘉赏其文，则泫然为之流涕。使近世新党之魁，模效其状，以为忠孝，周狗嗁而牺牛哭者，则苏轼为之前驱也。

明之党人，名为与逆奄相抗，然自江陵新郑之时，朝士已分省自植，以熊廷弼之长于兵略，而不附东林，则邹元标、魏大中辈，必欲致之死地，其私心有可见者。会魏忠贤用事，廷弼、东林同时俱尽，海内党人，不得不解仇相助。忠贤既诛，而分省之争复亟。乃者东林之汪文言，复社之张溥，皆以善行贿赂，为党人所依赖，此汉、唐、宋之党人所不为者；若其内行点污，瞑瞒声色，则又前世清流之所未有。张溥喜服房中之药，见于医师喻昌书中；如瞿式耜之忠纯，而犹有内实五姬，临命桂林，欲与妾诀，为张同敞所引止，况复延儒、谦益之流乎？明思文帝有言，北都覆于东林，南京亡于马、阮，厥罪维均。信哉，党人之死权而忘国事也！

索虏入关以后，党人已绝，而臭味所遗，百年未艾。其以文字抗虏者，在野有吕留良，在朝有查嗣廷、胡中藻，虏酋宣其罪状，叛逆以外，率举浮华奔竞为辞。彼以陈义慷慨而婴斯戮，诚当为之讼直于天。然留良以时文自豪，科举诸生，猥相崇尚；而嗣庭之附隆科多、中藻之附鄂尔泰，虽爱者亦莫能为讳，其被浮华奔竞之名，非不幸也。虏不

能以浮华之名加顾炎武，以奔竞之名加戴名世，而独被于是三人者，由其中明世党援之习独深，以此为名，而汉人不能以辞相抵。然则始自东汉，迄唐、宋、明，有党人者四世，虽竞名死利，各有等差，而大体不能外也。

今之新党，与古人絜长则相异，与古人比短则相同。自弘历殁而谤声衰，百年之间，朝野士庶，寂然宁息，国政军实，堕于暗昧。洪王起于金田，虏始振动，旋踵亦灭。外有皙人之祸，北露西欧，交征诸夏。讫于载湉嗣位，丑声起于禁掖之间。李鸿章拥兵于外，朝士哗然，皆谓其有异志；梁鼎芬以劾李鸿章罢官，朱一新以言李连〔莲〕英废黜，天下冤之，则新党之萌芽始作。甲午辽东之役，丧师糜财，疆埸日蹙。台湾之割，旅顺之割，青岛之割，威海之割，接踵而至。大酋垂拱于上，失其帝天之尊，而宫掖亦时有诟谇。康有为乘七次上书之烈，内资同和之力，外藉之洞之援，设强学、保国诸会以号召天下。当是时，有郑孝胥、陈三立之徒，以诗歌目录闻于世；而汤寿潜善持论，为吏有声，世比之陈仲弓；数子者，名为通达时事，并相和会。嘉应黄遵宪，与有为交最深，元和江标，以掇拾中外末流之学，视学湖南，熊希龄辈和之于下，皆更相驱驰为一朋。有为既用事，欲收物望，树杨锐、刘光第于军机，以宫闱相挤之故，复结二妃。时文廷式既废，亦扼腕欲自发舒。其外则有俞明震者，与陈三立父子有连，尝佐唐景崧称副总统于台湾，世人称其忠义，与有为亦相引为重。而诸贵游为京朝官者，各往往参错其间，新党自此立矣。

有为既败，杨、刘死，张之洞、梁鼎芬始与有为抵拒，其

党人亦稍稍引去，而江标以连蹇死，惟黄遵宪始终依之。倾侧扰攘，至于庚子团民之变，唐才常起汉口，事发，有为再败，则同党始有告密于诸藩，自戕其爪牙者。然新党之萌芽，本非自有为作，挟其竞名死利之心，而有为所为，足以达其所望则和之，不足以达则去之，足以阻其所望则畔之，故有为虽失助，而新党自若。至学生任事时，则新党始颓废，其善附会者犹故不败。综观十余年之人物，其著者或能文章、矜气节，而下者或苟贱不廉与市侩伍，所志不出交游声色之间。人心不同，固如其面，吾亦不敢同类而共非之，特其竞名死利则一也；其所以异于诸耆老者，挟术或殊，其志则非有高下也。

往者大酋专制，公卿备其顾问，故干誉者不出市朝。藩镇日强，自帝其部，非传食幕府，则不足以钓名。自薛福成、黎庶昌辈为其前导，而后之继起者，转相崇尚，足迹接乎诸侯之境，车轨结乎千里之外，出入庶方，所更既广，故不得以一端取胜。必若条分件系，各附其人，则或为名士耻。是故录其科目，以为大别。国事阽危，庶政纷乱，旧法未收，新政又起；故官未裁，新除又下，非特职守难分，即名实亦多相缪。于是求之古人以定是非，而对策八面锋贵于当世，则有父同甫、兄贵与者，此一族也。备位公辅，自名知学，百家成说，未能研精，然未尝不记其篇目，晓其大义，于是求与己应者，造次酬对，展转不穷，而目录说部诸书，最为利器，则有父晓岚、兄兰甫者，此一族也。法制不常，时有张弛，诸所陈奏，要在疏通，而不可不缘以儒术。下逮序述笔札之属，质胜则不动人，文胜则不

适用，于是桐城义法，为其中流，则有父永叔、兄子瞻者，此一族也。声气相扶，交相诵美，哀亡上寿，及以饮食会同之属，华实两尽，足以无憾，谄曲者，末胡椒以堕泪，怀橄榄以解酲，其实虽具，必济以文，则有父荀慈、兄稚存者，此一族也。生长贵游，凭藉家世，一端之长，足以倾动朝野，自谓与国家同休戚，不敢有贰，而学术未具，徒能诗歌，所赋不出佩兰赠芍之词，所拟不离鸣鸩啼鹃之状，而又挟其惰性，喜逐狎邪，燕私之情，形于动静，则有父朝宗、兄定庵者，此一族也。是数族者，举其大别则然。若囊括数者而兼有之，则最足以趋利。夫其所操技术，岂谓上足以给当世之用，下足以成一家之言耶？汗漫之策论，不可以为成文之法；杂博之记诵，不可以当说经之诂；单篇之文笔，不可以承儒、墨之流；匿采之华辞，不可以备瞽蒙之颂；淫哇之赋咏，不可以瞻国政之违。既失其末，而又不得其本，视经方陶冶之流，犹尚弗及，亦曰以是哗世取宠而已！若夫前世党人，未尝涉历幕府以为藉也，未尝交通禁掖以行媚也，未尝逢迎驵侩以营利也；而今之新党，则泊然不以为耻。均之竞名死利，其污辱又较前世为甚。幸其用事日短，秽行不彰。不然，而康氏事成，诸新党相继柄政，吾知必无叶向高、高攀龙辈，而人为谦益，家效延儒，可无待蓍龟而决矣。故曰：今之新党，与古人絜长则相异，与古人比短则相同也。

抑此新党者，自名为新，彼固以为旧染污俗，待我而扫云尔。返而观其行迹，其议论则从新，其染污则犹旧。盖顾氏有言曰：今日人情相与，惟年、社、乡、宗而已，除此

四者，窅然丧其天下。吾尝持此以衡今日之俗，与明季略有异同：其相同者，年耳乡耳，宗则今日所轻，而重渐移于姻戚；社则今日所绝，而恩又笃于拜盟。彼党人之所以自相援助，传之自旧，虽昌言维新而不废者，亦有四事。具论如下：

一曰师生。师生本以学术授受得名，非座主与所举者得称师生。晚世浮伪之俗，其师在穷阎织屦者，则弃之未尝一顾，而曲事座主，如对上皇，斯已可鄙。科举废而斯道不行，然执贽上官，以师生相称者，其丑又甚于座主。推究始祸，实惟唐之韩愈。愈作《师说》以自文饰，其门下相从者，自皇甫、张、李之外，以其力能通榜，求为援手而已。明世武臣对执政则称走狗，而士大夫之事奄人者，名为义儿，其名既污，近世乃假借师生之称以避指摘。按《日知录》有云：《后汉书·贾逵传》：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是弟子与门生为二。欧阳公谓亲受业者为弟子，转相传授者为门生，愚谓汉人以受学者为弟子，其依附名势者为门生。《郅寿传》：大将军窦宪常使门生赍书诣寿，有所请托。《杨彪传》：黄门令王甫，使门生于京兆界辜榷官财物七千余万，宪、外戚，甫、奄人也，容得[1]有传授之门生乎？《南史》所称门生，今之门下人也。《宋书·徐湛之传》：门生千余人，皆三吴富人之子[2]，姿质端妍，衣服鲜丽，每出入行游，涂巷盈满，泥雨日悉以后车载

---

(1) 《文录》作“安得”；《日知录》原文亦作“安得”。

(2) 按：据《宋书》卷七十一《考证》：“门生十余人，皆三吴富人之子。十南本作‘千’”。

之。《谢灵运传》：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是也。其所执者，奔走仆隶之役。《晋书·刘隗传》：周嵩嫁女，门生断道，斫伤二人。《南史·刘瓛传》：游诣故人，惟一门生持胡床随后，是也。其初至皆入钱为之。《梁书·顾协传》：有门生始来事协，知其廉洁，不敢厚饷，止送钱二千，协怒，杖之二十。《南史·姚察传》：有门生送南布一端，花练一匹，察厉声驱出，是也。而今之以达官贵人为师者，则无不自称为门生，彼固以为弟子事师，与前史所说有异。及观其实，则所事者亦外戚奄人之流，而欲入其门，虑无不入钱以当束脩之献者，耆旧既然，新党趋之益甚。是当比于汉世赘婿之科，为人群所不齿也。

二曰年谊。前世所谓同岁生者，谓其同在精庐，得失相告，困乏相资，急难相救，及其学成出校，又在同时，故其恩比于他人为切。若夫以科举取士而同时入选者，前日固非相识，邂逅遇之，何所归厚？而近世执为典常，复取唐人小说浮薄之言以为根据，义不本于礼经，事不允于民志，其不足称说也明矣。翰林院之尊先辈，逾于三老五更，不计齿历之高下，学术之浅深，惟入选后先是问；乾坤可毁，中国可亡，而此制必不可变。由是言之，沈朝士于浊流者，非为过矣！然观今之新党，心识其非，而犹不决然舍去，乃沾沾于百事之改良，非能见千里而不自见其睫者乎？

三曰姻戚。近古虽重宗族，而宗族不皆显贵之人。惟累世达官者，犹以自护其宗为念，下此则宁通谱于贵人，然犹不如择取外姻之为便也。诸将校之起自田间者，虽

位至开府，犹见轻于乡人，必与清贵者为婚姻，然后可以御侮。惟士大夫亦然，苟以姻娅为援，其迁转自较常人为易。而郡县守令之属，葭莩末戚，相聚一堂，鬻狱弄权，习为民患。彼新党者，于后者或能制止矣，于前者则犹固著不忘也。

四曰同乡。人情爱其乡里，不足致讥。督抚既横，时有暴政，则同乡京官得诉于察院而理之，此其补苴隙漏，诚不可骤废者。以视前三，夐乎远矣！然今人之爱其乡邻，较诸爱国为甚，夷貉在前，视之自若，而鄙夷他省，辄以为鱼蛇狼虎之不如。一人秉权，则乡人倚之而起；一人失职，则乡人从之而衰。故有舆金辇璧以保其乡贵，使不失旧服者，此新旧党之同情也。而新党之偏戾不道者，或谓南方当存，北方当弃，则往者迂旧之士所羞称矣。

今夫食肉者贵鲜肥，宿则味减，不如其鲜也；饮酒者贵陈酿，新则气暴，不逮其陈也。同此啖食之物，而或新或旧，贵贱殊情。然则论事当以是非为准，不以新旧为准，其例较然明矣。而诸新党于旧道德之当维持者，则视之以为琐节末事，诸有污俗，则随而与之转移，岂不曰吾之党援，将藉是以成立也。若是而顽固守旧者，亦得执此以为口实，曰吾之党援，将藉是以成立也。彼其激扬名声，互相题拂，两者对校，未见旧之必劣而新之必优。然则闰位余分，偷假旦夕，及名位既去，其人亦见轻于天下。荀子有言：狂生者不胥时而落，此之谓矣。若与汉、唐、宋、明之党人相提并论，不亦轻中国而羞泉下之朽骸耶？

或曰：今之任事者为学生，学生者非新党，而亦自为

一群，此殆可以无讥矣。曰：吾向者固言之矣，中国士民，流转之性为多，而执著之性为少，渐久渐通，则无不流转而为新党。今天下既无顽固守旧之徒，则新党之名自绝；而诸学生之所为者，又新党之变形也。夫其学术风采，有异昔时，诸所建白，又稍稍切于时用，然其心术所形，举无以异于畴昔。其尊师帅，有异于向者之称门生乎？其应廷试，有异于向者之叙年谊乎？其分省界，有异于向者之护同乡乎？以借权为长策，以运动为格言，凡所施为，复与党人无异。特其入官未久，不如昔人之熟识径涂，故不敢冒昧以求一试，迟之数岁，必森然见其头角。且新党虽多谄曲，而品核公卿，裁量执政，犹其所优为者。彼虽恃其客气，外以风节自高，则不得不有所饰伪。今则并其饰伪者而亦不知，惟以阿附群公为事。若夫呵殿出门，登坛自诩，以其爵命夸耀诸生，而视其取青紫如拾芥者，则新党虽顽顿无耻，犹必噤口不言。然则新党者，政府之桀奴；学生者，当涂之顺仆。新党犹马，不饱则不行；学生犹狸，不饥则不用。自专权自恣之政府计之，则学生之谨愿小心，其可用自优于新党。学生用而新党废者，非独时势适然，亦其品格愈卑，易于策使之故。观近世督抚之荐举州县，犹以书生本色为美谈。彼学生者，诚可谓书生本色矣。若就寻常处世之道为言，则新党诚愚，而学生不可谓非智。何者？东陲貉子，宰割神州，彼亦自树其部落族姓而已。汉人之良者，非备访问，则充书记，求其驯谨顺命而止，下此则为溺职，过此则为出位。其视汉人，实无异于趋走供奉，岂复以骨鲠直臣望之耶？纂盗日久，恬然

忘故，而汉人亦自以为在汉、唐、宋、明之世，犹之僵卧于海船者，梦中所见，犹是山原城郭，而不悟巨浸之稽天也。汉官之视虏主，无以异于吾族帝王，乃欲昂首伸眉，上法先正，外饰直言之名，內有植党之志，眞昔人所谓探龙颔批逆鳞者，大酋一觉，或废或诛，而汉人之为新党者，各鸟兽散矣。以此而处汉、唐、宋、明之世，君威虽伸，舆论尚在，必不至落薄如是。彼满洲者，既无法律，亦无清议，一遭贬削，则望实交陨尔耳。昔李绂之反接菜市，孙嘉淦之掷笔殿堂，此虏酋所以豫惩新党者也。学官之设卧碑，乡老之讲圣谕，此虏酋所以弹正学生者也。学生能善体虏酋之志，执雌守黑，不敢自遂，大智若愚，于是乎在，而新党不能，岂非天下之至戆耶？今之新党，犹有孑遗，幸而小小得志者，皆善守学生之术，以此云进步，则眞进步矣；以此云维新，则眞维新矣。若就中国民气为言，则新党犹不至靡然荡尽，学生用事，廉耻道丧，秏矣哀哉！非独中国之亡在是，虽满洲政府，亦未必不以此致亡于外人也。何者？国于天地，必有与立，非倜傥非常之士，即强力敢死之人，以一者足以进取，一者犹足以自卫也。满洲初入关，虽多兽德，而贞固干事之材，其所素有，此汉人所以不竞。今满人习于承平之乐，惟声色狗马是务，诸所举措，纷无友纪，而学生之承流其下者，一切以顺为正，海內向风，既明且哲，反唇偶语，且不得闻，而欲建立议院，以匡救庙堂之阙，此必不可得之数。然则虏廷之自恣必甚，而亡国划类，固可以旦夕俟之。满洲之亡，汉人之幸也。所恨者，天下习于学生之腥德，怯懦持下，宁为牛后。满洲

之亡，不亡于汉人，而或亡于他族，则汉人亦与之同尽，非变形新党之咎而谁咎哉？若吾党之狂狷者，不疾趋以期光复，日月逝矣，高材捷足者将先之！

【说明】 本文原载《民报》第十号（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收入《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

汉帜发刊序

（一九〇七年一月十九日）

日本以太阳得名，中国以天汉立称，信哉星球世界非我汉人不能抚而有也。原汉建号之始，肇于刘氏，而戎狄以此为媾奉大国之名。夫汉水东来，至于夏口，实为神州中央之地。夏本民族之称，则别称为汉，宜矣。索虏入关以来，汉乃日失其序，然名号犹与所谓满者相对。一二豪俊得依之以生起光复之念，而后乃今将树汉帜焉。顷者，汉族同志实基于此义，创一报，以发扬大汉之国徽，推倒满旗之色线，于是以《汉帜》定名。推斯志也，受小球大球，为大国缀旒可也。

汉人开国之四千六百五年一月十有九日，章炳麟序。

【说明】《汉帜》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日本发行的宣传革命的秘密刊物，创刊于一九〇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发刊序》即为章氏所撰。

失 题 诗

（一九〇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独独鹿鹿，水深泥浊。泥浊尚可，水深杀我。雍雍双雁，游戏田畔。我欲射雁，念子孤散。翩翩浮萍，得风扭轻。我心何合，与之同并。空床低帏，谁知无人。夜衣锦绣，谁分伪眞。刀鸣箭中，倚床无施。父冤不报，欲活何为。

【说明】 此诗录自《革命评论》第八号《革命风流》，一九〇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

军人贵贱论

（一九〇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中国千一百年之习俗，视兵与倡优同贱，而今世特甚重兵，此皆不察其情实者也。兵者，为国爪牙，以捍卫其人民土地，使他族毋得陵逼而宰制之，此兵之所以贵。若夫入受命于政府，出而剪除寇盗、镇服潢池者，无过魁侩伍伯之等夷；又况效忠虏庭，为枭为貔，以拒倡义之师乎！比于倡优，犹为逾格，亦何尊贵之有？满洲政府之陆军，大抵以破灭义师为职者也。论者徒以向之军士，出于鸡鸣鼠窃，而今有以士人入行伍者，比之曩日，步伐齐均则贤，纪律娴习则贤，通知文字则贤，护惜威仪则贤，故相与震矜之。若究其实，彼果为国爪牙以御他族者耶？征兵之与募兵，练卒之与乌合，良家之与狗屠，其贵贱均也。御他族者，虽后亦有可贵之道；拒义师者，虽前亦在当贱之列。不揣其本而齐其末，猥以步伐纪律文字威仪之长而加之以高名，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此而可贵，则倡优亦有可贵者矣！夫倡者，以他人为夫，而不自刃其夫；优者，

以其身受戮辱，而不使同类偕受戮辱。今之军士，于此宁无愧耶？

且征兵之制，千一百年以前固然，汉之南北军，唐之府兵，皆州郡良家也。然其所以张皇简讨者，惟备御羌胡是急。汉时尚武之气未衰，关西健儿，皆以从军为乐。至唐世始有牵衣顿足，悲泣以送戍边之士者，然观其所以怨嗟，知其心以戎狄豺狼为可惎，而非施于内地镇抚之师也。唯然，故汉、唐之名将，率不以严厉为能，唯拊循士卒、绝甘分少者称焉。此兵之以御侮为贵，而上亦能贵其兵。中唐以降，始有彍骑，犹是备边之师耳。其后方镇角立，僭制自王，实始招募市人，以相抵御，名为牙兵，而兵之贱，亦自此始。讫宋如故。岳家军之得名，从其主帅。兵既无赖，不得不示以威棱，则妄取一鸡者，罪在必戮。其他骄帅，无问军法重轻，惟以己意断斩。将之于兵，所谓狼牧羊者。明世虽有军籍，徒任挽输之事，能战者少。九边劲旅，大抵出于招募，而持溺器侍寝食者杂厕其间，此千一百年以来募兵之所以贱。贵贱虽殊，然其意在防外，不在备内，则未有与前世相戾者也。

古之军制曰：蛮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则有献捷，王亲受而劳之，所以惩不致[1]、劝有功也。兄弟甥舅，侵败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献其功，所以敬亲昵、禁淫慝也。讫于明世，武选之法，首功四等，迤北为大，辽东次之，西番苗蛮又次之，内地反寇又次之。若是，则征兵、募兵虽异，要其设军之意，只以御敌，非以防

---

[1] 《文录》作“惩不敬”。

民，章章明矣。夫其宗旨既同，故兵亦本无可贱之道。就此无可贱中，而本其或出良人，或出闒茸，以第论其高下，斯贵贱之情有异，亦其至微者尔。

若夫满洲政府之用汉兵，则勿论为征为募也，其用意固与前代绝异。辽东则本部也，漠北则同类也，西番则绝远也，苗蛮则小丑也。敌忾之情，固不加于数者。至于欧、美诸国，亦明知其力不若，毋敢启衅，以失事大之道。所汲汲欲得而甘心者，我中国之义师，而彼之所谓内地反寇耳！使彼族自处其地，协以谋我，则在彼诚有可贵者；以汉族而为之用，其可贵者安在？夫名者实之宾，名其为兵而云可贵，无可贵之实以丽之，则可贵者亦去。犹之仕宦为官吏者，其名亦岂不尊严耶？然以今之官吏言之，则清廉者百无二三，而赃吏遍于市朝，稽以当官之律，孰非在大辟之条者。如是，则官亦失其所以贵，而指斥者以为胠箧模金之不若，其言非过也。惟兵亦然。近世惟中流以上知官之为贱，而兵之被贱视者，率在闾里细民之目。非民智不开，而囿于习俗也。兵无御虏之用，顾反被用于虏以防制吾民，则宜其被贱也。夫闾巷细民，尚知黄、炎遗胄之可贵，而贱夫翼戴他族以反噬同种者。士大夫乃欲倒行而挽回之，使人人以叛降异族为神圣重宝之名，则是士大夫之智，曾闾巷细民之不若也。且兵之所以被贱者，岂独社会恒言而已，虽满洲政府亦自贱之。观其陈奏于大酋之前也，文臣自署曰臣，武臣自署曰奴才。其将既奴，而为之部曲者，非奴之陪奴欤？其京朝官有受命于虏廷而充钦差者，所至之地，文臣则以手版入谒，武臣自副

将而下，皆长跪道左，唱名以迎前导。然则所部之兵，又不足比其狗马也。今满洲政府改易兵制，于礼节或稍宽假，而奴才之称自若。夫社会既以反面事仇而贱视之，虽满洲政府亦以其叛降于己而贱视之，进退无可贵之地。独士大夫之不肖者，乃欲率其私意以相矜尙，则是士大夫之智，又胡貉禽兽之不若也。

若以区区征募之间相较，则吾不曰征募为同等，而曰征兵尤贱于募兵。今之征兵，唯略有土流耳，其实犹以招募得之，非有比戶简稽之法也。彼醉心于兵最可贵之名，亦不暇计其可贵者在为己国，而非为他人之国，擿埴索涂，如群瞽之相导，以委身于戏下，此犹其所志然也。若征兵也，则吾汉民固无效命于虏廷之责，一旦从其胁迫，受其絷维，牵帅壮士，投命军府，此无异于被略卖者。当此时而犹以兵为贵，则不如泽雉之入樊笼，犹有抵触震雊之顷也。由是言之，募兵者自鬻而为奴，犹非洲之矿工；征兵者被他人胁迫而为奴，犹南洋之猪仔。以此为衡，则征之更贱于募，断可知矣。

或曰：若是，则人类之至贱者，莫如满洲所置之陆军耶？曰：人之贵贱，亦在其心耳，无以面目形式为也。今有痛心于宗国之沦亡，而身在草茅，无尺寸假手之柄，欲得其当而报汉者，顾岂无其人哉？夫不惮以身为厮养臧获，展布四体，以趋胡羯笞箠之下，卒其所谋，乃归于反正者，此其心至哀隐，其行亦天下之至高也。昔靡，固夏之遗臣也，降仕夷羿，卒辅少康以复旧物；颜杲卿，又唐之太守也，迎谒禄山，有紫袍之赐，终能定谋图贼，使赵、魏诸郡，

坚守自固。陆军人而知此，成则可以上比二公；其不成也，犹不失为李陵，此汉人所当写金为像而膜拜之者也。若其弗能，胡汉治戎，遇于中原，弹丸未发，望风瓦解，宁失数金之廪食，积岁之勋资，而不忍冒天下之不韪者，抑其次也。虽然，借权之事，固非容易得之。坚忍者以此为恢复汉宗之径窦，而狡者或假借其名以谋衣食，至不已而裴回观望，不以一矢相加遗者，虽至无俚，犹其次也。

【说明】 本文原载《民报》第十一号（一九〇七年一月二十五日），收入《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

敢死论跋语

（一九〇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记者案：发愤自戕，诚属无谓，然天下必多此辈，而后临事不惧。何者？无名誉之死，尚优为之，况复见危授命，为举世所尊崇耶？若必选择死所，而谓鸿毛泰山，轻重有异，则虽值当死之事，恐亦不能死矣。罗马人之敢死，即被斯多牙派之遗风，是则无事而能自戕者，有事则未有不奋身搏〔搏〕战者也。凡事取法乎上，所成不过中流，自戕之风，当开之，不当戒之。太炎附识。

【说明】 本文系《民报》第十一号（一九〇七年一月二十五日）病己：《敢死论》之跋语，标题系编者所加。《敢死论》以为"发愤自戕，或孑身蹈海"，"乃类于匹夫匹妇之所为"；"而何以不利用此精神，以成敢死之事也"。此文撰于陈天华投海自杀后不久，对之似有讥意，章氏于文后加此"附识"。

邹 容 传

（一九〇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邹容，字威丹，四川巴人。世为贾，父某，读书通大义，以贩鬻致富。容生而慧敏，父令就傅，年十一，诵群经、《史记》、《汉书》皆上口。又喜雕刻，从吕翼文学，始知六书。父常以翰林期之，容弗欲，时以语抵其父，父怒，令伏榻上，笞其臀流血以为常。父嗜罂粟膏，容于广坐语人曰："嗜罂粟者当断头。"父默然，良久曰："尔不知为亲者讳乎？"与人言，指天画地，非尧、舜，薄孔子，无所讳。翼文以为畔道，逐之。乃之上海，入广方言馆，学英语，数月，又不能竟。父令赴日本留学，时年十七矣。诸留学者皆分省相保为同乡会，容曰："中国人皆同乡，岂以方域相格。"与同学钮永建规设中国协会，未就。会江南武备学生监督姚某有奸挑良家妇女事。容与同学十余人突入其邸中，挞之数百。事发，微行归上海。

是时，余在爱国学社始识容，诸教员争与交。容性倜傥，喜詈人，谓诸社生曰："尔曹居上海，在声色狗马间，学

英文数岁，他日堪为洋奴耳，宁知中外之学乎？”社生群聚欲殴之，乃去。以《革命军》一通示余，令稍稍润色之。余曰：“吾持排满主义数岁，世少和者，以文不谐俗故。欲谐俗者，正当如君书。”乃为叙录，与金山僧用仁刻行之。容既去，犹留上海。适康有为役人冯镜如召康氏徒党，欲立国民议政厅，亦招容。镜如者，广东贾人入英籍者也。容往，诘之曰：“尔英人，今所设者，中国民议政厅耶？英国民议政厅耶？”镜如惭，逡巡退去。

容既明种界，又任气，视朋辈无足语者，独深信余，约为兄弟。时爱国学社教员吴朓故依附康有为，有为败，乃自匿，入盛宣怀之门。后在日本，与清公使蔡钧不协，逐归，愤发言革命排满事。而爱国学社生多朓弟子，颇自发舒，陵轹新社生如奴隶。余与社长元培议，欲裁抑之。元培畏朓，不敢发。余方驳康有为政见书，事寖寻闻于清政府，欲逮爱国学社教员，元培微闻之，遁入青岛。而社生疾余甚，问计于朓。会清政府遣江苏候补道俞明震穷治爱国学社昌言革命事，明震故爱朓，召朓往，出总督札曰：“余奉命治公等，公与余昵，余不忍，愿条数人姓名以告，令余得复命制府。”朓即出《革命军》及《驳康有为》上之曰：“为首逆者，此二人也。”遽归，告其徒曰：“天去其疾矣，尔曹静待之。”初，清铅山县知县陈范以事免官，欲报仇清政府，设苏报馆于上海，颇诋諆政府丑事，后闻有言革命者，喜甚，时乞文录之《苏报》，故明震亦列陈范名以上。英租界巡捕承命至苏报馆，范遁，令其子诣余告警。余谓诸教员方整理学社未竟，不能去，坐待捕耳。巡捕

至，遂入狱。而容亡匿英教士所，巡捕不敢诘，闻余被系，即徒步走赴狱自□："我邹容"。英巡捕皆骂曰："尔五尺竖子，未有知识，宁能作《革命军》，得无有狂疾？速去！"容曰："我著书未刻者尚千百卷，非独此小册也。尔不信者，取《革命军》来，吾为尔讲说之。"巡捕既不能得容，及容自至，亦欲因以为功，乃开铁槛引容入居巡捕狱。半岁未决，与余读佛经及周秦诸子以为乐，时时欲为诗，自以为未素习也。余曰："第为之，虽不工，亦无害。"容即题《涂山》为一绝，涂山在蜀，世云禹妃涂山女故国也，其诗曰：

　　苍崖坠石连云走，药叉带荔修罗吼。辛壬癸甲今何有，且向东门牵黄狗。"

其言东门牵黄狗者，盖自比李斯具五刑事，余笑曰："未也。"

明年狱决。狱卒始不以人道相待，时闭置空室中，未服役，视狱卒陵暴状，相与咋舌裂眦。余谓容曰："尔我体皆弱，又不忍辱，与为白人陵藉而死也，无宁早自为计，然以禁锢期限计之，我三年，尔二年。尔当生，我当死。"容哽咽流涕曰："兄死，余不得不死。"余曰："不闻子胥兄弟事耶？且白人内相陵逼，而外犹恶其名。余死，彼惧烦言之不解也，必宽假尔。"因复议引决事。时刀索金环毒药皆不可得。余曰："独饿死耳。中国饿死之故鬼，第一伯夷，第二龚胜，第三司空图，第四谢枋得，第五刘宗周，与我而六。"既服役，余断食七日不死，同系者皆走告曰："断食虽久，不必死，徒呕血耳，毋自苦。"容亦劝余食，因复进食。

所食皆马麦饭带稃者，日赋三合，粗粝哽会咽，顾视便利，则麦复带稃而出。同系五百人，一岁死者百六十人。印度人为狱卒者，尤暴戾，每举足醍〔踶〕踔人，不择腰膂腹背。既仆地，则数狱卒围而击之，或持椎捣其胸，至闷绝，乃牵入铁槛中，而狱卒头目复造私刑为钳制计，其法以帆布为梏，反接两手缚之，加以木楔，名曰软梏。梏一小时许，则血管麻木，如针刺状，虽巨盗弗能胜，号呼宛转，声彻全狱。凡狱囚与外人交通书札者，则以此钳制之，故暴戾之状，不闻于外。余尝三受梏，而容略解英语，稍与委蛇，然意愤恚殊甚。

明年二月，容病心悸，西医来验视曰："病易治。"食以牛乳。又二十日，曰："病稍甚，吾当请而释之。"其夕，积阴不开，天寒雨湿，鸡初鸣，卒于狱中。旦日，余往抚其尸，距气绝八小时矣。目不瞑，同系者皆疑医师受贿酖之。方余断食时，与容相和为绝命词，其卒章曰："愿力能生千猛士，补牢未必恨亡羊。"容死，余常忆其诗云。

【说明】 本文原载《革命评论》第十号（明治四十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署名"章炳麟"，收入《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修改很大。此后，章氏又就《文录》所载增损为《赠大将军邹君墓表》，见本书卷三。

秋瑾集序

（一九〇七年八月）

山阴为少康枝子之地，箕帚作而妇道成，曹娥以死其父，未足以多。最后有秋瑾，变古易常为刺客。将其德合于乾元，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瑾素自豪，语言无简择，尝称其乡人某为已死士，闻者衔之次骨。

徐锡麟既诛恩铭，党祸浸寻及绍兴，遂牵连以告有司而贼之。

瑾死，传其诗词百余首，都为一集。余睹其语婉瘱，若不称其情性者。人之志行，或深固不见于诗，然瑾卒以漏言自陨，悲夫！

余闻古之善剑术者，内实精神，外亦妥仪，则喋喋腾口者寡。读《吴越春秋》，有袁公越女之事，惜乎瑾之不志此也。定、哀之世，于是乎有微言。丁未七月，章炳麟序。

【说明】 按：《秋瑾集》（《秋瑾诗词》）二卷，王芷馥编，一九〇七年印行。收秋瑾诗词各一卷，共诗八十七题，词三十八阕。章氏曾为撰序，载《民报》第十七号（一九〇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太炎文录》未曾录入，上海国学书局排印的《太炎最近文录》则列为“附录”。

国　家　论

（一九〇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余向者于社会主义讲习会中，有遮拨国家之论，非徒为期望无政府者说，虽期望有政府者，亦不得不从斯义。然世人多守一隅，以余语为非拨过甚，故次录前论，附以后义，令学者得中道观云。

一、国家之自性，是假有者，非实有者；二、国家之作用，是势不得已而设之者，非理所当然而设之者；三、国家之事业，是最鄙贱者，非最神圣者。此义云何？第一义者，凡云自性，惟不可分析绝无变异之物有之，众相组合，即各各有其自性，非于此组合上别有自性。如惟心论者，指识体为自性；惟物论者，指物质为自性。心不可说，且以物论，物质极微，是最细色，不可断截破坏贯穿，不可取舍乘履搏掣，非长非短，非方非圆，非正不正，非高非下，无有细分，不可分析，不可睹见，不可听闻，不可嗅尝，不可摩触，故名极微，亦曰原子。此毗婆沙论一百三十六说，近世原子论者，亦同此义。若以原子为实有，则一切原子所集

成者，并属假有，何以故？分之则各还为原子故。自此而上，凡诸个体，亦皆众物集成，非是实有。然对于个体所集成者，则个体且得说为实有；其集成者，说为假有。国家既为人民所组合，故各各人民，暂得说为实有；而国家则无实有之可言。非直国家，凡彼一村、一落、一集、一会，亦惟各人为实有自性，而村落集会则非实有自性。要之个体为眞，团体为幻，一切皆然，其例不可以偻指数也。或曰：凡团体者，非止以集合个体为性，乃自以其组织为性，故不得说为假有。夫组织云者，将指何等事耶？一线一缕，此是本眞，经纬相交，此为组织。今若有一幅布及一端帛，特指其经纬相交以成面积而言，当其为布帛时，此一线一缕者，未尝失其自性，及其解散，则线缕之自性犹在，而布帛则已不可得见。是故线缕有自性，布帛无自性。布帛虽依组织而有，然方其组织时，惟有动态，初无实体。若尔，组织亦无自性，况其因组织而成者，可得说为实有耶？且如人有两手，两手者，固各有自性，虽至两手相叉，亦惟认两手为有自性，不得以相叉为有自性，此儿童所知者。复次，人之组合而为村落，或为军旅，或为牧群，或为国家。又若金之入型，各从其相，而金之自性无改，方为指环，无间又为眼镜筐；方为眼镜筐，无间又为时辰表廓。此指环、眼镜筐、时辰表廓者，惟是形式相差，势用有异，而展转相更，复可以此为彼。是故指环、眼镜筐、时辰表廓，一切虚伪，惟金是眞。如是，村落、军旅、牧群、国家，亦一切虚伪，惟人是眞，虽有巧辩，不能夺其说也。

然近世国家学者，则云国家为主体，人民为客体。原彼之意，岂不曰常住为主，暂留为客，国家千年而无变易，人民则父子迭禅，种族递更，故客此而主彼耶？若尔，请以溪流喻之：今此一溪，自有溪槽，溪槽者，或百千年无改，而其所容受之水，则以各各微滴，奔湊集成，自朝逮暮，瀑流下注，明日之水滴，非今日之水滴矣。是则亦可言溪槽为主体，槽中水滴为客体，而彼溪槽，所指何事？左右有岸，下有泥沙，中间则有空处；岸与泥沙，虽溪槽所因以成立，而彼自性是土，不得即指彼为溪槽。可指为溪槽者，惟有空处。夫以空处为主体，而实有之水滴，反为客体，是则主体即空；空既非有，则主体亦非有。然此空者，体虽虚幻，而犹可以眼识现量得之。若彼国家，则并非五识现量所得，欲于国家中求现量所得者，人民而外，独土田山渎耳。然言国家学者，亦不以土田山渎为主体，则国家之为主体，徒有名言，初无实际可知已。

或曰：国家自有制度法律，人民虽时时代谢，制度法律则不随之以代谢，即此是实，故名主体。此亦不然。制度法律，自有变更，非必遵循旧则，纵令无变，亦前人所贻之“无表色”耳。（凡言色者，当分为三：青黄赤白，是名显色；曲直方圆，是名形色；取舍屈伸，是名表色。凡物皆属显色形色，凡事皆属表色。表色已过，而其所留遗之功能，势限未绝，是名无表色。如筑桥梁建城郭等，当其作役，即役人之表色；作役已毕，而桥梁城郭至千百年不坏，即此不坏之限，为役人之无表色。）[1] 其功能仍出于人，云

① 《文录》无此（　）号。

何得言离人以外别有主体。然则国家学者，倡此谬乱无伦之说以诳耀人，真与崇信上帝同其昏悖。世人习于诞妄，为学说所缚而不敢离，斯亦惑之甚矣。

问曰：若尔者，人亦细胞集合而成，云何得言实有自性。答曰：以实言之，人亦伪物云尔。然今者以人对人，彼此皆在假有分位，则不得以假有者斥假有者，使吾身之细胞，悍然以人为假有，则其说必非人所能破。若夫对于国家者，其自体非即国家，乃人之对于国家。人虽伪物，而以是单纯之个体，对于组合之团体，则为近真。故人之以国家为假有者，非独论理当然，亦其分位得然也。

第二义者，一切物质，皆有外延，此本无当然之理，特以据有方分，互不相容，则不得已而生肤郭。植物有皮，介虫有甲，乃至人及鸟兽，皆有肤革以护其肌，大者至于地球，亦有土石为之外郛，使地藏金火得以安隐，此皆势力所迫，不得自由。昔者庄生有云：夫得者困，可以为得乎？则鸠鸮之在于笼也，亦可以为得矣。且夫趣舍声色以柴其内，皮弁鹬冠搢笏绅修以约其外，内支盈于柴栅，外重纆缴，睆睆然在纆缴之中，而自以为得，则是罪人交臂历指，而虎豹在于囊槛，亦可以为得矣。由是观之，令人得脱肉而居，无皮革以缠其外，而不受雪霜风雨之侵，则于我顾不快耶？夫国家犹是也，亦有大山巨渎，天所以限隔中外者，然以人力设险为多。蒙古之鄂博，中国之长城，皆是类也。又不能为，则置界碑；又不能为，则虚画界线于舆图以为分域。凡所以设此外延者，与蛤蚌有甲，虎豹有皮何异？然则国家初设，本以御外为期。是故古文

国字作或，从戈守一，先民初载愿望，不过是耳。军容国容，渐有分别，则政事因缘而起。若夫法律治民，不如无为之化，上有司契，则其势亦互相牵连，不可中止。向无外患，亦安用国家为？汉土学者，视政府无足重轻，然犹云尊卑有分，冠履有辩，君臣有等，虽无用而不可不立。不悟天高地下，本由差别妄念所生，一切分位，随眼转移，非有定量。如彼工巧画者，以少采色间少采色，能令无高下中见有高下，乾坤定位，准此可知，名分之执，亦由斯破坏矣。或者又谓物有外延，实是天然规则，国界虽无所用，而不可破此模型。欲破此执，且当以峡水喻之，如峡水流，两岸色形，同处一时，俱现二像，居两岸者，互见分明。夫即此一峡水中，而互容两岸色像，是则万物本无不相容受之理。凡诸有形质碍，同处一时，似不俱起，然试取一坚青玉质，以石磨研，悉成细粉，青所在处，亦即坚所在处；坚所在处，还即青所在处。此青与坚，何以同处一时，相容俱起？又试任取一物，除去显色形色质碍而外，其中尚有"物如种子"否？若云无者，物则本无，不烦推论；若云有者，即彼"物如种子"，何故能与显色形色质碍等相，相依俱有？若云显色形色质碍等相，别有"造色种子"为之因者，是则"物如种子"、"造色种子"二者所现之量，同处一时，互相容受，即知万物本无外延明矣。虽无外延，而随眼所得，则有外延者，亦犹工巧画师用少采色间少采色，能令无坳突中见有坳突，故知万物外延之用，非理本然，实随感觉翳蒙而有。以是推求，则国家之作用可知已。

㊷

第三义者，凡诸事业，必由一人造成，乃得称为出类拔萃。共集合众力以成者，功虽烜赫，分之当在各各人中，不得以元首居其名誉，亦不得以团体居其名誉。惟诸学术文艺技巧之属，高之至于杜多苦行，皆由自力造成，非他能预，若是，斯足以副作者天民之号。若学术无心得，惟侈博闻；文艺无特长，惟随他律；技巧无新法，惟率成规。虽尽天下之能事得尽有之，犹是他人所有，非吾所独有也。若节操足以动人，惟是弹琴咏风，自喻适志，如《周易》所谓甘节者，斯则少欲知足之士皆能仿佛，非天下之至高也。非吾所独有，与非天下之至高，而独尸其嘉名，犹不免为攘窃；况于功德在人，本非独力所能成就。析而视之，则犹人人解炊，使天下无一夫受其饥者，其功利不可谓不博，要之其业至微末已。夫工场主人，于佣作者，日役其力，而擅美利于一己，世犹以为不均。然凡一熟货之成，一者必有质料，二者必有作具，三者必有人力。此质料与作具者，素皆主人所有，彼佣作者，独人力耳。是一熟货成就之因，主人当其二，佣作者仅当其一也；而所获赢余，一切为主人所没，议者且以盗窃名之。若夫国家之事业者，其作料与资具，本非自元首持之而至，亦非自团体持之而至，还即各各人民之所自有，然其功名率归元首，不然，则献诸团体之中，此其偏颇不均，不甚于工场主人之盗利乎？世人愚暗，辄悬指功利以为归趣，余岂必非薄功利。然彼功利所在，亦即美名所在。而功利者，必非一人所能为，实集合众人为之。纵有提倡其前者，犹行礼之赞相，所擅唯有口号；至于槃辟跪拜，则犹赖人自为之

也。夫其事既由人自为之，而美名所在，不归元首，则归团体，斯则甚于穿窬发匮者矣。岂独常事为然，凡在军旅，其劳瘁亦至甚矣，然将帅虽劳，而士卒之疮痍，与齐民之罢弊，有什伯于将帅者。世人以功成骨枯为佳兵者戒，不悟事虽合义，行迹非不与佳兵者同也。然并世之夸夫，率举"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以为恒语，此必不能附会者。大觉有情，期于普度众生得离苦趣，则身入恶道而不辞，顾未尝牵帅他人以入恶道。至于国家事业则不然，其为种族革命欤？政治革命欤？社会革命欤？必非以一人赴汤蹈刃而能成就，我倡其始，而随我以赴汤蹈刃者，尚亿万人，如是，则地狱非我所独入，当有与我俱入者在。而独尸是语，以为名高，斯亦何异于盗窃乎？余以为众力集成之事，直无一可宝贵者，非独莅官行政为然，虽改造社会亦然。尧、舜云，亚历山德云，成吉思汗云，华盛顿云，拿坡仑云，俾士麻云，于近世巴枯宁、苦鲁泡特金辈，虽公私念殊，义利事异，然其事皆为众力集成，则与炊薪作饭相若，而代表其名者，视之蔑如，以比释迦、伊壁鸠鲁、陈仲子、管宁诸公，诚不啻蛎甲之于犀角，虽一术一艺之师，犹不足以相拟也。夫灶下执爨之业，其利于烝民者至多，然而未有视为神圣者；彼国家之事业，亦奚以异是耶？尸之元首则颇，归之团体则妄，若还致于各各人民间，则无过家人鄙事而已。于此而视为神圣，则不异于事火咒龙也。

上来三事，所谓遮拨国家。然期望有政府者，亦非因是而被障碍，此义云何？

前第一义，既不忍许国家自性为实有物，则凡言爱国

者，悉是迷妄。虽然，爱国之义，必不因是障碍，以人心所爱者，大半非实有故。喻如各各金粒至百千数，人之爱之，不如其已成指环者，各各白石粉粒至万亿数，人之爱之，不如其已成瓷瓶者；又如古钱有文，旧碑有刻，若捣碎之，则废铜沙砾，可以弃之沟中，纵复熔铸为钱，凝和为碑，犹不如向日完具时为可宝玩。夫指环瓷瓶，无过形式，而钱文石刻，则区区雕琢隐显之间耳。然其可贵，必有百倍于各各分子者。此何因缘？则以人身本非实有，亦集合而成机关者，以身为度，推以及他。故所爱者，亦非微粒之实有，而在集合之假有。夫爱国者之爱此组合，亦由是也。且以各各微粒，捣和成器，器虽是假，而其本质是眞，其爱之犹无足怪尔。亦有别无本质，唯是幻像，而人反乐观之者，喻如幻师，幻作白兎青雀等像，于中无有微分毛羽血肉可得，乃至石磨水漉亦不可得，而人之爱玩反过其眞。又如画工画作林木及诸牛驹，于中本质，惟是纸素丹青，虽以锯齿析破木之一叶、牛之一角、驹之一足，竟无存其中者。然人心睹画而愉快，或过于入山适牧见其眞形也。此何因缘？则以人身本非本质，托此气液固形诸无机物，以转化为肌骨血汗耳。即身为衡而以外观群物，故所爱者，亦非本质之实有，而在幻像之假有。夫爱国者之爱此景像，亦由是也。今夫幻云画云，虽无本质，而现有接触于眼根者，其爱之犹无足怪尔。亦有别无现量，惟属过去未来，而人反乐念之者。今有上味，声称远闻，或地绝远，或物难致，如思熊掌及思鲈鱼，又若蜀士思啖蟹羹，或在沙漠思得荔支，当其存念，虽太牢之味，无

以易也。逮其舌根亲证，顾无以愈于彼。复有上妙欲尘，求之难获，若彼妃匹裘马宫室道具之好，当其未得也，希望过甚，或舍生以求之；及其已丧也，恋著过甚，有忘形以殉之；此其以为乐也，虽钧天玄圃，曾莫逮其万一。然当其现受时，则亦寻常之愉快耳。夫过去者已灭，未来者未生，此即虚空无有之境。然于现在正有之境而爱之甚微，于过去未来无有之境而爱之弥甚者，此何因缘？则以人心本念念生灭，如长渠水相续流注，能臆念其已谢灭，而渴望其未萌芽者。以心为量，令百事皆入榘矱之中，故所爱者，亦非现在之正有，而在过去未来之无有。夫爱国者之爱此历史，亦犹是也。复次，处盛强之地而言爱国者，惟有侵略他人，饰此良誉，为枭为鸱，则反对之，宜也。乃若支那、印度、交趾、朝鲜诸国，特以他人之剪灭蹂躏我，而思还其所故有者，过此以外，未尝有所加害于人。其言爱国，则何反对之有？爱国之念，强国之民不可有，弱国之民不可无，亦如自尊之念，处显贵者不可有，居穷约者不可无，要以自保平衡而已。

前第二义，既不忍许国家作用为当设，则凡言建国者，悉是悖乱。虽然，建国之义，必不因是障碍，以人所行事，大半非当然故。饥者求菽麦，渴者求水浆，露处者求廊宇，号寒者求絮绵，此宁有当然之理耶？使人皆如灵龟，则可以不食矣；人皆如雉子，则可以不饮矣；人皆如飞凫，则可以不屋矣；人皆如游鱼，则可以不衣矣。非特尔也，草昧初民，虽有饮食居服，而犹与今人绝异；今人纵不能为龟雉凫鱼，独不可为草昧初民乎？习于宴安，而肌骨

不如昔日之坚定，去此则不足以自存。值歉岁，处围城，析木皮以为食，有宁不入喙而死者，由其咽喉所习则然。以此知近世存生之术，皆由势不得已而为之，非理有当然而为之也。原夫人之在大界也，介然七尺，而攻围其四帀者多矣。依天以立，而寒燠瘴疠侵之；依人以处，而笞箠刀锯犯之；依身以存，而饥渴疲劳迫之。尽此百年，无一刹那得以自在，于是则宁以庶事自缚以求安全。若从吾所好者，安取是扰扰为？然既已自求安全，则必将层累增上以至建国而止。今之建国，由他国之外铄我耳；他国一日不解散，则吾国不得不牵帅以自存。说者以为国界虽存，政府则固可以不立，乃举普法战事证之，谓拿破仑第三，自将而亡，巴黎城人，自为守而固。宁思人自为守者，独无当轴处中，以司号令者耶？此固不必远举法事为征，凡以草泽齐民，起而自踣其政府者多矣。要有幕府，是即政府之具体而微者，故不得以无有政府为说。人亦有言，勇夫重闭，而况国乎？当其存时，则不得不俱存；及其废也，亦相随俱废耳！一废一存，慢藏贾祸之道在是矣。说者又云：饮食居服，生而不得不然，至于国家则否，有时而可以消灭之，故不得以为同喻，是亦未为谅直之论也。人果入山，日啖松脂药草诸物，久之芽毛渐生，而居服即无所用，方书所言，或不尽实，然以成事验之，人有击鹳而下者，微伤其足，涂以金疮之药，久之自愈，日以稻饭食之，举翮欲飞，遂不得上。以是知谷食祸人，令体沈重而多疾病，故资于裘絮栋宇以蔽之，不然，则无所事此尔。人于居服，当其可弃则弃之；人于国家，当其可废则废之，其喻

正同，势未可脱，则存之亦宜也。

前第三义，既不忍许国家事业为神圣，则凡言救国者，悉成猥贱。虽然，救国之义，必不因是障碍。以人之自卫，不论荣辱，农夫担粪以长稻粱，矿人沾体以致石炭，此其事至污辱也，而求食者不以为诟，是何也？人之躯骸，本由腐臭不净之物以成胚胎，其出入与便利同道，故一念及生，即不邮自处污垢。况于匡扶邦族，非专为一己而已。特世人执是以为高名，则不知集众所成，其能力最为阘茸，而自旌其伐，尊于帝天，遂令志其事者，毫毛未动，先有矜众自贵之心；事之既成，又群奉以为大长，斯最可忿嫉者。若本其惨怛之心，以为自卫卫人之计，则如里闾失火，相与抱瓮救之，虽焦头烂额，不以自多，惟曰行吾之素耳，此安论鄙贱与神圣哉？今之贤者，既救火而思牛酒，斯末矣。不肖者，未救火而预设一可得牛酒之心，悲哉！然此非独救国为然，虽能空国家而致之大同，亦赖群伦之力，未足以自豪也。其间贵者，独有密怀匕首、流血五步，与夫身遭厄困、百折而不回者，斯乃个人所为，非他能代，故足重耳。若夫成功以后，铭勒景钟，斯适足为揶揄之柄。此而可贵，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者，当愈贵于是矣。

然则前举三事，与后义本不相妨，世之期望有政府者，必知斯义，而后举无缪妄。若夫拘牵法理，尊仰事功，斯乃牛羊贱趣、冥无识知者尔，是曷足与言胜义哉！

【说明】 本文原载《民报》第十七号（一九〇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收入《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三。

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

（一九〇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阳历十月十七日，政闻社员大会于锦辉馆，谋立宪也。社以蒋智由为魁，而拥树梁启超。启超往，徒党几二百人，他赴会者亦千余人，又召日本名士八辈为光宠，犬养毅者，其气类相同者也。革命党员张继、金刚、陶成章等亦往视之。梁启超登，力士在右，与会者以次坐，政闻社员在前，革命党员在政闻社员后，他留学生在革命党员后。启超说国会议院等事，且曰："今朝廷下诏，刻期立宪，诸君子宜欢喜踊跃。"语未卒，张继以日本语厉声叱之曰："马鹿"。起立，又呼曰："打"。四百余人奔而前，启超跳，自楼曲旋转而坠，或以草履掷之，中颊。张继驰诣坛上，政闻社员持几格之，金刚自后搤其肩，格者僵，继得上。众拊掌欢呼，声殷天地。政闻社员去赤带徽章以自明，稍稍引去。

继遂言曰："吾不应参政闻社员事，然所以不能默者，将有所诘问于犬养毅。毅前在早稻田，语支那学生曰：

'中国当速革命。'吾亲闻之。今何故附会立宪，猥鄙至是？"毅俯首谢，则登坛作酬应立宪语，既卒，徐曰："支那或革命或立宪，任人为之，在速行耳。"当是时，蒋智由先知有变，不至，会亦遂散。继本意欲痛驳立宪以塞莠言，会事急至用武，亦未竟其说也。

余意梁启超、蒋智由辈，志在干禄，虑非专心于立宪者。又前日所为欺诈事状，多已发露，其党人并自知之[1]。犬养毅者，日本进步党之旧人，虽游说奔竞，不晓学术，类策士之所为，然固尝躬豫宪政之事矣。人情葆爱其所躬行，而欲施之邻里，野人奏曝，自古而有之，诚不可与梁、蒋同论。然始言革命，终言立宪，浮夸转变，失其权衡，是其心固非有定见者。盖中国事状，非外人所能知，日本虽比邻，犹无以知其成败中失所在，斯其议论浮游，亦无怪尔。

原吾辈所以遮拨立宪者，非特为满、汉相争，不欲拥戴异族以为共主；纵今日御宇者，犹是天水、凤阳之裔，而立宪固不适于中国矣。是何也？宪政者，特封建世卿之变相耳。其用在于纤悉备知，民隐上达，然非仍封建之习惯者弗能为。欧洲诸国之立宪也，其去封建时代，率不过二三百岁，日本尤近。观其上下二院所以并设，岂故为钤制哉？藩侯贵族，渐替而为地主，握赋役之枢纽者，惟是为重，异于中国所置名号王侯，空无凭藉。故二院不得不同时并立。其二院并立[2]，而因仍封建可知也。今中国

---

(1) 《文录》作"其党人且自知之"。

(2) 《文录》作"观其二院并立"。

之去封建时代，则已二千余岁矣。夫封建之猥诸侯，其地财一县耳。百里之封，而命官授吏，至数百人，且用人多不出乡里，其知民间情伪，无异箪席之间。然则纤悉备知，而民亦不敢自匿，固其所也。又其世为邑主，素分已定，民视之以为天授之尊，故有顺从而无违逆，上亦善审民情，而斟酌其赋役轻重，则厚敛而民安之。云南某土司尝语余曰："余所部凡六万户，赋有定额，然有所兴立，量民之力而加其征，征虽重，民不逋赋。"此即封建可以厚敛之效也。且夫众建棋置之势，互相隔绝，则争战[1]之事常多。借观春秋鲁、郑诸国，当今日十数县耳，而国有三军，其兵额几至四万。今一省之兵，或不逮是矣。夫外患多则不以服兵为怨，战争亟则常以尚武为风，此皆封建已然之验。即观今时缅甸已并于英，而本邦土司，以弹丸黑子之地，犹足自保，非人自为守百足不僵之势耶？以赋税则乐输无隐如此，以兵役则效命不违如彼，习惯已成，一转移间而为立宪，则犹舍重而之轻也。土田荒熟无所隐，丁口少多无所匿，赋税厚重无所逋，兵役劳苦无所避，岂上之综核使然，顾民亦率其旧贯耳。还以观之中国，惟汉时去封建近，故顷亩户口之数，犹能审悉，而过更践更之制，民皆乐就而无规匿。至于唐之府兵，虽出征调，民间逃亡者已多，勉而就之，惟牵衣以泣耳。自尔以来，赋税未为极重，然逋欠者往往而是。以言民数，明时黄册，盖多有不实者，及一条鞭法盛行，而编审亦为文具。观今之保甲册，盖以分别主客，防闲奸宄，此皆有利于民，非有所害于

(1) "争战"，《文录》作"竞争"。

民也。然其数犹模糊不实，况于计口征兵，名一注册，则无异罣于罗网，孰有自占得实者乎？以言田数，中国曩时盖已明通算术矣，虽无代数，而四元不可谓不精；虽无几何，而句股不可谓不密。以视日本，其疏密相去，盖不啻天渊也。然以之清丈田亩，辜较粟米，虽有其术而不能行。日本当封建时，算术至疏，顾无隐漏奸欺之患。夫曩日虽自占田数，其赋固不甚厚，而犹有隐度不实者，况欲增加重税，田一注册，则有负债之券，宁肯吐实以自害耶？以言榷筦，中国盐政，秉于官而校之商，然私贩者猥众，商人或有余盐不雠，官为检卖酱家，视酱缸之数以为鬻盐之数，卖酱者便私盐，则缸数皆不实告。夫酱缸，特有形之物也，犹不可审悉钩检，况于货直之低昂、奇赢之厚薄，而可详悉知之乎？由是观之，去封建时代愈久者，其尚武之风衰，其输税之情惰，纵欲尽情检校，然今之官吏，尚有受贿欺隐者，而况付之警察台隶之流？凡诸征税料民之事，不委之地方自治耶，则官吏深文，多有骚扰害民之弊；委之地方自治耶，则戚里相护，必有徇情隐匿之奸。是故习惯已移，而欲藉法律以逆挽之，此必无济于实事者也。

综观中外之历史，则欧洲、日本，去封建时代近，而施行宪政为顺流；中国去封建时代远，而施行宪政为逆流。中国欲立宪，惟两汉之世差可，今则时已去矣，诚欲求治，非不在综核名实也，然观贞观、开元之政，综核之严，止于廉问官吏，于民则不为繁苛。夫惩创贪墨，纠治奸欺，宁非切要可行之政哉！要之，民所上于有司者，一丝一粟，有司悉以归之左藏，而监守自盗者必诛，挪移假借者必戮。

是在今日，亦足以救弊扶衰。至于民间之有容隐，虽时时检括，终于无可奈何。夫如是，则立宪无益，而盛唐专制之政，非不可以致理。谈者不察，以为度支出入，岁有报告，民知赋税之为实用，则自乐输而无隐情，以闾里赛会饮酺之事为证；不悟赛会足以饰观，饮酺在于取醉，朝出资而暮得乐，则争先赴之也固宜。若夫县官经费，其收效为至迂，亦有益于全国而损于个人者，纵有报告，民之观望自若也。即观道路桥梁诸政，近在一邑，私用至可睹矣，然抗不出资者尚众；况于国家行政，成效未著，焉得以赛会饮酺为喻也？

或谓民知爱国，则自以效命疆埸为美谈。然观印度嫠妇，赴冢自焚，亦在笃于伉俪而慕节烈之名耳；若问其心，乐耶否耶？今金陵所谓征兵者，大抵出自士流，乐名就募，非不训练，而惰弛如故，且逃亡者有焉，盖自悔其卤莽也。况于农、工、商贩之流，百姓当家，差足自澹，亦何苦而俯首于戎旃之下。然是二者，若出于初脱封建之国，则自循化顺则而为之，惟中国则不可与彼同论。世人徒见欧洲、日本皆以立宪稍致清平，以为四海同流，中国必不能自外；是但知空间之相同，而不悟时间之相异，其亦疏缪甚矣。

抑又思之，欧洲诸国，其宪政多不行于藩属，本部之地，视中国大可一省，细者乃数府耳。日本三岛，亦不当四川一省也。以中国之地大人稠而选议员，五万而一，则当得八千人；就四万万人计之。十万而一，则当得四千人。议员猥积，则亦猱杂喧嚣甚矣。若以一千四百州县各选一

人，则是二十八万五千人而得其一也。议员之数，与民数相去，既甚阔疏，则必不足以知民隐。且得选既少，则被选者必在显贵仕宦之流，是无异一县有土客二令，而以其土著之令留之京师，此庸有异于专制者哉！自前观之，则于国之富强无益也；自后观之，则于民之利病无与也。徒令豪民得志，苞苴横流，朝有党援，吏依门户，士习嚣竞，民苦骚烦，是宁足以为知微审势者耶？若以日本立宪为有效者，彼其施行宪政之岁，与战胜中国之岁，相去财五稔耳；纵能收效，必不迅速至是。故知其民尚武，由封建之习惯使然，非宪政之倡导使然；其政有叙，由封建之习惯使然，非宪政之裁制使然。况自立宪以来，岁财二十，而议员贪叨，丑声外播，腐败已萌于内；徒以文明之号，泽其皮肤。从今以去，不五十年，必与西班牙辈同其堕落，此无待龟筮而知者。犬养毅不悟其非，又欲以是贻祸中国，斯犹竖阳献酒，盖适以毙之也；余闻跛者大隈重信将有西行，是二子者，所谓臭味相同，声气翕合，而中国浮竞之士依以为命者也。观政闻社大会破坏之状，与余所论列者，其亦可以自愧欤！

【说明】 本文原为《民报》第十七号"时评"（一九〇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收入《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题称《记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

按：一九〇六年九月一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清政府正式宣布"预备仿行立宪"。预备立宪的宣布，给国内外的立宪分子以莫大的幻想。一九〇七年二月十三日（光绪三十三

年农历元旦)，康有为将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准备回国从事政治活动。八月，梁启超、蒋智由等在东京筹组推动立宪的政闻社。十月十七日(九月十一日)，政闻社开成立会于东京，推举马良为总务员。本文即系论述当时开会情况的“时评”。此后，政闻社又刊行机关刊物《政论》，高唱立宪，抵制革命。章氏屡次撰文驳斥。如《驳神我宪政说》，即系针对马良的“就任演说”——《政党之必要及其责任》(载《政论》第三号，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日——一九〇八年四月十日出版)而予严词斥责的。可参见本卷《与马良书》、《驳神我宪政说》、《马良请速开国会》、《代议然否论》、《政闻社解散之实情》诸文。马良的“就任演说”，亦录附《驳神我宪政说》之后，幷供参考。

总同盟罢工论序

（一九〇七年）

《总同盟罢工论》，德意志人罗列著，日本幸德传次郎译为东文，沧州张继以汉语移书之，都凡四章。其冣略曰：烝民失职，惟货殖者并兼之咎，小小罢工，趋于增益僦钱，然货殖者亦交相什保，不足以挠其权，独有云合雾起，走集要害，既夺资财与共化居，且断邮传使不得通，虽有劲兵，自保不给，什伍散处，则号令不行，计一人乃足以当百，一国罢工，他国睢盱而起，亦无忧於外患。如是，则政府崩，豪民溃，阶级堕，资用散，生分均，而天下始玄同矣。

罗列生长西土，各于其党，故言不失方。今中国工商未兴，于此若不汲汲者。然自功利说行，人思立宪，摭《周官》、《管子》、素王眇论之说，以言保富，当代不行之典，于今无用之仪，腐臭千年，复洗涤而陈之。驵侩攘臂，讼言国政，齐民乃愈以失所，其患既蘖芽于兹矣。哲人又往往东走矿冶，阡陌之利，日被钞略，邦交之法，空言无施，政

府且为其胥附，民遂束手无柰之何。以意絜量，不过十年，中人以下，不入工场被棰楚，乃转徙为乞丐，而富者愈与皙人相结以陵同类，验之上海，其仪象可睹也。

夫审时势者，不苟偷一朝之中失，其计画当经久远。今罢市为内地所恒有，顾皆猥琐，不敢行于巨大市场，行之则受成长官大贾，堕其调中。若循同盟之则，姟兆一志，更相携将，一市之间，闭门七日，则馈饷役使皆不继。虽有利器，且縮不前。吾乃近据其所有者而均调之，楮柱皙人富民之道，独有是耳。若迟桡畏死，一刦一行，百金以下之民，必与牛驹同贱，以贫病箠挞死者，视以罢工横行死者，一岁之中，数常十倍，孰与铤而走险，姑忍数日之饥、一创之痛，以就大名，而有捊多益寡、称物平施之利，此则罗列所已言，亦张继移书之志也。章炳麟序。

【说明】《总同盟罢工论》，德人罗列著，张继译，一九〇七年出版，本文即该书序文，收入《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

复吴敬恒书

（一九〇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稚晖足下：吴朓、吴朏、吴敬恒，皆足下也。昨得手书，以《革命评论》所述足下与俞明震交涉事来相诘问。案仆入狱数日，足下来视，自述见俞明震屈膝请安及赐面事，又述俞明震语，谓："奉上官条教，来捕足下，但吾辈办事不可野蛮，有释足下意，愿足下善为谋。"时慰丹在傍，问曰："何以有我与章先生？"足下即面色青黄，嗫嚅不语，须臾引去。此非独仆与足下知之，同系者尚有□□□、□□□辈，可复问也。

仆出狱后，见□君□□，□□曰："前与俞明震赌骨牌为戏，微及'苏报案'事，明震亦于邑有自悔状。"仆是日亦往东京，不复多语。至最后足下献策事，则□□□言之，□□语不知得自传闻，抑亲闻诸俞明震者。但仆参以足下之屈膝请安，与闻慰丹语而面色青黄，及□□所谓明震自悔者，有以知□□之言实也。足下既作此鬼蜮事，自问素心，应亦惭惶无地，计穷词屈，乃复效讼棍行径，以为造

膝密谈，非人所晓，汹汹然驰书诘问。足下虽诘问，仆岂无以答足下哉？适扬之使愈彰明耳！是非曲直，公道在人，无则言无，有则言有。仆于康、梁诸立宪党，诋之未尝过甚。今于无政府党如足下者，摘发奸回，如彼其至。盖主义之是非，与心术之是非，二者不可同论。且以败群之羊，不可不摈，普天同志，犹未分明，故不得不明著表旗以示天下，岂以个人之私怨而诬足下哉！

呜呼！外作疏狂，内贪名势，始求权藉，终慕虚荣者，非足下乎？康长素得志时，足下在北洋，拜其门下而称弟子，三日自匿，及先生既败，退而噤口不言者，非足下之成事乎？为蔡钧所引渡，欲诈为自杀以就名，不投大壑而投阳沟，面目上露，犹欲以杀身成仁欺观听者，非足下之成事乎？从康长素讲变法不成，进而讲革命；从□□□讲革命不成，进而讲无政府。所向虽益高，而足下之精神点污，虽强水不可浣涤。仆谓足下当曳尾涂中，龟鳖同乐，而复窃据虚名，高言改革，惧丑声之外露，则作无赖口吻以自抵谰。引水自照，当亦知面目之可羞矣。

足下始学批尾家当，中则葆爱对策八面锋之伎两，最后效村学究，持至简且陋之教科书以自豪。今者行役欧洲，已五年矣。仆以为幡然如蜕，当有以愈于畴昔。及观足下所著，浮夸影响，不中事情，于中国今日社会情形，如隔十重云雾。有所记叙，则犹二簧之演历史也；有所褒贬，则犹儿童之说是非也。盖曩日之以《经世文编》、《校邠庐抗议》汲汲然求术于众者，今则变相如是。吾于是知纵横捭阖之徒，心气粗浮，大言无实，虽日日在欧洲，犹不

能得毫毛之益也。

足下恶言国粹者，利人之愚。利人之愚者，将以掩己之失。（如以讲国粹属张之洞，讲吏治属曾国藩，此纯是门外语。张之洞以前，达官之讲国粹者多矣，张之洞提倡国粹，亦非甚力；但今之大吏，半起白徒，故名独归于张之洞耳！曾国藩惟善行军，岂尝讲求吏治？稍远者何不举林则徐、陶澍？稍近者何不举阎敬铭、刚毅？而牵一绝不相干之曾国藩耶？此等议论，若稍知近事者观之，有覆酱瓿而已。幸而人皆蒙昧，得任足下恣意妄言。）私心暧昧，灼然可知，而复虚憍议人，不自知其庸妄，指孔、孟以解嘲，举奴隶以相劫，此足以吓素无学术、随逐波涛之子耳！

仆则素志已定，愿自署为守旧党、顽固党矣，岂新党骛名之士，腾其绝无根据之谤辞，遂足以相慑耶！

足下自慕虚荣，以为人亦慕之，曾不自量所处何地？康有为门下之小吏，盛宣怀校内之洋奴，不屑为者众矣，未知足下屑此否也？书此，敬问撰祉。章炳麟白。一月三十一日。

【说明】 此书原载《民报》第十九号（一九〇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并附吴敬恒原函，《太炎文录》未曾录入。

按：章氏所撰《邹容传》在《革命评论》发表后，吴敬恒对文中所述与俞明震交涉事，寄书狡辩，并刊于《新世纪》第二十八号（一九〇八年一月四日巴黎出版）。章氏阅之，严词批驳；此后续予诘斥，即鲁迅所称反对"献策"的斗争，参见本卷《再复吴敬恒书》。

附：吴敬恒与章炳麟书

枚叔先生执事：去年恒来巴黎，见君所作《慰丹传》，登诸第十号《革命评论》者，中间以恒旧名，叙述恒与俞君相晤事。满纸孔子若曰，孟子以为，作优孟之声口，文品如斯，恒乃大奇。恒与俞君相晤，恒亲告于君，君与恒现皆存世，非如慰丹之既没，岂当由君黑白者？当时方拟东归，欲当面就问，今因事滞留，东归无定，故先函问左右：如《慰丹传》所云，有所原本，请将出诸何人之口，入于君耳，明白见告。恒即向其人交涉。如为想当然语，亦请见复，说明为想当然，则思想自由，我辈所提倡，恒固不欲侵犯君之人权，恒即置之一笑。倘不能指出何人所口述，又不肯说明为想当然语，则将奴隶可贵之笔墨，报复私人之恩怨，想高明如君，必不屑也。敬候惠复。附颂撰祺。寓址别陈。八年一月一日吴敬恒谨白。

无政府主义序

（一九〇八年一月）

张继译《无政府主义》一卷，本意大利人马剌跌士达著，其挥斥垢氛，解散维絷，悲愍众生之念，亦以勤矣。至于自明指要，或有执著，旧邦学说，多未脱离。夫能平齐人之好恶，知一身之备物，刀割香涂，爱憎不起，黄尘火齐，等无差别者，斯天下之至高也。其次莫如恬憺寡营，屏人独处，持芧栗为谷食，围木皮作袴襦，大乐不至，劳苦亦绝，愈于交相倚持、待群为活者远矣。何者？人之形躯，不异鸟兽，而好尚所至，是有两端。州居萃处，人之情也；及其独居深念，中有秘藏，肺府周亲，憎若虫蚋，此亦根性然也。故有乐群就众，亦有介特寡交，人心不同，虑如面类。若其离群孑居，言有秩序，尚不可得，况得言无秩序？一求屯聚，即不得无友纪条贯，鳃鳃然惧人之多言，急以自白，盖犹震于物论者也。庄生有言：鱼之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吾生有涯，以随知之无涯，殆已。昔人悲夸父之逐日，近贤悼奔马之追杖，此则营求眇欲，

自苦之根；麇集为生，伐性之斧。故知福为美疢，群惟聚痡，计文野者，是华士见，不如归大朴也；求幸福者，是天宫见，不如言苟全也。凡求幸福，无不得苦。今日阶级未平，苦者自苦，乐者自乐，诚不相谋。若阶级既平以后，当一人兼之矣。欲乘汽船，必先凿煤，乘轮之乐，不偿开坑之苦也。欲孳稼穑，耕以机器，开坑之苦，更甚于力农矣。若使苦乐异人，其不均何异于今日耶？然则小艇可乘，何必轮舰，躬耕足食，安取引机，但损欲速务多之念，福亦犹人，必不因之致苦也。此则今日所有文明，尚当有裁损者，何得复求增进？至于文明野蛮之分，本是俗论，无足顾虑[1]。徒以心如委辔，竞进猥多，持世之言，必以百姓千名为准。然则山林独善，不能制群体之曼延，榰巢见并，松栎为摧，以众暴寡，又可睹矣。若能循齐物之眇义，任夔蚿之各适，一人百族，势不相侵，井上食李之夫，犬儒裸形之学，旷绝人间，老死自得，无宜强相陵逼，引入区中，庶几吹万不同，使其自已，斯盖马氏所未逮欤[2]？然其批捣政家，钼犁驵侩，振泰风以播尘壒，鼓雷霆以破积坚，堕高堙卑，邱夷渊实，荡覆满盈之器，大庇无告之民，岂弟首涂，必自兹始。虽有大智，孰能异其说耶？谅知大戟芫花，是时为帝者也。丁未十二月，章炳麟序。

【说明】 本文原载《民报》第二十号（一九〇八年四月二十五日），收入《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

---

(1) 此段脚注，《文录》删去。

(2) 《文录》作"斯犹马氏所未逮乎？"

与马良书

（一九〇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相伯先生左右：居贤善俗，神道化民者，是先生之志也，嵬琐干禄，固不屑为。比闻梁启超、蒋智由辈将以立宪涛张天下，戴先生为祭酒，舍天爵而植朋党，先生不其然。立宪党人，志不过升斗，藉成名以取宠，此婴儿子之所周知。然其说率以民权为埻，故有所谂于先生。代议政体，非能伸民权，而适堙郁之。盖政府与齐民，财有二阶级耳。横置议士于其间，即分为三，政府固多一牵掣者[1]，齐民亦多一抑制者。欧、美、日本行之，民愈困穷，未见其为元元福也。是在中国，则势尤异于东西。

一曰去封建久近之比例。代议者，封建之变形耳。君主立宪，其趣尤近。上必有贵族院，下必审谛户口土田钱币之数，至孅至悉，非承封建末流弗能。欧洲诸国，宪政初萌芽，去封建直三四百岁，日本且不逮一世。封建之政，遇民如束湿薪，渐及专制，地主犹横，于是更立宪政，

1) 《文录》作“政府诚多一牵掣者”。

民固安其故也。中国混一既二千稔，秩级已弛，人人等夷，名曰专制，其实放任也。故西方有明哲者，率以中国人民为最自由，无故建置议士，使废官豪民梗塞其间，以相陵轹，斯乃挫抑民权，非伸之也。

二曰面积大小之比例。欧洲诸国，大者不当中国四省，最小乃二三府。其生又不繁，选举议士，率五六万人而一，日本亦十万人而一耳，然被选者犹多豪贵。若计中国四百兆人，县选其一，得一千四百人，犹三十万分之一也[1]。数愈阔疏，则被选者必在故官大驵。不然，则非民所周知与属耳目者，宁有毫厘与选之望？故官素贪污，驵侩又惟锥刀之竞，直道而选，犹不能得佳者，况其出于关节。日本议士三百余员，苞苴流溢，比闾可螯，率为政府爪牙以侵黎庶。中国士大夫，饰身寡过，又不日本若，以是代议，民其得有幸乎？

循是二例，以中国行立宪代议之政，其蠹民尤剧于专制。今之专制，直刑罚不中为害，他犹少病，立宪代议，将一切使民沦于幽谷。夫贼民者非专官吏，乡士秀髦，权力绝尤，则害于民滋甚。乃者诸妄豪强，把持公事，政府固甚疾之，虽齐民亦欲倳刃其腹焉。州县下车，能搏击巨室土豪者，井里编氓，皆鼓噪而称民父。豪强之妨民如是，幸其在野，法尚得施。今超而为议士，为虎著冠，其妨民不愈况耶？且宪政既成，则政党因缘而起，新学浮华之士，又往往参错其间。今之新党，其猥鄙盖甚于旧党矣。榜署既章，惟封殖党援是急，民之利病，固委置之，贿赂公

(1) 《文录》作“犹二十九万分之一也”。

行，为枭为貙，将什佰于官吏。昔明世东林、复社，名为以道德相扶持，及其左右朝政，则自植渠帅以为首辅，延缘昏椓，交通宫禁，苟可以利吾党者，惟力是视，此先生所察知也。近世新党，佞谀突梯，又愈在东林、复社下，阮之犹惧不尽，况坿益之。人亦有言，芳兰荛蔚，臧不同瓯，先生游衍昊天，躬行文莫，哀民德之昌披，以身作则，教之善道可也，焉用与宵人奔走，以自尘点。有皇上帝，爱民甚矣，岂其使新党豪民肆于人上。书不能尽意，唯财省览。章炳麟白。

【说明】 此书原载《民报》第十九号（一九〇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收入《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

与刘揆一书

（一九〇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林生足下：客有得湖南书者，道湘潭王翁①为湖南宪政支部会长，或言杨度归从臾王翁，王翁弗应，说各异状。仆以王翁平生行迹参校，疑后说为近情。然执前言者，皆云万万如实。意者宪政诸子，建王翁为表旗，因以矜耀，不吝余名，以复露诸夸者。八十老翁，名实偕至，亢而有悔，自堕前功，斯亦可悼惜者也。

立宪者，岂足以张国威、舒民气。突厥、波斯，建置议院，无救于衰微。纵得一二成效，编户齐民，愈益失其职姓。贾竖日贵，其势乃陵轹王侯，欧洲成验，赫然葪明，直以旧贯固然，不可拨除，中国为此，徒丧其清明宁谧之俗而已矣。夸者求仕宦不获，持此上遂，幸得假手，车坚马驵，被貂裘、著织成鞾、以游王侯长者，其腹肠至猥鄙。王翁曩岁，尝在肃顺、曾国藩间，去而勿有，与屠沽养卒处，天下高之。今直为夸者树其私门，藉勿从事，徒以誉望卵

① 按：指王闿运。

翼鄙夫，令得自肆，已自丧矣。

顷岁有丹徒马良者，则天主教之父师耳，明法兰西哲学，亦窥汉土名家故训之术，旁晓因明，行年七十，而束修自好，行不逾检，横为夸者所引，令充渠率，知其足惜，亦因驰书讽之。王翁学术，非直马良也[1]，行谊又大似狂狷。大耋之年，鼓缶自乐，方外圣人，庶将比肩原壤，一遭点污，向之令名，便当堕地，令海内议者，云不受进士而规元老议长，其让爵为欺突世人。王翁虽辩智绝人，何以应此？足下处王翁门下数岁，师弟子相风切，不为畔喭，宜为先生惜也。若乃戎狄豺狼，诸夏亲昵，义已众著，即不繁碎陈数。如仆所闻，"公羊春秋"之学，近世甄明之者自刘逢禄。逢禄祖纶，仕满洲为执政，家世受豢，忘其宗国，横取《公羊》言进吴楚者，以傅会引弓之帝。魏源、龚自珍继之，皆好功名、求仕进，学本粗犷，尤憙附丽，诸所陈述，佞谀万端，晚不得据要路，复以微文姗谤。戴子高与王翁乃异数子。夫处阴极玄黄之世，材者宜发愤自厉，复我邦族。然人情性异效，姿能殊状，作止语默，非一端而已。故夫织履饮瓢，槁项不闻国政，慎守经术，及以九流，处则自理，动以化人，令国家虽泯没，而臭味无改于千载。子孙黎民，得因以兴起者，视彼义夫，亦足以作对也。王翁守此既四十年，信誓旦旦，晚而自渝，仆固意其不然。盖竞名嗜进[2]、自相题榜、以求显贵者，非直廉节士所不为，乃亦自违其学。在中国则废九世复仇之义，于清室则蹈

(1) 《文录》作"非独马良也"。

(2) 《文录》作"竞进嗜利"。

人臣自将之诛，一前一卻，悉败绩失据。殺使言者非妄，明明王翁，如珽如琮，谓戴子高何？谓胡母生、董君何？足下不以此匡谏，值百年之大齐，遭神龟之尽期，世有明达，生刍一束，终已不来王翁之殡宫矣。心所谓危，亦以告也。章炳麟白。

【说明】 此书原载《民报》第十九号（一九〇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收入《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

与孙仲容书

（一九〇八年六月一日）

仲容先生左右：得书并《周礼正义》一帙，谨振董再拜以受。发书在去岁八月，至五月朏始达。自昔未侍先生杖履，既遭党锢，修谒无缘，并赐书亦濡滞半岁，喜益悲矣。承以古文三条见示，精凿傀琦，足补汉师之阙，皋本作虢，二千年未睹本字，欻自先生发之，麟始知《说文》臭字训大白泽，非浅人妄改，乃古文借臭为虢，叔重误仞臭为本字耳。《白泽图》已著录于《隋·经籍志》，明其自古相传，有此异兽。皋、泽二字，古多掍淆，《说文》言臭，古文以为泽字，《本草》、《广雅》泽兰兼得虎兰之名，疑本亦作皋，借皋为虢也。旧学放失，怪说昌披，近有欲以万国新语改汉土文字者，麟方作《驳议》[1]一篇，以世人多谓汉字难知，故复新定纽文韵文，令蒙学略知反语，已属虞君转呈，其

(1) 按：指《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一文，曾载《民报》第二十一号，又载《国粹学报》第四十一——四十二号，收入《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本卷未曾选录。

有燁謬，先生幸是正之。《新方言》印行后，近复附以新知，隐栝就墨，为《释词》、《释言》、《释亲属》、《释形体》、《释宫室》、《释器》、《释天》、《释地》、《释植物》、《释动物》十篇，俟再印行，便当就正。前书阙失尚多，先生有所诲正，幸即见示。《名原》七篇，何时出版？渴望赐阅，若昏夜之待明星。海内耆硕，自德清、定海二师[1]下世，灵光岿然，独有先生。虽年逾中身，未为大耋，浙人所仰望者，亦无第二人。愿存精神、加餐食，长为乡土表仪，幸甚幸甚！麟以寡昧款启之身，荐更忧患，学殖荒芜，无可自憙，内省素心，惟能坚守旧文，不惑时论，期以故训声均，拥护民德，远不负德清师，近不负先生，虽并世目为顽固，所不辞矣！

仪征刘生，旧名师培，新名光汉，字申叔，即恭甫先生从子。江淮之令，素治古文《春秋》[2]，与麟同术，情好无间，独苦年少气盛，憙受浸润之谮。自今岁三月后，谗人交构，莫能自主，时吐谣诼，弃好崇仇，一二交游，为之讲解，终勿能济。以学术素不逮刘生故。先生于彼，则父执也。幸被一函，劝其弗争意气，勉治经术，以启后生，与麟戮力支持残局，度刘生必能如命。倭倭陈述，非为一身毁誉之故。独念先汉故言，不绝如线，非有同好，谁与共济？故敢尽其鄙陋，以浼先生，惟先生少留意焉[3]。

《正义》当以一二月功得卒读之，后有疑滞，复当以书

---

(1) 按：德清，指俞樾；定海，指黄以周。

(2) 按：指刘师培世传《春秋左传》之学。

(3) 本段据《制言》影印原函补入。

请益也[1]。书此，敬问起居万福。后学章炳麟顿首上。五月初三日[2]。

【说明】 此书撰于一九〇八年六月一日（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初三日），曾于《国粹学报》刊布，《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也予录入。以后《制言》第三十期复将原函影印。其中浼请孙诒让（仲容）“劝说”刘师培一段，《国粹学报》和《文录》均予删节，今据原函勘补。

刘师培，字申叔，江苏仪徵人，世传《春秋左传》之学，一九〇三年赴沪，与章相识。次年，任《警钟日报》撰述。一九〇六年，中国同盟会派高旭为江苏分会会长，在沪组会讨论时，刘亦参加。旋又赴日参加同盟会，并在《民报》撰文。后来刘因“与会中办事争权，大恨党人”（陶成章：《浙案纪略》上卷“纪事本末”第四章，第三节）。一九〇八年刘由日返国，妻何震为端方秘密侦探；不久，刘本人亦成为端方之侦探。此书系章氏耻其行而“深爱其学”，故仍“移书劝其归隐”（钱玄同语）。

(1) 以下据《制言》影印原函补入。

(2) 《制言》影印原函，下附刘师培通讯处，兹从略。

答 梦 庵

（一九〇八年六月十日）

震旦去封建时代已远，故不事王侯者，世以为重，而奔走竞进之士，受其恶名。老、庄已兴于战国，及魏、晋而有玄言。渡江以后，释教盛行，至唐世遂极盛，其间隐沦遁世之材，亦与佛、老相左右，所以遏贪冒之风、厉浮夸之俗者，共在斯人。然则三纲六纪，无益于民德秋毫，使震旦齐民之道德不亡，人格尙在，不在老、庄则在释氏，其为益至閎远矣。自宋世昌言理学，君臣之义日重，虽古之沮、溺、荷篠，亦贬斥以为不仕无义，世载其风，逸民日乏。近世又益昌言功利，而热中利禄者，以宪政为干进之阶，虽此革命党中，能岩岩如泰山者几何？乘坚车、策肥马，衣服惟恐不丽都，发鬘惟恐不膏泽，去朴质之风，而近浮华之习，革命者将安赖此？欲与为枯槁之逸民既不可得，亦不足以应急务。如彼西方景教，亦几可斲雕为朴矣。然义趣单纯，好思想者多不乐此，又与老、庄旧说，过相违戾，欲兴民德，舍佛法其谁归？仆往者铸镕经论，断之鄙

心，时有微言，多登《民报》，诚藉是为导引之资也。《大乘缘起说》者[1]，无过考证之文，不关宏旨。是时方讨论震旦方言，不皇辍业，仓猝应乏，遂以是篇入录。

今见《东亚月报》，载梦庵说曰："此《缘起说》，足以济度恶劣政府乎？足以建设共和乎？佛教之平和思想，死于千载之上，曷得抱亡骸为维持新世界新真正之平和之具[2]？况土地国有，与乞食之士谋之乎？以之求日、华之连合，以之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皆远之远矣。无一于此，而《民报》之作此佛报者，抑出于何意乎？《民报》宜作民声，不宜作佛声也。夫使几亿民众咸作佛声者，非印度乎？几万万人皆法师，则谁作食？谁执兵御敌？故印度以之终亡，支那亦病乎有一颜回守其陋巷，使支那至今日之境者，颜回之徒也。安分知足，明哲保身，如此而已矣。鸿儒尚病或无用，况颜回尚怀文殊臭骸，以横新民众之上乎？"

今问梦庵，《民报》所谓六条主义者，能使其主义自行耶？抑待人而行之耶？待人而行，则怯懦者不足践此主义，浮华者不足践此主义，猥贱者不足践此主义，诈伪者不足践此主义。以勇猛无畏治怯懦心，以头陀净行治浮华心，以惟我独尊治猥贱心，以力戒诳语治诈伪心。此数者，其他宗教伦理之言，亦能得其一二，而与震旦习俗相

---

(1) 按：章氏所撰《大乘佛教缘起说》一文，载《民报》第十九号（一九〇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并附录《辩大乘起信论之真伪》、《龙树菩萨生灭年月考》二文。除《龙树菩萨生灭年月考》未收入《太炎文录》外，前二文均载《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三。

(2) 原文如此，疑刊印有误。

宜者，厥惟佛教。是固非言语文字所能成就，然方便接引，非文辞不为功。以是相导，令学者趣入法门以自磨厉，庶儿民德可兴，而六条主义，得人而弘其道，谁谓改《民报》作佛声者？此《缘起说》，亦诚不离名相，有同史考，所谓提要钩玄而已。其他微旨，散在《民报》诸篇。梦庵以为佛教亡骸，不足为维持新世界平和之具，吾岂谓四分十诵，可直接用为国际法者？惟是居贤善俗，非斯不足以救浇漓，民德既衰，纵求世界平和，岂有近效？庄周有言，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则所用之异也。必如梦庵说者，《东亚月报》首登孔子、阳明诸像，能救东亚之衰微耶？孔子殁已二千岁，其遗说亦与佛书同往，于此新世界者，形势礼俗，岂有相关？彼阳明者，君不乡道，而求为之强战，则古人所谓辅桀者，佛教视之，亦罗刹药叉而已。然其学说，往往剽窃象山、慈湖，象山、慈湖又剽窃佛家之说，藉禅宗以谈儒术，始终不出寿涯所说改头换面之一涂，是正堪为佛教作仆耳。日本资阳明之学以兴，馨香顶礼，有若圣神，而复诋佛教为无用，何其昧所从来哉？

佛教者，朽骸也，不足为新世界用，而国家立学，亦有哲学一科。哲学科中，亦有琐格拉底、柏拉图辈学说，此非千载上之朽骸耶？与现世之国家何与也？凡诸宗教，过弛则风节衰，过张则职业废，吾所为主张佛教者，特欲发扬芳烈，使好之者轻去就而齐死生，非欲人人皆归兰若。在昔阳明辈之支流，亦多栖心禅寂。明季之士，所以蹈死如饴者，幸有禅观摄持其意。而急功近利，不避声

色，则阳明学为之厉阶。顾宁人欲以礼教改易天下，势有不能。夫礼教不如戒律之安隐，王学不如大乘之精严，固可知矣。人果学佛，蹈汤赴火，必有王学之长，而放诞诪张之病，庶其获免。作民德者，舍此无他术也。

震旦民俗，本异梵方，岂有人人尽作法师之事。夫隋、唐二代，隆法之至也，国力盛强，乃远在宋、明以上，岂有绍隆佛法，遂令人不知兵者。外观西方基督教僧，亦不肯执兵应敌，未闻欧洲诸国以此灭亡，而强引印度以相比校，斯不察社会情形之甚矣。且印度亦暂亡耳。今者国民自觉，光复独立之声，宣扬八表，安见孔雀、笈多，不复睹于今日？梦庵目睹印度之亡，而归咎于佛教，使在希腊未兴之世，将谓七贤出世为希腊之祸胎耶？诋佛不已，复谓颜回陋巷为亡中国之阶。呜呼！封建遗民，情存势利，于是大可见矣。不愧其不自撙节，而愧其终于贱贫；不忧其不自束身，而忧其不交显贵。抵掌游说，相习成风，内行点污，乃以进取之民自盖。古之言进取者，进取学术志行也；今之言进取者，进取权势利禄也。盖封建末流，务在尊崇贵族，以仕宦为光宠，以卑谄为效忠，举世聋盲，顽不知耻。今者政体虽革，习俗未移，即观《东亚月报》序文，一则淫昏之伊藤博文，一则狐媚之宋秉畯耳。以伊藤博文、宋秉畯为斗极，则鄙夷陋巷也亦宜。汉土自嬴政以来，藩侯绝迹，阶级既平，民俗亦因之大异，所以为国民作潜势力者，不在朝市，不在庠序，而在蓬艾之间，故陋巷亡而王迹息。自宋以来，隐士之凋微甚，国势之陵夷亦甚，其效至可睹矣。夫陈仲、管宁必不生于封建变形之国，

彼所以为国者，乃在服从教令，竞志功名，而隐沦故非所贵。民之秉彝，亦无他好，曰“长兄为二千石，仲兄被貂裘，小弟虽无官爵，往来王侯长者游”，以是为荣名耳。震旦则不然，朝市者争利之区，庠序者哗时之府，地皆污垢，而为一国之杪端，方之于人，其位正当玄牝，然积精自刚，本原不在是矣。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是震旦所以为国也。仆尝旷观前史，而得震旦废兴之的，此本非与公等道者。

梦庵又曰："康熙帝虑学者多不服己，遂设计集天下之学者，从著作之业，使目不皇数糟粕，手不皇拾死字，虽洵美不可实用。遗俗流风之入人深，虽四百年鸿儒不世出，研钻竺坟，犹考证六经，其所发明，不以义为先，以文迹为先。"呜呼！安得此宏侈不经语耶？满洲康熙帝未兴以前，汉士固先有实事求是之学矣。康熙、雍正、乾隆所集者，词章之部，类书之林，务博而不衷于是。吾党所务则异是：求其精，不取其博也；求其真，不取其美也。虽一字之文，而考证或逾千字，要以内慊吾心，外合对境。在康熙朝宏词诸子视之，只以为破碎耳。原此考证六经之学，始自明末儒先，深隐蒿莱，不求闻达，其所治乃与康熙诸臣绝异。若顾宁人者，甄明音韵，纤悉寻求，而金石遗文，帝王陵寝，亦靡不殚精考索，惟惧不究，其用在兴起幽情，感怀前德，吾辈言民族主义者犹食其赐。且持论多求根据，不欲空言义理以诬后人，斯乃所谓存诚之学。日本诸子治汉学者，惟务其义，不务其文，训故未通，而以微言相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故茂卿、息轩诸公老死而无

所得。汉土有西河，日本有茂卿、息轩诸子，名为反对宋儒，其所得实与宋儒无异。读书不求甚解，斯语之误人亦甚哉！若夫梵方，经论本有言语道断之义，然解者亦不得不先求文字，所谓随顺者也。是故索诃世界求佛法者，以耳根圆通为主。今梦庵则曰："佛教者，一佛教也，未闻释迦有二舌也。马鸣所说，或说为有，或说为无，二皆邪妄，非其正理，马鸣一口传通佛语如此。请试思之，二者邪妄，则一且不立，佛法元来无高低远近深浅之际，大乘小乘之说，皆圆颅辈舌斗之戏论，故二皆邪妄也。况先生曰：无我本小乘旧说。又曰：纯言无我者，马鸣亦未尝以之为是。先生之见，何如此漏逗乎？既是无我，决无纯杂也；既是无我，决不容新旧也。故大乘百法明门论之改革七十五法，冒头先云：如世尊言，一切法无我，而后分析心法，剔出阿赖耶末那二识，亦唯细说一心法而已。故曰：恶彼佞者，虽宇宙破坏，一切法无我，虽忽生山河大地，一切法无我。希腊哲人彼得古剌士有言曰：宇宙者流矣。夫唯无我，故与宇宙流也。此言得无常意，无常无我者，宇宙混战之形状也。悲观者，退化之声闻缘觉是也；乐观者，进化之大乘菩萨是也。故无我之活动，与宇宙神矣。民声亦不可不与宇宙新之神之。"夫佛教本与神教有殊，非专以一种悉檀强人信仰，是故四十九年随机说法，佛惟一舌，而权实大小诸教，因所对者而分。今云本无浅深大小，此法华三乘皆归一乘之义，后贤亦以为权说矣。况异部宗轮，分为二十，纵佛法无新旧纯杂，末师之论，安得无新旧纯杂也。梦庵既以声闻缘觉与大乘菩萨有悲观乐观之分，而

复言佛法无二，何自相牴牾至此！岂声闻缘觉者，是外道非佛法耶？马鸣立如来藏，与般若有遮无表者殊，其言有我无我二皆邪妄者，执著有我，则同数论之偏，执著无我，亦涉顺世之妄。是故二者双非，非其绝无所立，所立云何？即如来藏。岂徒以含胡不了之词，使人无所问径。梦庵引彼得古剌士说，以证诸法流转，即为无我，其言则谛实矣。而此流转者谁，则不得不归之识；既有识矣，是非绝无所立也。百法言一切法无我，而法相诸论，皆以阿赖耶识为宗。当其杂染，以阿赖耶识为名；原其清净，以庵摩罗识为名，乃即马鸣所谓如来藏矣。今徒执无我之文，而谓马鸣所言，一且不立，是梦庵则为随文不随义者。而又以未读佛心、有碍根本相诮，此则汗漫之言，非仆所敢知也。吾观日本人说佛教者，或以马鸣哲学，比之海格尔说，徒以形式相同，强为比傅，其义绝远，斯正随文之过耳。梦庵谓大乘菩萨惟是乐观，不悟五地以前，犹欣涅槃而厌生死，世固无以毛道凡夫超入五地者，则大乘发心之始，犹是悲观。若无悲观者，众生本乐，何苦度入涅槃？彼自无疮而妄施以针艾，安所用之？无我者与宇宙相流转，流转既息，则为常乐我净。今梦庵欲任其流转，与宇宙神而化之，此则路迦耶师之说，与佛教若冰炭之不相容矣。

【说明】 此书原载《民报》第二十一号（一九〇八年六月十日），《太炎文录》未曾收录。

驳神我宪政说

（一九〇八年六月十日）

罗马教高僧马良自吴淞抵日本，说宪政事，以神我为国家根本，视阘茸者稍愈。马氏治法兰西哲学，初祖笛伽尔，言"思在即我在"，与数论所云"我是思"者相类。故马氏亦傅会数论神我之说以为本氐。详其所论"求神我之愉快"者，愉快不与神我相应，其在佛乘，则为"受阴"；其在数论，则为"萨埵喜德"，求愉快亦不与神我相应。自性三德，生我慢谛，此乃所谓求愉快者。神我不当为境界缠缚，一求愉快，即絷维于境界之中，乃自负其神我矣。名实相反，而皮傅以为言，是则眩惑后生之论也。复以神我形我相对为名，我但一耳，宁有形神之别？形我者，即数论所谓"五知根"、"五作根"，不容与神我对立，则知马氏所谓神我，即罗马教所谓灵魂。名之不可相假，盖稍治学术者所能知。儒者言神气，非罗马教所谓灵魂；罗马教言灵魂，非数论所谓神我；数论言神我，非佛家所谓"中阴"、"五阴"。界说各殊，不容相贸。今以灵魂

而假神我之名，斯不察其同异矣。至引《孟子》少乐众乐之文，以为国家成立在是，则一切博饮淫佚者，悉可借孟说为表旗。以国家言，则兼并者亦可以是文饰，背人道而为残贼，乃以神我涂附其肤，黄发雨际诸公，当不食其余矣。余因举马氏所说，分条驳难，著于篇。

马氏之言曰："国家之起原，果何自昉乎？凡有血气者，莫不自爱我。然所谓我者，有形我焉，有神我焉。禽兽知有形我而不知有神我，故永世不能以为群。人类者，非徒以形我之安佚而自满也，必更求神我之愉快。苟孑然孤立而无偶，则虽极耳目口腹之欲，而非人情之所愉乐，于是乎家族不得不兴。普通之人，其爱其家族也，殆与爱己身无所择，盖神我之作用然也。然神我之愉快，又非徒恃家族而能满足也。善夫孟子之言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盖人类之恶独而乐群，全由其天性然，于是乎由家族进而为部落，由部落进而为国家。禽兽不能为家族部落，而人能为之，曰惟知有神我故；野蛮人不能为国家，而文明人能为之，曰惟能扩充其神我故。"今案神我之名，自数论始。据自在黑金七十论：离身别自有我，我非作者，名为见者，与自性三德合，如烧器与火相应。是三德者，何等为相？一萨埵，喜为体，能作光照；二罗闍，忧为体，能作生起；三多磨，暗为体，能作系缚。三德互违，得共一事，如油炷火，三合为灯，是为作者，非为见者。故我与自性合，如生盲人负生跛人，是和合者，能生世间。自性先生大，大者，或名觉，或名为想，或名遍满，或名为智，或名为慧，大次生我慢。

我慢者，或名五大初，或名转异，或名焰炽。慢次生十六，十六者，一五唯，五唯者：一声、二触、三色、四味、五香。次五知根，五知根者：一耳、二皮、三眼、四舌、五鼻。次五作根，五作根者：一舌[①]、二手、三足、四男女、五大遗。次心根。是十六从我慢生，从五唯生五大，声唯生空大，触唯生风大，色唯生火大，味唯生水大，香唯生地大，是名二十三谛。此二十三，皆有三德，譬如黑衣从黑缕出，末与本相似故。自性三德作我，事已则得分离，如世间中无知水草，牛所啖食，应养犊子，于一年内，能转为乳，犊子既长，牛复食水草，则不变为乳。若如其说，三德为我作用，则我在缠缚之中矣；三德与我脱离，而我入涅槃之境矣。今马氏所谓愉快者，即由喜德转为我慢，与心相应，乃适为缨茀神我之网罟，于神我何所利焉？若家族者，若部落者，若国家者，虽事有巨细，对境不过五大五唯，士用不过五知五作，特以此二十事展转交叉，递相蕃变。即实而言，家族作用，特男女根之“戏”尔；部落作用，特手根之“执”、足根之“步”尔；国家作用，并此三者，益以舌根之“言”尔。所对外境，于无机物，不出地水火风四者；于有机物，骨肉筋毛，悉归之地，精血涕泪，悉归之水，暖气蒸动，悉归之火，呼吸出入，悉归之风。除此四者，何处得有人类？人群相与，舍此无他事矣。特以从此则乐，违此则忧，皆由我慢执持，不得自遂。使神我而见自性，于此方遁逃不暇，复何愉快之有？非特家族、部落、国家则然，即彼爱我心者，亦由我慢煎迫使然，于神我适为桎梏，斯正可谓形

① 原刊如此。

我耳。是故马氏欲以家族、部落、国家供养神我，神我所不受也。其言扩充神我，尤不可通。神我本自不增不减，无微尘数量，神我不为之损；有恒沙数量，神我不为之增。如鹅羽衣不受水染，如金刚石不作浮沤，纵欲扩充，亦无扩充之处，是诸论议，可谓伧陋不学者矣。若以佛法相稽，惟许有阿赖耶识，并不许有神我。所以者何？若我有自性者，不应生灭相寻；若我无自性者，不应执著难舍。是故立阿赖耶识为根，以末那之执著者，谓之我见，谓之根本无明。而此阿赖耶识，唯与舍受相应，不与苦乐忧喜四受相应，乐且无存，皇论外界之多少乎？又云：禽兽知有形我，不知有神我。若以神我为寂灭者，人类不知，亦几十得八九；若以神我为求愉快者，虽高之至于建设国家，亦只形我之事。禽兽与人，知识明暗虽相远，其有我慢与五知五作一也。且蜂蚁有君臣，猿猱有渠帅，谁谓禽兽无部落、国家者。禽兽虽有部落、国家，人视之则不以齿数，此由形有巨细，事有幽明，故二者不能以相拟。令有修人，无路建立国家，视吾侪所谓国家、部落者，亦若蜂蚁猿猱之聚矣。马氏所执，亦谓禽兽无灵魂，人有灵魂耳。灵魂之说，义固芒昧，形骸既殁，理不独存。若就生存为说，灵魂者，即与知识无异。人与禽兽，知识虑有短长。至谓禽兽有现量而无比量，则亦夸诬之论。马行道上，见有人偃卧其前，则却行勿进，以前比量，知蹴则伤故。貍闻鼠声，必审听其方位，从其方位而捕噉之，以余比量，知鸣处即鼠所在故。鹿于石上砺角，必就池沼自镜，观其形态妩媚与否，以平等比量，知水中像即己形故。若徒知有

现量者，必不审虑如此。且心所有五遍行境，人与禽兽所同也。作意触受，无过动向感觉之伦，乃至想以取境分齐，思以构造善恶，禽兽虽愚，于此岂异于人耶？特其别境五事，则不必尽与人同。要所缺者，惟定慧胜解耳。未来之欲，过去之念，此亦非有异人也。以此鄙夷禽兽，既非其实，以寻常知识之本体而被以神我之名，其名实亦不相应矣。卒之禽兽之所以劣于人类者，在其少自觉心，不在其不知神我，家族、部落、国家之所以建造，亦不系神我观念之有无。有知神我者，有进而知无我者，则独往之念必盛，而合群之力必衰。世俗所谓文明野蛮者，又非吊当之论也。

昔德人尼采有言曰：路德所以能改教者，非由其才调志行度越常人，亦非由北欧君主同心与法皇相抗，又非由罗马旧教内容腐败，可炊而僵；实以北欧文明过浅，人人有平均之信仰，故从之如风靡耳。南欧文明已进，故与路德相和者少，上观希腊盛时，毕他科罗斯、柏拉图、因柏图克黎斯诸圣哲，人人有建立宗教之资，然而独倡寡和者，由希腊文明最进，个人之发达有余，则思想不容一致。以此反观，改革宗教之所以成，正由北欧之文明缺乏耳。是岂特宗教然，虽于国家亦然。凡能成国家者，必其人民于国家有平均之信仰也。假令人民参半皆知神我，团体解散，直反掌之事而已。今信仰国家者，以信仰宗教为非文明，惟信仰国家为文明；信仰无政府者，以信仰国家、信仰宗教为非文明，惟信仰无政府为文明。三者虽殊，其当合群一也。若信仰神我者，则不容有团体。纵如雨际诸师，

亦成宗教，率皆屏营独处，僻在深山，与上说下教者有异。故神我之说成而团体从之熔释。然世固有以止观禅定为见危授命之资者，此但旷览死生，能轻躯命，故其成效有然。所谓尘垢秕康，陶铸尧、舜，非直接于清净法流也。且审于自知有我者，亦审于知他人之有我，互相题品，则方人自此始。然知人愈明，其团体亦愈难巩固。今以中国民情论之，他无所长，独知人为长耳。有雄略之士出，宅塞北与蒙古处，宅南海与侨人处，其人知识浅短，不知交际蕃变之情，则易于结合也。黄河以北，抵长城而止，五岭以南，抵崖山而止，稍难于凝集矣。大江左右，其人机智相猜，互见肝肺，纵欧洲诸豪骏生在区中，亦无以使人翕合，一相诊察而崩离立见矣。惟庸德庸行，有时足以臧人，愈雄略则愈见其拙，是即尼采所论南欧、北欧之例，非审于知我之效耶？今以知有神我为国家之起原，抑何其纱戾也？由家族而部落，由部落而国家，特彀张使大耳。若以但有家族为野蛮，既有国家为文明者，今应问彼，文明野蛮，为反对耶？为部类耶？若云是反对者，家族、部落、国家，巨细有异，其为人群相处则同，反对之性安在？若云是部类者，文明野蛮，即不应分别高下。家族者，野蛮人所能为，增进其野蛮之量，则为部落；又增进其野蛮之量，则为国家。是则文明者，即斥大野蛮而成，愈文明者即愈野蛮，亦犹伏卵为鸡，至三尺之鶤而止，鸡为极成之卵，文明为极成之野蛮，形式有殊，而性情无异，安用徒张虚号矣。今以文明野蛮为国家有无之准，又何其紾戾也。

马氏之言曰："洵如孟子少乐不如众乐之言，则神我之最宜感愉快者，莫吾中国人若也。盖个人之乐，不如家族之乐；家族之乐，不如部聚之乐；部聚之乐，不如国家之乐；小国寡民之乐，不如大国众民之乐。"比例则然也，而我中国今日之人，乃适得其反。今案人之情性，好群好独，固有两端。好群者虽多数，如婴儿多嗜甘也，稍长则或嗜姜蓼诸辛，有睹饴蜜而作吐者矣。研精冥想之士，多好闲居，乐群者惟恒民为尔。不然，则死权殉利、奔走衣食者也。就云众乐为本性者，喑醷之物，强阳之气则然。非对于神我必应如是。伉俪相处，不如陈列嫔嫱；父子更佣，不如传呼仆役。骄奢淫纵，皆自众乐[1]之念生，马氏亦与之耶？若云小国寡民不如大国众民之乐，自非侵略他人，其乐何由而遂？夫事有同名而指趣绝相违戾者。博爱并容，墨子之所谓兼士也；侵牟蚕食，商君之所谓兼并也；其言兼同，其所以为兼异。乃如水火白黑，势不相容。今假众乐之言，以文饰其帝国主义，是犹借兼士之名，以文饰其兼并主义。墨、孟有知，必萦以朱丝、攻以雷鼓无疑也。马氏固罗马教僧，其言不得不稍蕴藉，充其意趣，去金铁主义不远矣。

马氏之言曰："吾侪以求神我之愉快故，而组织此政闻社；吾侪以遵良知之命令故，而组织此政闻社。人人各有其所信之主义，所信之主义适相同者，乃集合而为一党。谁信之？吾之良知信之也。故政党者，多数政党员之良知之结晶体也。人而不自服从其良知，时曰非人。"

(1) 《文录》落"乐"字。

是说固非甚谬，然应问良知云何？当婴儿能啼笑时，宁知有政治？亦宁知政治中有相歧之主义？长而有所见闻，以意推校，或可或否，则既非良知矣。且人当服从良知固也，而良知所信者，未必皆正。即彼为盗贼者，亦有任侠可贵之名。凡诸椎埋攻掠之徒，赤心悃幅以崇效宋江为义士者，其心岂皆虚伪，盖贞实自信者多矣。故虽服从良知，而所信既非，不得以良知为解。世之言致良知者，始自余姚王守仁。以宸濠仁孝多闻，视武宗荒淫之主，一尧一桀可知也。而守仁拥戴乱君以诛贤胄，亦谓效忠天室，良知所信则然。今以匡扶胡羯、热中巧宦之政党，主义相同，同在慕羶之事，而以良知所信文之，斯良知亦不足卻矣。昔康德有言曰：过而为非，后必自悔，此良知之命令使然也。后有人驳之曰：过而以任卹之事许人，后亦自悔，此亦良知之命令使然耶？若云至诚所发，悉本于良知者，一切悖乱作慝之事，苟出至诚，悉可以良知被饰。宜哉孔有德、范承谟辈，得以致命遂志称也。

呜呼！马良以方闻之黄耇，为承学重。今其持论款空，徒为侈大，有以知权利之涂，令人丧其神守而已矣。虽然，吾当为马良告曰：马良本罗马教僧，吾亦崇信相宗，与沙门比迹，虽佛乘与天教有殊，其游心方外一也。既与乞儿马医同贱，为民请命，是其故常。且释教以王贼并称，而罗马教所奉《旧约·出埃及记》一篇，亦即民族主义，纡此净土天宫之想，以其头目脑髓持救汉民，则僧徒所有事；若踸踔政党之间，熔金跃冶，既不祥矣，而黑衣宰

相之名，又足以点污正教，抑何不矜惜其门风耶？吾意马良之命名也，盖亦有所则效。昔汉末有襄阳马良矣，蜀先主辟为左将军掾，遣使吴下，良求诸葛亮为介于孙权，亮曰："君试自为文"，良即为草曰："寡君遣掾马良通聘继好，以绍昆吾豕韦之勋。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鲜于造次之华，而有克终之美，愿降心存纳，以慰将命。"今马良自吴淞来，不惮波涛，自日没以至日出，又与东国勋旧应和，寡君爱新觉罗氏，其亦叹为白眉哉！汉有胡广，明有胡广，中庸之道既同；汉有马良，清有马良，协穆二家，亦复古今一揆。所志固遂，若无以昭事上帝何？

【说明】 本文原载《民报》第二十一号（一九〇八年六月十日），收入《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

按：政闻社于一九〇七年十月十七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在日本东京成立，推举马良为总务员，"并拟公派专员到沪，求马君承诺"。十二月十五日（十一月十一日），马良"不惮奔走之劳，特来东瀛"，就"总务员职"。发表其"就任演说"——《政党之必要及其责任》于《政论》第三号（一九〇八年四月十日出版）。《政论》编者并加"附志"云："右稿为马总务员口演，书记笔述，其文责记者任之。"《政论》是政闻社的机关刊物，章氏阅后，随加诘责。本文即系针对马良"就任演说"而予驳斥的。今将《政党之必要及其责任》摘附于后，并供参考。

附：政党之必要及其责任（摘录）

马　良

政闻社总务员就任演说

……国家之起原，果何自昉乎？学者之说，是丹非素，经百年而未有定。要之无论何种之国家，必经过家族之一阶级而来，斯则可断断也，故明乎人类乐有家族之理，则夫人类乐有国家之理，亦可以类推而得其故矣。凡有血气者，莫不自爱我，然所谓我者，有形我焉，有神我焉，禽兽知有形我而不知有神我，故永世不能以为群。人类者，非徒以形我之安佚而自满也，必更求神我之愉快。苟孑然孤立而无偶，则虽极耳目口腹之欲，而必非人情之所乐，于是乎家族不得不兴。普通之人，其爱其家族也，殆与爱己身无所择，盖神我之作用然也。然神我之愉快，又非徒恃家族而能满足也。善夫孟子之言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盖人类之恶独而乐群，全由其天性然，于是乎由家族进而为部落，由部落进而为国家。近世学者，或谓国家之成立，純由竞爭力促之使然，此固未尝不含半面的眞理，然谓国家成立之原素而仅在是，则是徒举形我之一方面，而遗神我之一方面，安得云知言也。夫禽兽之与人类，其受逼迫于外界之竞爭一也，顾禽兽何以不能为家族、部落而人能为之，曰惟知有神我故。野蛮人与文明人，其受逼迫于外界之竞爭一也，顾

野蛮人何以不能为国家而文明人能为之，曰惟能扩充其神我故。明此义者，可以知国家，可以知国家与政党之关系矣。

人类之能为国家也，恃有神我也；人类之乐有国家也，所以求常保神我之愉快也。使有国家而不能保神我之愉快，甚或其愉快反缘有国家而为之灭绝减杀，则吾之乐有国家者果安在？故欲完国家之责任，莫要于使国内之人各得所欲，此犹家族之责任，在使家內之人各得所欲也。虽然，一国之人，其所欲亦多矣。淆乱而不能統一，隔阂而不能相知，甚欲互相反对而莫审所适从，将何道以沟通之、别择之？于是有一部分人焉，揭櫫其所欲者以告于天下曰：吾所欲者在是。夫人情固不甚相远也，我欲之，则必有共可欲者存，遍国中与吾同欲者，不知几何人也。前此各怀之于心而互莫相知也，窃窃然忧吾道之孤而莫吾应也。及闻甲部分之人昌言曰，吾欲在是也，而乙部分、而丙部分、而丁部分，咸相说以解曰，吾欲固亦在是也；其余他部分之人或前此并未知此之可欲，及见夫多数人欲之，乃寻其理由，而觉其中诚有可欲者存，乃恍然曰：吾昔所欲不及此，而今固亦欲之也，于是乎政党之机动。既群多数同欲之人，则必求所以餍其欲，且必求所以去其所不欲，此非合输其心力、齐一其步武，无从为功也，于是乎政党之形成。

虽然，吾所欲者，非能强举国人以尽从同也，则必有其所欲不在是而在彼者焉。一部分之人揭櫫以号召曰：吾所欲在彼，则亦必有他之乙、丙、丁等部分人起而应

之，其所以求餍其欲而去其所不欲者，亦犹我也，于是乎一国之中，必不止一政党，而常有政党与政党对立。夫既谓之政党矣，则必聚同欲者乃能成之明也，又必非少数之所欲而为多数之所欲又明也。既多数人欲之，则其中必有可欲者存。故苟名为政党，则无论何党，而其所欲皆必与国利民福相近。然犹或欲此不欲彼，或欲彼不欲此，何也？或欲国利民福之小者，或欲其大者；或欲国利民福之近者，或欲其远者。夫远且大之福利，或为近且小之不利，近且小之福利，或为远且大之不利，各见其利之方面，而忽其不利之方面，此政党与政党所以恒对立也。虽有不利之方面，而必有其利之方面，故曰与国利民福相近也。天下无純利而无小害之事，故不敢谓其与国利民福之范围适合而无间，故日相近也。既政党与政党对立，国家将何所适从，曰：采其与国利民福最相近者行之，则国家之责任尽矣。何者为与国利民福最相近，曰国民最大多数所同欲者，与国利民福最相近；何者为国民最大多数所同欲，曰最大政党所主张者，即国民最大多数所同欲。……国家恒采最大政党所主张，为国民最大多数所同欲，而与国利民福最相近者以施政，夫是之谓政党政治。政党政治者，现世人类中最良之政治也。……

天下虽无绝对的良政治，而有绝对的恶政治。何谓绝对的恶政治？则徇最少数人之私欲，而反于大多数人之所同欲者是已。质而言之，则曰专制。专制政治，束缚人人之神我，使不得申，故有国家曾不如其无，故生为专制之国民者，必当以排除专制为唯一之义务。此非我对

于人所当尽之义务，实形我对于神我所当尽之义务也。然则何道以排除之？曰：还以神我之力排除之。夫我之有所欲有所不欲也，此神我之能自主者也，而专制政治，则强吾之所不欲，以徇人之所欲，是不许神我之自主也。虽然，神我者，赋之于天者也，虽父不能夺之于其子，虽主不能夺之于其奴。彼蝍蛆嗜溷也，强人而尝之，虽或下咽，然其厌疾之之心，无论何人，不能禁其不漾于中也。若是者，吾中国先圣，谓之良知。既有良知，斯有良能。人之思得其所欲而去其所不欲也，其良知也；既思之，则务所以得之去之，其良能也。夫人之乐有国家者，其亦孰乐有专制？既不乐之而固受之，则其良知之苦痛，岂有已哉！……故欲排除专制，无他道焉，国民咸遵其良知，以发表其所欲者与其所不欲者，乃胥谋各竭其良能，以求其所欲者去其所不欲者，斯则政党之业也。

……鄙人老矣，雅不欲以伤心语堕诸君少年锐进之气，然……比年以来，煎迫愈甚，虎狼眈眈，嗥于卧榻，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呜呼！诸君其知之否耶？使五年以后之中国，尚如今日之中国者，则吾侪自今以往，至于世界末日，永堕畜生道而靡复人趣矣。诸君诸君，谁为为之？孰令致之？呜呼痛哉！此专制政府之罪也。曷为有此专制政府，曷为使专制政府久适于生存？呜呼痛哉！此国民之罪也。曷为使国民久负罪至今日而犹不思自赎，呜呼痛哉！此鄙人与诸君之罪，又凡举国中先觉者之罪也。……呜呼！至今日而始有政闻社之发生，鄙人与诸君之罪重矣；抑今日而有政闻社之发生，乃鄙人与诸君所

以谋自赎其罪，且偕国民以同赎罪者。嗟夫！嗟夫！吾侪之罪，其终能赎耶？嗟夫！嗟夫！天心仁爱，其许吾侪以赎也必矣。

吾侪以求神我之愉快故而组织此政闻社，吾侪以遵良知之命令故而组织此政闻社，吾侪以自赎其罪且为众人赎罪故而组织此政闻社，则吾侪所以图践此责任者当如何？

一曰忠实。……人之于政党也，当如妇人之于所天，死生以之，何以故？政党非以强迫而结合者也，人人各有其所信之主义，所信之主义适相同者，乃集合而为一党，谁信之？吾之良知信之也。故政党者，多数政党员之良知之结晶体也。人而不自服从其良知，时曰非人，故政党员之忠于政党，则我忠于我而已。其或徒挂名党籍，不思对于党而负责任，此非欺人，乃自欺耳！是不啻我对于我而怀叛逆也。吾侪之地位各不同，而党中应尽之义务亦至夥，苟诚忠焉，无论居何地位，而皆有得尽义务之余地，经济学上分劳之谊，实团体发达之第一要素也。

二曰忍耐。……非有百折不回之气，即罹一蹶不振之忧，当思个人之生命虽短，团体之生命甚长；个人之能力虽微，团体之能力甚大。蹶于此者，必兴于彼；挫于今者，必成于后；若徒恃一时客气，不旋踵而痿者，志行薄弱之鄙夫，非吾侪所以自处也。

三曰博爱。爱也者，神我之所攸托命也，岂惟一党，岂惟一国，天地赖兹立，万化赖兹出焉。有对于党中之爱，吾侪以主义结合，固也，然犹有附属之一胶质焉，曰感

情。感情不相浃，中道涣之易易耳。故有手足相依、患难相共之情，然后可以永结于不散，此吾侪所各宜自勉者也。有对于党外之爱，道有阴有阳，数有正有负，吾是吾所是，而不能谓人之尽非，此国家所以能容两政党以上之对立也。故吾侪忠于本党，而不嫉视他党；可以为光明正大之辨难，而不可以为阴险卑劣之妨害。其中立之人，吾侪宜尽吾力之所及，使其表同情于吾党之主义；其有未肯遽表同情者，吾侪当谅其锢蔽之太久，启悟之不易，常怀矜悯之心，勿为厌弃之容；即对于吾主义之公敌。吾侪抗战，固不可不力，然有战时公法之可守，不尙诡遇，不罪降人，此亦所以行吾爱也。鸣呼！吾侪苟非有此爱根，则遁世无闷已耳，遑问国家，遑问政治。既以爱故而结政党，若缘政党而伤吾爱，斯所谓进退失据也。

鄙人无似，承诸君之推举，负疚滋深，顾以四十年来怀抱之志愿，所欲从事而未能从者，及今而得以从事焉。鄙人虽耄，犹得与诸君共观厥成矣。

哀陆军学生

（一九〇八年七月十日）

捐妻子，违井里，去神州之绝岛，奴虏其身，骏雄其魄，以立功名非乎？以博尊官厚禄非乎？俄而练兵处下令曰："陆军学生，来，当与尔辈出身地，高者守备，次即千总，最下乃把总耳！不来者，断汝胫矣。"然诸考试留学生事，月有见告，陆军学生则怒曰："尔曹习法政，空言无实，上选者得编修，次乃进士；学工者才比匠师，亦列位贡举间；最无俚者，凿齿而补以金，犹不失为牙科举人。吾辈辛苦三数岁，入戏下为厮役，讲习戎事，幸而成就，乃反得最劣者。守备、千总、把总，老革朽钝者所为，箠楚尘埃之间，猥贱无与比，而以辱我英骏诸生。叱嗟！练兵处大臣，而母婢也。吾不来，汝断吾胫；吾来者，亦啑汝脑矣。"

章炳麟闻之，曰：学校之祸人，如是哉！原中国初设学校也，在贵族封建时代，其学非以求是，惟致用是务，出身事主为尤急，当其入学，而所志固在升斗矣。后有乡举里选之法，所选不尽士人，至魏、晋又归重于门地，隋世乃

不得不用科举。唐、宋诸科，惟进士为华辞，不关学术；秀才则以待閎博多能之士，卒无人能应举者；经、法、书、算，是固一技之长，贤于进士之浮虚也。王安石始合学校科举为一，科举愈凋敝不如旧制，学校所务，亦舍科举无他事，两为学者所鄙夷，则始有讲学者出，自名其家，以与学校科举相攻。比明世，复以其学合之学校科举，故陈献章、王守仁辈，各往往变更旧术，传之其人。东林之兴，为学士丛薮，然急切干禄之念，浸益染污，名为讲学，实以自植政党。夸者黄宗羲作《明夷待访录》，以为乡校当闻国政，满洲猾夏，其说卒摈不行。求利禄者，独俯首科举下，腐朽日甚，而倜傥异材，乃以六书九数名其学，既不习制举事，又异东林之徒裨贩洛、闽以求闻达者，深固伏蛰，且二百岁。夸者魏源，始以经世之术求用。至近世乃设学校，选高材游学异国，上之所望于学生，非为求是，为致用也；下之所以自处，非为求是，为出身事主也。然则学校在官，其污垢与科举等。讲武之术，为国干城，其效用为尤急，与封建时代之学校同流，一堕网中，处处羁绊，立功之念，过于求学；封侯之念，过于立功。盖沦浃精髓，浸淫肝鬲久矣。

往者学陆军得士官，归即被任为标統，不乃处帷幄为画策士，犹未厌足；乍闻守备、千总、把总之命，精魄颓丧，怏怏觖望不已，是亦学生之素情也。呜呼！凡有血气，谁不自尊贵者？谁不爱其天属之亲者？今者弃捐乡里，履波涛而之绝域，情欲已失半矣。习法政工商事，休沐燕游，犹足以谈美自乐，今直为戏下台隶，一入联队，囚虏之

食，不比于人，麦饭半菽，肠胃为焦，老兵视新进者，有若仆圉，引重则使之，上食则使之，拭衣则使之，膏履则使之，所以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曰：他日得为无上军官以自酬故，今则已矣。在外为徒隶，归亦为徒隶矣。在外受罚，无过幽闭暗室以自省过，归且不保其尻脊矣。额手以见贵人，其辱犹小，归且跪道周而迎先马矣。悲夫！悲夫！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独薄于陆军学生耶？其父母之生我者，独使我为守备、千总、把总耶？抑禄命使然耶？若素知此，胡不为法政学生，弃军国民之名而收大政党之实。轩车驳马，驰骋畿甸间，一日得与王侯贵人过从，椎牛炮羔，恣所啖食，黄貂狐白，无价宝珠以为璎珞，犹足以自焜耀也。不然，则习筑路视矿之技，亦犹为駔侩尊祟也；不然，虽习马医，尚以一艺自给，未至为他人臧获也。置此不习，乃冒昧趣陆军。呜呼！不可怨天，不可尤父母，亦不可咎禄命也，直齰舌自悔耳！

欲少逗留，公使之命，厉若雷霆，敦迫上船，若引重囚以趋市肆，纵傲狠违节制，淹滞旅馆，非有宿舂之粮，犹是生命，独能忍饿死乎？欲遂归国，以赴期会，协统、标统，若天之不可阶而升。藉有善营求工侧媚者，十中财得一二，余复何望？当其营求，而先进之陆军学生，既被任为协统、标统者，复忌刻之。寤寐而思，聚处而议曰：吾辈已得玉案之食矣，勿令后人至，攘吾辈权利也。故虽有轶伦绝群之材，为人齮龁，终不得起。其欲得上遂者，先为徒隶于异国，当复吮痈舐痔，以事先进，然后得循资除授。以若所为，得若所欲，军国民之荣名，竟安在耶？幸而得

之，一朝被嫌疑，称革命党，投置闲散，复与湘军提镇归为佣工者等，槁项乡里，卖孔雀翎以续衣食，猝遇典礼，则头戴松枝以出耳！呜呼！谁造此军国民之名者，如狐如祟，惑我神志，使我困苦无告至于此极也。

侧闻铁良规设模范师团于顺天，以维絷陆军学生，勿令散处。得一高官，纵受维絷，比于乘轩之鹤亦已矣，何复污以守备、千总、把总之名也。呜呼！不可怨天，不可尤父母，不可咎禄命，亦不可自艾也。寻怨于铁良耶？死生亦大矣，孰不自爱其首领者。迫而为此，亦不可咎铁良也。

维我天公，何不简择，而生徐锡麟于中国。尔为陆军学生，尔为道员，纵不竭忠事主，为国家作保障，当念道员与陆军学生，固同类也，何因攻难冒死，注铅丸于尔大帅，身既不保，屠肠决肺，陈于市朝，卒无补益，徒以暗杀之名表尔墓道，尔享其誉，人受其疑。为道员者，以尔徐锡麟故，悉堕谗谤，蔡钧被编管，以忧愤死，高尔嘉衣赭关木，雷电击之。为陆军学生者，以尔徐锡麟故，沈沦不起，降在伍伯舆台之贱。嗟兹天公，胡生是子，以祸我道员、陆军学生也。

道员者，皆千金子也，当治一太牢具，上祷昊天，下禜泰社，中告公旦、鄫侯之灵曰：自今以后，愿为道员者，毋若徐锡麟矣。陆军学生，往往多蓝缕子，亦操一豚蹄，上祷昊天，下禜泰社，中告蚩尤、穰苴之灵曰：自今以后，愿为陆军学生者，毋若徐锡麟矣。呜呼！祷耳禜耳，尽乃心耳，高高穹苍，能下听乎？澹澹黄泉，能仰受乎？茫茫鬼

伯，能与人类通熏蒿之气乎？祠祝无益，祝由不效，其抑者表石于徐锡麟之里曰：尔以暗杀荼毒我曹，屠肠决肺其宜矣，当尔受刑时，吾恨不得分一杯羹，吾犹有尺八匕首，今生活既无赖，宁自引决，与尔格斗于羡道中。不知锡麟之鬼，有所惩创否也。惧格斗而不胜，则徒死亦无补。呜呼！不可怨天，不可尤父母，不可咎庥命，不可自艾，不可忿铁良，亦不可追怨徐锡麟也。

昔尔女娲，抟土为人，青泥白壤，龙奇不純，既造貉子，复作汉民，将特为此殊形异类以相轧轹耶？其亦于沈醉茗艼之间失念而为此耶？藉令汉人悉变化为满洲种类，陆军学生则犹是八旗贵胄，何所歧异，而当疑为刺客革命党人。然则取珊瑚顶、获麒麟师子之绣服，犹拾芥也。今也则亡，受命不迁，生此南国。女娲祸若于前，轩辕、嫘祖祸若于后，块然七尺，终已不得谥为满人。其上书愿著旗籍耶？偷取官位，何以上对祖宗丘墓；其自承为汉人耶？牙旗羽节，于我绝分，空受数岁之劳，而不可得毫厘之酬报。进退道穷，羝羊絓棘，人生不天，未有如陆军学生之甚者也。

呜呼哀哉！逢逢白云，一东一西，一南一北，朝出军幕之上，夕在戎旃之下，快哉云耶，宁知陆军学生之苦？明月案户，海水上潮，方舟回复，喧阗海隅，宇宙虽乐，又焉知陆军学生悲也。勃鸠晨鸣，乾鹊啸群，猿猱跳梁，牛羊不括，鸟兽虽顽，犹有乐事，如我陆军学生何？相彼唐园，林木氾移，梧桐竹柏，郁青自喜，尔曹无情感，如我陆军学生何？伊威在室，蟏蛸在户，瓜葛蔓生，野马动扰，有

知无知，亦各有以自得，如我陆军学生何？北山蒿里，积尸在泉，冥卧千载，不知岁月，尔曹能长往，终无哀乐，如我陆军学生何？上山采药，而得黄连，下泽求蔬，乃获瓜蒂，其味已苦，曰：不如我陆军学生苦。昨者江户之滨，雨雹如鸡子大，其以陆军学生之怒，致此震动。东风为陆军学生吟，浮云为陆军学生阴。鸣笳以送陆军学生，陆军学生，涕泗随之；举觞以饯陆军学生，陆军学生曰：吾自有泪饮之，不烦设醴酒也。学生有马，号曰的卢，以主人将就道，嘶而送之，不悟主人嗌先嗄矣。呜呼！闻斯语者，虽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其乌能无恻隐之情哉！抑吾闻之，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也。

【说明】 本文原载《民报》第二十二号（一九〇八年七月十日），《太炎文录》未曾收录。本文之后并附录《留东学生监督处公布书》曰：

> "案照练兵处章程第十六条，学生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充见习士官期满，除考入大学校及各专门学校外，其余回国，由练兵处就其历年所学一一考试，最优者奏请授职守备，次者千总，次者把总。此项武职，即作为该学生等出身等因。现在士官学校第四期学生已届毕业，无论志愿回国，或志愿继续留学，一并送部考试，希即一律来处领取川资及咨文赴京投考。本处已咨请陆军部择期考试矣。特此公布。
>
> 咨陆军部稿附贴
>
>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监督处公布。"

满洲总督侵吞赈款状

（一九〇八年七月十日）

阳历六月，有自号中国国民一分子者，移书本社，道清两江总督满洲人端方侵吞赈款事，其人或有所忌讳，故不直举姓名。今录如下：

“顷有友人自金陵来函云：去岁案去岁当是前岁之误。江北赈款，上下凑集约五百万，灾民实受惠仅二百余万，余尽被贪吏所侵蚀。官场密传云：某方伯以此款丝毫未得，一日对某督作讥刺语。某督云：尔不必如此，晚上定有一杯茶敬奉上。至夜果送库平银一万两至藩署，某方伯始欲受之，而恐招祸，继欲却之，又恐触怒而加害，只得蒙笼以公项收之。至今此款尚存于江藩库中，不过以事涉某督，现在人不敢言耳！余乍闻之，不胜骇异。夫去年江北之灾，亦吾国近年之巨灾也，不独本国慈善家捐助巨款救济同胞，即旅沪之外国慈善家，亦慨捐金钱救援灾区，吾国官吏虽不肖，何至丧心病狂若是？故余对于此事，不能

无疑，然徵之咸、同之间，豫省一灾，官吏以吞赈款兴大狱，昭昭在人耳目。嗟嗟！吾国官吏，固素以渔赈款为常例者也，事关重大，言非无因，敢祈贵报馆确实探访，登诸报端，以告我国人，此亦贵报馆之天职也。如畏势不敢昌言，则余亦不欲与贵报馆言也。

即颂著祉。中国国民中一分子上言。”

案原书，有方伯、豫省诸语，词气凡俗，此为曾入仕涂者之口吻；不然，则亦幕僚之属，故其诊察内情，十得八九。据称侵吞赈款，为官吏常事，而引河南吞赈之狱为徵。夫以吞赈兴狱，则法律犹未弛，视民亦未至竟如草芥也。往者，西北四省，岁遭大康，易子而食，谭钟麟、曾国荃辈，非甚廉洁守法者，然犹戮一二吞赈之州县以谢饥民，其有侵蚀，亦十取一耳。今据来书，以五百万之赈款，而侵蚀至三百万，盖昔时所未有。端方曾遣军队以弹压饥民，不令为变，若赈款果为民用，亦安有扰乱事？如曰有革命党交构其间，则应防者不止饥民而已。然则所为弹压饥民者，非畏革命党之煽乱，畏知其隐情者之煽乱耳。虽然，此未足为端方咎，其咎则在以满洲人建立政府。满人贪冒，本十倍于汉人，如彼康熙、乾隆二朝，名为法令修明之世，而黩货者犹遍于朝列，汉、唐、宋、明盛时，有此秽乱事耶？自满人以黩货著，汉人之仕宦者，知廉洁不足以博荣名，而反被嗤为拙钝，于是载其腥德，贪狠满郊，此固自然之势也。不然，宋、明季世，乱政滋章，亦有一二权奸侵牟于上，而朝士与封疆之吏，犹有清德可称者，岂其法令善哉，正由贪窦未开，人犹知耻耳！独此满洲政府，自边外马贼

组织成之，摸金发丘，是其天性，余波所衍，安得不至是乎？欲使官常整饬，视民如伤，必非满洲政府所能为也。或议吾辈所持，偏在种族革命，而政治革命之说，一切委弃不谈。不悟法制臧否，因时而施，非今日所能悬拟；所可悬拟者，惟共和政体之空名，其间细碎典章，安得豫为筹画也。

且今所恶于满洲政府者，非在制度不良，在所好与所令异。若就其法令成文以断今之政事，则一命以上，比屋可诛，亦非清律所能容矣。而所以不可禁者，肉食之性，天纵贪饕，务在上下容隐，比周为奸，久之则反以简易宽容为长德。故满洲之乱政，非自其法令成，自其天性与习惯成。若一日覆满洲政府，纵令制度粗疏，日不暇给，而贪叨之习，必就廓清，此又无待豫为筹画者也。

或曰：四省大康之岁，侵蚀赈款者，尚不如今时为甚，彼其时，独非满洲政府主之耶？答曰：今之乱政，满洲政府为根株，而立宪变法诸家为之加厉，何也？今之言立宪变法者，非为内治而起，乃为外交而起，寝食不忘，惟敛财治兵是务，而官常清浊，民生疾苦，非其口所欲说、耳所欲闻者。方略重而文法轻，策士尊而循吏绌，其弊不至此不止。彼袁世凯、端方者，纵横之士，拥戴以为宪政巨公者也。既为宪政巨公矣，虽有黩货殃民之事，而朝士视之，以为分所应为。且谓小节出入，无伤大体，故侵蚀至三百万，其事未尝见于弹章。虽民间清议，亦相与优容之，此则立宪变法之说，所以纵端方而使无忌者也。

往者，四省大康之岁，莠言未作，朝士之于政事，犹务

在簿书期会，不为高掌远蹠之谈，外吏揣朝士意，逆知侵款过多，则不免于弹劾；弹劾既行，则不免于罢黜，故犹顾其后耳。虽然，立宪变法之说，非满洲政府据其上，则无由生。倘方略，尊策士，惟敛财治兵之务，而不问吏治如何，此满洲二百六十年之国是也。故立宪变法之说，惟为外交、不为内治者，得以中之。然则谓端方之侵赈款为满洲政府必生之果可也。

【说明】 本文原为《民报》第二十二号“时评”（一九〇八年七月十日），《太炎文录》未曾收录。

王夫之从祀与杨度参机要

（一九〇八年七月十日）

满洲政府以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为汉土学者所宗，奉其主，纳之两庑，为收拾人心计，亦犹使衍圣公为山东学务总稽查也。公不省学，藉巡视以狎娼优，徒为士民笑悼。三老之入两庑，驳议嚣然。

原夫成均释菜，所以崇礼先师，使民则效，然徒典礼虚文，于教化非有补益。郡县祀孔子，自许敬宗、李林甫始。刘禹锡尝驳之曰：凡学官春秋释奠于先师，斯〈礼〉止辟雍泮宫，非及天下。今州县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庙，其礼不应古，甚非孔子意。传曰：祭不欲数。又曰：祭神如神在。与其烦于荐飨，孰若行其教。今教颓靡，而以非礼之祀媚之，儒者所宜疾。窃观历代无有是事。武德初，诏国学立周公、孔子庙，四时祭。贞观中，诏修孔子庙兖州，后许敬宗等奏天下州县，置三献官，其他如立社。玄宗与群臣议罢释奠牲牢，荐酒脯，时王孙林甫为宰相，不涉学，使〔委〕御史中丞王敬从以明衣牲牢，著为令，遂

无有非之者。[1]不知今之尊孔庙为大祀者，其奸谀视许敬宗、李林甫何如耶？两庑从祀之典，自明季至今日，浸益为学者所轻；淫昏如欧阳修，尚得血食，其他何讥焉。故世之视从祀，亦若乡里祭社公而已，此宁足以示民趣向哉？虽然，量彼佞臣媚子之用心，则以为使民乡方，莫两庑祀典若也。乃满洲贵胄，无所恶于衡阳王氏，而悬悬欲黜馀姚，汉人之处枢密者，则愿为馀姚藩蔽，斯可怪矣。衡阳者，民族主义之师；馀姚者，立宪政体之师。观《明夷待访录》所持重人民、轻君主，固无可非议也；至其言有治法无治人者，无过欺世之谈，诚使专重法律，足以为治，既有典常，率履不越，如商君、武侯之政亦可矣；何因偏隆学校，使诸生得出位而干政治，因以夸世取荣；此则过任治人，不任治法，狐埋之而狐掘之，何其自语相违也。馀姚少时，本东林、复社浮竞之徒，知为政之赖法制，而又不甘寂寞，欲弄技术以自焜耀。今之言立宪者，左持法规之明文，右操运动之秘术，正与馀姚异世同奸矣。满人方主立宪，而竭其唇吻之力以斥馀姚，此可异也。将以蔑视君主为嫌耶？蔑视君主之为忧，未若攘斥胡虏之为忧。衡阳所著，则有《黄书》、《噩梦》，其尊汉族而拒羯夷，成文具在，斯正虏所深甚，当痛心蹙頞以攻之者也。今于衡阳反无一言，岂彼满洲贵胄者，未睹衡阳之书耶？抑自知东胡秽貉，荐食神州，罪在不赦，故不敢公吐盗言以憎主人也。若是，则彼满洲人者，亦以汉人排满为当然耶？

1） 按刘禹锡语，见《刘宾客文集》卷二十《奏记丞相府论学事》一文。章氏引录，仅据文意，而非原句。今除将刊印脱误注出外，不另勘补。

昔曾国藩身为汉奸，猘薙同种，而衡阳遗书数十种，素未现世，实国藩为之刊行，湘人父老相传，以为国藩悔过之举也。然则尊祀衡阳，默无非议者，其亦满人悔过之举耶？

虽然，神道设教，末也。征之行事，则满洲政府之用杨度，亦有一二可怪者。杨度本爱国协会会员，与徐锡麟、黄兴、刘揆一，盖尝歃血涖盟，誓灭建夷而后朝食者也。爱国协会者，以士人无徒党，不可奋起草泽间，故所趣在暗杀，杨度亦尝为刺客，将素非学陆军者，故得自掩。其后浸寻言立宪，汉人之处枢密者，援以为重，犹其藩蔽徐姚之志，而满洲人亦尊宠之，忘其畴昔，则未知其与尊祀衡阳之心一耶异耶？又未知此杨度者，将终为徐姚之事耶？抑将返为衡阳之事耶？

夫衡阳者，九泉下之积尸，虑不足为满洲患，有与衡阳生同乡里，而夙所行事复与衡阳同轨者，今一旦背衡阳之学而效徐姚，人犹疑之曰：名为立宪，实则革命也。既不能剖腹以明心迹，盍亦排摈衡阳，罢其从祀，使皇天后土，鉴其竭忠新主之情矣。

【说明】 本文原为《民报》第二十二号“时评”（一九〇八年七月十日），《太炎文录》未曾收录。

革命军约法问答

公是先生问　太炎答

（一九〇八年七月十日）

公是先生曰：云南革命军，自河口至蒙自、江那，市非不惊，民安其业，庶几孟津观兵，前歌后舞。虽然，寻其约法，亦有至不平者：杀外人焚教堂者必诛，而诛汉人者皆从轻比，其余民间公产，毁破者无所问，是诸约法，姚冶喜新之士，亦恬视以为当然矣，不知言民族主义者，亦拳拳奉此耶？同气之生命何其贱？外人之生命何其尊？汉族之财产何其轻？皙种之财产何其重？满洲异族，惟知俯首摇尾，以媚泰西，而视皇汉之裔如草芥。吾党杖义兴师，为民请命，亦有所轩轾如是乎？汉人与外人，良莠皆错杂而处，外人之良者，当力与保护；汉人之良者，不当力与保护，此何说也？借云汉人之莠者，杀之则罪轻，然革命军之起，非为劾捕盗贼、惩治奸宄而起也，则良莠当等视；若其不等，外人之莠者，固多于汉人，而教堂当任人焚爇矣。新旧二教诸僧，其传教于中土也，名为以善道化

人，而深研神学者寡，大率款启寡闻之民，欲为父师于其宗国而不可得，乃借汉士为蛇龙菹焉。其间容有善士，淡泊宁静，以道得民，藐焉若稗中之一黍粒；自余多为权利来者，所至陵轹乡愚，干预辞讼，藏奸纳垢，无所不为；其彰彰有名闻者，且与京邑巨公相结纳，藉其权威，以胁制州县长吏，举措越法，无敢诃问；斯实彼教之罪人，其为蟊贼，孰甚于是？吾民忍辱三数岁，众怒偾盈，阴血周作，以与大巫争命，此与抗官吏诛警察者何异？革命军人，于此方赞助之不暇，而又何诛焉。若曰此平民事，军人则不得为此。然则会馆、善堂、社会、书院、寺观、神丛之属，亦岂革命军所反对者；容有伏藏奸蠹，虑不如彼甚也。于彼而毁破之，则曰军人不得为此；于此而毁破之，则不曰军人不得为此，又何说也？夫教堂则其小焉者也，西来商旅，本以贸易为名，租地置廛则可矣。今则市役之局，遍于口岸，巡警之卒，横于商场，越其通商互市之权，而奸政事，彼商之视吾汉种，不犬豕若也。一满政府不足，又于商场置十数欧、美政府以蹂躏吾汉人，此非独平民所当诛，虽革命党人，当恝然置是乎？若曰传教通商，当与保护，实条约之明文，不可违倍。为问此条约者，汉政府与外人订之耶？抑满政府与外人订之耶？吾党革命诸公，认满政府为中国政府耶？抑不认满政府为中国政府耶？若不认满政府为中国政府者，即亦不当认此条约。夫以条约为口实者，乃满政府所以钤制汉人。今以汉人排满政府，而复藉满政府所订条约，转以自制汉人，虽巧言如簧，何以解此？盖吾党之革命者，与他国异。他国革命，政治

98

之以；吾党之革命者，先为种族，次为政治。自他国革命家观之，则以革命覆此政府，非曰从本以来不认为己国政府也。自吾国革命家观之，则本不认为己国政府，革命者，所以不彰不认之心，非曰未有革命军时彼政府即吾政府也。在他国者，犹以长吏残贼其民，民之仇其长吏者，起而戕之。在中国者，犹以盗贼自称长吏，民之起而诛之者，非以为长吏当诛，以为盗贼自称长吏故当诛。是故内之汤、武，外之那破仑、华盛顿辈，皆不足为吾党例。昔之已成者有伊大利，今之未成者有印度、越南，庶几同其辙迹焉。夫素认为己国政府者，虽欲诛其君相，更其法度，于对外之条约，则不得不认也。素不认为己国政府者，虽对外之条约，可复认乎？浸假非洲之黑人与美洲之赤人订约曰：尔得在汉土传教通商，吾汉人共认此否耶？虽然，吾揣诸公之意，以为吾党虽不认，而欧、美人固认之，为此屈抑主观以勉就客观云尔。夫势所陵迫，因以枉其初心，虽囊括六合之英，莫能自主，吾何敢苛责于诸公。抑传教通商，则条约所许矣；僧侣之干预词讼，亦条约所许乎？闲田公地，废庙荒山，僧侣或私据而有之，以为寺产，亦条约所许乎？商人擅设市役局，驱汉人为警察，由是擅设科条，罔民陷罪；又置团练，以贼土著，偶有小警，发铳击人，无罪死者，转徙沟壑；或且擅设监狱，以闭汉人，亦条约所许乎？租界左右，地非宿赁，因缘细故，以布其警察之权，亦条约所许乎？夫彼以不法来，而此必以循法应，是犹舞干羽以化有苗也。法所许者，传教通商，即彼传教通商之人而有违法之事，是则杀人者，非杀僧侣

也，非杀商人也，杀其违法之僧侣商人也，于此必设之厉禁，是以外人之祸吾民为当，即无以服满人之心矣。若曰凡事纲举则目自张，是故排满为先务，于西人则姑置为后图，斯亦可也，何取严设科条，以禁其杀外人、焚教堂为？纵令禁之，则杀汉人与毁民间公产者，亦当同得断头之罪，今于此则附轻比，于彼则附重比，惧徒袭表面之文明，而于民族主义相违背，亦未得云眞人道也。

章炳麟答曰：公是先生之说，至谬厉矣，言种族革命，则满人为巨敌，而欧、美少轻，以异族之攘吾政府者，在彼不在此也。若就政治社会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烈千万倍于满洲。僧侣之祸，吾弗深知，商人之祸，吾深知之矣。尝系租界狱三年，问同系之偷儿曰：尔曹亦尝入上海县狱及自新迁善诸局所，视此奚若？则对曰：上海县狱及自新迁善诸局所，至宽厚也。食得饱，衣得暖，卧得熟睡，囚人相对得语言，狱卒亦不甚厉，独室稍湫隘耳！贫民所居，故非华屋，以茅茨采椽易此，何损焉。今西人所设狱，外观甚洁清，而食不足以充腹，且无盐豉，衣又至单寒，卧不得安眠，闻铃即起，囚人相对，不得发一言，言即被棒，此直地狱耳！人生至此，无宁踣尸于市也。五百囚人，一岁而死者一百六十有奇；中土囹圄虽昏暗，未至若是。世人徒以桎梏有无、卧处垢净为比，卒其成效，乃大相反。余在狱时，亦廪廪有戒心。夫以市井贱商，推其大驵以为渠帅，而造作非法，使汉人服城旦鬼薪之役以自肥，斯已憨矣。若乃阳作宾萌，阴为敌国，遽数之不能终其物也。汉人思此，能无生敌忾之心乎？昔巴

枯宁有言：不能破一名都，亦当破一牢狱。今者狱主非他，则外来之商旅，余所为日夜切齿腐心者，亦惟斯竖，幸而授首，是为中国薙一长蛇，岂以为病？然以利害相校，则革命军不得不姑示宽容，无使清人、白人协以谋我，军中约法，半为利害，不尽为是非也。昔岳飞之御军也，士有取人一鸡，辄斩以徇，取鸡之罪，常法未至殊死，然所以断斩无赦者，惧其滋蔓，则市人皆与为敌耳！今之约法，意亦如是，盖公是先生所知也。虽然，业已保护外人，则保护同族，必当同等。昔左宗棠、彭玉麟辈，为虏将兵，以敌洪氏，士卒有创伤平民者，必诛无贷。彼直虏之豢豕耳，犹知保乂烝黎，勿令失所；况于光复之师，为我邦人兄弟请命者哉！

顷者军兴二十余日，过师衽席，视民如伤，虽约法有偏重轻，而于里巷齐民，秋毫无所骚扰，则知草泽健儿，已明种族相亲之义，后有继者，庶几救民水火，其则不远。惜乎吾党之士，既其实未既其文，约法之书，辞气不能无畸轻重，是亦千虑之失也。抑商人之稔恶也，吾固谓其浮于僧侣，僧侣传教，其务在于羑民为善，纵名实不相应，丧德作奸，所在皆是，彼实孤露乞食之徒，贫无以生，则稗贩上神以糊口于汉土，稍益陵厉，犹贫而为暴客与为舞文之讼师耳。暴客、讼师，吾将怜闵之。若夫赤心悃愊，殷殷以化民成俗为念者，亦百有一二矣。不务声华，僻在下邑，故名不闻于当世。彼教堂所以有特别保护者，亦不尽为利害也。夫然，则汉土之方闻大儒，犹得数四；而孝弟力田，公廉絜行之夫，万室之邑，必有二三，其所以膏沐生

民者大矣。故国者，非乔木足以荫之，旧闻使民不背其宗，长德使民不偷〔渝〕其俗。自东胡猾夏，欧梟美蜮，交相荧眩，吾民之犹有耻心，不欲终为左衽者，谁之力也。于此而不为特别保护，则是轻乡邦之耆德，重异域之宾师，以云绍隆汉族，倜乎远矣。僧侣无贤不肖，一切皆与特别保护，则汉土之学者，虽豪横如王先谦，矫饰如夏震武，跅弛如王闿运，汉、宋旧学，薪火相传，数子犹能保其余烬，宣扬国光，终胜神道，亦犹愈于新学鄙生，独不当特别保护耶？若夫新莽之臣，犹有卓茂，羿浞之国，必有武罗，如高密郑文焯，旧著满籍，而忽奋自脱离，以复七百年之旧族，其学术文采，亦斐然有可观者。式闾表邑，犹惧其晚，况当侵暴之为。为目前计，保护僧侣，无过表示文明，趣以集事；为久远计，黎仪旧德，维国之桢，与之特别保护，则光复家之分所应为者。迩来规摹未远，鞅掌于咫尺之间，无多怪也。军威既盛，略地既远，斯时当念吾言。

【说明】 本文原载《民报》第二十二号（一九〇八年七月十日），列为“主客语”栏，《太炎文录》未曾收录。

再复吴敬恒书

（一九〇八年七月十日）

稚暉足下：前得手书，造次作复。今见足下复以此函登诸《新世纪》中，故复详疏本末以报。

仆始终视足下非革命党也，非无政府党也，非保皇党、立宪党也，曰康有为门下之小吏，盛宣怀校内之洋奴云尔。

足下辄以陵轹同辈为言，谁视足下为同辈者？乃牵涉陈范事，摘仆所著《慰丹传》中之言云“清铅山知县免官欲报仇”者以相诘。陈范素以赃吏得名，淫昏欺诈，至免官后尙然。凡人书信札封面与范，题云“大老爷”则怒，题云“大人”则喜，范曾捐升知府。此得为眞革命党乎？至云提考篮、戴铜顶，二者吾幸脱焉，少小未尝应试，至今犹是汉族齐民也。足下尝中式乡试，私臆他人非举人即学官弟子，盗跖以余财污良家，何足与辩？仆意固非谓应科举者即不得为革命党，亦非谓曾入仕涂者即不得为革命党，要在观其行事而已。陈范以赃吏免官，发愤而言革命，其

心诈伪，非独仆一人知之。若如香山陈景华者，杀岑春煊差官，因被拘劾，遂入革命党中。当其攻杀差官时，已有鲠直犯上之气，故其言革命为可信，亦谁得以陈景华为免官报仇者？如范之伦，固远非景华比矣。

民族革命，光复旧物之义，自船山、晚村以来，彰彰在人耳目，凡会党户知之，凡妇女儿童亦户知之，非自仆始，仆安得以革命党前辈自居哉！世有材骏，或沈沦科举仕宦之间，与昌言立宪变法而卒自悟其非，豹变龙拿以归于革命者，吾方馨香顶礼以造其门，独于足下则异是，要以行事推知耳！昔闻康子有日月二侍者，怪而问其徒党，则曰：林旭者，吾师之外嬖也；吴朓者，吾师之外嬖也，此所以赫然留"吴朓"之名也。

前此作《慰丹传》，由革命评论社人属仆疏记，以充篇幅，书此相付，草次操觚，录其事状，所以发扬芳烈，酬死友于地下者，无过毫末，痛心之事，言之能无訒乎？慰丹而外，死友复有秦力山氏，欲为作传，至今未成。诚以二子之提倡革命，收效至宏，与仆交义亦最挚，悲痛惨怛，度越恒情，故欲记其事而不能措诸文辞。若无革命评论社人之请，斯传虽至今不作可也。而足下谓以此为表旗。足下思想自由，仆亦岂能干涉，但自述素心，如是而已！

足下诘仆云："□□□君果有其人否？何以屡询留欧同人，无知之者，新从东方来之人，亦不之知。"今告足下，□□□乃一幕友，前岁来此游历，与仆相见而说其事，至其语所从来，仆何必问？度金陵皆已知之。足下虽以死抵谰，赐面请安之事，卒不可讳；且足下既见明震，而火

票未发以前，未有一言见告，非表里为奸，岂有坐视同党之危而不先警报者？及巡捕抵门，他人犹未知明震与美领事磋商事状，足下已先言之，非足下与明震通情之的证乎？非足下献策之的证乎？仆辈入狱以后，足下来视，自道其情。当是时，足下亦谓仆辈必死，以此自鸣得意，故直吐隐情而无所讳，即赐面请安等。及今自掩，奈前言不可食何？乃云"何不丐□君亲叩俞氏"，足下既自述，仆又得二子证明，证据已足，又安用复叩为！

又云："献策语与对学生语，未容随便填写。"足下试念，仆作《慰丹传》，非法庭录供之爰书，有其事则略记其语，宁能适与声气相肖。非独仆然，自来记事者皆然。足下自命为无政府党，与法律相攻，顾于寻常记叙之言，欲以法吏录供为例，岂足下不知文体耶？抑攻击法律者所以自便，而挟持法律者所以御人乎？足下以直供《苏报》主笔让仆，抑足下入狱省视时，已自述行期，仓猝告别，既为逋逃之人，无从捕录，又何隐焉。足下复以简邀邹、龙让仆，抑仆岂愿入网罗，以珠抵鹊者？徒以学社未理，是故守死待之，犹军吏之死城塞，不然，何苦而不自藏匿耶？学社之争，仆与慰丹发之，《革命军》为慰丹所著，仆实序之，事相牵系，不比不行。仆既入狱，非有慰丹为之证明，则《革命军》之罪案，将并于我，是故以大义相招，期与分任，而慰丹亦以大义来赴。使慰丹不为仆事，亦岂欲自入陷阱者？□氏虽以他事见捕，而人证未具，即狱不速决；狱不速决，则仆与苏报馆中三子，将永系于捕署之中，是故亦以简邀□氏。昔吕安、嵇康，辞相引证，吾但知汉土

先贤，有此成例而已，安知所谓落水求伴者哉！文辞记载，自有详略，但说慰丹入狱，义不负心可也；纵自述简邀事，于仆何损，而当深讳其文耶？爱国学社先进诸生，忿于社事，抵慰丹之门，抛砖骂詈，云"章某已入狱，尔不入狱为无耻。"此非足下教之乎？仆于此事，盖亦未及详载也。

足下睚眦报仇，与主父偃、朱买臣辈异世同术，而外以博大之语自文。且前在学社，目中惟有南洋退学生；今在巴黎，目中亦惟有法国留学生。自此而外，四千年四百兆之士民，一切与犬羊同视，党见狭陋，并世无双，而反以心量过狭议人，此固足下所当自省者也。

足下本一洋奴资格，迮而执贽康门，特以势利相缘，非梁启超、陈千秋辈从之求学者比。先生既败，文武道穷，今日言革命，明日言无政府，外獘大阉，忘其雅素，一则曰吾年长，再则曰君年少，是明以革命先辈自居，而反以是议人，何其自戾。足下果年长耶？保耆艾者，不在多言；善箝而口，勿令舐痈，善补而袴，勿令后穿，斯已矣，此亦足下所当自省者也。章炳麟白。

【说明】 此书原载《民报》第二十二号（一九〇八年七月十日），并注曰"原函见《新世纪》四十四号"。《太炎文录》未曾收录。

按：章氏于一九〇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复书驳斥吴敬恒后，吴敬恒施其无赖行径，强辩饰非，《新世纪》四十四号（一九〇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载其《答章炳麟书》，章氏特再撰书申斥。此书刊出后，吴又在《新世纪》六十三号（一九〇八年九月五日出版）刊其《再答章炳麟书》。今将吴敬恒两书，录附于后，并供参考。

附：吴敬恒答章炳麟书

枚叔足下：复我之书已读悉，又在第十九号《民报》中重读之。书中答俞事，除“张鲁望言之”一语外，皆想当然之词，可不辩。仆今但闻张鲁望君，果有其人否？何以屡询留欧同人，无知之者；新从东方来之人，亦不之知，请再明示，并请问明张君，彼又闻诸何人？此次足下复书引他人语，知用“　”号，则《慰丹传》中涉及俞事者，献策为一事，则云“为首逆者，此二人也。”(《驳康书》等五月初出版，五月一月中，上海市上，人人争购；至闰五月初五矣，尚待出诸吴朓袖中。所造情节亦奇。)归告又为一事，则云“天去其疾矣，尔曹静待之。”皆未容随便填写，足下必已知之。献策谓有张君言之矣，归告又何人言之？并希告我。仆愿正告足下，君既年少于我，又自信智识胜我，不应自终于书院课生之结习，与人三日居，稍不如意，即忮很忌刻，随意入人以死无葬身之地之罪名。若复书中所谓“屈膝请安”、“龟鳖同乐”、“为康有为弟子”等，不过可笑之谩骂，足下不自爱惜其笔墨，此可任君之自由；惟献策一事，明明诬以事实，诚如足下所谓有则言有，无则言无，岂能供足下为泄忿之资料者？足下自适己意，不问他人之能受与否，必穿凿附会以实之，则我虽极知同党之不可内讧，又深谅足下近日心绪之恶劣。然以足下之逞

心妄谈如此，终不能不求一最后之解决也。俞君固亦生存，我实泄其见释，彼岂能为我讳者。既□□□君习与斗骨牌为戏，足下即可丐□君亲叩之，何必多引影响之言，作支吾之词哉！足下既重提往事，我今亦请略质数言矣：

癸卯闰五月五日之夜，我陪陈梦坡君避地□氏，足下亦居其楼上，早知逮捕中并有君名，足下呵我等曰："小事扰扰。"明早，又有人流汗走告，劝君引避，君又哂之以鼻。六日之夜，巡捕执票来拘，君与同去，可谓求仁得仁矣，又何怨乎？其时君尚未遇所谓张鲁望君者，则吴敬恒固明明为足下完全无过之同党，足下乃在公堂上供我之名，此载上海各报，千人皆见，因致捕我之信复亟，十五日我始西行。公堂上可供同党，公德已非所顾，岂足下以己度人，故疑他人从同，此愿足下之自省者一也。

《慰丹传》者，即足下借以摈败群之羊，著"表旗"以示天下者，乃不登于当日流行方广之《民报》，仅登诸罕入支那国门之《革命评论》，插"表旗"于幽巷，已可诧矣。吴朓、吴(朏)、吴敬恒皆我，则章绛、章(缁)、章炳麟皆君，假我记君之丑事，将以明示天下，乃书章绛之僻名，我意何居？献策之事果实，罪人实为当日"阳沟"案哄传之吴敬恒，与隐晦之旧名何与？如以为足下行文，有其前例，则足下尝诟康有为矣，何不曰康祖诒？尝诟严复矣，何不曰严宗光？故或者曰："吴朓"云尔者，欲使近数年之人，不急急于知其为谁氏，与登诸《革命评论》之僻报，用意正同。传说乃不易入于尔耳，欺谬之摘发，可以不速，三年五载之间，恨吴朓者有人，鄙吴朓者有人，凡一事在中国

人脑中，有刊本，而又耳熟稍久者，遂未许轻易置辨，又或尔适流离客死，则将来知吴朓之为吴敬恒者，自亦有人，皆将目笑存之，而章先生之术遂售。人言如此，我固不谓其必然，然僻名之与"表旗"，二者不同物，我亦岂能为足下讳，是诚何心乎？章炳麟固自信内外疏狂者，必无人疑其夹带渣滓者，此愿足下之自省者又一也。

曩年自三月迄于闰月，捕人之事六七见，今日传甲乙，明日招乙丙，此足下居爱国社亲见之而熟记之者。我则四次被招，有云官虽名捕矣，我等不见听，君等讲学耳，对曰唯唯，诚讲学也。有云官捕汝等以张园昌言革命，顾口舌罪人，姑再说，对曰：昌言革命于张园者，诚为我也，见释与否，皆彼等意耳，岂我丐之耶？我卧家中，招我者皆彼等以函牍来耳，岂我请之耶？特最后一次，邀往者非西人，为华官，今日为甲者有我，明日为乙丙者有足下等，我则未捕而见释，足下等则隔夜闻程君吉甫先被捕，有五千金取保之说，知息耗甚恶，陈梦坡、邹慰丹二君皆避地，足下意不屑，既静待引拘，复于捕房作书招邹、龙二君，遂留赫然之苏报案于人间，于是我之见释于前夜者，致为足下之口实。于公堂上以《苏报》主笔供之，不见效；复于《慰丹传》以卖友诬之，稍抒其积忿。虽然，吾为足下思之，果何所憾耶？足下为《慰丹传》，则曰"整理学社未竟，坐待捕。"则似欲逃不获耳。于事实又以手札邀邹、龙，使已逸者自投，矛盾若此，爱他人以德耶？抑落水求侣乎？慰丹瘐死，足下遂讳书邀之事实，而曰"闻余被系。"将矜君之名德乎？抑有所中歉乎？足下箴他人以阳沟，诚可感

篆，我闻君子之风，当亦还以相箴，愿君纵极周张，常直勿曲。我辈鄙陋，提过考篮，曾戴黄铜顶以自豪，若他人必且圈豚于入苙，不为葑菲之采，则我辈一丘之貉，虽翘其橐橐之履声，终不能肖文天祥，则足下辄以"逐归愤发言革命。""清铅山知县免官欲报仇。""始随某人，继随某人"等词，轻薄其同党，亦正所以自谑。（有如无谓之诟讥，"康有为之小史"，徒为可笑之谰言；而梁启超之助手，适为调侃之实事也。）岂足下以为革命党亦有如翰林衙门，有前后辈之可叙耶？革命者，不过为道德上人人应为之一事，观足下相遇同辈之词气，直认革命为一种功业。足下自视，则为大革命国之尚可喜、孔有德辈；他人皆洪承畴、钱谦益，应编大革命国《贰臣传》以入之。果尔，是足下即为将来大革命国之汉军贵族。以吾一日长乎尔，愿忠告曰："孺子勿过鄙陋也。"（非如君之常以辈行自矜也，因多吃了三斤草，尽其摇木铎之责任耳！）此愿足下之自省者又一也。

至于关系公益之事，惟愿足下为道理爱惜，万不可以个人之私恨，有所横决，想此义足下尚能知之，故皆略而不答。（下略）四月十七日，吴敬恒白。

吴敬恒再答章炳麟书

枚叔足下：始吾以为足下虽庸妄，未至过自鄙亵，今

与足下书疏三往复，乃甚为悲痛。哀哉！章炳麟之末路。《慰丹传》中语，仆本为足下有想当然之自由，足下不自足，辄更造伪证，重为罪孽，今既见哀于无政府党，谓不当以法律见绳，已矣，恕足下无过；然足下应知无政府时代，但无法律内所定之赏罚，未尝可无法律内所含之是非，愿足下自爱重，好言莠言，此后加意慎之。即如此次外媻日月之见诟，又逞足下之胸臆，虚构故实，一即以抵遮吴朓僻名之辨；一以词成鄙谚，易于扬丑。作伪之劳，用心之险，足下纵不吾爱，岂不自爱，何至于此！章炳麟发之，吴敬恒受之，康有为听之，捷若传电。仆于康有为，可谓素昧平生，足下为如此绝无影响之谰言，不过表明章炳麟工于造诳，岂不为康有为所好笑。有人告我："仆为康有为弟子。"足下在上海时，曾与宋燕生其人者，坐四马路九华楼上，作为有味之快谈，仆真为之喷饭，故前次答书，仅略致调侃，未加深辨，以其无价值也。不谓足下再费许多之幻想，又扯一大名鼎鼎之林旭，用算命先生之拆字诀，配合而成丑秽之故实，藉以为倾排，可悲哉！足下亦已四十见恶之年，粗涉书史，何其不自爱重如此！倘仆又欲问所谓"徒党相告吾师有日月二姬"，徒党究为何人？则必又闹一张鲁望伪名之笑柄，否则仍将谓无政府党不当学法吏之穷诘，如是而已。仆以为足下如欲谩骂，则"龟鳖曳尾，吮痈补袴"，一切秽词，已足泄野蛮之忿恨，何必辄造可笑之事实，为反问之自累。西方对于诳言者，齿之盗贼之下。纵无政府党必能怜君之愚，不加谴责；然足下方二三其德，诋排无政府党，从新崇拜有政府之道

德，则足下必将为世俗实加以盗贼之丑罚，复何面目仰首伸眉，司报馆之撰述乎？故仆甚为足下心痛也。

足下又劈空谓爱国学社诸君，抵慰丹之门，抛砖骂詈，其词则曰："章某已入狱，尔不入狱为无耻。"且加以引语之括号，如此漫空之鬼话，虽平日至亲爱于足下者，亦为之绉眉太息，抵书不欲观。足下愚谬至此，是直欲以善诳为生活，纵不恤道德与是非，独不虑信用一失，必至不齿于人数，欲快意于见仇者耶，抑反为见仇者所快乎？至于足下谓"则《革命军》之罪案，将并集于我。"仆闻此言，毛发俱竦，倒退三匝，吐吾之舌，久不能缩，疑有慰丹之鬼，附君而言。如此，慰丹之死，不惟为公义，并为私交，海內知识慰丹者，自愈敬悼，而足下则自居何等耶？岂曾慑于会审委员之威，或曾拍案怒目相向曰：《革命军》之罪，该监生岂能当此重咎？故足下即援世俗之例，一身将为妻妾之赡养者，故不得不以大义丐友而自活；不然，所谓大义者，何义乎？"吕安、嵇康，词相引证"，不伦不类，援古自恕，故有人激言，好以中国古书为野蛮门面语者，其中绝少良士，其言信乎？已矣！勉之。足下所自留之余地，最可取者，莫如尚有虚侨之气，辄称不欲与人同党，显露其崭然之头角，(此所谓戴角也欤？而不知尚戴毛，一笑。)果能扩而充之，不嗜虚名，不说鬼话，庶尚可进于道乎？已矣！勉之。顺颂撰祉。西七月二十三日，吴敬恒白。

马良请速开国会

（一九〇八年八月十日）

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既奏请速开国会，同时马良复电致宪政编查馆云：

“宪政编查馆王爷中堂军机大人钧鉴：开设国会一事，天下观瞻所系，即中国存亡所关，非宣布最近年限，无以消弭祸乱，维系人心。且事必实行，则改良易；空言预备，则成功难。凡事如斯，岂惟国会？近闻有主张十年、二十年者，灰爱国者之心，长揭竿者之气，需将贼事，时不我留，乞速宣布期限，以三年召集国会，宗社幸甚，生灵幸甚。政闻社总务员马良等谨叩。”

案马良本罗马教神父，身有祖祢且不祀，何有于他人之宗庙？家有五祀且不奉，何有于他人之社稷？易牙蒸子，开方弃父，而云为其主效忠，此识者所以致惑。良且不顾马氏之宗社，乃为政府言曰：宗社幸甚。此违心之言耶？抑已愿背其上帝耶？向见基督教徒，闻入仕为印

官，则将拜谒孔子，辄频蹙。今乃有言宗社幸甚者，有向王大臣而言谨叩者，然后知利禄所在，虽破门以崇他教，伏地以谒贵人，有所不惮。而向之不愿拜谒孔子者，由其资望之不足以拜谒，非得拜谒而不欲也。良之言曰：时不我留。此义云何？以为老夫僻处，马牛羊齿已长矣，复待十年，则将上宾于帝，以享天宫之乐，遂不获享上议院之乐也。纵获再生，惟得为天使，犹不得为人间之议长也。盖闻东方学生之言开国会者，期以三年；满洲政府之言开国会者，期以十年；西方学生之言开国会者，期以二十年。淹速之度，相去绝远，何也？东方学生，以为吾习法政既成，暖暖姝姝，足以自喜，他日习者猥众，则其贱与帖括房行无异，乘其未集，以高材捷足掩袭得之，犹可以取富贵。西方学生，以为吾习法政未成，今富贵为东方学生袭取，吾辈归国以后，特循资除授耳，未能据要津也，故力遏其流，以待明王之梦。一则曰开国会过迟，时不我留；一则曰开国会过速，时不我待。所持不同，其为利禄则一也。马良者，介在东西之间，视荫已不能待五稔，其弁急甚于恒人宜矣。人虽厚貌，眸子不能掩其中情。于式枚老于事，逆知宪政党人鼠窃狗偷，所志不过升斗，故以"中国自有宪法"折之。虽附会，足令夸夫夺气。陈景仁忿戾争之，遂被编管。良不遇谴，亦幸矣！吾所为良忧者，七十岁老秃翁，危如朝露，旦夕将入天宫，若无上帝耶？一瞑不视，亦已矣，若有上帝耶？见其宗社幸甚之言，惧将斥之为老魔，责之为背叛正教。不蒙谴于生前，而或蒙谴于死后，则上议院之乐未得，而又丧其天宫之乐也。

悲夫！

【说明】 本文原为《民报》第二十三号"时评"（一九〇八年八月十日），《太炎文录》未曾收录。

复蒋智由书

（一九〇八年八——九月）

观云先生鉴：两接手书，前书谲谀，不足致辩；今所辩者，在后书。

君所拟五件要求之事，多为补救方来，而非昭雪既往。其处置告密之人，与秘密调查等法，如君所拟处分条件，一云："此次办理不善之人治罪"；二云："告密无实据者，诬告反坐之条适用"。其第一事，似为昭雪既往矣，然办理不善之人，只承上官札饬而行事耳，若非有告密者为之乡导，安有札饬之事？即安有办理不善之事？故今日所欲治者，重在告密之绅衿，轻在办理之官吏。如君所说，但当治此办理不善者也；于告密者，则非所问，斯非包庇政闻社员而何？第二事虽云告密无实据者反坐，然此次密告秋瑾后，浙抚据武义之案以相傅，则非无实据而已编成实据矣，密告者，安能反坐乎？至秘密调查之说，以何法调查乎？出告密者之口，入绍兴府之耳，声音欻往，岂有明征？自府至院，或有电报，而密码疑文，谁能指实？

况此次密电，非若详文禀稿之属，当存档案，非明问浙抚，何从而得之乎？如君所言，问之袁翼，则袁翼固不肯自承也；问浙抚幕张让三，则让三亦有参预密谋之嫌疑也。若自各种方面旁敲侧击，终属比拟推度之辞，不同现量。左袒告密者，则同司[1]，是犹上海各报所登载耳，乌足为据。如是则虽调查，犹不调查也。若夫质问浙抚，诚未得其要领，然与秘密调查同归无效，则宁舍甲而就乙矣。假令二者皆有成效，则秘密调查所得告密者，尚有躲闪之余地，而浙抚所指明者，则虽欲躲闪而不能也。陈、陶诸君所以力主彼说，而君必反对之，盖"秘密调查"之语，不过为告密者预谋其兎窟耳。若君意谓质问浙抚，必无成效可期，故力言"不必"者，试问君所拟之五件，政府与浙抚能听之乎？

生命条件二云："已拿之人，审无实据者释放。凡今回被诬牵连之人，概行释放。"处分条件二云："告密无实据，诬告反坐之条适用。"蛮刑之消除条件一云："不得用天平架等蛮刑。"夫无实据者当释放，诬告者当反坐，清律固然。即天平架等蛮刑，新律亦已不许施用矣。官吏尚不遵法律，而能遵浙会之要求乎？岂浙会之言崇重反过于法律乎？况近日督府杀人，本非以供词定谳。实据有无，一任官吏编造，何从知之？若必要求实据，彼岂不能栽埋军装，伪造票布。自就地正法之制通行各省，凡有疑狱，臬司且不得与知，一任督府与地方官所为而已。纵令政府、浙抚允此数条，亦不过具文耳，何裨于实际乎？

---

(1) 原钞如此。

处分条件一云:“此次办理不善之人治罪。”夫官吏朋比相亲,甚于爱地方之士绅。今告密者,绅士也;办理不善者,官吏也。若彼肯加罪于办理不善之人,何爱于告密者而不吐实;若于告密者且犹隐忍不吐,安肯加罪于办理不善之人?是则陈、陶诸君所要求者,犹易于君所要求也。君平日虑事周详,岂于此区区者而不能较其难易?则君之有意袒护政闻社员,而藉文明浮泛之言,以涂饰门面,更可知矣。

来书云:“足下当日,身未到会,一切不知,既未查明,不应擅入人罪。”又云:“足下将不问真假而断狱乎?抑将问其真假而断狱乎?”夫仆所登者,报章也,非诉讼之词状,非论罪之吏牍也。但据陈、陶诸君亲莅会场者所言,则已有其实证矣。至从此等实证,而更以推究君之用心,此在爰书论罪,诚不得用此诛心之律,而报章议论,则性质本与彼殊,安得以断狱之法,绳登报之法乎?

就前所闻会场实事,与君前后所行之事而综合之,则君之可疑者三:一、秋瑾本曾妄称革命党首,以君为东京机关,君衔秋瑾次骨。而此次昌言立宪,则斯语于君,尤为切肤之害,恶其语,斯不能不恶其人也。(有人述君在会场言:“若为保安地方计,秋瑾当杀。”此语不知实否?)二、袁翼本政闻社员,与君有密切关系也。三、《政闻社章程》,有“儆告政府”一条,并未注明应儆告者限于何事,则革命党之有害于政府者,非不应儆告也。以此三事测君之心,而加推论,然终未尝下武断语,但云“袁、胡告密,不为无因”耳。此所谓盖然之词,而非必然之辞也。

又云："蒋之居心可知。"可知者，谓其可以推知，非如实证知也；亦所谓盖然之词，而非必然之词也。报章既非爰书，推究之辞，又非十成死语，而君以断狱相绳，何其拟不于伦也。若君心果洁白无疵，岂非仆所甚愿。三千日之交游，乍成仇衅，人心倾险，可畏如彼；而仆于六七年中，又负盲不知人之诮，宁不为之梗咽坠心乎？于此知君果非有异志，则仆所馨香祷祝以求之者也。

虽然，是非数行纸墨所能明也。更有说者，君前后二书，处处以法律相绳。夫仆之所定，固越于通行法律。然法律于君大有碍，何也。君言立宪，则不能不自认为清国臣民，既自认为清国臣民，则不得不遵奉清国之法律；虽有他国之律，优于清律十倍，而非清国臣民所当遵奉也。清国之法，结社有刑，则君不当设政闻社也；清国之法，不垂辫发有刑，则君不当割辫也；清国之法，凡有冤狱，许亲属呈求伸理，亦许同乡人公呈请求伸理。至于法律所当治者，无许民间立异，法律所不听者，亦无待民间三令五申，悬如要约。如君所拟五条有云："宗族不得牵连，财产概不得查抄。"然叛逆亲属、父子同产之类，法当受刑；至其财产，亦当籍没，此自法所当治者。又云："不得用天平架等蛮刑。"然新律固已禁此，此则法所不听者，其立异于其所当治者，则为非法；要约于本所不听者，则为越权。君亦不当用此五条要求也。若云吾所奉之法律，本非清国法律，则无解于自认为清国臣民。若云惟伸公理，本不以法律为据者，则君于生命条件一云："招出及告密，必有实据，方可拿捕。"是有革命之实据者，君亦谓应拿

应捕矣。革命党而云应拿应捕，此法律之言乎？抑公理之言乎？故以君而言法律，则自身所为，抵触于清国法律者多矣。以君而言公理，则生命条件第一款，又不合于公理矣。进退失据，如羝羊之触藩，愿君审思可也。章炳麟白。

【说明】 此书撰于一九〇八年八、九月间，录自《章太炎先生与蒋观云先生往来函件》（又名《章蒋关系秋案往来文》），钞本一册，南京图书馆藏。

原钞载有章太炎致蒋智由函一件和蒋智由致章太炎函三件。首为蒋致章函，列述当时收支情况，申说“经济上之困难”；次为蒋致章第二函，再次为章致蒋函，末为蒋致章第三函，均涉及“秋瑾案”事。

一九〇七年七月六日（五月二十六日），光复会员徐锡麟刺杀恩铭，起义安庆，事败死难。十三日（六月初四日），绍兴大通学校被破坏；次日，秋瑾死难。按据陶成章：《浙案纪略》上卷第二节《破坏事实》七《绍兴之难》称：“先是，绍兴士绅既有恨于瑾，又因师期屡改，密谋尽露，于是绅士胡道南等密禀知府贵福，……贵福遂面禀浙抚张曾敭，曾敭使其幕友张让山（章函作“三”）询之。”（第四十七页）又贵福致张曾敭电亦云：“越密。前据胡道南等面称，大通体育会女教员革命党秋瑾及吕凤樵、竺绍康等谋于六月初十日起事……请预防。”（同上书第四十九页）此即函中所述“告密”事。而蒋智由在“秋瑾案”发生后，以为仅系“办理不善”，需“讲一大善后之策”，提出所谓“生命、财产、学校、蛮刑之取除”等办法，发表在其主编的《政论》第一号中。（见该号《绍兴案》，一九〇七年十月七日出版。）实质上是和清政府妥协，反对

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展开，故章氏撰书驳斥。

今将蒋智由致章太炎第二、第三两书辑附于后，并供参考。

附：蒋智由致章炳麟书一

太炎遗老：闻人言，兄有责弟之言，登于某报。弟尚未见。与兄友也，如有责言，必当先以书来，无先登报之理。然则果有此书否乎？如果有之，凡人于所交友之人，必有友谊，弟断不与公反驳。至于弟果有小人之心，与肯为小人之事与否，日久自能知之，今日何必辨？故弟一无辞。公既有此书，敬以此答。率泐，敬问台安。

又，万事必须查究确实，闻一二人之言，不可据以立案。如政府不查究得实而杀人，谓之蛮野。闻书中有云：同乡拟为秋瑾开追悼会，弟阻之。同乡会人具在，弟岂有阻之之说乎？非特弟不阻之，并无有提及为秋瑾开追悼会者，此则同乡会人具在，一经对证，即可水落石出。故弟凡事均不必辨，盖试对证其事，皆无有也。并以附闻。

弟不知其他，苟有利于国家人民之事，则必为之，虽与公主义不同，而此心则固可质之天地鬼神者也。又公义若何不论，而私交存在。今后兄以如何待弟，弟所不问；而弟之待兄，一如曩日。力之不及，则无如何；苟力之所能及，弟必顾全交谊者也。智由顿首。中七月十五日。

蒋智由致章炳麟书二

昨日始得读大著诋弟之书，乃知以此次绍兴同乡会坐弟以罪。夫同乡会为众目昭彰之地，其评断至易。当日弟所提议者，其大纲：一为生命，细目略。必有告密或报案，查无实据，不得拿捕；已拿捕者，即当释放等数条。二为财产，三为学校，四为蛮刑之取除，如不得用天平架等，五为处分办法不善之官吏。弟所主张五条，当日非但演说，又写出问会员之赞成与否，各令举手，此光明正大，人人所皆见者，有何居心之不良乎？当时大多数皆赞成，惟陈、陶诸君三四人（到会者约三十人）不赞成，谓须处置告密之人。余谓今为绍兴全局起见，告密一事果当办，而此外犹有善后之事当办，立一具体之案，决不为专办一事。至告密之事，余又于生命一条之中，已有言之者，细目中如有告密而查无实据者，当坐以诬告及反坐之条者即是也。故其相异之点：

（甲）办保护生命财产学校及除蛮刑处分官吏之事。告密之事，亦当办之，但为全局起见，不当专办一事而止。

（乙）其余之生命财产学校蛮刑官吏等皆不问，但办告密一事。

不过甲乙两种之办法，而弟属甲种，此当日大众之所皆知也。至办告密之事，弟亦主张之，而其办法为：

（甲）从各方面各人种种秘密之调查，得知其人，而后处置之。

（乙）正式的以电报请问浙江巡抚，令其说出姓名。

余主张甲种办法，谓正式问巡抚，则巡抚必不答，事属无益。当日仍以甲乙两种之法求大众之决可，而甲法得多数，主张乙法之人怒而去，此后如何说余之坏话，余不得而知。故其辨别，为专办告密之人，其余一概不问，与告密之人果当办，而其范围，不当以办告密之人而止。又办告密之人，正式的令巡抚说出，与从旁用种种之方法调查，其区别不过如此。足下当日身未到会，一切不知，既未查明，不应擅入人罪，此为一定之理，若此理不守，天下无是非矣。三年前《日本新闻》有诋足下一书（时足下在上海狱中），其中多失实被诬之语，余作一书辨明之。后《日本新闻》又作一书，皆见报，若欲查明，事甚易易。盖当日到会之人，约有三十人故也。凭一二人之言而诬人，文明者果当如是乎？事之眞者自眞，假者自假。今绍兴同乡会显与足下之言大相径庭，不知足下将不问眞假而断狱乎？若果谓不问眞假而可断狱，则先无辞以责政府。余辈有为公理战争之义务，故必须必问[1]，眞假之义必当确定。抑将问眞假而断狱乎？敢问[2]。至其余之事，有失实更多者；如欲问眞假[3]，则余讼必胜，若不问眞假，则此等蛮野之世，不必再辨[4]。

---

①② 原钞如此。

③ 原钞旁有小注"以太多不具陈"。

④ 原钞下附文天祥《零丁洋》诗一首，今不录。

代议然否论

（一九〇八年十月十日）

代议政体者，封建之变相，其上置贵族院，非承封建者弗为也。民主之国虽代以元老，蜕化而形犹在。其在下院，《周礼》有外朝询庶民，虑非家至而人见之也，亦当选其得民者以叩帝阍。春秋卫灵公以伐晋故，遍访工商。讫汉世去封建犹近，故昭帝罢盐铁榷酤，则郡国贤良文学主之，皆略似国会。魏、晋以降，其风始息。至今又千五六百岁，而议者欲逆反古初，合以泰西立宪之制，庸下者且沾沾规日本，不悟彼之去封建近，而我之去封建远。去封建远者，民皆平等；去封建近者，民有贵族黎庶之分。与效立宪而使民有贵族黎庶之分，不如王者一人秉权于上，规模廓落，则苛察不遍行，民犹得以纾其死。盖震旦亦无他长耳。旁侃邻国与我为左右手者，印度以四姓阶级亡，西方诸国，上者藩侯，下者地主，平民皆不得与抗礼。其废君主立总统者，以贫富为名分，若天泽冠履然。彼其与印度兴亡虽异，以阶级限民则同，独震旦脱然免

是。闽、粤间或以族姓分高下，自岭以北则绝。江东有惰民渔户，法皆禁锢不得入仕涂，自秣陵以西则绝。有时骄虏吏奋其威棱，践元元如草芥，然固非世其位者；废官归老，其子姓或暴横乡曲，值长吏骨鲠者，往往能捕治之。若夫使高赀兼并之家，口含天宪，手司民命，则千载未有一二。承五十叶平等之绪风，虽东胡入主，犹不能恣情滑乱，而反除江左世奴之制，为之释回增美，是震旦所以卓绝矣。官吏贼民，宦家武断，与岭南人分宗族大小，是为纯白中著一黑黶。假令彼政府欲除三害，当专以法律为治，而分行政、司法为两涂，诸司法官由明习法令者自相推择为之，咨于政府，不以政府尸其黜陟。夫长吏不奸裁判之权，则无由肆其毒；司法官不由朝命，亦不自豪民选举，则无所阿附以骫其文，如是而民免于陧杌矣。猝然外交有失，至于辱国祸民，民得临时诛其主者，依罗马法无所问，如是而主相不得自擅矣。惰民渔户之俦，肇自有明，所以贬抑胡裔。岭南之葆爱族制，其始亦以分北俚繇，久则泛滥及同种，然皆自法令禁锢成之。若一切许其登录，锐意奖进，则去此如发蒙振落，如是而王道荡平，大圜停水之中，无少有坎窞矣。斯固标举粗犅，未尽委细，然大体不逾是。必欲阘置国会，规设议院，未足佐民，而先丧其平夷之美。若是者，于震旦为封豕，投畀有北，未足以尽其诛。

乃者杨度鸱张，夸夫伸眉延颈，喁喁请开国会，满政府如其请，果刻九年为宪政实行之日。吾且庋阁民族主义，而言代议之不可。夫其横分阶级，既略论如前矣。若

乃选举不可实行，则明之以丁口比例。今计中国本部及新疆、盛京、吉林、黑龙江四省，大校二千四百万方里，为州县千四百，丁口则四万二千万有奇。若如日本选率，十三万人而一议员，则议员当得三千二百人，其数与虎贲等。猱屯麕聚，分曹辩论，謦欬之声，已足以乱人语，故列国议员无有过七百人者。今以七百员计，则是六十万人而选其一也；除去妇女僮儿，入选场者，大率二十万人。愚陋恒民之所属目，本不在学术方略，而在权力过人；以三千人选一人，犹不能得良士，数愈阔疏，则众所周知者，愈在土豪。今举一例，假令二十万人中，有二十贤良与一土豪，区万人为一处而选之，其万人中无土豪者勿论，其适有土豪者，设土豪得票与贤良均，或且增倍，贤良虽不能与土豪抗，其余十九区中犹有贤良，土豪不能尽陵其上也。若以二十万人选一，彼万人所知之贤良，非十九万人所知；而万人所知之土豪，则为十九万人所周知，是贤良终不能与土豪抗也。单选不善，于是与之复选，其人知识虽少高，贤良众，则势分而附从寡，土豪一，则势合而陪属多，其不足相胜亦明矣。是故选举法行，则上品无寒门，而下品无膏粱，名曰国会，实为奸府，徒为有力者傅其羽翼，使得膢腊齐民，甚无谓也。借令通选不足以得材士，又缩衄之而为限选。汉土之限选，若易行矣，不以纳税为齐，而以识字为齐，计汉土识字者，十人而三，则七人无选举之柄，行之若截削省要者，卒之苟偷一时，势不足以经远；强迫教育实行以后，人人识字，又无柰彼何也。

且以满洲政府歆羡金钱，其计必以纳税为权度，然以

纳税定选权者，又不可施于震旦也。案今震旦所有直税，纳诸所在州县者，独地丁漕米与渔芦诸课，岁可得银三千万两，而田赋高下科则，处处不同，山泽亦然。以其地有肥硗，穫有多寡，不容以法令一切等画之耳。然则田赋重者，莫如江浙，亩几输银三钱，漕米可一斗许，亦当銀二钱有奇，合之则亩输銀五钱，池沼场圃山林庐舍之属，视此而杀。上流稍轻减，湖南壤土非垸埆，而亩财输銀三分，又无漕米，山泽廛里几无税矣；辰沅以上，亩财出银七八厘耳。北方诸省，亦大校类是。而新疆与东三省，其陇亩往往未升科；纵升科亦必不能过辰沅。今若以纳税定选权，中国制钱当日本半钱五分之一。日本以直税十圆者得选举权，中国应以直税二圆者得选举权。如是，则江南、浙江之农，有田三亩，纳丁漕方二圆，足以攘臂参选。而上流贵州、湖南诸省，虽有田百五十亩，犹倜倜未入格。北方如陕西、甘肃，益以销铄；而东三省与新疆尤无赖。如是，则选权凑集于江浙，而西北诸省，或空国而无选权也。此何等政体耶？若欲比肩日本，以直税十圆为度齐，今此直税三千万两，无虑当银圆五千万枚，令人人皆有十圆之税，全国得选举权者，亦财五百万人。况其数本出于奇零簉集，税不及十圆者，大氐三分居二，则得权者财百六十六万人耳。而税有倍于十圆者，其选权仍不得倍。如是，又当减其什一，则得权者财百五十万人。夫以四万万人成国，其得选权者只百五十万，是二百六十六人而一，于民权不增涓壤，又安用选举之虚名为？若欲增重直税以繁殖选权者，此不足使繁殖，而适以减削其数。何者？土

田山泽所得本微，复課重税，中人有十圓之税者，且将去而之商贾，以其土鬻之富人；富人虽纳百圆之税，选权不为增多，而纳税十圓者，其人数已减十分之九，选权则愈省啬。夫代议本以伸民权也，而民权顾因之日蹙，令二百六十六人中，必有一人居其维首，其权力与众绝殊，名为损上益下，于下反增之层累，此则名实相戾，不足以绐孩婴之童也。

且所为代议者，欲使增益租赋之令，不自上发，而自下裁定之。今为繁殖选权，则于代议未行之前，先武断以增租赋，于因果又适为颠倒矣。若不以直税为剂，而以一切税课为剂者，民有选权，或稍稍增于往昔。凡课至重者莫如盐，今设盐官凡十处，其商多聚居城市，一处无过三四千家，合之亦增多三四万人耳。其外则茶也、丝也、木也、药材也、瓷器也、缯帛也、锡也、木绵也、布也、谷食也、酒也、皮也、马也、珠玉也、纸也、烟草也，为货殖家最巨者，而倡优亦不得无课，其课率在十圓以上。夫以商人豫选，若无害矣。反而思今之政党，素皆蹑屩赢糧以游异国，参半为贫乏士，虽有温饱者，亦往往不治生产，其纳税十圆者盖寡。夫倡优尚与选，而素知法律，略有政见者，反无尺寸选举之柄，则以纳税定选权者，其匡戾亦已甚矣。况值风教陵替之时，朝贵既惟金钱是务，惟氓庶亦应之于下，谋选举者，或以方术运动，终不如橐中装足以耀人，若是，则虽倡优亦或被选。吾何以知其然耶？向者未有选举，满洲以乡会试为取士大典，然柏葰尝与优童通关节，中式入录矣。今之选举，宁有异是？若以众选不可遂私

者，吾见选举之法尚在，而作奸树伪者相枕藉也。选举法中，孰不曰为选举事而以酒食游览招人者、及受其招者皆有禁锢之刑乎？孰不曰为选举事而赠财物利益于选举人者、及受其赠者皆有禁锢之刑乎？法令滋章，关防滋密，而诡窃者滋多，视之以为恒事；加以复选，则私昵者尤多。况上视贵族院，而知满洲华胄，人人习为倡优，贵族院得容此曹，众议院独不得容此曹耶？尤而效之，则人情亦不为噩异矣。

夫以纳税定选权者，犹汉时以赀算为郎，其点汙甚。且震旦二千岁中，世爵已废，财产皆均分子姓，无以长子相续者矣。一兴选举，又以纳税为限，民之死权者，欲持此以无替。父有一顷之田、一廛之肆，而其税适当选格，分之数子则权去，委之长子则权存，人将以重视荣名，不顾七子均分之美，其滑乱风俗，又将自此兴矣。以纳税定选权者，独有一善，曰租界工商纳税，多在外人辖下，而乡里或无铢两之租，身无选权，则不得齐夷于士伍，容当作其耻心耳。虽然，犹无效。大驵多金，固得以敕选入贵族院，而敕选非有定格。满洲制法，方悬子男之赏以厉贩夫。向者以报效赏京卿，今且以报效入上院，何有于乡里选权哉！是故通选亦失，限选亦失，单选亦失，复选亦失，进之则所选必在豪右，退之则选权堕于一偏。要之代议政体，必不如专制为善。满洲行之非，汉人行之亦非；君主行之非，民主行之亦非。上天下地，日月所临，遗此尘芥腐朽之政，以毒黎庶，使鱼乱于水，兽乱于泽，惴耎之虫，肖翘之物，莫不失其职姓。甚矣哉，酋豪贵族之风，至

于今未沫也！

难者曰：知代议必不可行，而公等昔尝主持共和政体，何其自相斫也？应之曰：昔者吾党以为革命既成，必不容大君世胙，惟建置大总统为无害，而又慕说美利坚人，哀思窈窕，为我好仇，故联想及于共和政体。不悟置大总统则公，举代议士则戾。且未尝推校丁口，与他国相稽也。美之丁口七千有余万，视震旦五不当一；其地三千万方里，视清所据疆土四分而三，视震旦本部以倍。然犹众建联州，各为宪法，其议员亦无等差高下，然后分布得均耳。震旦不分为联州，多选议员，则召喧呶；少选议员，则与豪右。若分为联州耶？此土情势，即又与美轨戾，今之务在乎辑和民族，齐一语言，调度风俗，究宣情志，合之犹惧其隔阂，况剖分之。自宋以降，南人视北人则有异，荆、扬、益三州人，视岭外人则有异。地方自治始萌芽，而湖南、江苏、安徽比邻之民，又且相视若戎狄。滨海通商之地，其民竭羡不均，顾反有贱其宗国而厚爱欧、美人者。若一日分为联州，其逖离则愈甚。而南北美之战争，将亟见于汉土，于民族主义甚反矣。

夫山人诮泽人，则以为蛙黾；泽人诮山人，则以为貁貍。将由老死其乡，无交通之利便故然耶？斯又未谛。合震旦冠带之区，大于英、德、法三国，彼以政俗不同，转相鄙贱，虽交通利便不为损。今若分置联州，其相蔑相陵可知已。抑震旦人之天性，固函阴阳二极，毗阴故更互鄙夷，毗阳故争求和会。在昔魏氏代汉，梁氏代唐，以合为分，以博为伐，则讴歌者有怨志。三国分而晋混一之，南

北分而唐混一之，五季分而宋混一之，江表唐蜀，亦有文思憔杀之人，未闻以灭宗为怨。何者？幸同气之和合为一家，不至以戈矛相见也。故当伏其阴极，轩其阳极，令民族亲如昆弟，宁可以联州促其骚离哉？若就民生主义计之，凡法自上定者，偏于拥护政府；凡法自下定者，偏于拥护富民。今使议院尸其法律，求龙断者，惟恐不周，况肯以土田平均相配。故当时言共和政体者，徒见肤表，不悟其与民族、民生二主义相抵牾也。余固非执守共和政体者，故以为选举总统则是，陈列议院则非。总统之选，非能自庸妄陵猎得之，必其尝任方面与为国务官者，功伐既明，才略既著，然后得有被选资格，故虽以全国人民胪言推举，不至怐瞀而失其伦也。至夫议员则不然。其被选不以成绩，有权力者能以势借结人，大佞取给于口舌，譁众啸群，其言卓荦出畴辈，至行事乃绝异。家有阎妻，又往往以色蛊人，助夫眩惑，既与举者交欢，骋辩未终，令听者魂精颠沛，俄而使其良人上遂矣。美国之法，代议士在乡里，有私罪不得举告，其尊与帝国之君相似。猥鄙则如此，昌披则如彼，震旦尚不欲有一政皇，况欲有数十百议皇耶？他国未有议员时，实验未著，从人心所县揣，谓其必优于昔，今则弊害已章，不能如向日所县拟者。汉土承其末流，琴瑟不调，即改弦而更张之尔，何取刻画以求肖为？吾党之念是者，其趣在恢廓民权，民权不借代议以伸，而反因之扫地。他且弗论。君主之国，有代议则贵贱不相齿；民主之国，有代议则贫富不相齿；横于无阶级中增之阶级，使中国清风素气因以摧伤，虽得宰制全球，犹

弗为也。

夫欲恢廓民权，限制元首，亦多术矣。如余所隐度者，略有数端：代议不可行，而国是必素定，陈之版法，使后昆无得革更。其事云何？总统惟主行政国防，于外交则为代表，他无得与，所以明分局也。司法不为元首陪属，其长官与总统敌体，官府之处分、吏民之狱讼皆主之，虽总统有罪，得逮治罢黜，所以防比周也。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惟小学校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他学校皆独立，长官与总统敌体，所以使民智发越、毋枉执事也。凡制法律，不自政府定之，不自豪右定之，令明习法律者，与通达历史、周知民间利病之士，参伍定之，所以塞附上附下之渐也。法律既定，总统无得改，百官有司，毋得违越，有不守者，人人得诉于法吏，法吏逮而治之，所以戒奸纪也。总统任官，以停年格迁举之，有劳则准则例而超除之，他不得用，官有专门者，毋得更调，不使元首以所好用人也。在官者，非有过失罪状为法吏所报当者，总统不得以意降调，不使元首以所恶黜人也。凡事有总统亲裁者，必与国务官共署而行之，有过则共任之，不使过归于下也。总统与百官行政有过，及溺职受贿诸罪，人人得诉于法吏，法吏征之逮之而治之，所以正过举、塞官邪也。轻谋反之罪，使民不束缚于上也；重谋叛之罪，使民不携贰于国也。有割地卖国诸罪，无公布私行皆殊死，不与寻常过举官邪同也。司法枉桡，其长得治之；长不治，民得请于学官，集法学者共治之，所以牵独断也。凡经费出入，政府岁下其数于民，所以止奸欺也。凡因事加税

者，先令地方官各询其民，民可则行之，否则止之，不以少数制多数也。数处可否相错者，各视其处而行止之，不以多数制少数也。民无罪者，无得逮捕，有则得诉于法吏而治之，所以遏暴滥也。民平时无得举代议士，有外交宣战诸急务，临时得遣人与政府抗议，率县一人，议既定，政府毋得自擅，所以急祸难也。民有集会、言论、出版诸事，除劝告外叛宣说淫秽者，一切无得解散禁止，有则得诉于法吏而治之，所以宣民意也。凡是皆所以抑官吏、伸齐民也。政府造币，惟得用金、银、铜，不得用纸，所以绝虚伪也。凡造币，不得以倍现有之钱者等于一钱，不使钱轻而物益重，中人以下皆破产也。轻盗贼之罪，不厚为富人报贫者也。案治盗贼，不当刻定臧数以论罪之轻重，当计失主所有财产而为之率。譬如家有百万金者，取二十万金犹无害，家有十金者，取三金则病甚。其为害于人有轻重，故罪亦因之为轻重，不当刻定铢两以计罪。亦犹伤人者，毁婴儿一肢，与毁大人一肢同罪，或且加重，不以肉之重量面积计罪也。限袭产之数，不使富者子孙蹑前功以坐大也。田不自耕植者不得有，牧不自驱策者不得有，山林场圃不自树艺者不得有，盐田池井不自煮暴者不得有，旷土不建筑穿治者不得有，不使枭雄拥地以自殖也。官设工场，辜较其所成之直，四分之以为饩廪，使役佣于商人者，穷则有所归也。在官者身及父子皆不得兼营工商，托名于他人者，重其罪，籍其产；身及父子方营工商者，不得入官，不与其借政治以自利也。凡是皆所以抑富强、振贫弱也。夫如是，则君权可制矣，民困可息矣，又奚数数然模效代议惟恐或失为？

难者曰：夫一国而分数总统者，可行于小国，不可行于大国，今以法司学官与总统敌，是即三总统矣，事有稽留则奈何？应之曰：总统不可众建者，以其议论不决也。今法司与学官各视其事，不与行政国防相奸，责有专负，事有专任，非众建之例。借观明代法制，行省有布政、按察二使，政刑分权，无他官以临其上。及满洲常设巡抚一员，为行省长，学政又与巡抚抗礼，政学分权，无他官以临其上，然不闻有废事，何者？各司其局，则无羼羼之忧，亦无所用争执。一省如是，一国易明也。总统主行政国防与代表外交事，他人无从旁掣曳者，斯不应以大小为比。且公知大国之总统不可众建，未知大国不可设议院也。夫小国寡民如雅典，则市民人人得以议政。今欧洲诸国皆方雅典攈大，即揪缩为代议。汉土视英、德、法又大至五六倍，视美利坚，其民则繁庶至五六倍，由是代议又不可行，行之惟有分州以治，又不足县群众而有害于和会。是故监督政官之责，当移于法司，此形势自然也。学术者，故不与政治相丽。夫东胶、虞庠、辟雍、泮宫之制，始自封建时代，礼、乐、射、御，皆为朝廷用，孔、老起，与之格斗，学始移于庶民。自尔历代虽设太学，其术常为民间鄙笑。汉世古文诸师，所与交战者，十四博士。宋世理学诸师，所与交战者，王氏之《三经新义》。综观二千岁间，学在有司者，无不蒸腐殠败，而矫健者常在民间。方技尤厉，张衡、马钧之工艺，华陀、张机之医术，李冶、秦九韶之天元四元，在官者曾未倡导秒末，皆深造创获，卓然称良师。且震旦为学者，常谘谘与官立庠序反对，纵校官有长艺，

犹刳心致死以争之，此则一统久长，民不系于九两之效也。知学校为使人求是，非为使人致用，则学官与政官分。然犹建长理之，分帑赋之，不纯任民间自为者，以草茅设学常少数，而资财又不足以取济，或并于译人大驵之手，则国华谦而贱民兴，是故以此扶翼，不以此为本株。独以击蒙讲武之学隶政官者，由强迫教育为在官所有事，申李法，定约束，其事固专为致用，非执权者又莫能行也。

难者曰：停年格者，徒以岁月期会困人，不能得方略士，是材者不得起，而下资获遂也。应之曰：为治固当循绳墨，无所用贤，且有劳者得超除，溺职者受罢黜，材者固无患其沈滞，虽下资亦自见汵汰矣。若夫跅弛异众之材，虑非平日所能逆睹。若使元首以知人善任为期，所得无过纵横之士。夫年劳可质验，而怀材不可豫知，其魄兆独在言词捷给而已。以笔札唇舌自用者，率多援引声气，更相题榜，嫉人之是，用己之非；下者箪笥馈遗，以结人欢，其称誉乃日起。若主者无他肠，则误用佞人耳。若有他肠，且假借尚贤之名，为顿置私人地。内观清政，部选重时，虽权在胥徒，犹不能以意颠倒。今者部选之权愈轻，而督抚用人愈缪，借有一二廉直者，以不受赂遗自高，内则引用故旧，外则交通关节，犹处处见告。外观美政，总统更移，自台阁以至抱案之吏，无不随之更调，此其朋党比周，为蠹已甚。故令贪夫盈于朝列，饕餮贡于大庭，犹曰美政文明，斯则戾矣。要之国有政党，非直政事多垢黩，而士大夫之节行亦衰，直令政府转为女闾，国事夷于秘戏，此盖法家所深甚者。彼停年格，直不足以得高材

耳。高材固不常有，偶失一二亦何害。若乃任意举措，其失人且百倍此矣。

难者曰：平时不选举议员者，虑其任豪右也，有外交宣战诸急务，而临时得遣人与政府抗议，顾不患其举豪右耶？应之曰：所为选举者，欲其伸民权、宣民志也，庶事多端，或中或否，民不能豫揣而授其意于选人。选人一朝登王路，坐而论道，惟以发抒党见为期，不以发抒民意为期。乃及工商诸政，则未有不徇私自环者。欧洲诸国，中选者亦有社会民主党矣。要之豪右据其多数，众寡不当则不胜。故议院者，民之仇，非民之友。今以外交宣战诸急务临时遣人，既无他端杂事，民得直以其意授之，所遣者本无政党题号，亦非以是为荣名，而得摩近仕宦。若己意与舆人反，则辞谢不行可也，行者必与民同意之士。观近世郡县有冤狱，民辄公选一人，使讼于都察院，所选者率非豪右，亦无逆民意而自擅者，以其事有期验，不容以意诡更，诡更之则为舆人所死，故奉使能致其命。以是为类例，其与平时选举议员，利害至不侔矣。

难者曰：因事加税，使地方官各询其民，此亦丛脞甚也。数处可否相错，乃各视其处而行止之，此则全国之税则，又失整齐矣。应之曰：凡以州部集民，不为丛脞。夫至众者莫如农圃，汉世街弹之制，集县民而致之，今虽不可试行，借观农人之纳丁漕，分期赴县，率十余日而竣，此据自投匮自上仓言，若包征包粮者则与此异。今若访问农民，亦自州县询之，夫何丛脞之有？其工商则多屯聚都会，而数亦减于农，司与府问之足矣，必不如头会箕敛之碎也。

今夫土膏肥瘠，川渠清浊，所在不同，故田赋必不能量以一概。往者赫德为清政府谋，令田一亩赋二百制钱，此由外人素未习东土事，故以彼国法制相衡，其实厚薄异齐，不得一往刻定，所可定者，曰顷亩长短不容彼此异耳。其赋则相地衺征，自有差等，故或有加于此而不得加于彼。纵令农学遍行，或准古区田法，隤高堙卑，舄卤化而膏泽，然以气有舒惨，收获犹不可齐。夫本不可齐者，则不齐亦无害矣。工商转贩，一物而远近贵贱不同，故亦相地而差赋税，此宁可以一剪刀剂之。管子有言：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万家之都，不可平以准。盖据有广土者，不得无是见也。夫分区而询民，与分区而选举，其繁碎相若。然远西诸国，取彼不取此者，其议院始牙糵，本为征税，而税实出于地主。既有地主，一人足以摄千万人，是故就此访之，不必与无税之佃客议也。中国土田，农圃自主者大半，逮地权平均以后，全国无地主矣。岂有一人足以表六十万人，七百人足以表四万万人者？其外征税及商贾之事，几及百端，而议员未能悉备，又可冒昧许诺耶？若谓百事有统计表，不出户牖，足以坐识万方；此虽官吏亦能知之，又何赖于议员也。且今之议员，名为代表全国，非为其一邑一村，而震旦税则，全国必不能同。如欲增税，此省此道则胜之，彼省彼道则弗胜。人情素隔，而令其更互为谋，无异使夔谋蚿，使鹿谋鳅也。是故就赋税计，函胡以询议员，不如分画以询齐民也。

如上所述，此政体者，谓之共和，斯谛实之共和矣；谓之专制，亦奇觚之专制矣。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

足讳，任他人与之称号耳。大抵建国设官，惟卫民之故，期于使民平夷安隐，不期于代议。若舍代议政体无可使其民平夷安隐者，吾亦将摭取之。今代议则反失是，不代议则犹有术以得是，斯掉头长往矣！名者，实之宾也，吾汉族诸昆弟将为宾乎！

【说明】 本文原载《民报》第二十四号（一九〇八年十月十日），另附《虏宪废疾》六条，《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辑入《代议然否论》而删去附篇。

清美同盟之利病

（一九〇八年十月十日）

清、美同盟，是不啻中、美同盟也。清政府内不怿于日本，而主之者为袁世凯，袁世凯所任者为唐绍仪，欲借极东之美以掣日本。美人亦惎日本久，期相掎角，以挠其权。卒以斡旋枢纽为原动力者，尚非清政府，而为朝鲜太上皇。朝鲜太上皇，自比威廉，世人皆悼笑以为愚妄，其实不然。太上皇与美国教师密谋，求为游说列强，认朝鲜为自主国，议虽无效，然美国人常阴助朝鲜，其志士违难者，多以极东为逋逃薮。陈义慷慨，贞固不挠，高歌喝，猥弧蚀，精诚极，白虹生，虽殊色者，亦抚剑相与和。故美人排日本人而不排朝鲜人，至斯的温被杀事，又且挺缓其狱，数月不决，是可谓有提携寡弱之盛心者。然人心公私白黑常参半，而持国论者弥甚。以助朝鲜排日本之心，与为白种排黄人之心，盘互错杂其间。黄人惟日本最盛，中国与朝鲜则无赖，故所排常在盛强之国。其阳与中国交欢者，外以维持东亚为名，而阴谋黠默，与日本亦相等。夫朝鲜

太上皇一动而使日、露战，再动而使清、美盟，东方变故，常自朝鲜太上皇制之，其自比威廉，不诬也。今以利害相校，则朝鲜之引美自救为无害，而中国之与美同盟为有害。朝鲜者，地处东北，介日、露之间，纵美人有野心，以其齿牙交捽，或未至为非律宾。借为非律宾，亦与今日等耳。

且夫堂上不粪，则郊草不芸；鹿之将死，不择美荫，事处危急，不可以待五稔，非引美自救则无术，而中国有异是。日本之骄矜自肆，非吾良友也。其在亚洲，东则蔽遮美氛，西使欧洲群丑欲有所搏噬于东方者，不得不稍制敛，若楹之支屋也，虽恶之而知其不可去，欧、美所以深惎日本在是，亚洲所以犹赖日本在是。今者中、美同盟，美之兵力，尚弗能与日本雁行，清政府则益不相値，诚不足以挠日本。然日本与极北战争而后，民贫财匮久矣，所借以灌输者惟商贩，其品物亦裁输及汉土，适会广东有抵制东货事，美人间之，欲利用其角目相视之情，使美之商品益流衍，而日本之贸易以衰，所以制日本者，独在此耳。

日本绌，则民益不聊其生，而军实无所取，白人乃得回旋驰骋于亚洲。故中、美同盟，非美一国之便，而为白种所同便。其使美人独为权首者，以素未蚕食中国尺寸地；及联军攻破北京之役，且返其岁币以示亲昵，故感情为易动。其术正而谲，其情岂弟而倾险，其形势若刓钝而有锋芒。盖中国与日本交，既鲜利矣。交美则汉人亦害，满人亦害，而亚洲悉有害。然则汉人固排满也，都计之，满人与白人孰远近？亚洲人固忌日本之骄矜也，都计之，

日本人与白人孰亲疏？令诸亡国各得保其种姓，自植政府，分区有截，则汉之视满洲犹邻好，亚洲诸国之视日本犹肺府，固远非白人比。今纵未能，满之制汉，日本之制全亚，力固不任，令白人横于东土，则亚洲悉为乌莀之续耳。乌莀者，西域国名，旧为王者苑囿，以是得名乌莀。乌莀译言苑也。

或曰：中、美盟，则华侨入境之禁可解；日本盛，则将为英人镇制印度；是为亚洲与中国计，其利害在彼不在此。应之曰：美，分治之国也，联邦与中央政府不相比，纵中央政府壹意与中国交欢，滨太平洋诸洲，其闭距华工当自若，何禁之可解。日本与英订攻守同盟之约，涉及印度、西藏间事，是时印度人未倡义，英人所以期望日本者，固不为印度内变，特以掌拒露人耳。乃者梵土英灵，扶义俶傥而起，英政益棼。日本报章或论之曰："我日本不可不为同盟镇制叛人。"是特夸者孟浪之言，未尝寻其中央〔失〕。若印度人与英人鏖战，英势未去，固不容假力于日本，借日本以平领土之内乱，其辱国则已甚。若印度人果胜英人，长幼既定，日本虽欲为英援手，非空国出师不可。夫民贫财匮既如彼，纵今日复欲与露人战，民且弗顺，况为英人驱除哉？向日与露西亚战事，本乎士民之敌忾心，且名义既近正，战而胜又斥土至广，为国家利，故民皆鳙臂陌头而作，事定已，不能无怨讟矣。今为英人镇制印度人，其名义至不正也，民又素无恨于印度，事定又不足以取利，而空费财露骨，为白人张其朋势。问上，上亦勿为；问下，下亦勿愿；其不能见诸行事至明也。然则交欢美人

无益，不挠日本无损，亦明也。

抑吾又于社会文化之事，而得其利害之率焉。今清政府与美人同盟，不自知为白种作机关木人，而反以为得计；同盟果就，则醉心于美洲文化愈甚，其资遣学子将愈多。吾观盛年之士，赢粮而趣日本，学少就，则言革命者参居一，其庳者或迷眩于君主宪政，以藩王室、尊贵族为的，其猥贱甚；转而趣美，或以伸张民权为帜，精气入而粗秽除，庶将廓然寤晓，而革命之风愈倞，未可知也。

虽然，察其因果，校其情伪，于期望则不相应，于利害则不足以相庚偿。何者？日本蔬食紵衣之国耳。风俗朴质，使人无歆羡于目前，故就学日本者，虽下之至于营求立宪，以佞东胡，而市权媚外之子，卒不出于其间，又且未忘国学，种性未弛，坚贞有为之材，往往间出，以趣光复军之戏下。今美则膏粱国也，其社会趣于拜金，皮相其政治则最优，深察其风教则最劣。游学者，血气未定，睹其狡好，则荧魂为之震荡；仪其富厚，而精魄为之变移；欲令神襟明悟，以就学业，固已难矣。借或成就，如曾国藩所遣游学美洲者，耽乐于黄金藏，忘其故土，就室家长子孙者相继也。借或成而归国，久濡染于垢俗，怀龌龊嗜利之心，以入官则贪且鄙。盖美之官僚臧秽甚，清之官僚亦臧秽甚，两臧秽相得则愈炽。向者营境外之交，计道路、籍地藏而授券于外人者，率在此曹，其病国莫与二焉。知识又不与东方比。往时伍廷芳在律例馆，欲尽改清律如美律，日本法家被佣为顾问者笑之。其造商律，令合资有限公司，借本无限，破产有限，以奖励诳豫之徒，中外皆大哗。

以专习法律者定律，纯与人情违戾，以中国人视中国情状，其知识又尚在日本人下。容闳尝以同知充公使，既归，曾国藩欲授以苏松太道，闳曰："公使者代表全国，吾尝充公使，肯左迁为苏松太道耶?"盖犹不知道与同知之尊卑也。及参唐才常军事，或言会党不可恃，闳曰："会党尊尚自由，非端人孰为此?"其人退而笑曰："吾即会党尔，知其情深，奈何以空言相抵。"其暗于中国事情如此。今之游学者，出身汉土，其昏暗或不如闳、廷芳甚。要之学识素短，无虑宪比校者。学于一国，则惟一国为是，未尝持脉察病，揣色写声，而以一方处治者，所在皆然。

夫专误〔谈〕政治则已矣，纵不入官，其持论率僻违无类，挟大同博爱之浮言，以乱名实，使人为倡妇，使人为贾竖，卑谄营利，膜拜外人，不惮于屈身辱国，实自此始。盖外人所惎者，莫黄人自觉若，而欲绝其种性，必先废其国学，是乃所危心疾首、寤寐反侧以求之者也。始宣教师咻之，犹不见听，适会游学西方之士，中其莠言，借科学不如西方之名以为间，谓一切礼俗文史皆可废，一夫狂舞蹈，万众搴裳蹑屣而效之。今已糜烂不可收拾，外人之志已得矣，则犹以为未足。美之返岁币也，以助中国兴学为辞，俾倪山西，知藏矿最博奥，乃令宣教师往主学校，卒令山西大学堂专崇欧语，几有不识汉文者，以是为鼓铸汉奸之长策，而宝藏可任取求矣。今美与清政府同盟，游学者且加厉，其成效百山西，其获利万岁币，异日求学子如今之宪党者且不可得，何有于革命?

夫如是，则学僮终不可以适欧、美耶? 曰：学者非专

为知识，其于德育尤重。是故建置学校，不宜于市井嬈扰之区，而却就郊野者，不以沈浊之气、鄙吝之态乱之也。今中国、日本则郊野，而欧、美则市井，就学市井，于德育固不适；若其为智育计，去国愈远，故土之情状亦愈蔽。故科学知识少高，而社会知识则益堕。以是推求，欧、美固非就学之地，然而有不得已者，独可使志节坚定、国学有素者就之，不然，能朴固如朝鲜人者就之耳。

鸣呼！金在炉捶，从其方圆，师哉师哉，桐子之命，可不慎欤？今妄遣十百少年，雉兎相随，以趣白国，斯有百害无一利也。夫以国势言则如彼，以学术文化言则如此。中、美同盟之利病，亦大可见矣，毋以美人之助朝鲜而视为亚洲人继父也。

【说明】 本文原为《民报》第二十四号"时评"（一九〇八年十月十日），《太炎文录》未曾收录。

政闻社解散之实情

（一九〇八年十月十日）

自陈景仁上书请开国会，清政府斥以莠民譸张为幻，又令天下遍索社夥，令两江总督具疏马良、蒋智由、徐公勉、黄可权等行事以告。侯选道员前罗马教神父马良诚惶诚恐稽首顿首奉诏解散政闻社员。世多议马良无节操，余以《政论》所登马良演说稽之[1]，其言曰：

“吾侪以求神我之愉快故而组织此政闻社，吾侪以遵良知之命令故而组织此政闻社。

“人人各有其所信之主义，所信之主义适相同者，乃集合而为一党，谁信之，吾之良知信之也。故政党者，多数政党员之良知之结晶体也，人而不自服从其良知，时曰非人。”

今果不自服从良知而服从清廷上谕，弃其人格，自比于贞虫蜚鸟，意马良未至此。察其情实，盖康有为、徐勤

---

(1) 按：马良演说辞：《政党之必要及其责任》，原载《政论》第三号，见本卷《驳神我宪政说》篇“附录”。

之徒，诚譸张为幻者也。何以明之？陈景仁本非法部主事，清廷遍稽官册，而不得其姓名，其为康有为、徐勤所诡托可知。且陈景仁上书以前，康有为已遍发檄文，传入腹地，以改号撤帘迁都为号。夫请开国会者，亦欲清政府之听从耳。今先讼言改大清国为中华国，以触胡人之怒，讼言撤帘以触老妪之怒，讼言迁都金陵，示将拥岑春煊为相国，使百官总己以听，以触袁世凯之怒。是使请开国会书有驳斥而无听从也。

政闻社总理为马良，康有为、徐勤既不便署名电奏，而马良实居道员，有闻于朝野。今不以马良署名，而以陈景仁署名。陈景仁本非法部主事，又诡托之，其奸易破。且使清政府明知其自南洋来，则无不瞋目切齿者，是亦使请开国会书有驳斥而无听从也。康有为、徐勤，岂戆愚至是哉！

盖自杨度得志以还，齮龁康、梁久矣，而政闻社员中，自蒋智由而外，多与杨度无怨，且有素通款曲者。宪政党本以势利成团体，其良知亦惟在势利，谁不就杨度之菀而去康党之枯者。是故政闻社员，欲离此结晶体而别附他结晶体者已众，康有为、梁启超亦束手无奈之何。铤而走险，出奇计以致其必败，曰：置之死地而后生，与之亡地而后存。是故不询于马良，而先擅发檄文，后又诡托法部主事以电奏。夫固知其必遭驳斥，必被查拿，且幸其有是也。查拿之谕下，则政闻社员之为康党，皆已有名章糊录在丹书，必不能公附杨度，虽杨度亦不敢收恤之，如是而后团体可固、叛降可绝也。

盖康有为之遇人，多用此术。往者丘炜萲为康有为效命，破家产数十巨万，而康有为悉以其财入囊橐，求衣带诏又不得。丘炜萲自悔为其所绐，奋欲投诚以自解免。有为则露版上书，陈举人丘炜萲有保皇劳绩，请加奖擢，亦欲使国中人人知丘炜萲为保皇党，则反顾之路绝耳。今于政闻社员，亦用此术钤制之，所谓"梁山泊政略"者，其则不远，马良亦心知之。然后知昔之组织政闻社，非良知之命令，乃天魔所诱惑矣。

康有为、徐勤欲因查拿之谕，以锢政闻社员；而政闻社员亦因查拿之谕，以解散政闻社而雪康党之名。马良因民所欲，公布解散政闻社状，一施一报，理有宜然。世之沾沾訾议马良者，盖未审其苦心也。虽然，吾犹叹康有为、徐勤之愚尔，丘炜萲与政闻社员阅世稍深，非梁山泊草泽之徒可以机权胁制者比，而康有为、徐勤，犹以梁山泊之术遇之，夫安往而不败也。

【说明】 本文原为《民报》第二十四号"时评"（一九〇八年十月十日），《太炎文录》未曾收录。

中国之川喜多大尉袁树勋

（一九〇八年十月十日）

湖南无赖子山东巡抚袁树勋电商外务部严禁人民争矿，其略曰：

“前因东省人民散布传单，集会演说，拟保津浦铁路附近矿产，曾将情形电达在案，一面饬令在省官绅婉为开导，以期早日解散。讵两月以来，更变本加厉，牵及五处矿务，议将合同作废。细查发起者，乃知为东人陈干、周树标等，中以各处学堂毕业生为多，名为热心公益，其实无理取闹，禁之不听，犹复一倡百和，开具理由，斤斤辩论，谓五处矿务，系商务性质，宜用国际私法，不当用国际公法；佥押宜用商人名，不当用山东矿政局总办名；勘矿年限，不应展至二年；指定矿地，不应每块三十方里。种种悖理违法，非议废不可。又谓订合同时，东省人民，全未预闻，断不承认等语。窃思五处矿务，发端于光绪二十五年及二十七年，联军在京，德人乘机要挟，促订草章，

当未佥押。至三十三年，经杨升院咨商大部，改订合同，挽救已属不少，其先后为难情形，早在大部洞鉴之中，并经杨升院奏咨有案。今春商部颁发矿务新章，又经吴署院援照正章内第三章第八款咨明商部请示办法，旋准咨复，东省华洋各矿，如章程合同，均系奏准之案，自可照旧办理等因。现在该公司合同佥字以及一年勘矿之期，尚未逾限，无故议废，将何致词？且中国办事，向由官家主持，民人本无议政之责，如该生等所云，乃立宪国办法，非预备立宪国所可比拟也。树勋初念该生等未谙情势，但能解散，即可毋庸置议，不意该生等昨呈节略，反谓如不能废，当限制开矿抵制德货以为后盾。若置之不理，则嫌疑从生，保无酿成不稳举动等语。窃思该生等如果热心桑梓，何不争于合同未经佥押以前，而于此时逞无意识之行为，悍然不顾，其居心叵测，难保非借端摇惑、扰乱治安起见，如不及时严禁，万一暴动，必至酿成交涉损失国权而后止。查民政部章程，凡学堂教习学生集会结社，均干例禁，现已将此情形电达山东同乡京官，并严谕官绅切实查禁。倘再抗不解散，惟有执法以绳，惩一儆百，以息后患。特此电陈，伏乞钧鉴！”

案东人所与袁树勋抗议者，其词质而有伦，然亦思满洲政府，何政府也？法律之文，不足以挠之；恫愒之语，不足以震之；徒以空言相抵，袁树勋亦知其情矣。若果有实力者，清政府虽许德人指买矿地，未许德人略有矿地，矿

地尚为民间所有，德人固不能盗取也。然则要请〔清〕政府使废合同，孰如要山东诸业主使不得卖矿地。所为抗议者，惧民间相约不卖，则德人又且要求清政府，而清政府复为德人划策以浚民，虽以兵继之可也。是故宛转陈乞者，期以绝其根株，其心则诚苦矣。袁树勋言：中国办事，向由官家主持，民人本无议政之责。是固遵率旧章，非树勋所倡议。虽然，政自在官，地自在民，民人本无议政之责，政府亦本无胁迫民人卖地之权。若清政府能昭示大信，明著权限以号于民曰：尔自民人，我自政府，无相干也。我政府许德人指买矿地，尔无得议之；尔民人坚不向德人卖地，我无得胁之。如是，虽立合同，亦无损耳。今所以抗辩无已者，以民人无得议政府之治令，而政府得动民人之私产。不从，则与德人同谋，屠其人、籍其地而后止。故执词者不得不先自竞。今者解散有渐矣，山东士民，当以何术楮柱？独有要结齐民，坚不鬻地为可。不然，则限制开矿，抵制德货耳。而清政府必且遮禁之，格杀之。继自今，愿尔山东士民，为义和团，无为衍圣公；衍圣公曾以军乐迎德皇画像至其第。为林清、王伦，无为吕海寰。北出则拊建州之背，西迤则断燕京之喉，东下则捣胶州之脊，事不就，则尽六千万人归魂于泰山蒿里，庶其为邹鲁之遗民、管葛之令子，徒扼臂怒目无为也。

抑吾闻之，清政府近方模拟日本，宪法刑律皆雕彤篆刻以求其肖。日本法：国内土田，不得以尺寸鬻与外人。清政府独不敢效是，彼昏不知，亦可怪也。

氛雾蔽蒙，狐貍叫啸，袁树勋方横于山东，而盛宣怀

又适奉头鼠窜以归日本。彼日本川喜多大尉，为私鬻军书于袁世凯，日本宪兵就而铳杀之，其士民群称为卖国奴，谓其死不足赎。袁树勋、盛宣怀所为，非特川喜多也，如清政府之不能用铳何！

【说明】 本文原为《民报》第二十四号“时评”（一九〇八年十月十日），《太炎文录》未曾收录。

为民报封禁事移让日本内务大臣平田东助书一——三

一

（一九〇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内务大臣鉴：《民报简章》六大主义，前经贵内务省认可，今未将此项保证退还，突令不许登载与此《简章》同一主义之事项，本编辑人兼发行人不能承认，特将此纸缴还。贵内务省如以扰害秩序为嫌，任贵内务省下令驱逐，退出日本国境可也。《民报》编辑人兼发行人章炳麟白。十月二十一日。

二

（一九〇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内务大臣鉴：前封还命令书，经贵内务省饬令警视厅传告牛込警署，令其恳切晓谕以复受命令书为期。警署本奉命之地，署长特备役之人，权不己操，本编辑人兼发行人勿庸与之撑拒，当将命令书仍旧携归。

然今有为贵大臣告者，前经牛込警察署长当面告言:“此事关于外交，不关法律。”本编辑人兼发行人早闻北京传说，据云:“唐绍仪此次途经日本，将以清、美同盟之威胁日本，又以间岛领土之权、抚顺炭矿之权、新法铁道之权啗日本。”今与牛込警察署长之言相校，毫厘不爽。本编辑人兼发行人私谓贵国自有历史以来，以刚毅悃明称于天下，必不茹柔吐刚，以纤毫之利、圭撮之害，而俯首以就满洲政府之羁轭，以挠邻国士民之气。往者，朱之瑜以光复中原不胜，违难贵国，贵国士大夫至今称之。本报立论，犹朱之瑜之志也，顾岂前后异哉!

贵国天性尊君亲上，世笃忠贞，若以此推爱于满洲政府，虽名实相违，而言出由衷，犹为世所共谅。若以威吓利啗之故，而以《民报》之革命宗旨与满洲政府所赠利益交换，本编辑人兼发行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贵内务省既勒令本报改变《简章》，请以新假定六大主义疏写呈览:

一、灭尽世界立宪国;

二、破尽世界伪平和;

三、以中华帝国统一东亚;

四、以专制政府攘逐蛮夷;

五、不与兽性民联合;

六、不求卖淫国赞成。(以上系假定语)

若作是说，语语与现在《简章》异撰，或且反对，未知贵大臣允许否也?

呜呼!圜舆广大，何所无托身之地，黄鹄一举，识天地之圆方。本报刊行，岂必局在东海。必若操之过蹙，即

人人能作唐绍仪耳！吾党人在美国者，已明言中、美国民连合，变本加厉，或亦本报所有事。自兹以后，更不烦以“同文同种”酬酢之言，辱我炎、黄遗胄矣。《民报》编辑人兼发行人章炳麟白。十月二十三日。

三

（一九〇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内务大臣鉴：二十三日寄去一书，次日即有铁道技师高桥孝之助来作说客。本编辑人兼发行人观其辞气举止，知于政界有瓜葛者。祸福存亡之念，不以撄心久矣，岂此奢阔之言，而足挠乱神听？独有为贵大臣告者，台阁之上，政由己出，龙行虎步，高下在心，欲将《民报》永远禁止，则直令永远禁止耳。今既不敢居严厉之名，而利权所在，又不能不虚与委蛇，由是舍永远禁止之名，而取永远禁止之实，迫胁《民报》，使变其革命宗旨，为此者亦内疚神明，惟欲深秘其事，并贵国诸报章不令记载，以激外人之姗笑；复遣游说之徒，风示意旨；为长吏者，当丸皮如是耶？本编辑人兼发行人虽一介草茅，素不受权术笼络。若贵大臣有意督过之，封禁驱逐，惟命是听，幸勿令纵横之士腾其游说也。《民报》编辑人兼发行人章炳麟白。十月二十六日。

【说明】 以上三书，录自《新世纪》第七十九号，一九〇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法国巴黎出版。

一九〇八年十月十九日日本政府徇“清政府之请”，下令封禁《民报》。据《新世纪》同期《报告〈民报〉二十四号停止情形》(文末署名为“中国革命党同白”)称：

“敬启者：《民报》二十四号于阳历十月初十日出版，乃日本政府受唐绍仪运动，始则胁以清、米同盟之威，继则啖以间岛领土、抚顺烟台煤矿、新法铁道之利，遂令日本政府俯首帖耳，于十月十九日，突发命令书，收没本期《民报》，并其所曾经认可之《民报简章》，亦永禁登载同一主旨之文字。其书如左：

《民报》发行人兼编辑人章炳麟：

明治四十一年(按即一九〇八年)十月十日发行《民报》第二十四号，有人告发，违背新闻纸案例第三十三条，遂依同案例之第二十三条，停止其发卖颁布。且记事如《革命之心理》(按为汤增壁撰，笔名伯夔)，《本社简章》有与同一主旨事项之记载，皆被停止。合将内务大臣命令相达如右。

明治四十一年十月十九日，警视总监龟井英三郎。

“此书发时，《民报》编辑人章炳麟适往镰仓，至二十日晚，归至东京，即在警署得此命令。按《革命之心理》一篇，无一语与彼三十三条相犯，所谓败坏风俗者无有也，所谓扰害秩序者无有也。至《民报简章》，自开办时已经彼内务省认可，前日不禁而今禁之，尤与法律背驰。编辑人章炳麟向牛込警察署长诘问理由，警察署长答曰：‘此事关于外交，不关法律。’……时人或以避其锋锐，渐与转圜为说，编辑人章炳麟知日本政府不可信任，乃封还命令书，且致书于内务大臣平田东助(按即上录第一书)。……

“此书去后，内务省复饬警视厅谕牛込警察署长，令其

恳切晓谕，以复受命令书为期。二十三日，编辑人章炳麟诣警察署，署长以原件示之。章炳麟曰：'吾始终不受此命令书，任君上告长官，言我反抗命令可也。'警察署长答曰：'不受亦不得为反抗命令，以前此已亲手接取。'故章炳麟知封还无益，乃复致书内务大臣(按即上录第二书)……

"此书去后，二十四日即有铁道技师高桥孝之助来作说客，先以买报为名，伪若不知《民报》沒收之事者。编辑人章炳麟以命令书示之，高桥应声答曰：'此非日本政府意，乃唐绍仪以间岛、抚顺、新法之利为饵，故外交政策，不得不如此耳。'章炳麟心知其所从来，直答曰：'贵国政府所为，非官吏之行为，乃倡妓之行为，谁能信倡妓无贰志乎？'高桥曰：'岂但倡妓，直盗贼耳，凡政治家不得不然(胡说——原注)。且日本为新造之国，外交方针，仓皇无定，亦当见谅。……'

"二十五日，同人集议善后之策，决定迁移报社至他国境界；且于迁移之前，先当筹款起诉，无论胜负，要之期于糜碎而止。次日，编辑人章炳麟又移让内务大臣（按即上录第三书)……"

此后，汪精卫又秘密刊行《民报》第二十五号、第二十六号，但为章太炎所反对，称之为"伪民报"。又本书卷一所附《章太炎先生答问》，述及章氏当时在日本警庭的斗争情况，读者可以参看。

原　儒

（一九〇九年十一月二日）

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说文》。太史公《儒林列传》曰：秦之季世坑术士，而世谓之坑儒。司马相如言：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汉书·司马相如传》语，《史记》儒作传误。赵太子悝亦语庄子曰：夫子必儒服而见王，事必大逆。见[1]《庄子·说剑篇》。此虽道家方士言儒也。《盐铁论》曰：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湣王矜功不休，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论儒》。王充作[2]《儒增》、《道虚》、《谈天》、《说日》是应，举儒书所称者，有鲁般刻鸢，由基中杨，女娲炼石，共工触柱，觟𧣾治狱，屈轶指佞，黄帝骑龙，淮南王犬吠天上，鸡鸣云中，李广射寝石、矢没羽，荆轲以匕首擿秦王，中铜柱入

(1) “见”字，《国故论衡》无。

(2) “作”字，《国故论衡》无。

尺[1]。日中有三足乌，月中有兔蟾蜍。是诸名籍，道、墨、名、法[2]、阴阳、神仙之伦，旁有杂家所记，列传所录，一谓之儒，明其皆公族。

太古始有儒[3]，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何以明之？鸟知天将雨者曰鹬，《说文》。舞旱暵者以为衣冠，《释鸟》，翠鹬，是鹬即翠。《地官》舞师，教皇舞帅而舞旱暵之事。《春官》乐师，有皇舞，故书皇皆作"翌"。郑司农云：翌舞者，以羽覆冒头上，衣饰翡翠之羽，寻旱暵求雨而服翡翠者，以翠为知雨之鸟故。鹬冠者，亦曰术氏冠，《汉·五行志》注引《礼图》。又曰圜冠。庄周言，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屦者知地形，缓佩玦者事至而断，《田子方篇》文，《五行志》注引《逸周书》文同。《庄子》圜字作鹬，《续汉书·舆服志》云：鹬冠前圜。明灵星舞子吁嗟以求雨者谓之儒，故曾晳之狂而志舞雩，原宪之狷而服华冠，华冠，亦名建华冠。《晋书·舆服志》以为即鹬冠，华皇亦一声之转。皆抗节不耦于同世辟儒，愿一返太古[4]，忿世为巫，辟易放志于鬼道。阳狂为巫，古所恒有，曾、原二生之志，岂以灵保自居哉，亦以是通其狂惑而已。董仲舒不喻斯旨，而崇饰土龙，乞效虾蟆，燔豭荐脯，以事求雨，其愚亦甚。然则上古之儒固然，非后世所宜效也[5]。古之儒

① 《国故论衡》作："有鲁般刻鸢，由基中杨，李广射寝石，矢没羽，荆轲以匕首擿秦王，中铜柱入尺。女娲销石，共工触柱，觟觽治狱，屈轶指佞，黄帝骑龙，淮南王犬吠天上，鸡鸣云中。"下接"日中有三足乌"。

② 《国故论衡》作"道、墨、刑法"。

③ "太古始有儒"句，《国故论衡》无。

④ "皆抗节不耦于同世辟儒"至此，《国故论衡》无，下作"皆以忿世为巫"。

⑤ "亦以是通其狂惑而已"句，《国故论衡》无；"然则上古之儒固然，非后世所宜效也"，《国故论衡》删去。

知天文占候，谓其多技，其后施易[1]，故号遍施于九流[2]，诸有术者，悉晐之矣。

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天官》曰：儒以道得民。说曰：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地官》曰：联师儒。说曰：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此则躬备德行为师，效其材艺为儒。养由基射白蝯，应矢而下；尹儒学御三年，受秋驾。《吕氏》曰：皆六艺之人也。《吕氏春秋·博志篇》。明二子皆儒者，儒者则足以为桢干矣。私名为儒。《七略》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周之衰，保氏失其守，史籀之书，商高之算，蜂门之射，范氏之御，皆不自儒者传。故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盖名契乱，执辔调御之术，亦浸不正，自诡鄙事，言君子不多能，为当世名士显人隐讳，及《儒行》称十五儒，《七略》疏晏子以下五十二家，皆粗明德行政教之趣而已，未及六艺也。其科于《周官》为师，儒绝而师假摄其名。然自孟子、孙卿，多自拟以天子三公。智效一官，奔走御侮则劣矣[3]。而末流亦弥以哗世取宠。及郦生、陆贾、平原君之徒，餔歠不廉，德行亦败，乃不如刀笔吏。是三科者，皆不见五经家。汉世称今文家为五经家，其古文家则不用是称，见《后汉书·贾逵传》[4]。往者，商瞿、伏胜、穀梁

---

[1] "其后施易"句，《国故论衡》无。

[2] 《国故论衡》作"故号遍施于九能"。

[3] 《国故论衡》作"德征一国则劣矣"。

[4] 《国故论衡》无此脚注。

赤、公羊高[1]、高堂生诸老，《七略》格之，名不登于儒籍。若孙卿书叙录云：韩非号韩士[2]，又浮丘伯皆受业为名儒，此则韩非、浮丘并得名儒之号，乃达名矣。《盐铁论·毁学篇》云：包丘子修道白屋之下，乐其志，或非专治经者。儒者游文，而五经家专致，五经家骨鲠守节过儒者，其辩智弗如。传经之士，古文家吴起、李克、虞卿、孙卿而外，知名于七国者寡。儒家则孟子、孙卿、鲁连、宁越皆有显闻。盖五经家不务游说，其才亦未逮也。至汉则五经家复以其术取宠，本末兼陨，然古文家独异是。古文家务求是，儒家务致用，亦各有适，兼之者李克、孙卿数子而已。五经家两无所当，顾欲两据其长，《春秋》断狱之言，遂为厉于天下。此其所以为异。自太史公始以儒林题齐、鲁诸生，徒以润色孔氏遗业，又尚习礼乐弦歌之音，乡饮大射，事不违艺，故比而次之。及汉有董仲舒、夏侯始昌、京房、翼奉之流，多推五胜，又占天官风角，与鹬冠同流。草窃三科之间，往往相乱。晚有古文家出，实事求是，征于文不征于献，诸在口说，虽游、夏犹黜之，斯盖史官支流，与儒家益绝矣。

冒之达名，道、墨、名、法、阴阳、小说、诗赋、经方、本草、蓍龟、形法，此皆术士，何遽不言儒。局之类名，蹴鞠弋道近射，历谱近数，调律近乐，犹虎门之儒所事也。若以类名之儒言之，赵爽、刘徽、祖暅之明算，杜夔、阮咸、万宝常之知乐，悉成周之眞儒矣[3]。今独以传经为儒，以私名则异，以达名

---

① 《国故论衡》下有"浮丘伯"。

② 《国故论衡》作"韩非号韩子"。

③ 《国故论衡》作"悉古之眞儒矣"。

类名则偏，要之题号由古今异。儒犹道矣，儒之名于古〈通〉为术士[1]，于今专为师氏之守；道之名于古通为德行道艺，于今专为老聃之徒。道家之名，不以题诸方技者，嫌与老氏掍也。传经者复称儒，即与私名之儒淆乱。《论衡·书解篇》曰：著作者乃文儒[2]，说经者为世儒。世儒业易为，文儒之业，卓绝不循。彼虚说，此实篇。案所谓文儒者，九流六艺太史之属；所谓世儒者，即今文家。以此为别，似可就部，然世儒之名，又不可施诸刘歆、许慎也[3]。孔子曰：今世命儒亡常，以儒相诟病，谓自师氏之守以外，皆宜去儒名便，非独经师也。以三科悉称儒，名实不足以相检，则儒常相伐，故有理情性陈王道，而不丽保氏，身不跨马，射不穿札，即与驳者，则以呰窳诟之，以多艺匡之，是以类名宰私名也。有审方圆正书名，而不经品庶，不念烝民疾疢，即与驳者，则以他技诟之，以致远匡之，是以私名宰类名也。有综九流斋万物，而不一孔父，不蹩躠为仁义，即与驳者，则以左道诟之，以尊师匡之，是以私名宰达名也。今令辩士[4]艺人閎眇之学，皆弃捐儒名，避师氏贤者路，名喻则争自息。不然，儒家称师，艺人称儒，其余各名其家，泛言曰学者，旁及诗赋，而泛言曰文学。文学名，见《韩子》，亦七国时泛称也[5]。亦可以无相鏖矣。礼乐世变易，射御于今粗粝，无参连白矢交衢和鸾之技，独书数仍世益精博。凡为学者，

(1) "通"字，据《国故论衡》补。

(2) 《国故论衡》作"著作者为文儒"。

(3) 《国故论衡》作"又非可加诸刘歆、许慎也"。

(4) 《国故论衡》作"今令术士"。

(5) 《国故论衡》作"盖亦七国时泛称也"。

未有能舍是者也。三科虽殊，要之以书数为本。

【说明】 本文原载《国粹学报》第五年己酉第十号，一九〇九年十一月二日（宣统元年九月二十日）出版，收入《国故论衡》下卷。今据《国粹学报》录出。

与邓实书

（一九〇九年）

昨闻上海有人定近世文人，笔语为五十家，以仆纡厕其列。仆之文辞，为雅俗所知者，盖论事数首而已，斯皆浅露，其辞取足便俗，无当于文苑。向作《訄书》，文实閎雅，箧中所藏，视此者亦数十首，盖博而有约，文不奄质，以是为文章职墨，流俗或未之好也。定文者以仆与谭复生、黄公度耦，二子志行，顾亦有可观者；然学术既疏，其文辞又少检格。复生气体骏利，以少习俪语，不能远师晋宋，憙用彫琢，惊而失粹，轻侠之病，睢睢相属。公度憙言经世，其体则同甫、贵与之侪，上距敬舆，下摧水心，犹不相逮。仆虽朴陋，未敢与二子比肩也。近世文士，王壬秋可谓游于其藩，犹多掩袭声华，未能独往；康长素时有善言，而稍谲奇自恣，仆亦不欲与二贤参俪。谓宜刊削鄙文，无令猥厕大衍之数，虚一不用，亦何伤于蓍卦哉。故非欲掎摭利病，泛僄时彦以自崇也，以为文生于名，名生于形，形之所限者分，名之所稽者理，分理明察，谓之知文。小学既废，

则单篇摭落，玄言日微，故俪语华靡，不揣其本而肇其末，人自以为卿云，家相誉以潘、陆，何品藻之容易乎？

仆以下姿，智小谋大，谓文学之业，穷于天监，简文变古，志在桑中，徐庾承其流化，淡雅之风，于兹沫矣。燕、许诸公，方欲上攀秦、汉，逮及韩、柳、吕、权、独孤、皇甫诸家，劣能自振。晚唐变以谲诡，两宋济以浮夸，斯皆不足邵也。将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虽容甫、申耆，犹曰采浮华、弃忠信尔。皋文、涤生，尚有谖言，虑非修辞立诚之道。夫忽略名实，则不足以说典礼，浮辞未翦，则不足以穷远致，言能经国，绌于笾豆，有司之守，德音孔胶，不达形骸智虑之表，故篇章无计簿之用，文辩非穷理之器，彼二短者，仆自以为绝焉。所以块居独处，不欲奇群彦之数者也。夫代文救僿，莫若以忠，撰录文辞，谅非急务，然彼之为是，亦云好尚所至而已。遂事既不可谏，仆之私著，出內在我，宜告以鄙怀，无令署录。玉石朱紫，庶其有分。章炳麟敂头。

【说明】 此书写于一九〇九年，录自《太炎文录》卷二。

邓实，字秋枚，广东顺德人，当时任上海《国粹学报》主编，章氏《诸子学略说》以及不少学术论文，都曾在该刊发表。

致国粹学报社书

（一九〇九年十一月二日）

国粹学报社者，本以存亡继绝为宗，然笃守旧说，弗能使光辉日新，则览者不无思倦，略有学术者，自谓已知之矣。其思想卓绝，不循故常者，又不克使之就范，此盖吾党所深忧也。

弟近所与学子讨论者，以音韵训诂为基，以周、秦诸子为极，外亦兼讲释典。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籥也；以眞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经学繁博，非闭门十年，难与斢理，其门径虽可略说，而致力存乎其人，非口说之所能就，故且暂置弗讲。音韵诸子，自谓至精，然音韵亦有数家异论，非先览顾、江、戴、孔诸家之说，亦但知其精审，不知精审之在何处也。诸子幸少异说，元明以来，亦有异论，然已无足重轻。近世则惟有训诂，未有明其义理者，故异说最少。而我所发明者，又非汉学专门之业，使魏、晋诸贤尚在，可与对谈。今与学子言此，虽复踊跃欢喜，然亦未知其异人者在何处也。其稿已付眞

笔誊写，字多汗漫，恐刻工不审，暇当斠理一过，却再寄上。

虽然，学术本以救偏，而迹之所寄，偏亦由生。近世言汉学，以其文可质验，故謍言无由妄起，然其病在短拙。自古人成事以外，几欲废置不谈。汉学中复出今文一派，以文掩实，其失则巫。若复甄明理学，此可为道德之训言，即伦理学。不足为眞理之归趣。理学诸家，皆失之汗漫，不能置答，则以不了语夺之。惟诸子能起近人之废，然提倡者欲令分析至精，而苟弄笔札者，或变为倡狂无验之辞，以相诳耀，则弊复由是生。此盖上圣所无如何也。贵报宜力图增进，以为光大国学之原，肉食者不可望，文科经科之设，恐只为具文，非在下者谁与任此。延此一线，弗以自沮。幸甚。绛顿。

【说明】 此书原载《国粹学报》第五年己酉第十号，一九〇九年十一月二日（宣统元年九月二十日）出版，附在《国学保存会报告》第三十九号《通讯》中。《太炎学说》卷一收有此书，辛酉春观鉴庐刊本。

秦 政 记

（一九一〇年）

人主独贵者，其政平；不独贵，则阶级起。唐、宋虽理，法度不如汉、明平也，亦有跨偶，非斠然一概者。明制贵其宗室孽子，诸王虽不与政柄，而公卿为伏谒；耳孙疏属，皆气稟于县官。非直异汉，唐、宋犹无是也。汉世游侠兼并，养威于下，而上不限名田，以成其厚。武帝以降，国之辅拂，不任二府，而外戚窃其柄，非直异明，唐、宋亦绝矣。要以著之图法者，庆赏不遗匹夫，诛罚不避肺府，斯为直耳。

古先民平其政者，莫遂于秦。秦皇负扆以断天下，而子弟为庶人；所任将相，李斯、蒙恬，皆功臣良吏也。后宫之属，椒房之嬖，未有一人得自遂者。富人如巴寡妇，筑台怀清，然亦诛灭名族，不使并兼。

嗟乎！韩非道“八奸”，“同床”、“在旁”、“父兄”皆与焉。世之议政者，徒讥“同床”、“在旁”，而“父兄”脱然也。秦皇以贱其公子侧室，高于世主。夫其卓绝在上，不与士

民等夷者，独天子一人耳。天子以秉政劳民贵，帝族无功，何以得有位号？授之以政而不达，与之以爵而不衡，诚宜下替与布衣黔首等。夫贵擅于一人，故百姓病之者寡，其余荡荡平于浣准矣。借令秦皇长世，易代以后，扶苏嗣之，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何有后世繁文饰礼之政乎？

且本所以贵者在守府，守府故亦持法，末俗以秦皇方汉孝武，至于孝文，云有高山大湫之异。自法家论之，秦皇为有守。非独刑罚依科也，用人亦然。韩非有言曰：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迁官袭级，则官职大而愈治。《显学篇》。汉武之世，女富溢尤，宠霍光以辅幼主。平生命将，尽其嬖幸卫、霍、贰师之伦，宿将爪牙，若李广、程不识者，非摧抑乃废不用。秦皇则一任李斯、王翦、蒙恬而已矣。岂无便僻之使、燕昵之谒邪？抱一司契，自胜而不为也。孝武壹怒，则大臣莫保其性；其自大守以下，虽直指得擅杀之。文帝为贤矣，淮南之狱，案诛长吏不发封者数人，迁怒无罪，以饰己名。世以秦皇为严，而不妄诛一吏也。由是言之，秦皇之与孝武，则犹高山之与大湫也；其视孝文，秦皇犹贤也。

尝试计之，人主独贵者，政亦独制。虽独制，必以持法为齐。释法而任神明，人主虽圣，未无不知也。惑于左右，随于文辩，己之错置方制于人，何以为独制？自汉、唐以下者，能既其名，顾不能既其实，则何也？建国之主，非起于草茅，必拔于搢绅也。拔于搢紳者，贵族姓而好等

制；起于草茅者，其法无等，然身好踢跌，而不能守绳墨。独秦制本商鞅，其君亦世守法。韩非道昭王有病，百姓里买牛而家为王祷。王曰："非令而擅祷，是爱寡人也。夫爱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与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乱亡之道也，不如人罚二甲而与为治。"秦大饥，应侯请发五苑以活民，昭襄王曰："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赏。今发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也。夫发五苑而乱，不如弃枣蔬而治。"要其用意，使君民不相爱，块然循于法律之中。秦皇固世受其术，其守法则非草茅、搢紳所能拟已。

秦政如是，然而卒亡其国者，非法之罪也。六国公族，散处闾巷之间，秦以守法，不假以虚惠结人。公族之欲复其宗庙，情也。且六国失道，不逮王纣，战胜而有其地，非其民倒戈也审。武王既歾，成王幼弱，犹有商、奄之变。周继世而得胡亥者，国亦亡；秦继世而得成王者，六国亦何以仆之乎？如贾生之《过秦》，则可谓短识矣。

秦皇微点，独在起阿房，及以童男女三千人资徐福，诸巫食言，乃坑术士以说百姓。其他无过。

【说明】 本文北京图书馆藏有章氏手稿，在标题下注有"故事部"三字。（原作"学术流别部"，后涂去。）查一九一〇年在日本排印的《学林》第二册"故事部"载有此文，后辑入《文录》卷一，今据手稿录出。

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

（一九一〇年）

本国沒有学说，自己沒有心得，那种国，那种人，教育的方法，只得跟别人走。本国一向有学说，自己本来有心得，教育的路线自然不同。几位朋友，你看中国是属于那一项？中国现在的学者，又属于那一项呢？有人说，中国本来沒有学说，那种话，前几篇已经驳过。还有人说，中国本来有学说，只恨现在的学者沒有心得，这句话虽然不合事实，我倒愿学者用为药石之言。中国学说，历代也有盛衰，大势还是向前进步，不过有一点儿偏胜。只看周朝的时候，礼、乐、射、御、书、数，喚作六艺，懂得六艺的多。却是历史政事，民间能够理会的很少。哲理是更不消说得。后来老子、孔子出来，历史、政事、哲学三件，民间渐渐知道了。六艺倒渐渐荒疏。汉朝以后，懂六艺的人虽不少，总不如懂历史政事的多。汉朝人的懂六艺，比六国人要精许多。哲理又全然不讲。魏、晋、宋、齐、梁、陈这几代，讲哲理的，尽比得上六国。六艺里边的事，礼、乐、数

是一日明白一日。书只有形体不正一点，声音训诂仍旧沒有失去，历史政事自然是容易知道的，总算沒有甚么偏胜。隋、唐时候，佛教的哲理，比前代要精审，却不过几个和尚。寻常士大夫家，儒道名法的哲理就沒有。数学、礼学，唐初都也不坏，从中唐以后就衰了。只剩得历史、政事，算是唐人擅场。

宋朝人分做几派：一派是琐碎考据的人，像沈括、陆佃、吳曾、陆游、洪适、洪迈都是。王应麟算略略完全些，也不能见得大体。在六艺里面，不能成就得那一种；一派是好讲经世的人，象苏轼、王安石、陈亮、陈傅良、叶适、马端临都是。陈、马还算着实，其余不过长许多浮夸的习气，在历史既沒有眞见，在当时也沒有实用；一派是专求心性的人，就是理学家了。比那两家，总算成就。除了邵雍的鬼话，其余比魏、晋、宋、齐、梁、陈的学者，也将就攀得上。历史只有司马光、范祖禹两家。司马光也还懂得书学。此外象贾昌朝、丁度、毛居正几个人，也是一路。象宋祁，刘攽，刘奉世，曾巩又是长于校勘，原是有津逮后学的功。但自己到底不能成就小学家。宋、元之间，几位算学先生出来，倒算是独开蹊径。大概宋朝人还算沒有偏胜，只为不懂得礼，所以大体比不上魏、晋几朝。（中国有一件奇怪事，老子明说：“礼者，忠信之薄”，却是最精于礼，孔子事事都要请教他。魏晋人最佩服老子，几个放荡的人，并且说：“礼岂是为我辈设”，却是行一件事，都要考求典礼。晋朝末年，礼论有八百卷，到刘宋朝何承天，删并成三百卷；梁朝徐勉集五礼，共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可

见那时候的礼学，发达到十分。现在《通典》里头，有六十卷的礼，大半是从那边采取来，都是精审不磨，可惜比照原书，只存二十分之一了。那时候人，非但在学问一边讲礼，在行事一边，也都守礼。且看宋文帝已做帝王，在三年服里头生太子，还瞒着人不敢说，象后代的帝王，那里避这种嫌疑，可见当时守礼的多，就帝王也不敢公然逾越。更有怪的，远公原是个老和尚，本来游方以外，却又精于《丧服》。弟子雷次宗，也是一面清谈，一面说礼，这不是奇怪得很么？宋朝的理学先生，都说服膺儒术，规行矩步，到得说礼，不是胡涂，就是谬妄。也从不见有守礼的事。只是有一个杨简，通称杨慈湖。在温州做官，遇着钦差到温州来，就去和他行礼，主人升自阼阶，宾升自西阶，一件一件，都照着做，就算奇特非常；到底不会变通，也不算甚么高。照这样看来，理学先生，远不如清谈先生。）

明朝时候，一切学问，都昏天黑地，理学只袭宋儒的唾余，王守仁出来，略略改变些儿，不过是沟中沒有蛟龙，鲵鳍来做雄长，连宋朝人的琐碎考据，字学校勘都沒有了。典章制度，也不会考古，历史也是推开一卷。中间有几位高的，音韵算陈第，文字训诂算黄生，律吕算朱载堉，攻《伪古文尚书》算梅鷟，算学也有个徐光启，但是从别处译来，并不由自己思索出来，所以不数。到明末顾炎武，就渐渐成个气候。

近二百年来，勉强唤做清朝，书学、数学、礼学，昏黑了长久，忽然大放光明，历史学也比得上宋朝。象钱大昕、梁玉绳、邵晋涵、洪亮吉，都着实可以名家。讲政事的

颇少，就有也不成大体。或者因为生非其时，不犯着讲政事给他人用，或者看穿讲政事的，总不过是浮夸大话，所以不愿去讲。至于哲理，宋、明的理学，已经搁起一边了，却想不出一种道理去代他。中间只有戴震，做几卷《孟子字义疏证》，自己以为比宋儒高，其实戴家的话，只好用在政事一边，别的道理，也并沒得看见。宋儒在《孟子》里头翻来翻去，戴家也在《孟子》里头翻来翻去。宋儒还采得几句六朝话，（大概皇侃《论语疏》里头的话，宋儒采他的意颇多。）戴家只会墨守《孟子》。孟子一家的话，戴家所发明的，原比宋儒切实，不过哲理不能专据孟子。（阮元的《性命古训》，更不必评论了。）到底清朝的学说，也算十分发达了。只为沒有讲得哲理，所以还算一方偏胜。若论进步，现在的书学、数学，比前代都进步。礼学虽比不上六朝，比唐、宋、明都进步。历史学里头，钩深致远，参伍比校，也比前代进步。经学还是历史学的一种，近代比前代进步。本国的学说，近来既然进步，就和一向沒有学说的国，截然不同了。但问进步到这样就止么，也还不止。六书固然明了，转注、假借的眞义，语言的缘起，文字的孳乳法，仍旧模糊，沒有寻出线索，可不要向前去探索么！礼固然明了，在求是一边，这项礼为甚么缘故起来？在致用一边，这项礼近来应该怎样增损？可不要向前去考究么！历史固然明了，中国人的种类，从那一处发生？历代的器具，是怎么样改变？各处的文化，是那一方盛？那一方衰？盛衰又为甚么缘故？本国的政事，和别国比较，劣的在那一块？优的在那一块？又为甚么有这样政

事？都沒有十分明白，可不要向前去追寻么？算学本是参酌中外，似乎那边盛了。这边只要译他就够。但以前有徐光启采那边的，就有梅文鼎由本国寻出头路来；有江永采那边的，就有钱大昕、焦循由本国寻出头路来。直到罗士琳、徐有壬、李善兰，都有自己的精思妙语，不专去依傍他人。后来人可不要自勉么！近来推陈出新的学者，也尽有几个。若说现在学者沒有心得，无论不能概全国的人，只兄弟自己看自己，心得的也很多。到底中国不是古来沒有学问，也不是近来的学者沒有心得，不过用偏心去看，就看不出来。怎么叫做偏心？只佩服别国的学说，对着本国的学说，不论精粗美恶，一概不采，这是第一种偏心。

在本国的学说里头，治了一项，其余各项，都以为无足重轻，并且还要诋毁。就象讲汉学的人，看见魏晋人讲的玄理，就说是空言，或说是异学；讲政事的人，看见专门求是，不求致用的学说，就说是废物，或说是假古玩；仿佛前人说的，一个人做弓，一个人做箭，做弓的说："只要有我的弓，就好射，不必用箭。"做箭的说："只要有我的箭，就好射，不必用弓。"这是第二种偏心。（这句话，并不是替许多学者做调人，一项学术里头，这个说的是，那个说的非，自然要辩论驳正，不可模棱了就算数。至于两项学术，就不该互相菲薄。）

这两项偏心去了，自然有头绪寻出来。但听了别国人说，本国的学说坏，依着他说坏，固然是错；就听了别国人说，本国的学说好，依着他说好，仍旧是错；为甚么缘故

呢？别国人到底不明白我国的学问，就有几分涉猎，都是皮毛，凭他说好说坏，都不能当做定论。现在的教育界，第一种错，渐渐打消几分；第二种错，又是接踵而来。比如日本人说阳明学派，是最高的学派，中国人听了，也就去讲阳明学，且不论阳明学是优是劣，但日本人于阳明学，并沒有甚么发明，不过偶然应用，立了几分功业，就说阳明学好。原来用学说去立功业，本来有应有不应，不是板定的。就象庄子说："能不龟手一也，或以侯，或不免于洴澼絖。"（不龟手，说手遇了冷不裂；洴澼絖，就是打绵。）本来只是凑机会儿，又应该把中国的历史翻一翻。明末东南的人，大半是讲阳明学派，如果阳明学一定可以立得功业，明朝就应该不亡。又看阳明未生以前，书生立功的也很不少，远的且不必说，象北宋种师道，是横渠的弟子，用种师道计，北宋可以不亡。南宋赵葵是晦庵的再传弟子，宋末保全淮蜀，都亏赵葵的力。明朝刘基，（就是人人称刘伯溫的）是参取永嘉、金华学派的人，明太祖用刘基的策，就打破陈友谅。难道看了横渠、晦庵，和永嘉、金华学派的书，就可以立得功业么？原来运用之妙，存乎其人。庄子说得好："豕零桔梗，是时为帝。"（豕零，就是药品里头的猪苓，意思说贱药也有大用。）如果着实说去，学说是学说，功业是功业，不能为立了功业，就说这种学说好，也不能为不立功业，就说这种学说坏。（学说和致用的方术不同，致用的方术，有效就是好，无效就是不好；学说就不然，理论和事实合才算好，理论和事实不合就不好，不必问他有用沒用。）现在看了日本人偶然的事，就说

阳明学好，真是道听途说了。

又象一班人，先听见宋儒谤佛，后听见汉学人谤佛，最后又听见基督教人也谤佛，就说佛学不好；近来听见日本人最信佛，又听见欧洲人也颇有许多信佛，就说佛学好；也不论佛学是好是坏。但基督教人，本来有门户之见，并说不出自己的理论来；汉学人也并不看佛书，这种话本可以搁起一边；宋儒是看过佛书了，固然有许多人谤佛，也有许多人直用佛书的话，沒有讳饰。本来宋儒的学说，是从禅宗脱化，几个直认不讳的。就是老实说直话，又有几个？里面用了佛说，外面排斥佛说，不过是装潢门面，难道有识的人，就被他瞒过么？日本人的佛学，原是从中国传去，有几种书，中国已经沒有了，日本倒还有原版，固是可宝。但日本人自己的佛学，并不能比中国人深，那种华严教、天台教的话，不过把中国人旧疏敷衍成篇。他所特倡的日莲宗、真宗，全是宗教的见解，并沒有关系学说的话。尽他说的好，也不足贵。欧洲人研究梵文，考据佛传，固然是好；但所见的佛书，只是小乘经论，大乘并沒有几种。有意讲佛学的人，照着他的法子，考求言语历史，原是不错。(本来中国玄奘、义净这班人，原是注意在此，但宋朝以后就绝了。)若说欧洲人是文明人，他既学佛，我也依他学佛，这就是下劣的见解了。

胡乱跟人，非但无益，并且有害。这是甚么缘故？意中先看他是个靶子，一定连他的坏处也取了来。日本出家人都有妻，明明是不持戒律，既信日本，就与佛学的本旨相反。欧洲人都说大乘经论，不是释迦牟尼说的，(印

度本来有这句话。）看不定的人，就说小乘好，大乘不好，那就弃菁华取糟粕了。佛经本和周公、孔子的经典不同：周、孔的经典，是历史，不是谈理的，所以真经典就是，伪经典就不是；佛经是谈理的，不是历史，只要问理的高下，何必问经是谁人所说？佛经又和基督教的经典不同：基督教是纯宗教，理的是非，并不以自己思量为准，只以上帝耶稣的所说为准；佛经不过夹杂几分宗教，理的是非，要以自己思量为准，不必以释迦牟尼所说为准。以前的人学佛，原是心里悦服，并不为看重印度国，推爱到佛经；现在人如果要讲佛学，也只该凭自己的心学去，又何必借重日本、欧洲呢？

又象一班无聊新党，本来看自国的人，是野蛮人；看自国的学问，是野蛮学问；近来听见德国人颇爱讲支那学，还说中国人民，〈是〉最自由的人民；中国政事，是最好的政事；回头一想，文明人也看得起我们野蛮人，文明人也看得起我们野蛮学问。大概我们不是野蛮人，中国的学问，不是野蛮学问了。在学校里边，恐怕该添课国学汉文。有这一种转念，原说他好，并不说他不好，但是爱教的人，本来胸中象一块白绢，惟有听受施教的话，施教的人却该自己有几分注意，不该听别人的话。何不想一想，本国的学问，本国人自然该学，就象自己家里的习惯，自己必定应该晓得，何必听他人的毁誉？别国有几个教士穴官，粗粗浅浅的人，到中国来，要知这一点儿中国学问，向下不过去问几个学究，向上不过去问几个斗方名士，本来那边学问很浅，对外人说的，又格外浅，外人看中国自然

沒有学问。古人说的，“以管窥天，以蠡测海。”（蠡本来应写蠃，俗写作螺。意思说用蠃壳去舀海水，不能晓得海的深浅。）一任他看成野蛮何妨。近来外人也渐渐明白了，德国人又专爱考究东方学问，也把经典史书略略翻去，但是翻书的人，能够把训诂文义眞正明白么？那个口述的中国人，又能够把训诂文义眞正明白么？你看日本人读中国书，约略已有一千多年，究竟训诂文义，不能明白。他们所称为大儒，这边看他的话，还是许多可笑。（象山井鼎、物观校勘经典，却也可取，因为只案字比校，并不多发议论。其余著作，不过看看当个玩具，并沒有可采处。近来许多目录家，看得日本有几部旧书，就看重日本的汉学家，是大错了。皇侃《论语疏》、《玉烛宝典》，《群书治要》几部古书，不过借日本做个书簏子。）这个也难怪他们，因为古书的训诂文义，从中唐到明代，一代模糊一代，到近来才得眞正明白。以前中国人自己尙不明白，怎么好责备别国人！后来日本人也看见近代学者的书，但是成见深了，又是发音极不正当，不晓得中国声音，怎么能晓得中国的训诂？既然不是从师讲授，仍旧不能冰释理解，所以日本人看段注《说文》、王氏《经传释词》，和《康熙字典》差不多。几个老博士，翻腾几句文章学说，不是支离，就是汗漫。日本人治中国学问，这样长久，成效不过如此，何况欧洲人只费短浅的光阴，怎么能够了解？

有说日本人欢喜附会，德国人倒不然，总该比日本人精审一点，这句话也有几分合理。日本人对着欧洲的学说，还不敢任意武断。对着中国的学说，只是乱说乱造，

或者徐福东来，带了许多燕、齐怪迂之士，这个遗传性，至今还在？欧洲人自然沒有这种荒谬，到底时候太浅，又是沒有师授，总是不解，旣然不解，他就说是中国学问，比天还要高，中国人也不必引以为荣。古人说，"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原是看品题人是甚么？若是沒有品题的资格，一个门外汉，对着我极口称赞，又增甚么声价呢？听了门外汉的品题，当作自己的名誉，行到教育一边，也有许多毛病。往往这边学究的陋话，斗方名士的谬语，传到那边，那边附会了几句，又传到这边，这边就看作无价至宝；也有这边高深的话，传到那边，那边不能了解，任意胡猜，猜成了，又传到这边，这边又看作无价至宝，就把向来精深确实的话，改做一种淺陋荒唐的话。这个结果，使学问一天堕落一天。

几位朋友，要问这种凭据，兄弟可以随意举几件来。

（一）日本人读汉字，分为汉音、吳音、唐音各种。却是发音不准，并不是中国的汉音、唐音、吳音本来如此，不过日本人口舌崛强，学成这一种奇怪的音。现在日本人说，他所读的，倒是中国古来的正音，中国人也颇信这句话。我就对那个人说，中国的古音，也分二十几韵，那里象日本发音这样简单？古音或者沒有凭据，日本人所说的古音，大概就是隋唐时候的音。你看«广韵»现在，从«广韵»追到唐朝的«唐韵»、隋朝的«切韵»，并沒有甚么大变动。照«广韵»的音切切出音来，可象日本人读汉字的声音么？那个人说，怎么知道«广韵»的声音不和日本声音一样？我说，一项是声纽，（就是通称字母的。）两项是四

声，从隋唐到现在，并沒有甚么大改，日本可有四声么？可有四十类细目么？至于分韵，元明以来的声音，比《广韵》减少，却比日本还多。日本人读汉字，可能象《广韵》分二百六韵么？你看从江苏沿海到广东，小贩做工的人，都会胡乱说几句英语，从来声音沒有读准，假如几百年后，英国人说，“我们英国的旧音失去了，倒是中国沿海的人，发得出英国的旧音”，你想这句话，好笑不好笑？

（二）日本人常说：“日本人读中国的古文就懂得，读中国的现行的文就不懂得，原来中国文体变了，日本人作的汉文，倒还是中国的古文。”这句话，也颇有人相信，我说：日本的文章，用助词非常的多，因为他说话里头助词多，所以文章用助词也多。中国文章最爱多用助词的，就是宋、元、明三朝，所以日本人拿去强拟，真正隋唐以前的文章，用助词并不多。日本可能懂得么？至于古人辞气，和近来不很相同，就中国人粗称能文的，还不能尽解，更何论日本人？自从王氏做《经传释词》，近来马建忠分为八品，做了一部《文通》，原是用法文比拟，却并沒有牵强，大体虽不全备，中国的词，分起来，总有十几品，颇还与古人辞气相合，在中国文法书里边，也算铮铮佼佼了！可笑有个日本人儿岛献吉，又做一部《汉文典》，援引古书，也沒有《文通》的完备，又拿日本诘诎聱牙的排列法去硬派中国文法，倒有许多人说儿岛的书，比马氏好得多，因为马氏不录宋文，儿岛兼录宋文。不晓中国的文法，在唐朝早已完备了，宋文本来沒有特别的句调，录了有什么用？宋文也还可读，照着儿岛的排列法，语势蹇涩，反变

成文理不通，比马氏的书，眞是有霄壤之隔，近来中国反有人译他的书，唉！眞是迷了。日本几个老汉学家，做来的文字，总有几句不通，何况这位儿岛学士。现在不用拿两部书比较，只要请儿岛做一篇一千字长的文章，看他语气顺不顺，句调拗不拗？再请儿岛点一篇«汉书»，看他点得断点不断？就可以试验得出来了！

（三）有一个英国人，说中国的言语，有许多从外边来，就象西瓜、芦菔、安石榴、蒲桃（俗写作葡萄）是希腊语，师子是波斯语，从那边传入中国。这句话，近来信的虽不多，将来恐怕又要风行。要晓这种话，也有几分近理。却是一是一非，要自己检点过。中国本来用单音语，鸟兽草木的名，却有许多是复音语。但凡有两字成一个名的，如果两字可以分解得开，各自有义，必不是从外国来。如果两字不能分解，或者是从外国来。蒲桃本不是中国土产，原是从西域取来，枝叶既不象蒲，果实也不象桃，唤做蒲桃，不合中国语的名义，自然是希腊语了。师子、安石榴，也是一样。象西瓜就不然，瓜是蓏物的通名，西瓜说是在西方的最好。两个都有义，或者由中国传到希腊去，必不由希腊传到中国来。芦菔也是中国土产，«说文»已经列在小篆，两个字虽则不能分解，鸟兽草木的名，本来复音语很多，也象从中国传入希腊，不象从希腊传入中国。至于彼此谈话，偶然一样，象父母的名，全地球沒有大异。中国称兄做昆，转音为哥；鲜卑也称兄为阿干。中国称帝王为君，突厥也称帝王为可汗。中国人自称为我，拉丁人也自称为爱伽。中国吳语称我辈为阿旁，

(«洛阳伽蓝记»,自称阿侬,语则阿旁。)梵语也称我辈为阿旁。中国称彼为他,梵语也称彼为多他。中国叹词有呜呼,梵语也是阿蒿。这种原是最简的语,随口而出,天籁相符,或者古来本是同种,后来分散,也未可知?必定说甲国的语,从乙国来;乙国的话,从甲国去,就是全无凭据的话了。(象日本许多名词,大半从中国去,蒙古的黄台吉,就是从中国的皇太子变来;满洲的福晋,就是从中国的夫人变来,这种都可以决定。因为这几国都近中国,中国文化先开,那边没有名词,不得不用中国的话,所以可下断语;若两国隔绝得很远的,或者相去虽近,文化差不多同时开的,就不能下这种断语。)有人说中国象形文字从埃及传来;也有说中国的干支二十二字,就是希腊二十二个字母,这种话全然不对。象形字就是画画,任凭怎么样草昧初开的人,两个人同对着一种物件,画出来总是一样。何必我传你,你传我?干支二十二字,甲、己、庚、癸是同纽,辛、戌是同纽,戊、卯、未,古音也是同纽,譬如干支就是字母,应该各字各纽,现在既有许多同纽的音,怎么可以当得字母?这种话应该推开。

(四)法国人有句话,说中国人种,原是从巴比伦来。又说中国地方,本来都是苗人,后来被汉人驱逐了。以前我也颇信这句话,近来细细考证,晓得实在不然。封禅七十二君,或者不纯是中国地方的土著人,巴比伦人或者也有几个。因为«穆天子传»里面谈的,颇有几分相近;但说中国人个个是从巴比伦来,到底不然。只看神农姜姓,姜就是羌,到周朝还有姜戎,晋朝青海有个酋长,名叫姜聪,

看来姜是羌人的姓。神农大概是青海人；黄帝或者稍远一点，所以《山海经》说在身毒，(身毒就是印度）又往大夏去采竹，大夏就是唐代的睹货逻国，也在印度西北，或者黄帝是印度人。到底中国人种的来源，远不过印度、新疆，近就是西藏、青海，未必到巴比伦地方。至于现在的苗人，并不是古来的三苗；现在的黎人，并不是古来的九黎。三苗、九黎，也不是一类。三苗在南，所以说左洞庭，右彭蠡；九黎在北，所以《尚书》、《诗经》，都还说有个黎侯，黎侯就在山西。蚩尤是九黎的君（汉朝马融说的），所以黄帝从西边来，蚩尤从东边走，赶到涿鹿，就是现在直隶宣化府地界，才决一大战。如果九黎、三苗，就是现在的黎人、苗人，应该在南方决战，为甚么到北方极边去，难道苗子与韃子杂处？三苗是缙云氏的子孙（汉朝郑康成说的），也与苗子全不相干。近来的苗人、黎人，汉朝称为西南夷，苗字本来写髳字，黎字本来写俚字，所以从汉朝到唐初，只有髳俚的名，从无苗黎的名。后来人强去附会《尚书》，就成苗黎，别国人本来不晓得中国的历史，听中国人随便讲讲，就当认眞。中国人自己讲错了，由别国去一翻，倒反信为确据，你说不要笑死了么？

（五）法国又有个人说，《易经》的卦名，就是字书，每爻所说的话都是由卦名的字，分出多少字来。这句话，颇象一百年前焦循所讲的话。有几个朋友也信他。我说，他举出来的字，许多小篆里头沒有，岂可说文王作《周易》的时候，已经有这几个字？况且所举的字，音也并不甚合，在别国人想到这条路上，也算他巧思，但是在中国人

只好把这种话做个谈柄，岂可当他实在？如果说他说的巧合，所以可信，我说明朝人也有一句话，比法国人更巧：他说《四书》本来是一部书，《论语》后边说，“不知命”；接下《中庸》，开口就说：“天命之谓性”，《中庸》后边说，“予怀明德”；接下《大学》，开口就说：“在明明德”；《大学》后边说：“不以利为义，以义为利也”；接下《孟子》开口就说：“王何必曰利，亦曰仁义而已矣。”这到是天然凑合，一点沒有牵强。但是信得这句话么？明末人说了，就说他好笑，法国人说了，就说他有理，不是自相矛盾的么？

上面所举，不过几项，其余也举不尽。可见别国人的支那学，我们不能取来做准，就使是中国人不大深知中国的事，拿别国的事迹来比附，创一种新奇的说，也不能取来做准。强去取来做准，就在事实上生出多少支离，学理上生出多少谬妄，并且捏造事迹。（捏造事迹，中国向来沒有的，因为历史昌明，不容他随意乱说；只有日本人，最爱变乱历史，并且拿小说的假话，当做实事。比如日本小说里头，说源义经到蒙古去，近来人竟说源义经化做成吉思汗，公然形之笔墨了。中国下等人，相信《三国志演义》里头许多怪怪奇奇的事，当做眞实，但在略读书的人，不过付之一笑。日本人竟把小说的鬼话，踵事增华，当做眞正事实，好笑极了。因为日本史学，本来不昌，就是他国正史，也大半从小说传闻的话翻来，所以前人假造一种小说，后来人竟当做眞历史，这种笑柄，千万不要风行到中国才好！）舞弄条例，都可以随意行去，用这个做学说，自己变成一种庸妄子；用这个施教育，使后生个个变成庸妄子，

就使沒有这种弊端，听外国人说一句支那学好，施教育的跟着他的话施，受教育的跟着他的话受，也是不该！上边已经说了，门外汉极力赞扬，并沒有增甚么声价，况且别国有这种风尙的时候，说支那学好；风尙退了，也可以说支那学不好。难道中国的教育家，也跟着他旅进旅退么？现在北京开经科大学，许欧洲人来游学，使中国的学说，外国人也知道一点儿，固然是好；但因此就觉得增了许多声价，却是错了见解了。大凡讲学问施教育的，不可象卖古玩一样，一时许多客人来看，就贵到非常的贵；一时沒有客人来看，就贱到半文不値，自国的人，该讲自国的学问，施自国的教育，象水火柴米一个样儿，贵也是要用，贱也就要用，只问要用，不问外人贵贱的品评。后来水越治越清，火越治越明，柴越治越燥，米越治越熟，这样就是教育的成效了。至于别国所有中国所无的学说，在教育一边，本来应该取来补助，断不可学《格致古微》的口吻，说别国的好学说，中国古来都现成有的。要知道凡事不可弃己所长，也不可攘人之善。弃己所长，攘人之善，都是岛国人的陋见，我们泱泱大国，不该学他们小家模样！

【说明】 本文录自《教育今语杂志》第三期，一九一〇年五月八日（共和二千七百五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在日本出版，署名“独角”，收入吳齐仁：《章太炎的白话文》，一九一七年泰东图书馆铅字排印本。

按：《教育今语杂志》，章太炎主办，封面也是章氏手书，“以

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教育为宗旨”，“演以浅显之语言”，故名。分“社说”、“中国文字学”、“群经学”、“诸子学”、“中国历史学”、“中国地理学”、“中国教育学”、“附录”八类，月刊，一九一〇年三月十日（正月二十九日）创刊，“缘起”、“章程”，似为章氏门人钱玄同所写。其中“社说”，每由章氏自拟，文字类“演说”，都是“今语”。

致留日满洲学生书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

满洲在东留学生诸君鉴：武昌义旗既起，人心动摇，贵政府岌岌不遑自保，君等滞在海东，岂无眷念，援借外兵之志，自在意中，此大误也。

所谓民族革命者，本欲复我主权，勿令他人攘夺耳，非欲屠夷满族，使无孑遗，效昔日扬州十日之为也；亦非欲奴视满人不与齐民齿叙也。曩日大军未起，人心郁勃，虽发言任情，亦无尽诛满人之意。今江南风靡，大势已成，耆定以还，岂复重修旧怨。东方一二妄人，志在兼并他人土地，妄作莠言，以动贵政府之听。不知贵政府之旧交，首在俄罗斯，其次则欧、美诸国。与彼国交通使命，建设商场，不过三十余岁，借口旧交，其实安在？彼国旧交之域，气〔无〕过高丽。今观彼国之待高丽，他日之于满洲可知也。贵政府一时皇恐，亦或堕其术中，君辈满洲平民，于此眞无利益。抚心自问，满洲人之智力，能过于高丽人乎？若在彼国钳制之下，监察森严，一举手一动足而不

可得，君辈虽智识短浅，何遽不念是哉？若大军北定宛平，贵政府一时倾覆，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优游共和政体之中，其乐何似？我汉人天性和平，主持人道，既无屠杀人种族之心，又无横分阶级之制，域中尚有蒙古、回部、西藏诸人，既皆等视，何独薄遇满人哉？四年前曾说肃王，晓以此意，肃王心亦默知。彼爱新觉罗之皇族，犹不弃遗，何况君辈惟是编氓，何所用其猜忌耶？诸君对于此事，不须忧虑，幸各安怀，明哲自爱，阳历十月十日。

【说明】 此书原载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清肃王与革命党之关系》一文中，《太炎文录》未收。据《革命逸史》称："辛亥八月，武昌起义，章太炎尚羁留东京，时满洲留日学生，惊慌万状，有主张向日本借兵，故太炎作书正告之。"